

戒严一日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戒严一日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在《戒严一日》
征文组稿会上的讲话
(代序言)

周克玉

总政文化部发起的《戒严一日》征文，是一次很适时、很有意义的活动。

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对我军是一次重大考验。斗争的实践说明，我们这支军队政治上是合格的。我们这支军队，与国内、国外的敌人都打过仗，但从没有遇到过这样复杂、这样特殊的情况。邓主席在分析这场反革命暴乱原因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这里所说的大气候，重要的一点便是国际反共势力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的阴谋。早在1949年的建国前夕，美国的当权者艾奇逊就竭力鼓吹在中国培植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希望这些人“终于会再显身手”，使中国倒退到美国的怀抱里。五十年代后期，杜勒斯提出以“自由主义化”为基石，颠覆社会主义的构想，即所谓“用和平手段”鼓励“内部演化”。他们提出这一设想是因为通过多次较量证明，军事上要想征服中国

是不可能的。于是他们就寄希望于和平演变，“不战而胜”。近几年来，借我们对外开放之机，一些国际反共势力大肆搞思想文化渗透，煽动人民对社会主义的敌视情绪。在国内，一些敌视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也遥相呼应，竭力吹捧资本主义、谩骂社会主义。这次暴乱的形成，正是由于国际反共势力插手，国内一小撮坏人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学生所致。正如邓主席所指出的，在部队执行戒严任务期间，由于一小撮坏人混在那么多青年学生和围观的群众中间，阵线一时分不清楚，使我们许多应该采取的行动难以出手。因此，我们说，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是在特殊的历史时刻担负的特殊任务。

发起《戒严一日》征文，用文字形式来反映这场重大斗争，非常必要。这次学潮之所以发展成动乱，除了上面所讲到的根本原因之外，大家都知道，在一段时间内，我们一些宣传舆论的错误导向，也起了很不好的作用。痛定思痛，牢牢占领宣传舆论阵地十分重要。

杨尚昆副主席指出，我军这次进驻北京是迫不得已的，解放军是为了维护社会安宁，保证党和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保护人民的和平劳动而进驻的。一段时间内，许多人对此不理解。通过学习邓主席的讲话和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通过我军执行戒严任务的实际行动和我们的宣传工作，现在误解已逐步消除，绝大多数同志对当前这场斗争已经有了正确的理解和认识。但还远未达到完全消除误解、隔阂和对立情绪的程度。要使广大群众真正达到了解事情真相，理解党和政府所采取的这一正确、必要的措施，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上来，还要做大量的工作。

决定发起这次征文，就是要反映出历史的真实，通过参加执行

戒严任务的解放军、武警和公安干警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所感，把历史的本来面貌告诉人民。这不仅对我们光荣牺牲的烈士、英勇负伤的官兵和戒严部队的全体同志是个很好的纪念，同时有助于人民群众，包括国外人士了解平息反革命暴乱事实真相，分清是非曲直。

征文活动要以邓主席的讲话和四中全会精神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要用邓主席讲话的立场和观点来揭示这场反革命暴乱的原因、必然性及其性质，分析动乱中发生的各种事情。征文要用事实说话。在执行戒严任务过程中，部队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感人至深、可歌可泣、催人泪下的生动事迹。要通过实实在在的具体事例，来反映戒严部队广大指战员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思想品质；反映人民军队爱人民，人民解放军是人民子弟兵这一本质特征；反映首都广大人民群众支持、爱护、帮助戒严部队的鱼水情谊。我们戒严部队的广大指战员，都是坚决执行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命令和指示的，想尽一切办法保护群众，不然部队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伤亡？部队在复杂、险恶的斗争面前忍辱负重，保持了高度的克制、忍让。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是人民子弟兵，她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尽管部队刚进城时，部分群众不理解，但始终有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支持我们执行任务，许多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和抢救我们的干部战士，精神很感人。这也是征文内容的组成部分。我们的每一位作者都要有严肃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写，用事实说话。只有符合历史真实的东西才有说服力、生命力。

征文作品要公开出版，各级政治机关要很好地审查把关。好在事情刚刚过去，大家记忆犹新，有充分的条件把这次征文搞好。

希望各级领导和政治机关，当作一件大事去抓。希望具体承办征文工作的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下大力组织好，向广大读者奉献一部好的作品。



《戒严一日》上集

目 录

- 代序言周克玉(1)
- 向首都重要警卫目标开进.....中校团长 李旦生等(1)
- 艰苦忍耐的三天三夜.....上校团政委 杨清福(20)
- 将军被围记.....干事 秦生祥(26)
- 戒严中的第一次流血.....中尉干事 任 斌(32)
- 我们终于站稳了脚跟.....少将 芦光祖(38)
- 十五分钟的恋人“情话”.....战士 余长海(42)
- 婚礼,在集结地域举行.....中尉干事 旺旺坤(44)
- 扁担床.....中尉连长 李晓磊(48)
- 比比心灵.....上士班长 毕晓波(50)
- 突击抢制炊事车篷布.....分厂厂长 刘凤君(53)
- 圣殿轶事.....上尉干事 崔 维(56)
- “F75”在行动.....郭德华 何文亭 傅俊(60)
- 守卫大会堂.....上尉干事 倪福田(64)
- 医疗队开赴人民大会堂.....副主任军医 田慧英(71)
- 两袋方便面.....少尉干事 董瑾斜(77)

六月三日,在西单路口·····	上校参谋长	王小京(80)
铁流东进天安门·····	少将政委	王福义(84)
开进中的防暴队·····	中校副政委	李林(92)
榜样的力量·····	少将副政委	高云江(99)
浴血金水桥·····	大校副师长	佟喜刚等(103)
B10—2203,你在哪里?·····	司机	任乃平(113)
西单路口,军火!军火!·····	干事	丹丁(120)
六部口救军火·····	上校参谋长	李胜堂(147)
走进血与火·····	少将军长	傅秉耀(155)
敬礼,天安门·····	上校团长	艾虎生(161)
我们在奔进·····	中尉干事	张喜波(167)
镜头下的长安街·····	摄影记者	李靖(175)
六月三日,在“急雨”中·····	干事	王卫东(182)
戒严日记六则·····	大校副军长	左印生(185)
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大校师长	黄栋甲(190)
热血军魂·····	上尉连长	王宏伟(194)
血肉支点·····	上尉干事	刘建奇(198)
带路·····	人武部部长	屈承明(200)
两退两进都是情·····	上士	朱双喜(209)
感情洗礼·····	中尉指导员	潘荣清(213)
推车挺进广场·····	中尉连长	彭虎(216)
八闯三元桥·····	上校处长	刘新力(224)
车头永远向北京·····	上校团长	张振生(233)
砸不哑的大喇叭·····	下士放映员	朱士芳(238)

不消失的浪漫曲·····	专业军士台长	王荣义(241)
我不是“娃娃”，我是兵·····	上等兵	刘兴茂(244)
奇速用兵太阳宫·····	大校参谋长	杨福臣(251)
向共和国保证·····	大校师长	张作礼(255)
推倒“女神”像·····	中尉连长	张东旭(259)
清场前的谈判·····	上校团政委	季新国(263)
红墙外的较量·····	上校团长	罗 刚(269)
天线，在历史博物馆上升起·····	上尉	唐 成(272)
二十七分钟·····	中尉连长	李胜顺(276)
共和国，请接受女儿的敬礼·····	少校军医	王 竞(279)
黎明即将到来·····	北京市公安局	陈葆琛(286)
没有硝烟的战斗·····	北京市公安局	刘成社(295)
利剑吟·····	北京市公安局	赵庭昌(301)
大胡子兵自传·····	军士	王洪祥(305)
开进电波·····	下士班长	段晓雄(308)
不平凡的征程·····	上士	徐 准(312)
我是“王强”·····	中尉干事	王 强(317)
脱险·····	少校营长	周美清(329)
在协和，有 34 名伤员·····	军医	杨容娅(333)
送“神枪手四连”去广场·····	司机	吕敬东(341)
在机要车被围困的时刻·····	中尉参谋	邓 炜(343)
油槽车历险记·····	下士	刘洪林(348)
“我们是文职干部”·····	护士长	穆立萍(351)
戳穿谣言·····	少校教导员	白志华(357)

马嫂·····	北京市公安局	马卫东(360)
千斤顶·····	中尉连长	孙彦(370)
野村先生的心愿·····	大校政委	刁九健(372)
北京人印象·····	少尉干事	任立本(375)
母亲的泪·····	干事	李西岳(380)
姑娘,你在哪里?·····	上士文书	宋学德(383)
九万六千个包子·····	大兴县	刘士忠(388)
永生难忘的深情·····	下士	刘海清(395)
送粮记·····	中校团长	崔龙珠(398)
空中补给线·····	供应站长	吴铁林(402)
611 特别空运·····	中校助理员	洪希涛(405)
七百五十斤干粮·····	管理员	邢华玉(408)
200 顶帐篷·····	上校副参谋长	侯树森(412)
他就是残害崔国政烈士的主要凶手		
·····	少尉排长 刘汉臣 少校政治处主任	任文锁(415)
傍晚,在军事博物馆·····	中尉排长	刘崇(420)
楼顶着陆·····	中队长	连文生(422)
“冒牌警察”落网记·····	上尉股长	田学东(425)
南新华街前的哀思·····	下士	刘刚(429)
太阳伞·····	上士班长	李洪海(432)
唱支军歌给党听·····	上尉股长	吴君(436)

向首都重要警卫目标开进

5月20日国务院发布戒严令后，担负重要目标警卫任务的我部，采取各种办法，克服重重阻拦，向指定位置开进……

中校团长 李旦生

5月20日上午10时，秦涛师长命令我团迅速进驻人民日报社等重要警卫目标。

接到命令，我团火速登车向城区开进。刚出营房大门，就遭到一群不明真相居民的拦阻围攻。我们旋即闯过，紧接着又连闯两道大学生设立的封锁线。眼看已进入城区，不料，在朝阳区大北窑，被潮水般涌来的上万名市民学生团团围住，动弹不得。

摩托车开进受阻后，我们想方设法迅速摆脱困境，返回营房，原地待命。

对于北京发生的事情，我是有一定思想准备的。完成开进任务，重要的是选择一条安全可靠的开进路线。面对地图，我和副团长、作训股长，苦苦地寻找、思索。皇天不负苦心人，一条远离工厂、学院、居民稠密区的路线被我们发现了。

我立即派邓国民副参谋长沿着这条新路线侦察社情。同时，

命令部队行动起来，进行化装，调团办化工厂的五台大轿车到司令部门前待命。

邓副参谋长侦察结果令人振奋，一切都象我们所期望的那样。

师李参谋长来电话询问开进情况。

“报告参谋长，一切准备完毕，今晚我一定站在警卫点上！”我信心百倍地说。

“你们打算采用什么方法、走哪条路线开进？”

“……”

我欲言又止，不能不提防有人侦听。“对不起，这个电话不保密……”

“好，不说了。”李参谋长爽朗地叫着我的大号：“李旦生，今晚看你的啦！”

放下电话，我冷静地分析了一下开进可能遇到的困难，感到有必要再找一条备用路线，以防万一。

电话铃响个不停，这回是秦师长从师前指打来的。

“你们要开动脑筋，多想点办法，”秦师长指示说，“比如，乘火车开进，徒步开进，你们不是有大轿子车吗？……”

秦师长把师前指在开进中受阻，改道 292 医院，化装进入指挥所的经过叙述了一遍，他的话，象过电似的在我脑海里打了个闪，启发了我的灵感。

对呀，292 医院在通县和警卫目标的中间，比较偏僻，居民少，是藏龙卧虎之地。如果我把开进警卫目标分做两步走，在 292 医院建立起一个“前进基地”，就主动、灵活多了。可进，可退，可以集结休整，补充给养，即便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还可以步行进点。

“前进基地”的雏形，在我脑海里形成了。

20点30分，情况突变。八里庄桥上聚集了二千多名受高自联蛊惑煽动前来堵截军车的市民、大学生。看趋势，夜间可能会更多。

此时，我头脑中的热点是进入“前进基地”后，如何完成第二步开进任务。

23点，邓副参谋长前来报告，新路线全线被堵，不要说进北京，出通县都很难！

夜色深沉，望着繁星下持枪待命的官兵，我不禁焦灼万分！

大家七嘴八舌，出主意，想计策，我默默地倾听，默默地思索、衡量、论证着。最后，我宣布改走顺义县李桥乡，再插入官庄大道，进而向“前进基地”——292医院开进。

新的决心，带来了新的问题。地图没准备好，向导来不及找，路线没有侦察过。困难确实不小，但我相信，这是当时情况下的最佳选择！

兵贵神速，23点30分，五副地方车牌照迟迟未到，我们不能再等借车了，集合部队，马上出发！

营房内笼罩着严峻气氛。

穿着花衬衣、牛仔裤、新潮服的217名官兵携带武器、弹药、电台等物资，鱼贯登车。

我坐在第一台车上，副团长负责断后，我们决心，没有车牌也要冲出通县，闯入北京城！

当大轿车启动的瞬间，我蓦地想起，五台车同时走一条路线，一旦受阻，就会全盘皆输。于是，我马上改变主意，让一台车沿八里桥——管庄路线向“前进基地”开进。

我率四台车向通县北关桥进发。北关桥是个重要路口，堵军

车的人群喧嚣得厉害。大约有二百名武警战士和车辆被拦截，停在路边，进退两难。

说来也巧，在北关桥，我们不知不觉地跟在了蔬菜公司的运菜车的后面。驾驶员有点紧张，试图超车快跑，被我制止了，命令他沉住气，跟着菜车走。

拉菜的司机跟拦车的办交涉，很快就放行了。

我趁机对大家说，“镇静，别慌，拿出点风格来。”

我们紧跟着菜车上了北关桥。在这关键时刻，战士们突然活跃起来，伸食指、中指作V字手势，探出脑袋摇旗呐喊，嚷成一片。

第一关总算闯过去了。我由衷地为拥有这些胆大机敏的战士们而感到自豪与荣耀！

从北京警卫目标侦察归来的参谋长，在管庄西侧追上了我们。“团长，前指命令我们停止行动。北京城内形势严峻，各个交通路口都设了路障，并有上千人把守盘查，开进困难。”

怎么办？真是进退两难。

我摊开地图，目光集中在292医院周围。难道这里就没有一条隐蔽的路线吗？不可能！我和参谋们一起细心查找，与熟悉地形的参谋长商讨研究，明确了一条新的开进路线。

从管庄以北开始，我们离开了马路，驶向农田区。在洞黑的田野、村庄中迂回前进，一路上除了惊起一串犬吠外，没有任何动静和拦阻。这条路线是那些堵军车的人做梦也想不到的黄金运输线，后来又被我团和友军多次使用。

进驻了292医院，标志着“前进基地”由设想变为现实，并开始履行它中转人员、武器、物资的使命。

官兵们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欢呼雀跃。

“同志们！”我嚷地站起来，无比振奋地举起中指和食指，“我们开进的第一步是这个，胜利属于我们！”

专业军士 程志仕

5月20日夜晩，我携带600元钱、800斤粮票，乘坐救护车，向永定门火车站开进。

救护车在新街口被迫停下。这儿的大学生、市民来了个分头盘查，我们说的口径不一致，被他们抓住了把柄。

“他们是便衣探子！”

人群呼啦围上来，砸烂了玻璃，又爬上了顶棚，又踹又踩，发泄着不满情绪。

一个头缠红布条的大学生蹿上车，要搭我们的车后撤。大家都看出他没安好心，动员他下车，但他死赖着不走。

车被迫往回开，到了一个有三、四千人聚集的道路口，这个学生突然大喊，“这是军车，快来人哪！”

人们象疯了似的拥过来，将车团团围住，又砸又骂，一片混乱，救护车险些被掀翻。

政治处主任吴济收少校出来做解释工作，嗓子都喊哑了，人却越聚越多。

吴主任悄悄命令我：“你必须想方设法溜出去，给前指报信！”

他找大学生头头商量：“我们下来透透气，方便方便。”

我在人群中走动，溜了两次都被发现，堵了回来。

突然，装在纸箱里的军装被搜出来了，大学生一口咬定，我们是给天安门广场便衣队送军装的。借此，大学生站在车顶上演讲开了。

这时，我要求上厕所。好家伙，八条汉子跟着监视。

我一边解腰带，一边说：“我在北京呆了十来年了，算是半个北京人吧。要是信得过我，你们就在门口等会儿，免得被臭气熏着。信不过呢，就只好委屈各位了，对不起，我要解大手。”

他们彼此看一眼，知趣地退到了门口。

一进门，我就发现后墙上有一个 0.5 平方米的翻转窗。八条汉子一走，我马上上去用手托了托，是活动的。侧耳听听外面的动静，哥几个正神吹海聊呢。

我一个箭步攀跃上窗户，探出大半个身子，观察胡同动静，见左右无人，心中大喜，刚把大腿撩出窗户，只听“吱啦”一声响，吓得我全身僵冷如铁。

原来，在开进时，我急中出错，竟把爱人的黑便裤错穿来了。本来就瘦得绑在大腿上，刚才使劲儿这么一撩，裤裆竟扯了一个 20 公分大裂口。

唉，顾不上这许多了。咚的一声，我跳到了小胡同墙根下。顺着墙边摸到了胡同口，见百米开外是个农贸市场，直奔过去，一哈腰钻进去，仍然能听见堵截军车的喧嚣声。

我站起来，顺着马路大步走去，刚过十字路口，后面有人喊，“站住！前边的，站住。”

我拔腿往左边胡同跑，五、六个人骑自行车追。车铃按得滴铃铃直响！

“站住，你跑不了啦！”

喊声不绝于耳。

我冲进胡同一看，大吃一惊。胡同又直又宽，路灯亮堂堂的，连藏身的地方也找不着。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啊！在这危急

时刻，忽然发现路口立着四个垃圾筒，我毫不犹豫地掀着盖子，跳了进去。

这时，外面有人嚷嚷：“他准是钻胡同跑了，咱们兵分两路包抄他，快追！”

他们跑远了，我才从垃圾筒内爬出来，沿着胡同继续跑。

北京的胡同密如珠网，天黑，路又不熟，我迷了路，不知不觉地闯进了布满纵横交错管道、铁罐的工厂里，弄得我晕头转向，绕了许久，才找到大门出去。

新的一天开始了。

大街上熙熙攘攘，川流不息。王府井上空，飞机抛撒着宣传材料，人们聚在一起，议论纷纷，道路又堵了个水泄不通。

“站住，”一个中年男子揪住我的衣袖，盘问道，“你是干什么的？”

我用地道的邯郸话说：“去永定门火车站，接俺媳妇。”

“你在哪儿工作？”

“在亚运村当民工。”

“哼，我看你是大兵！头发这么短，还穿着三接头皮鞋呢，”他自鸣得意地笑道，“你露馅啦，哥们。”

我把他的手轻轻推开说：“我哥在唐山部队，当军官，这皮鞋是他送俺的。甭，不能瞎叨叨了，呆会儿误了点，接不着她，才糟心哩。”

说着，赶紧摆脱了他。

前门箭楼遥遥在望。我实在走不动了，坐在马路沿上，脱鞋一看，脚上打了两个血泡，磨得亮晶晶的，快要破了。

到永定门火车站怎么走，我心里无数。想打听，又怕别人识

破。

恰好，有个老太太跟拉三轮的说：“上永定门车站，你拉不拉呀？”

哈！天无绝人之路。我真幸运，想向导，就有送上门的。

这样，我远远地跟着三轮车，一瘸一拐地走到永定门车站，找到了团指挥所。

同志们高兴坏了，笑骂道：“你小子可来了，我们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你瞧，正在这儿凑钱买面包呢。”

“快收起你们那几个小钱吧，”我摸出珍藏的钱和粮票，往桌上一放，“瞧，一分一两不少，全在这儿呢！”

少校团政治处主任 车光明

5月20日21点，我和郭副参谋长等四人奉命化装侦察开进的路线。

在新源里，我用电话与前指取得了联系，汇报了情况。前指命令我们前往北京站一带侦察社情。

于是，我们掉回车头，继续前进。

凌晨4时，一伙设路障的把我们拦住，吵吵嚷嚷，很快聚起了上千人。

一个翘鼻子的年轻人扯着嗓子问：“你们是干什么的？”

“怀柔民政局的，到北京站接54次列车。”我按事先编好的话回答。

人群中又钻进一个头缠红布条的女将：“你们有证件吗？”

我摸摸口袋，抱歉地说：“走得急了点，忘带了。”

“是呀，谁知道北京这么乱，半夜三更的要查什么身份证。”陈

副参谋长说。

他们又去盘问司机：“你的驾驶证呢？拿出来看看。司机总不能出门不带执照吧？”

“的确忘带了。”司机回答。

“哼，好大的忘性，故意的吧？”翘鼻子讽刺说，“你们不是好人！坦白吧，是大兵，武警，还是公安局的探子？”

玻璃被敲得乒乒响，车顶上又跺又踹，不时地威胁道：“快说出你们的任务，再不说，我们就要点油箱啦！”

一听他们要烧车，我全身的血液快要凝固了似的。不！绝不能让他们把车毁了。

我早就瞄准了翘鼻子是个头目，趁他不注意，冷不防一把把他拽上车内，当人质。

“你……你们要干什么？”

这个不可一世的骄子顿时惊恐万状。

“听着，”我怒气冲冲地说，“这辆车是我私下跟朋友借的，你们谁敢把它烧了，我们就跟他玩命！你也别想跑！”

小头目转转眼珠，怕我真的跟他玩命，用商量的口吻说：“你们没带证件这是事实吧？我可没权力放走你们，真的。要不，你跟我上大学生指挥车上谈谈去，他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末了，他又补充一句，“他们市民也听指挥部的话。”

“好，”我略一思索，“我跟你去一趟，不过——”我警告说，“这期间，你要保证我的车完好无损，绝对安全！”

小头目直点头。

我想，总窝在车上，跑也跑不了，车还难逃被焚之灾，不如到指挥部接触一下大学生，见机行事，睹情开方，谅他们不敢把我怎么

样。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钱干事自告奋勇，跟我一起上了所谓大学生指挥车。

小头目抢先一步，跟四、五个大学生咬耳朵。

“你们谁是负责人？”我沉着地抢先发问。

大学生们打量着我：“你的身份证呢，拿过来看看。”

“你的身份证呢，拿出来给我看看！”我毫不客气的语气令他们吃了一惊。大概，从来无人敢要求查他们的证件吧？

啪的一声，学生证扔在桌上：“哦，山西建工学院的……”

“你该拿出证件了吧？如果再拿不出来，就把你们当便衣探子处理。”

我意识到，必须摆脱证件这个话题，才能争取主动。于是，义愤填膺地说：“这些天，我在家天天听你们宣传，要民主，要自由，要法制，可今晚我们所见所闻，和你们宣传的恰恰相反。我，一个国家干部，守法的公民，竟被你们无故劫持到这里，失去起码的人身自由……”

“谁劫持你啦？你没有证件，我才带你来的。”小头目急扯白脸地辩解。

看来，不照着他们的痛处捅，他们就不识好歹！

“我警告你们，”我神色严峻起来，“你们不是不希望发生流血事件吗？如果再这样不愉快地进行下去，我看，北京市第一起流血事件就要在这辆车上发生！而且，一切后果由你们承担！”

“怎么？”一个岁数稍大些的“眼镜”，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你想动武吗？”

“我保持自卫的权力！”

这时，几个大学生彼此交换了一个眼色，那意思我懂了，景象

在说，这家伙怎么这么凶，大概不是当兵的。

“我再说一遍。”我也适当地把口气放缓和了，“我是去北京站接54次列车的，我父亲七十多岁了，从老家来看病，路也不认识，你们看，我现在却被劫持……”我双手一摊，软中有硬地说，“好吧，我没带身份证，不能进去，你们是这样意思吧？那么，请诸位给我留下真实姓名，地址，我老父亲若是丢了，或者有个三长两短，我找你们负责！”

几个学生见我如此认真地记录他们的学生证，又凑到一块，叽叽咕咕商量了一阵，强打笑脸说：“师傅，还是接你们老爷子要紧哪，你走吧！以后别忘了出门带身份证。”

我指着被包围的汽车：“你们看看，那么多人围着，我的停车牌都给抢跑了。”

指挥部的几位“大员”派那个小头目帮我找回了停车牌，他还不遗余力地朝堵车的人们解释：“查清了，不是大兵。让开点，让开……”

我们堂堂皇皇地向北京站开进。

班长 陈贵水

别提啦，一提起那事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儿，那些人也真做得出来呀！我常对自个儿说，所有的一切，都忘了吧，让记忆里只留下那片青青的小树林吧……

5月21日早晨，团里的大轿车把我们送到顺义县火神营。是呀，离彩电中心还有百把里呢，向着警卫目标，我们徒步开进！

你说的是谁出的馊点子啊，逼我们脱裤子，检查穿的是不是军队发的绿裤衩。这小子准当过兵，说不定也穿过几条军裤衩呢，真没

良心!

过大山子，我们连几个战友被拦下了，一搜身，背心上印着的番号给露了马脚，被汽车送回了火神营。

他们光顾折腾俺战友了，我穿过人群，继续西行。

我没敢走三元立交桥，那儿人多得象赶集。绕了个弯儿，悄悄地上了机场路。谁知道，这里把守的人也不少。

“站住，干什么的？”

我自知长得不够洋派，充不了学生，就谦虚了一点，自报是民工。

怪了，这些头缠红布条的，好象是来相女婿的，转着圈地瞧俺有没有被军帽压倒伏了的头发，从头看到脚，又看看腰带，是不是部队上发的人造革……鬼名堂真不少。

“民工？”一个大个儿冷笑一声，“今儿是什么日子，民工不往家走，往城里跑？”

“这家伙准是大兵，解开看看。”

我慌了，这是要干什么，想要流氓？我无论如何不肯解！

一个家伙从背后猛地抱住我的双臂，往后一拧，接着，又上来几个，七手八脚地把我的裤子扒了下来。

“快看！里边果然是军裤衩！”他们象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兴高采烈地吆喝。

我被送回火神营。

唉，心里别提多么窝囊了。

太阳升得老高了，背上象是背上了个火盆，烤得汗流浹背。抬眼四下一张望，看见了那片迎风招展的小树林。那青青的绿意儿，能给人消愁降火哩。

进了林子，我狠下心，把裤衩和印着“奖”字的背心全都扔了，浑身上下不留下一点部队的痕迹，忍痛割爱呀！

这时候，陆陆续续来了好几个被送回来的战友。他们也学着我的样儿，咬咬牙，自身来个大清查，把犯忌的衣裳全留在了小树林。

肚子咕噜咕噜地闹“动乱”，14个小时水米没打牙，早已饥肠响如鼓了。

忍着点吧，我跟弟兄们讲，到北京吃去！

渐渐地，我们拉开了距离。这回，我选择了三元立交桥。有了前车之鉴，我多少学了点乖，不那么呆板了。混在人群中，人家喊口号，我也跟着张嘴，打“V”字手式。活跃点，反倒不容易引起注意。离开时，我得意洋洋地朝那些个头缠布条的人们亮了个时髦的手式——“V！”

胜利？！

其实离胜利还远着呢！你算算从三元桥到彩电中心还有多少里地？况且，我又不能走大路，还得绕着弯子，躲开那些关卡。

哎，算了，别提了！反正是凭着这双铁脚板，在上级规定的时间内赶到。我饿肚子走140里地，到了彩电中心的台阶上，几乎站不住了。

战士 董振军

在家常听奶奶讲古董，天上有个玉皇，地府有个阎罗王。当然，都是些迷信的啦。

没想到这回开进，我竟然在阴森洞黑的地下铁道里转悠了三天两夜。

在向广播电视部开进的道路上，我和老乡结伴而行。为了避免纠缠，我们多绕了30里路，来到了北京站。

没想到，北京站盘查得更严。我们很快就被识破了身份，我掩护老乡逃脱，自己却被押解进了临时监狱——地铁。

这里不光我一人，还关着四个军人。我们虽然素不相识，却一见如故，大家凑到一块，商量着突围的方案。

我到处转悠着，找到了个铁家伙，乘没有人的时候，冲到大门去砸锁。一错开门缝，我傻眼了，四个铁将军把门，真是插翅难逃。

但我仍不顾一切地去砸锁！好不容易砸开了两把，顿时我信心大增。谁知正在起劲砸的时候，被人发现，夺去了铁器。

我沮丧了好一阵，难道他们想把我们饿死在地铁里？与其说饿死，不如乘着身上还有劲儿，从隧道里摸到下站站口，突围出去。

四位战友也赞成我的主张。

隧道幽长、曲折，黑黝黝的，伸手不见五指。我们仿佛变成了盲人，在黑暗的地府中摸索着前进。走的时间长了，会失去方向感，不是彼此相撞，就是撞到墙上。纵横交错的铁轨，在黑暗中变成了绊脚的绳索，摔跟头是家常便饭。

从出发到被关押，我三天两夜水米未进了，在隧道里行进消耗很大。此时，我心急如焚，更加思念连队和战友们。脑海里只有一个强烈的意念，冲出去，一定站在警卫目标的哨位上。我们彼此互相鼓舞，在坚定的信念和意志的支撑下，我们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摸到了建国门地铁站出口。

这个小小的站口，有几十个人把守着，我们隐蔽起来，等待着出逃的时机。中午，地铁站口人少了，大约是去吃午饭了吧。乘此良机，我们出其不意，宛如一阵旋风似的闯出地铁大门，他们想阻

拦也晚了。

当晚，我终于站在了广播大厦的哨位上。

上尉指导员 张付臣

5月21日23点，李旦生团长命令我带领27名战士，向市中心重要警卫目标开进。

出了“前进基地”，我们沿着农展馆西行，穿过了恬静优美的使馆区，来到了三里屯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下。

这里聚集了大约二百多骑自行车的人，宽阔的马路变成了狭窄的小过道。我背着装有160发子弹的军挎包，泰然自若地通过了人群。

“当兵的混过去罗！”

一个老太太眼忒尖，发现一会过去一个穿军裤的，或者穿解放鞋的，就喊了起来。顿时，老百姓的情绪紧张起来，如临大敌。

我们连一个十七岁的小战士，朝我跑来，猛地搂着我的胳膊，直叫：“指导员……”

“别害怕，”我安慰他，“有我在呢。”

老百姓盯上了我们。先审小战士：“你穿着解放鞋，肯定是大兵。说，干什么来的？”

小战士一声不吭。

接着又问我：“你是干什么的？”

“跑出来看看热闹。”我吸着烟，坦然地回答。

一个别着校徽的小伙子指着挎包：“这里面装的是什么？拿出来看看。”

“你没权力检查我的挎包，这是无理要求！”

一个老头凑上来说：“让我摸摸包里的东西。”

我断然拒绝了。

突然，几个小伙子冲上来抢挎包，我使出全力，死死抓住，就是不松手。

人们拥过来，有的乘机又踢又打，推推搡搡走了二百多米，吸引了上千人围观。

他们猜出包里装的是子弹。于是，发起了第二次冲击，狠命地掰我的手指，试图把手从挎包上拽开。我忍着钻心的疼痛，打定主意就是手指被掰断，也不能松手。

他们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换了个花招，叫人们把我紧紧地围在中间，团团坐下。

蓦地，脑后勺挨了意外的一击，两眼直冒金星。我警觉起来，在圆圈內不停地转圈，一是防止被偷袭，二是观察一下人群中有无战士。

果然，五个头缠白布条的战士正焦急万分地看着我。唉！还不赶快走！我把挎包攥成小包，往后一拧，双眉紧皱。我们连的战士一看便知这是让他们突围的暗号，服从命令，一个个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

“掏出来！一、二、三！”“一、二、三，掏出来！”

吼叫声一浪高过一浪。

眼被强烈灯光刺花了，定睛一看，三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在录相。

我立即大声疾呼：“中国人的事由我们自己解决，不许老外干涉、录相！”

喊了几遍，见有人响应，我就指着他们说：“他们录相想在国际

上现中国人的眼，起来维护中国人的尊严吧，同胞们！”

霎时，几件衣裳、太阳帽飞上了镜头，市民把外国人撵走了。趁乱，我也想溜之大吉，不料，几个大学生看得十分紧，没能成功。

这时，又有四名战士被推进圈内。

“你认识他吗？”大学生拽过来一个战士问。

我故意端详战士几眼摇摇头：“不认识，从来没见过面。”

这个战士被当场“释放。”

他们又推过来一个。

这个刚穿上军装不久的山村娃娃，低头垂手，不敢看任何人。

我用力咳嗽一声，他听着耳熟，睁眼一看是我，竟象找到娘的孩儿似的，偎依过来，眼圈都红了。

一看不妙，我用膝盖暗中顶了他一下。

他马上反应过来了，揉揉眼，嘟囔了一句：“我不认识你！”蹲在离我较远的地方，不吭声了。

头缠红布条的学生们，大约觉得再拖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了，决定把我交给大学指挥车处理。

一无所获的人们激怒了，雨点般的拳头落在了我身上。有几个歹徒伺机又想抢挎包，我被五个大学生拽着，上了汽车。

在大学生指挥车里，四个岁数可以做大学的父母的人跟我谈话。

先塞给我《告全国同胞书》和《告解放军全体官兵书》，逼我读完。

然后别有用心地问一些与时局有关的问题好象要对我发起“政治攻势”。

我在北京工作多年，深知北京人性气高傲，就故意用家乡土话

来跟他们打岔，说半截，留半截，跟他们装傻充愣，气得他们哭笑不得，拍桌子，跺脚，最后终于腻烦了，也就懒得问下去了。

一辆大轿车载着我们四个驶进漫漫黑夜，一路上不住停车，接受关卡检查。大约六支烟的工夫，车停了，他们逼我们下车之后，扬长而去。

经过一番辨认，我记起这里就是著名的亚运工程，我们曾在这里植过树。

黎明时分，我们徒步回到了三元立交桥附近。我对战士们讲：“我们就此分手，各走各的，一定要想方设法进去。我在此地等你们30分钟，如果不回来，就说明你们安全通过了。”

等到七点半，没一个人回来，我走进了一家小吃店，买了五个油条。吃了三个，拎着两个装幌子，我知道，北京的工人常常嚼着油条；边走边吃着上班。

过三元立交桥时，我开始咬第四根，混在堵军车的人群中凑热闹。一辆车过来了，他们蜂拥而去，我趁机跑进城。一路上，遇到拦阻的关卡，我就如法炮制。这招儿还真灵，再也没遇到麻烦。这一夜跋涉了70多里，总算安全地携160发子弹到达了执勤点。

少校教导员 张跃

我们营长期担任外事表演任务，战士们的军事素质，好得没挑儿，个个都象平时要求的那样，站如松，走如风，坐如钟。

这回便装开进，与平时对部队的要求是猴儿吃麻花——满拧。我们从庙城乘火车到了北京站，然后再由北京站向广播电视部徒步开进。这一路上，我跑前跑后地提醒、动员他们，要勾肩搭背，歪着脑袋，晃着膀子，吃着雪糕，说说笑笑地走路。

北京站、东单等重要路口，头上缠红布条的人到处都是，看见不顺眼的就拦下盘问。

为了保证顺利完成开进任务，我命令三个干部分别到前头、中间、后面悄悄地当调整哨，专门负责纠正战士的正规军姿。

首批到达的几个战士站在马路旁等待集结。我一看不妙！清一色的小伙子规规矩矩，笔杆笔直地站在那儿，时间一长，肯定会引起过路人的怀疑。

我看中了那块草坪，招呼战士们都过去。躺着，坐着，歪着，怎么都行。

烈日炎炎。北京的小青年不是都喜爱在草坪上坐着喝啤酒、冷饮，边喝边侃大山吗？

我们也如法炮制。为了显得浪漫，我让通信员去买汽水。谁知他撅着嘴回来了，十六块钱给我拿回来四瓶汽水。乖乖，小贩子真敢发动乱财，一瓶汽水要四块钱呐。放在最显眼的地方吧，摆摆样子也好。

卧在草坪上，身子挺悠闲，我眼珠可没敢放假，紧盯着马路上的过往行人。来一个兵，我就用手式招呼过来，迅速卧在草坪上谈笑。我们的兵象放出去的小鹰，不管遇到什么样艰难险阻，都会飞到集结地的。

人到齐了。我们拉开距离，哼着《跟着感觉走》，喝着四块钱一瓶的高价汽水，进入了警卫目标。

（于稚鸿 整理）

艰苦忍耐的三天三夜

上校团政委 杨清福

时间：1989年5月21日。

地点：北京市广安门外六里桥立交桥往南150米处。

凌晨2点，一阵凉风吹得我打了个寒颤，我赶忙把手伸向后背，扯了扯粘在脊梁骨上的背心，好家伙，内衣快成一张硬纸了。

这时，参谋长李国友挨到我身旁。“政委，我们现在被围困20多个小时了，看样子，他们是不会轻易放咱们走的。”

“这些家伙怎么这样来情绪，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哪见过这样的事情。你看看，2点多了，还围着好几万人。”副团长张洪臻也来到我们身旁。他是一个典型的山东汉子，他接着说：“部队啃了一天干粮，每个人喝的水还不够一泡猫尿多，昨天下午就有6名战士晕倒。他们哪有一点怜悯之心。”

我说：“发脾气，没有用，部队吃的苦、挨的饿、受的气、窝的火，我清楚，我的心和你们一样难受。难受又有什么用？忍着，咱们是部队，当务之急的问题是：如何克服困难，稳定部队情绪，用什么样的姿态迎接新的更为严峻的斗争。尽管咱们该说的都说了，该讲的都讲明白了，但是，还要抓住各种有利时机，不厌其烦地宣传我们的戒严政策、部队的传统和作风。”

架在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里传来了一个刺耳的声音：据可靠

消息，4点钟，解放军要打进天安门。顿时间，人声鼎沸，喊叫声、谩骂声此起彼伏，惊天动地。

分散的人群象潮水一样涌向我们的车队旁。几层——十几层——几十层——人墙把我们围得水泄不通。

担负团指挥车站岗的指挥连战士小张和另外三名战士，被一伙人推搡着，拳头雨点般地落在他们身上，小张的脸被打肿了，嘴角流出了殷红的鲜血，他紧咬着牙关，没有还手，依然竭力保持严整的军姿，但是，他流出了痛苦的泪水。

一个30多岁的女人，“呸”的一口唾沫直喷小张面部，他只是把头斜在肩膀上，默默地擦去那口发臭的唾沫。

3时许，火上加油的“飞虎队”杀气腾腾地在人群中来回冲击，声嘶力竭地叫嚷：“当兵的4点钟就要行动啦，决不能让他们走，把他们的车砸了。”

接着，在人群中有人高喊：“冲啊！把车砸了。”一会儿工夫，十几辆汽车的轮胎就被放了气。

情况十分危急，怎么办？

我急中生智，向周围喊道：“有大学生吗？”

有二十多人举起了手。

我十分严厉地说：“同学们，你们口口声声说你们的行动是爱国的，这样的举动是爱国吗？损坏军用装备这是犯罪。这个责任谁负？又有谁能负得起？”

学生们说：“他们只代表少数，不代表我们大多数。”

“那好，请你们劝他们不要冲动，不计后果，他们要完全负责。”

有的学生站起来，即席演说，劝阻群众要理智，不要损坏武器。

装备。

凌晨3点50分左右，六里桥上的路灯突然熄灭，到处一片漆黑，人们惊呆了，整个空气凝固了，周围的人群更警觉了，我们的战士也更加机警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

十几分钟后，路灯又重新亮了，人们才渐渐地恢复了神智。

我想，时机已到，便站到车厢上大声驳斥刚才的谣言：“市民们，你们该清楚了吧！有人不是说，我们解放军4点钟血洗天安门吗？事实怎样，现在4点10分了，我们不是仍然没有行动吗？完全是造谣生事。你们不要听信谣言，不要上当受骗，少数人是想把你们往死路上推。”

随着我的声音，十几名军官也不约而同地放开了嗓门。市民们似乎悟出了一些道理，由低声议论变成了沉默。

六里桥恢复了平静，我心底的石头总算落地了。

6时许，东方露出了鱼肚白，一轮红日冉冉升起，面对光辉的太阳，我多想舒心地喘息一会啊！也多想轻松一下啊！但是，我不能。

因为，更为严峻的艰苦战斗还在后头。部队被围快30多小时，战士们都怒火填胸，这些血气方刚的小伙子稍一冲动，那将产生不堪设想的后果，但是，我也深信，我们的官兵是有觉悟的，是能经受住各种考验的。

我爬下车，一辆一辆地看视着。当我走到第五辆车时，发现有个战士，身体不停地抖动，尽量把身体缩下去，一只手捂住小腹，紧紧地夹住双腿。

霍然，我明白了，是啊！战士们整整一宿没离车一步，尿憋得慌。

我立即吩咐，战士分期分批上厕所，每批由干部带着去，要加强警戒，保护武器、装备万无一失。

可是，到了厕所，战士们身体直颤抖，就是解不出来。

三营有一名战士，一泡尿足足解了二十多分钟。

试问，有谁能忍受这样超过生理极限的痛苦呢？试问，有谁能这样默默地作出无畏的牺牲呢？

上午9点钟，涌集的人群又到了一个高峰，人山人海，足有几万，广播喇叭象发疯似的嗥叫。一些用心险恶的人恶语中伤，直接谩骂我们的官兵。

骂声之一：你们这些当兵的都是狗娘养的，没有人性的东西。

骂声之二：你们快回去吧，你娘死了。

骂声之三：你们的姐姐被人轮奸了，还呆在这里干啥，快回去吧。

这哪象人话，我的脑袋“嗡”的一下象要爆炸。此刻，我发现有的战士握紧了拳头，有的把枪拿在手中来回地转动，他们的眼睛里都射出了怒火。是啊，他们哪受过这样的人身攻击？但是理智和部队铁的纪律告诉他们，决不能轻举妄动，要冷静、沉默。在这样的时刻，我们的军人也只能以泪水代替举动。

天越来越热，坐在大卡车上的官兵一个个大汗淋漓，有的嗓子干哑了，有的嘴唇裂了缝。

我巡视了一遍，官兵以严整的军容、端正的军姿，犹如一尊尊塑像坐在各自的位置上。他们手握钢枪端坐在车厢的两侧，我为有这样的战士而自豪！赞叹！感激！

“政委，有三名战士中暑。”

一路上，许多营连纷纷告急。

我在三营的车队旁看到了这样一组镜头，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娘，端着一碗茶水，递到一个战士嘴边，但这个战士怎么也不接。他的泪水夺眶而出，两名胸挂校徽的女大学生拿着两瓶开好盖的汽水，送到一名干部身边，动情地说：“解放军同志，你们喝一点吧，看到你们渴成这个样子，我们心里难受。”这个干部婉言谢绝：“谢谢，只要你们理解，我们什么艰难困苦都能克服。”

时钟已指向12点，是部队开饭的时刻了。但是，由于炊事车不能发挥往日的作用，多数战士只能啃干粮。

无休止的“战斗”仍在进行，极少数不死心的歹徒毫不放过一点机会，进行挑拨煽动。

下午3时许，几个留着长头发的小青年，从人群中站出来叫嚣，“你们看这些当兵的，校官一个个顽固不化，尉官是滴水不进，傻大兵更是一言不发。同他们说没用，对待他们就得动真格的。”接着，他们向军车扔出了汽水瓶、砖块，不明真相的群众也向军车撒出了沙土。

我的战士没有一人回击，石头袭来，他们躲一躲，沙土撒在身上，他们抖一抖，但是，他们愤怒的眼圈里流出了泪。

夜幕降临了，“战斗”还在继续。

.....

结束语：我们部队是5月19日奉命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5月20日早晨在六里桥受阻，被歹徒和不明真相的群众围困时间长达三天三夜。在此期间，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同志，还有许多好心的群众和学生给我们送来了热饭、热菜、开水、饮料和香烟，第三天，我们部队的吃饭、喝水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由于我们部队始终用无限的赤诚，极大的耐性对待周围的人群，终于逐步赢得了广

大群众和青年学生的信任与理解。

5月23日凌晨4点20分，我们乘学生和群众极度疲劳之机，经过周密组织布置，仅用13分钟就撤出了包围圈，部队安全无损地到达了休整地点。

（周春华 冯元军 整理）



将军被围记

干事 秦生祥

1989年6月6日下午，国务院发言人在中南海举行记者招待会。会上，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张工同志，以他那富有节奏感的山西口音介绍说，5月20日，我们有个部队在石景山古城到八角街地带被围困，吃不上饭，喝不上水，被打被揪，有的军长、政委在你推我操的情况下，站了五个多小时……

张工主任说的军长、政委，就是我集团军的臧文清军长、曹和庆政委。

我作为军党委秘书，目睹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

5月20日，是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第一天。

上午7时50分，臧军长、曹政委奉命率部向天安门广场开进。

为便于指挥，臧军长、曹政委身先士卒，同士兵一样站在解放牌卡车上随部前进。许多官兵深有感触地说：“将军和我们确实战斗在同一条‘战壕’里啦！”

9点10分，钢铁洪流从西山驶出。

9点30分，臧军长、曹政委所在的某师车队，进入北京西郊八角街附近路段，车队受到了数万人的围攻。

有的吹胡子瞪眼，投来凶狠的目光；有的咬牙切齿，手拿棍子朝我们戳戳点点；有的双手叉腰，破口大骂，恨不得一句骂声咒死我们一个兵，一句骂声炸毁我们一台车。

士气的较量，力量的较量，意志的较量，在人民子弟兵与鱼龙混杂的“群众”之间展开了！

面对严峻、复杂的形势，臧军长、曹政委镇定自若，沉着果断，指挥有序。

开始，让部分人员下车，将躺在军车前面的人抬走，将横在军车前面的汽车开走，车队继续向前开进。

学生和群众看这样阻拦不了我们，就又截住了3台10吨大卡车和6台公共汽车，并把车胎的气放掉，把车的钥匙扔掉，组成三道屏障，横在路中央。

在车队已不能继续前进的情况下，臧军长、曹政委经过简短协商，决定除留下看护武器和车辆的人员外，其余大部下车步行，向前突击。

他俩带头下车，率部在人群中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他俩边走边动员：“大家要齐心协力，结队前进，不要被冲散。”“同志们要加油，看谁冲在最前头！”

干部战士听到军长、政委的声音，顿时勇气倍增，加快了前进步伐。

可是，要冲破数万人组成的一个个包围圈，每前进一步，都要承受来自前后左右的推推搡搡；每前进一步，都要泼出一身汗水。

我见汗水浇透了他俩全身，湿漉漉的军衣紧贴在伟岸的身躯上，跟进的两千余名官兵也都汗流浹背，就说：“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吧！”但他俩谁也没有理会我的话，不仅没有放慢速度，反而更急

切地向前走！

就这样，左右迂回，绕道前进，一步一步，一米一米，冲破重重阻拦，硬是往前突进了两公里。

然而，前面又出现了数十辆公共汽车、运输车组成的路障和数万名学生、群众组成的近百米宽的人墙。

在失去了理智的人群面前，用说理的办法、和平的方式，寸步难行了。

臧军长、曹政委立即向上级请示，得到答复是：部队原地待命。

我习惯地看看表，中午12点差10分。短短的两公里，竟用了两个多小时。这不仅令我想起了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想起了《南征北战》抢占凤凰山顶。我愤慨地对曹政委说：“这哪里是我们军队戒严，而是他们戒了我们军队的严。”曹政委深沉地说：“这恰恰说明4.26社论的定性是完全正确的，再不采取措施，局面很难扭转。”

正午的太阳，照在身上火辣辣的。臧军长、曹政委和士兵一样，被围困在马路中央，忍受饥饿和干渴的折磨。由于今天早晨还未开饭，就接到了上级紧急开进的命令，整装出发。因此，臧军长、曹政委已经有18个小时水米未进了。卫兵将两个行军水壶分别递到臧军长、曹政委手中，但他俩谁也没先喝一口，随手转给了跟前的战士。一个战士接过之后，又转身传给了别一位战友。这样，两壶水在将军和士兵手中转了两圈，一点没少。最后，还是他俩下令，每人才喝了一口。此时的水比生命还宝贵，但将军和士兵的情谊比生命更珍贵。这平常的两壶水，在这非常的时刻，起到了凝聚军心、鼓舞士气的特殊作用。有两位战士接过将军手中的水壶时，激动得热泪盈眶。是啊，还有什么能超过在患难之中将军对士兵

的这种关怀和体贴呢！

人民解放军行动受阻，而非法组织“高自联”却气焰嚣张，简直到了不可一世的程度。他们一声招呼，就能使成千上万的人围堵军车；他们伸出两根手指头晃来晃去，猖狂地拦截各种车辆任其使用，甚至不惜扎破轮胎作路障；他们拿着小旗摇来摇去，让“飞虎队”的摩托车、“敢死队”的自行车队以及“高自联”的广播宣传车队呼啸而过……等等，等等。整个北京，一时似乎成了这些“时代宠儿”的天下。曹政委对臧军长说：“现在看到的局势，比我们来京之前所设想的要严峻得多。”臧军长点点头：“真是好人受气，坏人当道，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臧军长擦了一把汗接着道：“不能听任这些人胡说八道，要反击，干部要带头站出来讲话，宣传党中央的正确声音。”

“解放军同志们，你们受蒙蔽了，你们不知道北京的真相，因为你们有很长时间没读报纸、没看电视、没听广播了……”一个留着小分头的家伙手拿话筒对部队喊道。臧军长没等他说完，就指着他的鼻子：“你这纯属造谣，是诬蔑解放军。事实上，我们天天看报纸，天天听广播，天天看电视。”又转过身对着群众：“市民同志们，解放军的头脑是清醒的，请不要听信他的谣言。”人群中立即投过来一片掌声。那家伙见势头不妙，缩着脖子钻进了人群。

自称有二十多年党龄、是某机关党委办公室副主任的一个中年人，拿着工作证和党章，一边让人看一边攻击党的领导制度。臧军长、曹政委领着干部战士当即予以反驳，严肃地斥他：“你不是一个合格党员，不是一个称职的干部。党员在公开场合散布对党的不满情绪，是党纪不能允许的。”

由一个高个中年男子陪同的一名美国女记者，拿着微型摄相

机，跟随部队录了很多镜头。臧军长发现后，一挥手：“她违犯戒严令，冲上去把它收过来！”十多名干部战士立即冲过去，把录相带强行收缴了过来。

这样，臧军长、曹政委同干部战士一道，“舌战群儒”，粉碎谣言，宣传群众，劝导学生，不知不觉在烈日下站了5个多小时。

下午5点40分左右，我和组织处刘福连处长随臧军长、曹政委乘212吉普车到了古城路口。虽然两人都脱下军装换上了便服，但还是很快从车窗里被人认出来了：“这就是上午的两个少将，是这个部队的最高指挥官，不能让他们走。”随着这几个人的喊声，潮水般的人群发疯地拥向吉普车，围得水泄不通。这时，有一个长满络腮胡子的家伙，集结了十多个人要把车辆推翻。随着“一、二、”“一、二”的喊声，右边的车轮已离地半尺多高，如果再喊上两个“一、二”，惨剧将要发生。险情迫在眉睫，我不顾一切地挤过去，扭住喊“一、二”的那家伙一只胳膊，大声喝道：“你是不是学生，是学生为什么这样无法无天？你知道车里坐的是什么人吗？出了事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他不敢再喊“一、二”了，别人再也不敢推车了。军长、政委从车上下来，第二次陷入层层包围之中。这时，从人群中挤过来一个脸黑黑的、头缠红布条的学生，对着人群喊：“请当官的给我们讲几句话，不然就不让你们走。”曹政委接过话筒：“讲不讲，我们都能走，这不是你们决定的事。但我要告诫你们：军队永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和政府，包括军队，都希望广大同学们学习好、工作好，全国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军队执行戒严任务，正是为了协助政府、首都公安干警，维护秩序，制止动乱；请相信解放军是不会伤害好人的。”臧军长也说：“同学们，现在有些人企图利用你们的热情煽动闹事，这样闹下去的后果是不

好的。你们不要上少数人的当，跟着瞎跑。”这些话虽不能完全被他们接受，但看得出有一部分人开始低头沉思，个别人也蹦得不那么欢了。多数学生同意让军长、政委乘车离开。晚上9点半左右，我们又回到了滞留在八角街地段的某师所在地。

这一晚上，臧军长、曹政委多次组织师团干部研究继续推进方案，并采取多种队形，带领部队连续7次向前突击，一直坚持到5月21日早晨7点整。

古城被围，使我清楚地看到了臧军长、曹政委在复杂的斗争面前，政治立场是那样的坚定，执行命令指示是那样的坚决，对士兵是那样的关怀备至。总之，我看到了将军的胆识和谋略、气度和风采。



戒严中的第一次流血

中尉干事 任 斌

无论血是浓的还是淡的，只要这种生命的液体流在历史的关口，它就凝成了一份无可辩驳的证词。

戒严中的第一次流血事件发生在5月21日，它让人们惊叹，让人们思索。

我们这些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官兵，第一次被这么多人用疑惑、冷漠的目光注视着，第一次受到这许多人的责难、阻拦。我们这些热恋、憧憬保卫北京的赤子之心，第一次用自己的鲜血证明了自己。

新华社北京5月23日发出北京市政府发言人举行新闻发布会的通稿，披露这一历史性的流血事件：“一些身份不明的人制造谣言，进行煽动，混在学生和围观者中的一些不明身份的人用事先准备好的砖头瓦块袭击解放军战士。在这个过程中，大学生请求那些人不要再打了，但大学生也遭到袭击。解放军保持了高度的克制，一边撤离，一边保护学生。在这一过程中，116名干部战士受伤，其中48名住院治疗，29名受重伤，有的头部缝合9针，有的手指骨折。同时也有11名大学生受轻伤，另外有12人受轻伤、1人受重伤。在这一过程中有10人被解放军战士扭送到公安机关，

这些人已被拘留审查。其中有5名是外地人，有5名是北京市人，他们都不是大学生。23日上午11时，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张百发、市政府秘书长铁英到医院看望了被打伤的解放军战士。”

在流血事件的第二天，一位中年妇女以北京母亲的身份提着补品第一个到部队看望伤员，我和一位战士摄影员匆忙赶去看望这位在危难中甘愿当战士母亲的妇女。她拉着官兵的手说：“亲人们，亲人们，我是代表我们街坊来看你们的，他们让我捎句话，首都人民理解你们，欢迎你们到北京来。”

我这颗受伤的心，第一次有了针线弥合。然而第一次的流血，直到现在还重重地烙在我的心上，烙在北京的大地上。

也谈不上这是哪一种类型的任务，戒严指挥部命令，不能把武器拿出来进行射击。5月22日，我们象理解戒严令一样，坚决服从这来自戒严指挥部的命令。

我们是在5月19日晚上被阻丰台大井立交桥的，已经3天3夜。由于部队挤围在这块空地上，缺吃少医，平均5人当中就有一人患上了疾病，我也在病者之中。情况非常危急。中国红十字会丰台分会的医务人员在巡诊后发出危险警告，在病号车上插上了白色的红十字小旗。

白天烤得地上冒烟的太阳总算落进了遥远的山背，尽管平地吹过一阵阵凉风，但空气却把人堵得发慌，几乎有点透不过气来的滋味。我盼着下雨，下得越大越好，把几天带来的汗渍和忧虑都冲洗干净。

京都初上的华灯，闪烁在眼前攒动的人头上。那些围堵军车的人们，没有要撤离的样子，他们倚靠在车旁，或套官兵的话，或不停地围着车队走动，或注视着官兵的一举一动，他们象是预感到今

天晚上要发生点什么。我们部队也开始下车集合，站成一块块方队，高声唱着军歌，一遍又一遍，把人们的心震得发颤发裂，官兵的声带沙哑了，歌词是从口唇上用力嘞出来的。

任务是在突然中执行的，部队象是一列火车紧急制动。中央电台女播音员刚刚播完“现在是北京时间八点整”，官兵们象听到号令一样，有秩序地向车两侧涌去，大家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地向前挤开人群。我被安排在部队最前面，跟随政治部副主任邹万增和担任先头部队的某团，按预定的任务转向目的地——相距大井立交桥两公里远的某部队仓库。阻拦军车的人群，在13名大学生和我们签订的《协议书》下，不甘心地让出了一条道。

当先头车在我们叫号下往前开出几十米时，暂时麻木的人群如梦方醒，黑暗中一群歹徒狂叫着，“砸他们，砸死这些当兵的”、“不能让他们进城”。这种声音过后，雨点般的石块开始从房子里、白杨树下、墙根边向我们砸来。这时，我发现队伍中有人大喊：“流血了，流血了。”人群疯狂地投掷东西，有个客店把做饭用的煤气罐举着扔了出来，一直滚到前边的军车前；官兵们也被这突然发生的情况惊呆了，大家竭尽全力，声音沙哑地唱着军歌，反复喊着“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解放军不会镇压大学生”。但人们已经失去理智，而部队还是克制地、潮水般地往前涌。

在离西仓库还有几十米的地方，人群直扑军车，整块整块的、半截半截的砖块砸向军车的玻璃。蓦地，只见几块石头同时从一辆军车的三块玻璃砸了进去，紧接着军车象醉了一样朝着路边大白杨撞去……这时，军车突然急速往侧一拐，车后厢带裂了一块树皮，摇晃着继续往前开着，当我们赶上军车时，只见司机脸上血肉模糊，象是从血水中爬出来的。当我们把他抬到灯光下时，有人

惊呼着：“张克昌！克昌！你醒醒，你醒醒呀！”很长一段时间，张克昌的眼睛睁不开，他急得用手乱抓，我们翻开他的眼皮，才发现有两块碎玻璃渣扎在上面，我明白了，他是凭着知觉和毅力把车往前开的，在场的人几乎都惊住了。

我们部队不足一半的军车刚刚撤进西仓库，受伤流血的战友被一个又一个抬了进来，被救护车送到附近的丰台医院。部队中象是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官兵们拼命地向前挤，情况十分紧急。

“站住，你们给我站住，我是政委，听我的命令。”在我的左侧，陈锦彪政委挤到大门口大声反复地喊道。队伍中有人回答政委的话：“政委，我们的人都流血了，我们受不了，打吧。”官兵们也附和着。

“同志们想想，歹徒混杂在善良的群众中间，我们能下手吗？你们不知道，歹徒们正在盼望我们去打伤群众，让流血的群众成为他们栽赃的证词吗？”

在大门口的南墙角，一名排长和他的四名战士拼命拣着歹徒砸进来的石头，五双眼睛都冒着愤怒的火焰，他们急得边拣石头边气愤的叫着：“砸那些歹徒们，砸死那些亡命徒。”

“把石头放下，把石头放下！”师长于承海命令着眼前的官兵。

“首长，我们炮兵旅的人还在桥下，他们正在流血，我们这几个人不打冲不出去，救不出我们的战友。”这位排长恳求着，泪水涌出了他的眼眶。

“你是排长，你先放下，命令你的战士放下。”

“首长，我们不能再流血了。”

“流血你也得放下，这是命令！”

这位排长和他的战士不情愿地把捧在手上的石头一块一块放

了下来。我发现师长的表情很复杂，脸憋得红红的，眉头尖在颤动。

部队重新组织，戴上钢盔，赤手空拳，返回救援后续部队时，门口的气氛已经到了白热化，人群中密集的石块一排排向部队袭来，石头在钢盔上砸得嘣嘣响。一直阻拦军车的大学生拼命地跑到队伍前面，劝部队不要出去，一男一女两名大学生死死抱住我，往仓库大门内推，大声嚷道：“解放军你别去了，出去会被砸死的。”当他们知道劝阻无能为力，又转向砸石块的人群，哭喊着、恳求着，有三名大学生已经双膝跪着哀求，不要打解放军了，解放军不是来镇压我们的。但是，这几个大学生无法控制局面，流血又开始了。

在一棵大树下，我看见一名女大学生被砸中了，被几名歹徒拖上公路阻拦军车。这时，跑在前头的某团炮营教导员高振羽带领3名战士冲了上去，歹徒见事不妙，拔腿就跑，老高跑上前去正要背起女大学生，一块石头迎面飞了过来，老高一个箭步用身体挡住了，左肩膀上被重重地砸了一下，鲜血流了出来。老高忍着疼痛，背起女大学生往西仓库内跑。进了仓库，女大学生的血把他的军装染湿一片，他身上的血也染红了女大学生的裙子。这位女大学生醒来时，一切都明白了，她央求老高把她头上的红布条解下来，扔在地上。

事态还在黑暗中继续，接应后续部队的前方，不时传来石块、汽水瓶砸车的声音，受伤的战士一个一个被抬进了西仓库，拉着警笛的救护车在院内来回跑动。

当我在大门口接应后续部队陆续开进西仓库时，负责断后的侦察连班长李双印，被一群歹徒逼进了一间厕所。李双印从小熟练气功、螳螂拳、七星剑等防身自卫本领，他撤退着、躲着。这时，

两名歹徒抬着一块几十斤重的大石头向李双印砸来，当即厕所的门板被砸断，他的脚被砸伤了。一名歹徒还抄起一根木棍，狠劲地打在他的后脑勺上，他当即血流如注昏倒在地。歹徒们以为李双印死了，才扬长而去。我们救出他时，李双印身体蜷曲着，双手捂着头部，全身是血，已经负伤24处，头部5处裂伤，鼻骨骨折，双眼视网膜严重充血，已经不省人事。围在李双印身边的几名大学生失声痛哭：“都怪我们，都怪我们呀，让解放军受了伤。”

我和部队全部进入西仓库后，受重伤的48名官兵已经送进医院，负轻伤的官兵正在互相包扎，仓库内安静下来，谁也不知道这次流血将预示着什么。

就在我们默默地、反复地回忆着眼前发生的场面时，师首长来到了我们的中间，按捺不住地说：“戒严指挥部首长称赞我们了！”

顿时，我和战士们都欢腾起来，拼命地鼓掌。

转移结束，已经是凌晨两点十分了，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坐着，眼睛直勾勾地注视着太阳升起的地方，我多么希望天边出现红霞哟！



我们终于站稳了脚跟

少将 芦光祖

5月21日，我奉命率军区后勤12名同志奔赴京郊通县、沙河机场，负责×个集团军4个师1个旅共××个团的后勤保障工作。这真是一场特殊的任务呵！它近似实战，又不是实战，其困难程度又远远超过实战。

我们几乎是在空对空的情况下展开工作的。没有基地，没有依托；因为暂时的误会和不理解，又得不到广大群众的支援……

遥望蓝天，我心中不免划起一个又一个的“？”号。

几万人，住哪？吃啥？燃料从哪来？厕所在哪挖？……

以前，部队打仗也好，行军拉练搞演习也好，住的是老百姓的房，用的是老百姓的锅，点的是老百姓的灯……而现在，由于谣言的蒙骗，群众和子弟兵产生了隔阂。

一个个精干的参谋助理员们带回来的都是令人伤脑筋的信息：

老百姓不卖菜给军队；

老百姓的鸡蛋要15元一个（实际是不卖）；

附近的单位不可能解决军队的住房；

……

盛夏的京郊，烈日如火，可我的心比火烧还急。我知道，后勤保障直接关系到部队行动的成败；而这次部队进京戒严的行动，又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长远利益。我深感肩上责任的重大。这责任感给了我无穷的力量和克服困难的决心。

中午，我立即召集了紧急会议，决定了不等不靠，主动迅速沟通地方物资供应的应急方案和具体措施。

然而，要付诸落实谈何容易！当时，大街上已开始阻塞交通和阻拦军车，许多单位已没有了正常秩序，加之人地两生，要办成一件事，真是困难重重！

我们人换便衣车换牌，在小街小巷小胡同里拐来拐去地绕道而行，象做地下工作一样去找县里和市里的有关部门。

路上，虽仍有被堵、被截、被围攻的危险，但我们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我们心里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必须坚决完成上级赋予的任务，使戒严官兵们的生活得到可靠保障！

看着大街上躁动不安的人群，我忧心如焚。应该说，绝大多数学生和市民是好的。他们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对我们的国家也不乏忧患意识。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年轻人却不能从宏观上来权衡利弊。他们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不知道动乱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什么样的严重损失。他们没有政治经验，不能识别极少数坏人的阴谋；也不明白他们自己的无政府主义行为将会画出一条什么样的轨迹，导致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我真想对他们大喊：

我们的国家，再不能动乱了！

我们才过了十几年安稳日子的人民，再不能自己折腾自己了！

我们怀着这样的心情分别到粮店、菜场、副食商场等地去做工作，讲利害、讲大局，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终于赢得了不少群众的

理解和支持。很快，我们就筹来煤炭 160 吨，并打通了 6 条供给线。一些群众还主动送货上门，在军队集结地设立了销售点。

当长途奔进啃了几天干粮的官兵们第一次吃到热饭鲜菜时，我们的心里才终于有了几分慰藉。

然而，当我看见烈日下一队队就地卧息的战士时，我的心又收紧了。地下潮么？晚上有蚊子怎么办？下雨怎么办？不行！必须立即搞帐篷！

于是，调帐篷，便成了军区后勤前指的头等大事。为了在关键的一着上不出问题，我决心亲自抓这件大事。

帐篷，北京就可以调。然而，却异乎寻常的难。因为围堵军车的邪火正在蔓延。14 辆运送帐篷的卡车很快就被受蒙骗的群众围困。

怎么办？只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是硬冲，二是回撤。为了不和群众发生冲突，我们毫无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万军之众的部队竟然运不回自己必需的帐篷，这在军事上未免可笑；然而，这正是基于严肃的政治考虑的结果。我们不能让制造和煽动动乱的人有可乘之机。我们必须克制、忍让。即便委屈、受辱、办不成事，也只能这样。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是人民的子弟。

可是，人民的子弟也是人啊！战士们为了国家的安全，为了人民不受动乱之苦而来，在长途奔进中屡遭围阻，吃不好睡不好，已经是够辛苦的了，难道到了集结地还让他们露宿野外？让虫子叮蚊子咬？

不能，绝不能！

我们立即报告总参，申请空运。

这真是一个特殊环境下的特殊行动。两地的距离只有 30 多

公里，飞机起来还没达一定的高度就得赶紧往下落；这是不值得的，也是没有先例的。然而，为了戒严的大局，我们的航空兵破例了。

几百顶帐篷终于在京郊的野地里架起。它象一排排绿色的堡垒，又象是一朵朵安卧的荷莲。

战士们刚刚住进，一场暴风雨就来了。然而，它对战士们已经没有威胁了。望着风雨中安然而立的帐篷，我的心，这才松弛下来。是啊，我们终于站稳了脚跟！我这才想起，自己已经三顿没吃饭，24小时没打过一会儿盹了。

我正想舒舒服服地伸腿睡它一觉，突然，一个响雷凌空而炸，暴风雨越来越大了。它似乎给了我一个启示，使我的心又沉重起来。是呀，天上的暴风雨来了，这地下的暴风雨是不是也快了昵？

我的睡意又散了去。一个个新的问题又蹦进了我的脑子……



十五分钟的恋人“情话”

战士 余长海

将那封寄往河北沧州技校的书信封了口，我才长长吁口气钻进了蚊帐。

“你俩的情话还没说够哇？”同班战友和我开起了玩笑。

就在这之前3小时，未婚妻小唐坐了火车换汽车，又步行好几里，居然找到了部队临时驻地！我窝了一肚子火，这是戒严期间呀！上级有明确规定：戒严期间不准探亲，不准亲属来队！“谁让你来啦！”我劈头就是一句。小唐不知所措，怔怔地望着我。这时班里同志围拢来了，连队干部也来了，又是倒茶，又是嘱咐伙房加菜，她这才缓过气，把远道带来的水果点心一古脑倒出来。

不知谁说了句：“还是让小俩口亲热亲热吧。”大伙嬉笑着迅速跑开了，顷刻帐篷里就剩下我俩。

“我来一趟有啥错，值得这样对我。”她还委屈，“你可知道，俺是特地请三天假专程赶来看望你的。”

我声音有些柔和了，但语气仍十分坚决：“部队已有规定了，要求亲属戒严期间不要来队。”

“我已经来了，明天你就陪我到北京玩一趟吧。”她流露出恳求的目光。她在沧州技校就读两年，还没在北京逗留过，和未婚夫

同游京都，摄下几张倩影当然好，可……可这是戒严期间呀！

“部队训练正紧，你让我怎么好意思向领导开口？”

她有些失望：“我就呆一天，明儿一早走，行吗？”

“你没见么，10多人住个帐篷，你来了住哪儿？”

“那我到附近住旅馆。”

“不成，你得马上回去。”

“你太狠心了！”她泪眼涟涟，可还是起身收拾行李。

“情话”持续15分钟，连队饭菜好了，我告诉指导员：“来不及吃了，现在走还能赶上火车。”

于是，我步行把她送到汽车站。

临别，两人目光不由自主碰在了一起。她那美丽的睫毛还闪着泪光。我心里说，亲爱的，原谅我，这不是谈情说爱的地方啊，我何尝不想常和你在一起，何尝不想带你去天安门、去故宫、去北海、去长城，可……

我只能把无尽的情思，汇聚在当晚那封密密麻麻六页纸的情书里。

(程关生 整理)

婚礼，在集结地域举行

中尉干事 汪旺坤

5月26日夜，月光如水。在京郊某部集结地域，我有幸参加了二连连长王福海的婚礼。两天前，就听机关的同志议论王连长不恋洞房花烛夜，积极请缨到北京执行戒严任务的事儿，大家都说不错。

但是，眼前这婚礼场面却不敢恭维，与当今一些摩登青年的婚礼相比，甚至很寒酸：没有新娘，新娘远在千里之遥的驻地城市；没有亲朋，席地而坐的是身着戎装的战友；没有五彩缤纷的婚宴场面，有的是笼罩着戒严集结地的浓烈军事气息。说是“婚礼”，其实是有其名而无其实。新娘都不在，跟谁“天仙配”？但正因为缺“一半”，才使这婚礼具有了“轰动效应”。我敢说，在集结地举行婚礼的事儿，整个戒严部队可能独此一家。

新郎王福海，中尉军衔，山东人，虽不具备山东大汉的魁伟形象，甚至身材有点单薄，举手投足间却透出训练有素的军人气质，一身戎装更使他平添几分英武。在大家的祝愿声中，他亮开粗嗓门激动地说：“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首先，我代表新娘敬各位一杯，祝戒严顺利！谢谢大家的盛情！”

“砰！”十几只军用口缸撞在一起，激起一股水柱。年轻的心

撞在一起，产生强烈共鸣。热血男儿端起满缸自来水，干了个天翻地覆，荡气回肠！军人的豪爽，寄托着诚挚的祝福和无尽的情意。

鬼使神差。本来应该是高兴的日子，可大家的目光却有些润湿，我看见王连长眼窝竟盈着两点泪花……这不寻常的喜事，这烦恼人的婚礼哟！

早在进京执行戒严任务一月前，他与新娘商量，把婚期定在5月26日，结婚的用品、洞房，甚至连酒宴都准备就绪。奉命出征时，离婚期只有五天了，因婚礼原拟在女方家举行，新娘家杀了一头猪，请好了厨师，向亲朋好友发出40余张喜帖。终身大事一生就这一次，同许多青年朋友一样，谁不希望自己的婚礼隆重热闹呢？小两口充满美好的憧憬，还准备到北京旅游度蜜月呢！

然而，命运总象有意捉弄人。北京发生了动乱，婚礼没能正常举行，他没能挽着新娘逛北京，倒是带着全连士兵戒严来了。家事和国事象一道考题，横陈在他的面前。实践证明他考试合格——

接到命令后，他在极短的时间内收拢人员，检查装备，完成摩托化开进的准备工作，保证了全连齐装满员，昼夜兼程621公里，没有发生任何事故。全连政治立场坚定，官兵士气高昂，受到上级好评。而此刻，他兜里还揣着“接站”的电报，他的父母亲乐颠颠地从山东老家赶来部队参加他的婚礼。老人家从未来过部队，还没瞧见儿媳长什么样儿呢！由于时间仓促，王连长没能去车站接父母亲，只在心里说一声“请原谅我”就出发了。人生地不熟的老人家是拿着信封一路问着到营房的。

也许你不会相信，他甚至没能和新娘道别一声。新娘就在驻地不远的医院上班，骑自行车10分钟就到了。婚前的小两口，正是如胶似漆、情意绵绵。出征前夕，王连长多想去看看他的春英，

当新娘的喜悦会使她更漂亮迷人。但肩负的责任和严于律己的习惯，使他没有这样做，平时他就离不开连队这百十号人。在“用兵一时”的紧要关头，与战士离开一分钟，他心里更不踏实，他认为这是失职。

但一个细微的声音仍然顽强地钻进了他的耳鼓，伴着娇弱的喘息，呼唤他的乳名；轻风中还飘来那诱人而熟悉的馨香，他似乎看见她含情脉脉的眼神，里边的磁力和担忧凝成一个厚重的“爱”字，还有一个铁钩子似的问号和尖刀似的感叹号，仿佛在说：“对就要成为你妻子的人，难道连个招呼都不打吗？！”他的心隐隐作痛，“英雄志”和“儿女情”在心头搏斗。按照他的习惯，很多难题只需一甩脑袋就能作出最后的抉择。此刻，他又潇洒地甩了一下脑袋，毅然扣紧钢盔，指挥车队开进。只让留守的同志转交新娘一张纸条，上面写了八个字：国难当头，新郎有责！

夜色渐浓，月光透过窗棂窥视着这位年轻军官的婚礼。两个脸盆里分别盛着四个水果罐头和两个牛肉罐头，地上放着几包压缩饼干。一缸自来水下肚，大家心中的河床生出无数思索的浪花，竟沉默起来。面对此情此景，王连长感触良多，不禁吟出一首诗来：“热血男儿思报国，把酒临风邀明月。虽然佳期两离别，为保平安也值得！”

“好诗，好诗！为报效祖国，干杯！”指导员谭宜荣提议，气氛顿时又活跃起来。大家你一首小诗，我一句锦言，抒发年轻军人的壮志豪情，婚礼变成了完成好戒严任务的“誓师”。谭指导员和武汉籍战士小陈分别散发了凤凰牌、红金龙牌香烟，祝愿新郎新娘“龙凤呈祥”……

我第一次发现，平日里自诩为“老粗”的王连长，竟然也有如此

细心的时候。他准时打开了袖珍收音机，据说赴京以来他老爱听《十五的月亮》。果然，董文华的歌声深情飘出：

十五的月亮，
照在家乡，照在边关；
宁静的夜晚，
你也思念，我也思念。

……

我问王连长，他的“另一半”今晚可能在干啥？他沉思片刻，苦笑一下，说：“肯定在骂我哩。没想到少数人制造动乱把我们的婚礼也给冲成了两半，我这里缺一半无所谓，可家里没有新郎不知闹腾成啥样子呢！设身处地想一想，她现在的处境肯定很困难。”是啊，亲朋邻里会怎么议论呢？况且，有些群众对部队进京戒严不甚理解，谣言又多。做军人的妻子不容易啊！

后来我才听说，王连长的“另一半”婚礼，也在5月26日如期举行。新娘来信表示要把这一天作为他们的结婚纪念日，并鼓励、支持他安心执行戒严任务。他们还商定，等完成任务后，再来北京蜜月旅游，特别要看一看王连长他们的执勤点和烈士的牺牲地，还要到军事博物馆参观，因为那里收藏着王连长所在连队战争年代获得的一面锦旗。同时，她还捎给他一块手帕，上面绣着两行字：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等你凯旋。妻 春英……

当然这是后话。此刻，战友们正高举口缸，齐声祝福：干杯，为王连长的两地婚礼，为共和国的长治久安，干杯！干杯！

扁担床

中尉连长 李晓磊

你听过扁担床的故事吗？如果没听过是不是很想听？我讲的这个故事，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它是我亲眼所见的，决非虚构。

5月25日那天，是一个燥热的天气，闷得我从头到脚直流咸水，一中午也没有睡着觉。下午2点30分是全连政治学习时间，全连点名，却没了成寿波。

我急忙来到他住处查看。

没有！

到哪儿去了呢？

机场是一片旷白，连根茅草都没有，只有几架银光闪闪的飞机成队停放在我们的对面。

我沿着机窝后面的一片小树林走去，想必他就在那里。

一阵鼾声，把我吸引过去，我惊喜一看，觉得奇怪：一个有15厘米宽，1.5米长的木板，一头搭在一块横立的砖头上，另一头搭在地上，成一个小斜面。

成寿波个不高，体重可不轻，胖得足有140斤重。

只见他仰卧在木板上，双手着地，身体笔直，一动不动地呼呼睡得可香呢。

我又气，又觉得可笑，便大声喊道：

“小成，快起来！学习了，快起来！”

他没有反应。这时，我朝他腿踢两下，他才醒了。

他一手抓着耳腮，不好意思地垂着头对我说：

“连长，俺、俺……”

“俺什么，还不快学习去！”

“是！”

他来了个立正，跑步走了。

我又重新打量这块木板，一块破麻袋片，让他叠了几折，枕在头下。就这样，他睡得那么香甜。如果他能睡上席梦思，那他还不得睡上几天几夜啊……

自从我们进京戒严，就住在这机窝里的水泥地上，白天强烈的阳光在头顶上照射，气温可达40多度，夜晚的潮气打湿了被褥，就我这个棒体格，从不得病的，睡这潮湿的水泥地，腰也疼了起来，有时疼得就象折断了一样难受。

我没有拆掉这张扁担式的小床，我想，他明天中午还会来到这儿午休的。

是的，他一直躺在这张扁担床上午休。

也许，在这宽阔的机场里，只有这片小树林还有一点阴凉，还有一点他的梦香。

我的眼眶也潮湿了……

比比心灵

上士班长 毕晓波

5月25日，已是国务院宣布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令的第5天。首都的动乱不但没有和缓，反而在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的挑唆煽动下，发展得更加严峻。

天气闷热。我们野营在南郊，帐篷里人喘不上气。外面的草地蔫蔫发黄。这是5月呀，5月应该鲜花开遍原野。

帐篷外噪音沸腾。我们执行戒严任务，刚到这里，就被人群包围了。开始对我们还很热情，送茶送水，送冰棍和黄瓜。这都是一些挺和善的群众，虽然观点不同，但我们心里挺感激他们。可是渐渐地，人群中出现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他们很活跃，在人群中窜来窜去，散布流言蜚语，不时跑到我们面前，骂我们，唾我们。有一个很年轻的女人甚至伸手摸我们连一个新兵的脸，说：“小哥们儿，才十六七吧？真嫩。”新兵气得把她的手打开了。

下午，突然喧嚣声更大，一大群头上扎着布条的人来到我们的驻地。他们先抛撒传单，接着又用扩音喇叭大声播送《告解放军官兵书》，那内容反动得让我们吃惊。我真不理解，在我们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首都，怎么能容忍这些人如此嚣张。

有人带头呼口号，矛头直指党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同志。

甚至有人喊：“打倒共产党！”围观的人群开始骚动。

我们都觉得不应该再沉默。指导员挺身站出来，开始批驳他们。可是他没有喇叭，声音被淹没。人群围住指导员，有人开始推他，拉扯他。

这时，全连战士都自动地集合起来站在指导员身后。指导员回头看看我们，突然微笑了。

指导员说：“唱歌，唱我们喜爱的歌，同他们比比嗓门，比比心灵。”

一声令下，我们齐刷刷席地坐下，双手扶膝，挺胸昂首，一动不动。

歌声响起来了，是《歌唱祖国》：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

歌声嘹亮。我们的歌声一下就盖过了压倒了扩音喇叭和口号。

象一阵台风刮过，喧嚣的人群猛地震荡了一下，接着就开始慢慢安静。

我们大声唱着，胸不闷了，心开始顺畅起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人民军队忠于党》、《解放军军歌》、《我是一个兵》、《军营男子汉》……一首接一首，都是我们战士喜爱的歌。

我突然发现，当兵几年，我学会的歌真多。

军营里，总是歌声嘹亮。

歌声是军营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唱着歌集合，唱着歌行进，唱着歌训练，唱着歌成长。歌声早已经溶入我的心灵，成为我兵役期积蓄的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使我变得愈加健壮和坚强。

扩音喇叭早已哑了。围观的群众已没有了先前的好奇。人们看着我们这些引吭高歌的年轻的共和国士兵，在低头沉思。

我们唱着歌，一直唱到夜幕低垂。不知什么时候起，我的眼睛噙满了热泪。



突击抢制炊事车篷布

分厂厂长 刘凤君

6月3日是个星期六。下午5点来钟，我告诉办公室的同志：“这几天社会上很乱，路不好走。告诉家住厂外的同志，不要硬干到6点，可以提前一点时间下班。”话音刚落，就接到厂部电话：“立刻到厂长办公室，有紧急任务！”

厂长张华同志见到我，闲话不叙，开门见山地说：“戒严部队急需解放牌汽车改装的炊事车篷布，限你们分厂在10天时间里生产出篷布300套！”我的天！我们一个百十来人的“半边天”小厂，还没有见到过炊事篷布是啥样，一没图纸，二没原料，十天时间做生产前的准备工作也不富裕，要我们在这么短时间生产出300套篷布，那不是开国际玩笑？！若是在平时，我准要问问张华是不是说梦话。可是，今天对张厂长的心情我理解：戒严部队进京以来被那帮别有用心的人和受蒙蔽的群众折腾得太苦了，我们有责任让他们尽快吃上可口的热菜热饭！因此，我二话没说，坚决地把任务接了下来。

回到分厂，干部和工人还都没有下班。他们听说有紧急任务，都在等着我回来。这就是我们工厂最能叫我产生激情和力量的地方！多少年来，这些军工，包括装具分厂所有的女工，不论平日里

谁长谁短，只要遇到部队交来的紧急任务，就象是战士上了火线，谁也不再顾及其他，人人都争先恐后地向前冲。大家听我讲明任务，虽然开始面有难色，但一说到戒严部队正在吃苦，都异口同声地说：“干吧，拼啦！”

老军工安庚戌已经78岁了。从6月3日下午接受任务起，就和技术组的同志们一起紧急突击搞样板。篷布的样板在屋子里放不开，他们就在院子里搞。火暴暴的太阳晒得安师傅背上的汗哗哗往下淌。他顶着烈日一干就是四五个小时，第二天下午就突击完成了两块大样，占全部样板设计任务的三分之二。49岁的女工马凤莲，曾积极支持丈夫到老山前线作随军修理工，这次突击炊事车篷布，她负责包装任务。一套篷布重五六十斤，包装一件就累得她浑身是汗，每天干下来她的身子都象散了架。领导劝她悠着点干，累了就歇会儿。她说：“现在是啥时候？早一点把篷布送去，部队就少受一点苦，我哪能跑一边歇着！”6月初那几天，暴徒们见车就截，见挂军牌的车就砸。装具厂的车挂的是军牌，车开不出去。司机兼采购员刘力群就骑着自行车去采购。有一次由于用件紧急，需要出车，刘力群把车牌一摘，冒着危险就往外开。他一连闯过六、七道卡，终于按时把石棉布和铆钉送到了工人手里。

我们分厂女工占百分之九十五。在那样危险的日子里，我们对家住厂外的女工上班很担心，曾提出，家住厂外的晚上不要加班，路远的暂时可以不上班。但是，大家硬是都来了。女工阎秋萍，家住古城，离厂二十多里。为了坚持上班，她就一直住在工厂附近的娘家。女工蔡敏，小孩才一周岁多，婆婆又有病。她跟丈夫讲：“厂里接受了戒严部队的紧急任务，每天都要加班到晚上十来点。我顾不了家啦，娘和孩子全靠你啦！”就这样，她天天跟同志

们一起加班，往往一干就是“连轴转”。班长侯殿贵是个男同志，家住香山，离厂几十里远。为了家住厂外女工的安全，他顾不得家中的妻儿老小，每天吃住在厂里，夜里加完班把班上女工一个个送回家。

激烈紧张的十昼夜很快就过去了。当我们装具厂的职工及时把 300 顶崭新的防雨、防火、防风炊事帐篷给戒严部队安装起来的时候，戒严部队的同志握着我厂职工的手连声道谢。我厂职工自豪地说：“我们虽说身着便装，可也是军队的一部分。咱们是一家人，为你们做点事是完全应该的！”

(王存善 整理)



圣殿轶事

上尉干事 崔 维

在戒严部队我集团军流传着这样一首打油诗：

长安街上跑掉帽，
大会堂里睡过觉，
金水桥畔支锅灶，
纪念碑下放过哨。

它极其形象地描述了平息反革命暴乱期间，干部战士生活和执勤的情景。

就说诗中的第二句，“大会堂里睡过觉”吧。6月2日下午，我们集团军万余名官兵奉命便装进入大会堂。这些长年驻守在塞北高原的士兵们，一个个东看西瞧，两只眼睛简直应付不过来了。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人民大会堂——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圣殿，今天竟成了他们的临时营房，干部战士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可是时间不长，还没等战士们的情绪平定下来，麻烦事就来了。

这个“营房”没有床铺不说，连打地铺的地方也实在紧张。成千上万人，就挤在楼上一块有限的空间里，其它地方据说是留给友

军的。

晚上 11 点来钟，我们军机关的几名干部分头到各单位，传达集团军首长的指示。我费了好大劲才“蹒”到高炮旅，没想到正赶上看到一出“好戏”。

十几个女兵围着旅长、政委，又哭又叫，有的还直跺脚。

我走过去打了个招呼，薛政委象是看到了救星，急忙对那些抹鼻子的女兵说：

“军机关来人了！”边说边从“包围圈”中挣脱了出来。

“怎么回事？”我不解地问。

“嘘，别提啦！”薛政委叹了口气道。

“是不是集团军首长有什么指示？”他问我。

“军长、政委让转告各单位，组织部队抓紧时间睡觉，准备明天执行艰巨任务。”我向他交待了军首长的指示。

“睡觉？”任旅长不知什么时候也“突围”出来了。女兵们也停止了哭泣，围在一起叽叽喳喳不知在嘀咕什么。

“怎么个睡法，500 多人，就分给巴掌大点的地方。”任旅长边抱怨边指给我看。

这里是通向二楼大宴会厅的一条走廊，大约宽 7 米，长 50 米。走廊，当然要走人。这样一来，本来就不宽敞的地方，又被割去一条近 2 米宽的人行道。

“是够挤的。”我说了一句。

“挤一点倒没关系，可是这些……”薛政委看了一眼身边的女兵，往下的话不说了。

我一切都明白了。

是啊，看情形这块地方供 500 人睡觉确实有困难，即使勉强能

躺下，也得一个紧贴着一个才行。我心想，如果是这样，那些男兵们无所谓，可女兵们就受委屈了。再说，让这些十八、九岁的女孩子和这么多男子汉挤在一起，睡在人来人往的人行道旁边，也未免有点太“那个”了。

“怎么样，崔干事帮我们做做思想工作吧。”薛政委半开玩笑，半当真地将了我一军。

“不行，不行，我这点道行比起政委差远了，您都做不通，我不是自讨没趣吗？”我赶忙摇手推辞。

说实在的，这些女兵的厉害我早有领教，我们家一个女中尉我都招架不住，何况她们有十几个人。

“放着经验丰富的老政工您不利用，却拿我这个‘新兵蛋子’开玩笑，这不是拿着金碗讨饭吃吗？”我用手一指正靠墙根睡觉的高炮旅政治部王主任，对政委说。

“我当了二十多年兵，这种事还是头一回遇上，你让我说什么好？”王主任睁开眼，苦笑着对我说。

原来他根本就没睡着，大概是怕“引火烧身”，刚才是在装睡。

“其实，这些女孩子的麻烦事还多着呢！”他接着说道，“就说上厕所吧，我们旅就分了一个厕所，还要与坦克旅合用。这些女兵要‘方便’，就得派人先清理厕所，然后站上岗，她们才能进去；她们‘方便’一次，男兵们就要大闹一次。本旅的还好说，外单位的意见可就大了！再说，她们上厕所也不讲个‘步调一致’，一会儿一个，你说麻烦不麻烦。”

王主任喋喋不休地向我诉苦，逗得女兵们破涕为笑，用手捂着嘴使劲乐。

“不是有女厕所吗？”我问。

“有倒是有一个，可是分给守备师了。”任旅长指着不远处的一个厕所告诉我。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看到在走廊拐角处那个女厕所门前，真的有 20 多个男兵在排队等“方便”。

我默然了。

回到军前指，和首长们说起此事，他们也只有无可奈何地摇头。

是啊，首长不是孙悟空，也没本事变出一座竖旗杆的小屋来。要不他们怎么也和战士们一样，合衣睡在地板上呢。

第二天刚起“床”，就听到大宴会厅传来阵阵雷鸣般的掌声，还以为中央首长看望部队，急忙跑出去一看，却原来是高炮旅的几个女兵，端着脸盆去洗手间梳洗，由于大厅里躺满了战士，她们只得象扭秧歌一样在人丛中跳来跳去，寻找落脚点，样子十分可笑，引得上千名男兵不停地鼓掌起哄。

我心中默默地想，这些在父母面前仍在撒娇的女孩子，今天却在这里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她们为的是什么？但愿人们能够理解。

今天，高炮旅的女兵们已经返回营区，住进了舒适的“女儿楼”，但如果有人在她们面前提起大会堂，她们的脸仍会变得红红的。

“F75”在行动

郭德华 何文亭 傅俊

6月2日凌晨1点10分，我们部队接到了上级化装进城的命令，代号为“F75”行动。

化装进城，这只有在解放前敌占区才能听到的名词，乍一听，是较难理解的，然而，对于这支在第一次摩托化行军进城，被不明真相的群众围困75小时的部队官兵来讲，深深懂得上级做出这一决策的良苦用心。由于坏人的蛊惑和煽动，群众对部队进城执行戒严任务不理解，围追堵截，说啥也不让部队进城。眼下坏人和群众混杂在一起，无法辨认，为了减少和群众的冲突，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及时开赴戒严地域，控制动乱的局势，这完全是迫不得已啊。

从接到命令的那一刻起，首长和有关人员就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他们研究制定行军路线，对部队教育动员，派人购买服装，设想遇到盘问和各种险情的处置方法，组织调整收拢，挑选分组行动的向导等等，开始了周密的部署，一切都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从10点50分传达到全体干部战士起，一个半小时后，整个部队全部准备完毕，整装待发。

化装行军检查组的同志到队列面前一看，心中很不是滋味，这哪象队伍啊！什么健美裤、港式衫、运动衣，大裤衩、小背心，赤橙

黄绿青蓝紫，五颜六色，五花八门，穿什么服饰的都有，由于集体购买，时间紧迫来不及量体买衣，不少同志穿着长短肥瘦不合身，若在平时，任何人都会忍俊不禁，但此时，人人表情严肃，脸上没有一丝笑意，他们毕竟是前去执行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啊。

官兵们也开动脑筋，对自己的衣着、身份进行了巧妙的化装，有的手中拿上副羽毛球拍，装作待业青年；有的带着旅游图，小本子上还写上了旅游计划，装作外地游人；还有的袒胸露腹，衣服搭在肩上，装作无事上街的民工……若不是他们那一色的小平头，若不是常戴军帽，使额头留下的那一圈特殊的印痕，就连内行人也很难一下子辨认出这就是虎虎生威的共和国义务兵。

13点40分，调整收拢组人员乘坐的四辆吉普车，分别向香山、动物园、西四、北海公园等方向风驰电掣般驶去。

14点20分，数百名官兵分为100多个小组，分别由干部党员带队，拉开距离，仨一堆，俩一伙，勾肩搭背，或哼着小曲，或叼着烟卷，或吃着零食，互相照应着走出了营门，很快就隐入了大街上的人流之中。

在北辛庄街，有五名战士正行进中，突然从路旁窜出3个小青年，跟上了他们，开始了无休止地问话：

“你们是干什么的？”

“进城搞建筑的民工，今天工地乱得没人上班了，哥儿几个出来遛遛。”行者若无其事的回答。

“在什么地方干活？”

“香山附近。”

“到哪儿去转？”

“王府井百货大楼，怎么坐车？”

他们问来问去，没问出名堂，只好悻悻地走开了。

在动物园车站，排长郭国文带领几名战士正在等车，旁边一伙人围上来嬉皮笑脸地挑衅：“喂！你们是不是大兵？”

郭排长压了压心中的无名火，话中有话地说：“我们要是大兵就好了，你看我们象吗？”

“那，你们进城干什么？”

“工厂放假组织旅游，我们进城玩来了。”

“不象吧？”他们指着头发和额头说。

“夏天热，工厂不让留头发，额头上的印子是戴安全帽戴的。”

问来问去，一无所获。他们仍不死心，还要问这问那，郭排长在路口调整组人员的暗示下，放弃乘车，带领一、二十名战士向动物园走去，终于摆脱了纠缠。

在部队开进的3条道路上，有20多组人员遇到了盘问，纠缠，官兵们或是用自己事先准备好的话回答，或是急中生智及时摆脱，形势越来越严峻。为了防止夜长梦多，行军指挥部发出了加速前进的命令。

定点调整人员积极作用，在乘车站，在转弯路口，有的拿把扇子，有的点着香烟，还有的喝着汽水吃着冰糕，用眼神，用手势，指挥部队一组组通过。路上很少有人说话，遇到战友和上级轻轻点一下头，马上分开走路。车站人少时就乘车，各买各的票，装作陌路人。一看人多，就步行往前赶。一位机关干部为了排泄一下积郁在胸中的沉闷，点燃了一支烟，发现部队加快行动的暗号后，他刚吸了几口就啪的一下扔掉赶路，旁边一位老太太发现后，喊着追过来罚款，他随手掏出一张钱塞下就走。老太太连喊找钱撕票，他头也没回说了句：“不要了。”老太太纳闷：“这干什么，象

房子着了火似的，没见过。”

为了加快行军速度，收拢组两辆挂着地方牌照的面包车，穿梭般往返于部队行进的几条公路上，一趟趟将走在后面的人员往前运送。

尽管他们安排十分周密，还是有人免不了转向迷路。遇到这种情况，他们就迅速返回第一个联络点，叫声“师傅”，得到指点后，继续前进。部队到北海附近的一个汇集路段，一小撮坏人看到一伙伙人都向这里走去，猛然醒悟：这是部队在行动，便喊叫着疯狂地向走在后面的一伙官兵追去。但是，已经晚了。官兵们见势不好，立即向路边的一个交警跑去，低声对警察说：“我们是戒严部队的，请将后面追赶的几个人截住。”交警马上会意，待部队官兵一过，立即将指挥棒一横，把这几个家伙拦住，指责他们不应在大街上聚众闹事，就在他们发愣欲要争辩的时候，官兵们已经跑远了。

就这样，他们凭着军人的机智勇敢，凭着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越过一道道封锁，闯过一道道关卡，顶着骄阳，迎着辱骂指责，经过近4个小时的奔袭，北京时间18点整，代号“F75”的我部官兵，全部到达集结地域。至此，一小撮坏人企图再次堵截这支部队的阴谋彻底破灭。上级“化装进城”的决心圆满实现。为胜利完成6月4日的天安门清场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守卫大会堂

——一名军官的手记

上尉干事 倪福田

6月3日凌晨1点

京都的夏夜，一片乌云掠过。阜城门外大街上一辆银灰色的213吉普车向天安门广场急驰。

“截住它，截住它，这是当兵的车，是大官的车，是官倒的车！”一些人开始用自行车、隔离墩、垃圾筒设置路障，还拍打着汽车挡风玻璃叫骂不停。无奈“两个轮”的挡不住“四个轮”的。车上指挥员灵活的指挥，司机娴熟的驾驶技术，冲破了层层障碍，终于艰难地驶进集结地。一位身材高大的中年军人下车后，疾步走向人民大会堂。这位军人是某师师长高宗武。

“报告师长，×××团按规定时间已全部到达！”“报告师长，司政后机关和医院准时到达预定地点！”……高师长听完报告环顾部队，掐指一算，已进来三分之二。

6月3日凌晨3点

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巨幅油画上的郑成功赫然而立。这位收复宝岛台湾的民族英雄将亲眼目睹一场特殊的“战斗”。

指挥所设在这里，医护所设在这里，首长和三大机关的“住所”也设在这里。3点10分，各路人马的头头在这里开了第一个会。高师长宣布了“约法四章”：一、要认真学习 and 遵守人民大会堂各项规章制度；二、要象爱护眼睛一样爱护人民大会堂一草一木；三、要和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搞好团结；四、要军容严整塑造文明之师、威武之师的光辉形象。

灯光暗下来了。大家进行小憩。轻微的鼾声使劳累一天一夜的官兵进入了梦乡。然而，高师长却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后面还有三分之一的部队没上来，他无法合眼呀……

6月3日上午8时

“叮铃铃”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大家惊醒。

“喂，师指挥所吗？我是×××团保卫干事郭兰玉。现在我们团团团长、政委和司政后机关共47人被围困西单路口，形势十分危急！”

“要向人民群众做好宣传解释工作，要忍让、克制，不要使矛盾激化，要保护好枪支弹药！”参谋长郭明高紧抓电话，及时做了指示。

过了一会又传来消息：某部一位少将政委遭到一伙暴徒的围

攻污辱。他们扒掉将军的衣服，弄到车顶上让外国人肆意拍照录像……听到这些，大家睡意全消，情绪一下子紧张起来。

6月3日上午11时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民大会堂东门、西门、北门、南门、西南门、西北门……八个门遭到数万人冲击。

“当兵的法西斯！”

“走狗、奴隶、土匪！”

“一二，当兵的，×你妈！”

门外的叫骂声比一群泼妇吵架还厉害，还野。看到这种情景，听到这样的辱骂，有的战士伤心地流下了眼泪。我们人民的子弟兵，历来是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你们为什么对我们这个样子！

6月3日中午12时

在紧张的气氛中，我们还是按时开饭了。一人一包方便面，一块面包，一袋榨菜。吃得倒也香甜，颇有点野餐的味道。就这，大家也不敢填饱肚皮，只带了3天的干粮，看这阵势，谁知道在大会堂要呆多久，不勒紧裤带，往后的日子不好过啊。

6月3日中午1时

趁大家休息的当儿，我偷偷地上到人民大会堂最顶层。居高临下，极目远眺。天安门广场帐篷林立，人头攒动，喊声震天。东

西长安街人山人海，还不时有人拿着棍棒、石块东游西窜，这些杀气腾腾的家伙想干什么？北京是怎么了？自4月中旬到现在已有近50天了，他们占据全国人民的天安门广场，把圣洁的广场折腾得乌七八糟，甚至成了“垃圾场”了。他们在卢沟桥设卡堵我们；他们游行示威阻碍交通；他们肆意谩骂党和国家领导人；野蛮殴打共和国军人。这一幕幕、一桩桩，已足以说明，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动乱。

6月3日下午5点20分

外面的局势越来越严峻。我亲眼见到，一个头戴钢盔的小战士不知怎么落入暴徒手中（据说是友军去夺回被暴徒抢走的枪支时失散的）。无数只无情、野蛮的拳头雨点般地砸到这个战士脸上、身上。这时，一位身穿白裙子的姑娘（看样子象大学生）伸开双臂阻挡疯子一般的人群，保护着战士。可惜，她那弱小的躯体在凶狠的拳头面前太微弱了。不一会，这个战士被打得满脸血污，昏倒在地，又有几个学生模样的小伙子，抬起这个战士从门外扔到门里。部队及时进行了抢救。

过了半个小时，暴徒们砸开大门上的铁锁，凶猛地冲进人民大会堂约50米。在辱骂声中他们砸碎了哨所的门窗玻璃、电话、椅子。大会堂周围的子母灯被砸碎了七八个。“咣啷”一声，人民大会堂二楼西侧一块4平方米的玻璃被砸了一个碗口大的洞。事后我数了一遍共有4块玻璃被砸。

庄严、神圣的人民大会堂是国家的象征，是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的圣地，她的尊严就是共和国的尊严。她有生以来，虽然也经历过

风雨和坎坷，但从没有受到象今天这样的污辱。那些人口口声声讲爱国，讲民主，难道这就是爱国？这就是民主？我们心里在流泪！在流血！

6月3日下午6点40分

一个中等个、头戴钢盔、满脸稚气的小战士，一跃冲出人民大会堂，面对冲进西北门的那群暴徒，捡起暴徒们扔过来的砖头、啤酒瓶子、水泥疙瘩，勇猛地进行还击。心虚的暴徒面对这位单身上阵的、正义的小战士，吓得连连后退。我觉得这位战士十分可亲可敬。

6月3日晚7时

师领导机关召开了紧急会议。大家有的站着，有的蹲着，有的坐着，围拢一圈。师长讲话：“暴徒正在冲击人民大会堂，形势十分危急，现在我们要守住人民大会堂，要与大会堂共命运，决不能让坏人肆意污辱，决不能让千千万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共和国美好的今天，落入反革命分子手中。我们要果敢地、勇猛地、不惜一切代价地保卫人民大会堂，保卫共和国。按照戒严指挥部的命令，后面部队将在21时开始强行开进。我们搞好紧急动员，要做好充分准备，配合大部队行动。”

“坚决捍卫共和国，彻底制止动乱！”不知是谁喊了一句口号，接着大家跟着喊了起来。群情激昂，摩拳擦掌。有的纷纷请战，请组织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他们，有的战士向组织递上了墨迹未干

的决心书。

6月3日晚8时

任务已下达。上级命令我们集中兵力保卫人民大会堂。

师长高宗武、参谋长郭明高、后勤部长刘树志和负责政治部工作的宣传科长陈勇等领导及部分机关同志，立即进入紧急状态。他们把人民大会堂的各个门、各条路以及各门被围情况侦察清楚，及时制订了行动方案。仅用半个小时兵力部署完毕。

6月3日晚9点

政治部主任王谦负责留后工作，政委常久，负责带领强行开进的另外两个团，还没上来。这样政治工作的重担全落在了宣传科科长陈勇和组织科科长陈汝胜身上。他俩立即组织大家制订了第一线思想政治工作的纲要，接着部署政治干部分头到各单位进行动员。

“危险时刻，共产党员、干部骨干要冲在前。考验大家的时刻到了，我们要坚决彻底地把反革命气焰打下去，要誓死捍卫人民共和国！”他们走到哪喊到哪。

医院也在紧张地忙碌着。他们肩上的担子更重了。院长艾仓柱及时组织大家成立了战前救护队，他们摆了几个长条桌子，搭了一个简易手术台，备好药品。随时都可抢救为共和国流血的战友。

6月3日夜10时30分

部队准备就绪，严阵以待。

西门、西北门的一群暴徒还在狂叫不走。其它各门仍有数千人围攻。砖头、瓦块还时时在大会堂的周围横飞。

师领导和机关分头到各门靠前指挥。宣传科长陈勇带着小喇叭，指挥他的政治工作组穿梭于各门之间。

“部队进行出击，把侵犯人民大会堂的暴徒赶出去！”随着庄严的命令，一队队威武之师高喊：“暴徒留下，群众闪开！”“制止暴乱，保卫大会堂！”冲出大门。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威慑力量使暴徒闻风丧胆。一见部队出来他们就灰溜溜地退出门外。我们广大官兵威严地守住人民大会堂的各个门，一双双警惕的眼睛在注视着这场特殊的斗争，一颗颗跳动的的心脏在接受着血与火的考验。



医疗队开赴人民大会堂

副主任军医 田慧英

“砰！砰！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将我从睡梦中惊醒。我腾地从床上坐起来披上衣服，打开门。敲门的是内五科女护士曹光辉。她抹了一下脸上的汗水，气喘吁吁地说：“田副主任，医务部通知医疗队马上到新2楼集合。”

我看了看手表，时间是6月4日凌晨1点半。

我们借着星光，三步并作两步地奔到新2楼办公室。就这样，我作为北京军区总医院第一批医疗队队长接受了去天安门广场救治伤员的任务。

4日凌晨7点钟，我们接到了“立即出发”的命令。

两辆救护车开来了，为避免麻烦，白色的军车牌子已换成绿色地方牌号。我们穿着白衣，每个人胳膊上都戴上了一个标有红十字的袖章。细心的司务长早就把饼干、榨菜、饮料和一桶白开水放在救护车上。一位夜班医生看到手术室麻醉医生马亚群的鞋不合脚，立即把自己的一双皮凉鞋脱下来给他换上。院领导和机关四部的领导都来送行。我们14个人，有13名是共产党员。大家默默地点头，对这次特殊形势下的特殊任务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两辆救护车鸣着警笛，风驰电掣般地向天安门广场急驰。

汽车左绕右拐，来到崇文门，路口出现了3辆公共汽车组成的“品”字型路障，救护车没法通行，司机又调转车头，退回原路，从小胡同穿到长安大街，迂回向天安门前进。长安街上一片狼藉，一排被压碎的水泥护栏横七竖八地歪在地上；警察的指挥台被掀翻，委屈地躺在一边；砖头瓦块四处皆是，不协调地缀满路面。这时路上的行人很多，有的冲我们吹口哨，有的跃跃欲试，想拦截汽车。司机加大油门，勇敢地向天安门奔去。

救护车通过天安门广场，7点30分准时到达了人民大会堂北侧。

我们从车上跳下来，背起药箱，跑过数十级台阶直奔人民大会堂门口。一进门，映入眼帘的是密密麻麻的伤员。几百名伤员相互依偎着坐在地上，有的头部开了数条口子，深达骨膜；有的牙齿脱落，面部呈青紫色；有的肢体骨折尚未进行固定；还有的战士身上有几十处棍棒伤，坐、卧、躺都如上针毡。他们的脸上、身上、军装上沾着血迹。有些伤员已受伤六七个小时，只用三角巾做了简单包扎，伤口还渗着血。我的眼睛立刻湿润了，真不敢相信我们的战友会遭到如此毒手。

战士们看到我们进来，疲惫的眼睛中露出了希望。

“重伤员在哪里？”我们首先寻找重伤员。一位军官指了一下大厅南侧，还没等他带路，我们就跑到那里。这里躺着7名重伤员，前两名都是脑外伤，不断呕吐，已出现颅压高，如不及时开颅降压，则会出现脑疝而危及生命。第3名是胸部贯通枪伤，出现气胸，伤员处于休克状态。第4名是眼球扎伤，玻璃渣子嵌入眼球，左眼已经失明。第5名是耳撕裂伤，大半个耳朵已经断裂，仅有耳垂部连着一厘米的皮。第6名腿部开放性骨折，铮铮的白骨裸露

在外面，断骨处参差不齐。第7名是面部外伤，下颌骨脱裂。时间就是生命，伤情就是命令。我们一起动手，开始紧急抢救。没有手术床，就搬来一张桌子；没有输液架，就临时找来一个旗杆。脑外科主治军医王秀，立即给两名脑外伤的病人输液，降低了颅压。胸外科医生刘一凡马上为胸部贯通伤的病人进行了包扎止血。外一科医生马成宽及时为耳朵撕裂伤的病人进行了缝合。医生们争分夺秒地工作着。他们明白，外伤病人如果延误了治疗时间，伤口会化脓、感染，产生多种并发症。

这时候，北京军区后勤卫生部卫勤处的阎兆荣处长来了。他说：“你们来得太及时了，你们是这里的第一支医疗队。”

我说：“现在需要转送伤员。这里没有病房条件，没有辅诊仪器设备，吃饭、上厕所都很困难，必须把重伤员转到我们医院去。”

“好，就按你说的办。”阎处长点点头。

“队长，我去护送！”年轻军医高均茂的声音。

“还有我！”政工干事李百能的声音。

“路上危险，让我也去。”医务部助理员孙吉良的声音。

“你们快去快回，来时再带几名骨干医生。”我嘱咐道。

几分钟之后，7名重伤员被抬上救护车，两名司机握紧方向盘，向北京军区总医院驶去。

紧张的救治工作继续进行。现在，医疗队还留下9名医务人员。我们面对的是一支庞大的伤员队伍——500多名。往常在医院，如果同时有3名病人住院，医生就忙得不可开交。现在我们无须按科室分工，打破了内科医生与外科医生的界限，一人要顶十人用，千方百计地赢得治疗时间。首先我们要诊查伤情，按着先重后轻的原则进行处理，把重伤员分别抬送到门口，等救护车返回时分

批运走；其次，对于有撕裂伤的病人进行缝合；再次，对一些轻伤员对症下药。王秀、马成宽、张树林、马亚群医生认真仔细地检查每一个伤员的伤口，清创、消毒、敷药，并在戒严部队中寻找遗漏的伤员。护士陈增林和李惠丽迅速地用剪刀剪掉伤员伤口周围的头发。曹光辉象手术器械护士一样熟练地打开一个个缝合包，及时准确地递到医生手中。病人排着队等待着医生缝合。刘一凡医生一会站着缝头伤，一会弯着腰缝胸部伤，一会又跪着缝脚趾伤。手中的手术针不停地穿梭。一个上午，他为34名病人缝合了45处伤口，速度之快，创造了他20年外科生涯的奇迹。没有病床，给治疗带来了很大困难。在医院时，病人躺在床上，医生站在床边，手触肝脏、听心脏高度正合适。而现在，我们只能跪在地上操作。打针、输液、止血、消毒都要俯身弯腰90度。一个姿势呆的时间长了，身体似乎麻木了，等处理完一行病人，站起来往前走都有些步子不稳了。有的人胳膊酸了，就甩甩手腕，有的人手指不听使唤了，就用针头刺激一下。高效率的抢救工作继续着。

10点多钟，后勤卫生处干事张晓玉走过来对我说：“不要等救护车了，来不了了。”

我奇怪地问：“为什么？”

张晓玉说：“伤员送到总医院后，两辆救护车立即调回，准备接第二批伤员。救护车走到南河沿时，遭到一伙暴徒的围攻。一辆车被烧毁，一辆车被砸坏。医务部施凤池主任和随车的8名医务人员被打，高均茂医生受了枪伤，司机受了重伤。”

我听后心里一惊，心想，救护车不能来了，骨科医生就不能来了，医疗队就剩下我们9名人员了。我们更要抓紧工作。如果救护车一辆也来不了，转送伤员怎么办？

“用直升飞机运伤员。”张晓玉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说，“我已经联系好了。”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马上安排用飞机转运伤员。

转运伤员，首先要到广场的临时停机场联系飞机架次，然后把伤员转移到飞机场，按顺序发给登机号。伤稍轻一点的，可以搀扶着走，伤重一点的，就要背着走。从大厅到广场，来回800米路，上下70多级台阶，先从飞机上把药品食物运下来，再把伤员运过去，我们也数不清跑了多少次，也记不清用了多少时间，从白天到晚上，我们只记住了转走了8架飞机，200多名伤员。有的伤员上不了直升飞机的软梯，马成宽医生他们几个人就连背带抱，连拖带拉，把伤员拉进机舱。刘一凡医生背的病人最多，他总是背个大的、体重的伤员。有一次他背一名连长，这位连长是在行进的途中为掩护一名新战士被暴徒打伤腰椎的。现在他的双下肢已经开始发麻。刘医生的心在流血，他多么年轻呀，他不应成为截瘫。他把病人驮在背上，一溜小跑，身上的汗水和伤员脸上的血水顺着脖子往下流，白衣染红了一片。刘医生只有一个心思：快点，再快点，早些到医院去治疗！当伤员们全部乘飞机安全起飞后，马亚群医生发现自己走路一跛一拐的，原来一只皮鞋的后跟不知什么时候跑丢了。这双从战友脚上脱下来的鞋，没有辜负战友的情谊，它为转运伤员尽了最后一份力。

重伤员转走之后，我心中好象一块石头落了地。一看表，已经到晚上7点钟了。肚子叽哩咕噜地发出警报，提醒我们已经有12个小时未进餐了。部队给我们送来几包方便面，这里喝水很困难。我想起司务长临行前给我们带的那桶开水，现在虽然凉了，仍象甘露一样诱人。缺水的不仅是我们，还有伤员，他们此刻比我们更需

要水。于是我们几名医生把几瓶饮料，一些点心和一些凉开水放在战士们的“地铺”前。大家你推我让，啃着干硬的方便面。我吃了几口后，觉得胃很不舒服，我清楚自己的底细，干硬的面把我倒霉的老胃病引出来了，真不是时候。

十几分钟后，我们结束了“肚子”的战斗，下一步该“正规化”地行医了。我们重新收拾了门口的椭圆形问事台，把药品放在里面，把一个印有“北京军区总医院”的红十字药箱摆在台面上，搭起了临时门诊部，4名人员在这里值班，随时接待前来就诊的病人，其余人员都下去巡诊。检查上午处置的情况，看是否有遗漏的地方。腾出南侧大厅收容未能转走的伤员，以便集中管理。

这一天，是最紧张的一天，我们一直干到深夜一点多，一切工作才就绪。这时候，大厅的伤员都已经入眠。我们轮流靠在椅子上似睡非睡地坐着。一种从来没有过劳累困扰着我们，我试着抬抬脚，抬不起来，抬抬胳膊，也抬不起来。胃部开始隐隐作痛。我心里暗暗骂自己不顶用，暗暗告诫自己，这是第一天，战斗才刚刚开始，不能倒下去。

我在工作日记上写道：6月4日，是我们医疗队最难忘的一天。24小时的紧张战斗，救治、转运戒严部队、武警部队、公安干警伤病员500多人。

两袋方便面

少尉干事 董瑾科

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在苹果园，我们几十辆军车，上百名官兵被围困，进不能进，退不能退，整整3天粒米未进。太阳也仿佛乘兴似的，在头顶拼命地放射着紫外线。饥、渴、热，那滋味真不好受啊！在人民大会堂，我们又重新尝到了这种滋味。

6月3日，我们接到便装进城的命令。从宿营地到人民大会堂有十几公里，当时，首都情况异常严峻，北京的各个主要交通要道和路口，聚满了成千上万名不明真相的群众和极少数歹徒。我们按照任务区分，混杂在群众中间，分布在各个路口。歹徒对解放军便装进城已有所察觉，一时不慎，计划将全盘落空。开始我们说话口音还是带着浓厚的家乡味。因此，常常招来一束束怀疑的目光。后来，我们急中生智，扯起了京腔。一批又一批便装的战士克服种种阻力，向大会堂进发。每个人平均行程几十公里。大家心急如焚，顾不上吃一根雪糕，喝一瓶汽水，嗓子眼要冒烟，等全团战士进入大会堂，已经到了深夜。整整一天的奔波、惊悸、担心、劳累，到了大会堂，大家已是头脑发晕，两腿发麻。紧接着肚子开始抗议，饿跟踪而来。但被装、食物还没有运来，大家只有坐在地板

上，仰头数着天花板的吊灯，以逃避“饿虫”的侵袭。谁都没有说话。每个人似乎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整个大厅静得可怕。这时候，一位战士把指导员拽到一边，说：“指导员，战士们已连续两顿饭粒米未进了，又经过一天的惊悸，十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的行程，都饿晕了，我这有两袋方便面，让战士们一人分一口吧！”我在旁边听到这些话感动极了，泪水迅速充满了眼眶。心想，在这种时候，我们的战士作出这样的决定，将意味着他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又需要多么崇高的思想境界啊！

指导员迅速将三十多个战士集合起来，说：“两袋方便面，往下传，一人吃一口，暂时顶一顶！”两袋方便面从指导员的手中开始往下传开了，每个人捧着它，就象捧着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贵。最后，两袋方便面传到了我的手里，完整无损。我只好完璧归赵又传给指导员。这时指导员火了，声音虽小，但是充满怒火地吼道：“一班长带头，再往下传，每人必须吃一口，不执行者，纪律处治！”这是强制执行的命令啊！一班长拿过方便面，嗅了嗅，传给了下一个战士。三十多个战士几乎都是闭着眼睛，将方便面放在嘴边，深深地嗅嗅，又原封不动地回到了指导员的手中。一班长含着眼泪哽咽地说：“指导员，您从昨天晚上开完紧急会议到现在粒米未沾，今天又冒着生命危险整整奔波了一天，这两袋方便面您吃下去吧，我们不饿！”

三十几个小时没吃东西——“我们不饿”。多么崇高的思想境界，多么动人的场景。这场景我在故事中听说过，但那是听说，这次在人民大会堂，我亲眼目睹了！看着此景此情，我感动的眼泪夺眶而出。

指导员抹了一下眼角的泪水说：“同志们，我们连队还没有立

过集体三等功，这次执行戒严任务一定要把功拿回来。等回到营房，我摆上 18 个菜，开一次酒戒，为同志们庆功。谁不喝也不行！”哦，又一个命令——强制执行。



六月三日，在西单路口

上校参谋长 王小京

6月2日，我师奉命进驻人民大会堂。为了避免与不明真相的学生和群众发生冲突，部队全部穿便装，化整为零、赤手空拳、徒步开进。晚7点半我带着师“前指”进入大会堂，并马上布置调整哨，接应后续部队。

3日凌晨1点，师长、政委到达大会堂。但部队还有2000多人被分散拦阻在莲花池东路、广安门、宣武门大街等地。很明显，人员不齐，就影响部队战斗力，就无法执行任务。当时，外面的形势越来越严峻，一些歹徒肆意拦阻军车，殴打、绑架军人，加上许多干部战士初次来京，道路不熟，在外面很危险。于是我带一名参谋，出去寻找、收拢部队。在莲花池东路遇到90多名干部战士被围，我迅速带他们离开街道，到一个背静的建筑工地，将他们重新划分为30多个小组，每个组指定党员干部负责打头阵，明确行动路线，分散向大会堂开进。后来我又在广安门、复兴门等处找到300多人，都一一组织他们突破重围，进入大会堂。

凌晨5点，全师还有近千名干部战士没到位。师常委开会决定，组成10个组，出去继续收拢被冲散的部队。师长、政委见我冒险奔波了一夜，都不让我再出去。其实，他们也一夜没合眼，忙着

收拢部队，安排到达人员的食宿。我这当参谋长的，部队没到位，怎么能坐得住。于是，我又带一个小组出去了。我们走了6条街，串了20多条胡同，又收拢了68人。当走到北新华街路口时，见一名战士正被几个流里流气的人盘问，说他是当兵的，要扣留他。我急忙上去大声说：“你在这干什么，跟我走！”边说边拽着战士就走，那几个人还没搞清是怎么回事，这名战士就被我们带走了。

上午10点，我刚返回大会堂，师长、政委就对我说，一辆运送武器弹药的车在西单路口附近被围。

我立即带30名战士从大会堂西南门出去解救。但由于一路聚集很多群众，大部分战士被冲散，等挤到拉武器装备的车前，我身边只剩下6个侦察兵。而这时，几千人把这台车团团围住，3名学生站在车顶上，把车内的一挺机枪、两支冲锋枪、炊事班做饭用的菜刀、一顶钢盔和大檐帽尼龙帽圈，拿到车顶上架起来，一边让外国人拍照，一边拿着手提喇叭狂呼乱叫，进行煽动宣传。看到这种情况，我又急又气，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往车上爬。这时有人问我是干什么的，我毫无惧色地说：“我是戒严部队的领导，是来保护武器装备的。”我的话刚落，一些坏人就狂呼起来：“打死他！打死他！”接着身上就挨了两拳。

我上车后，他们让我回答3个问题，并恶狠狠地说：“回答不出来就别想活着出去！”

他们问：“为什么解放军穿便衣进城？解放军带武器来干什么？昨天晚上你们接到什么命令？”

我站在车上，拿过学生手里的话筒，对着几千群众大声回答：

“第一，穿军装还是穿便衣，这纯属军务，我可以不回答，但为了使大多数群众了解真相，我讲一讲。我们部队第一次进城，是全

副武装,但被堵了3天没能到位,这在共和国历史上是没有过的。你们阻拦军车,妨碍军务,这是与戒严令不相符的。今天我们这台车被堵在这里,我要是穿着军装,我能走到这里来吗?我的身份是我主动亮出来的,不存在穿便衣要达到什么目的的问题。”我话音刚落,车下就响起一片掌声。

我接着讲:“第二,解放军带武器进城,道理就和工人上班带工具,农民下地带农具,学生上课带书本一样简单。武器装备是军人的第二生命,走到哪带到哪。我们这次来北京是维持秩序的,绝不是镇压广大群众和学生的,但我们对极少数歹徒也决不手软。”群众听后,又是一片掌声。

“第三,我们接到的命令就是维持治安,制止动乱,稳定局势。”这时,几个小痞子站出来高喊:“不要听他的宣传,打死他!”

我不理会他们,继续说:“这些武器弹药如果被坏人抢去,无论对军队,还是对学生和群众都有百害而无一利。”有些学生和群众见我说得有理,就对我保证,他们负责武器弹药安全,并说:“这么多人围观,把车弄出去不可能,你先离开这里。”

我提出要跟学生们交涉怎么保护车上的武器弹药问题,他们说:“我们解决不了,要解决就到广场‘高自联’指挥部去。”我马上说:“去就去。”

他们把我领到广场纪念碑东北侧的一个小棚子里,送我的学生向“高自联”的头头讲了我的来历。有个小痞子听说我是当兵的,随即上来就打了我一拳。这时,一个叫李伟的,自称是纠察队长,问我:“你了解北京的形势吗?”

我对他说:“我们解放军并不是不懂政治的赳赳武夫。你们说解放军镇压学生和群众,现在到底是谁打谁?你们口口声声要‘自

由’，我在这里连起码的人身自由都没有，难道这就是你们要的自由吗？你们标榜自己如何爱国，可是你们帮外国人录像、照相污辱军人，这是丢军队的脸，丢国家的脸，丢人民的脸，难道这就是你们所说的爱国吗？”问得他无话可说。接着我又把武器弹药的事说了一遍。在场的4个市民主动出来说：“如果真象解放军说的这样，你们学生应该把他送出去，把枪弹控制好。”

后来，我们与西城区公安分局取得联系，在部分群众和学生的协助下，把车上的武器弹药安全地转移到海军医院。



铁流东进天安门

少将政委 王福义

也许与心情有关,6月3日下午5点,北京西郊的空气格外沉闷。作战室里,我们集团军几位领导坐立不安,焦急地等待张副军长归来。1小时前,他应召匆匆去军区开会,受领任务。

事态的发展确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每天接到便衣侦察员的报告,不明真相的群众阻止军队进城的情绪狂热到了极点。集团军领导曾找“高自联”的常委核心人员郭海峰和王丹等人的代表交谈,敦促他们撤出广场,回校复课。大局尚且如此,我们这种局部努力当然不可能奏效。无疑,要铲除天安门广场上这个毒瘤,进而迅速全面制止动乱,指望不付出相当代价就轻易成功的想法,显然过于美好。事已至此,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作为处于极其特殊情势下的集团军主官,我深感肩上担子的沉重。

电话铃急促响起。为争取时间,张副军长在军区受领任务后,当即要通电话向我转达。军区命令以×个集团军的建制,并由我集团军为先导,由西往东向天安门广场开进,如遇障碍则强行排除,务必按时到达。同时命我集团军于当晚10时前在军事博物馆以东路段完成集结编队,成4路纵队乘车东进。据此,张副军长提

出将整个集团军密集收缩在1公里之内，人车集中，首尾相顾，形成铁拳。

我立即将军区的命令和张副军长的想法向集团军其他领导作了传达。经简短研究，刘参谋长及司令部同志提出以A、B两个步兵师一家两路，齐头并进，坦克师、炮兵旅和工兵团随后跟进。整个车队先头设600人左右的防暴队、排障队开路，两侧由各自的防暴队护车，人车相互掩护前进。整个战术以集团密集队形，对付人海战术，以原始防卫手段对付砖石、木棍等的攻击，以强大的威势对付反革命气焰。

我认为这个方案很切实，并且有利于扬我集团军之优长。我们这个部队有自己的传统作风，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荣誉感很强，内部比劲也足。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军主攻天津，就是以这两个师并肩突击，很快打进城去。这次又这么做，两个师势必争先恐后地往前冲，迅速完成强行进入的任务。我当即表示同意这个方案，张副军长回来也表示赞成。

集结开进的命令通过电台迅速下达。坦白地说，我的心也提到嗓子眼。我在这部队生活了40来年，深知她的脾气禀性，关键时刻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可这次执行任务非同寻常。群众和坏人混杂在一起，叫你再有本事也难以施展，我们处在既要坚决完成任务，又要尽量避免流血的两难境地。前一阶段，戒严部队基本是叫群众和学生给戒了严，这在世界所有国家中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现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下决心要解决北京的问题，在这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时刻，犹豫和莽撞都是绝对不容许的。

想来想去，我分别用电话找到A师师长和B师政委，强调这次任务艰巨，意义重大，要求他们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即使付出代

价也要在所不惜。

为鼓舞士气，要求各级领导务必靠前指挥，身先士卒，同时重申军官务必按照军衔级别佩戴肩牌，要堂堂正正地带领部队去完成任务。

晚8时许，集团军指挥所的车队上路。驻地的官兵、群众目送我们，表情都十分严肃。有什么想法却又说不出来，只是默默地挥手为我们送行。

一上大街，我看到街两旁已经围着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我们的车到达公主坟转盘东口时，数以万计的人群涌上公路和林荫道，向我们围上来，有的举着铁棍铁管，站在公路中间拦击，有的挥动拳头朝车队狂喊：“当兵的，滚回去！”有的用木棍敲着车窗要和我们对话。我们军指挥所十几辆车孤零零摆在中间，处境十分危险。

不一会，“做工作”的见说不动我们，相继后退。接着，雨点般的石头、砖块从四面八方飞过来，砸得车体当当作响，大部车辆玻璃被打碎。我乘坐的213车8块玻璃一下碎了6块，玻璃碴子进得满车都是。司机和同车的两个机关干部都被石块砸伤。一块石头从车后窗飞进来，砸在我的腿上。

万分危急的时候，A师炮团车队从左后侧上来。我命令炮团组织反击，用扔过来的石块回敬暴徒。军指随即开到军博附近，与先期到达这里的A师车队会合。

此刻，我最耽心的还是B师能否及时赶到。他们有4个团住在丰台西仓库，在5月22日强行进点时，就曾受到数以万计的人群阻拦，有116名官兵受伤流血。现在要按时赶来编队，沿途要经过丰台路、五棵松、万寿路、公主坟等主要路口，不知要遇到多少障

碍。我用报话机催问参谋长：“B师上来没有？”参谋长回答还没有，不过B师已经派师侦察连到五棵松路口去接应了。

这时，A师虽已基本在军博以东集结，但由于B师没有上来，侧翼暴露，人群从前后左右围上来扔石头砖块。A师防暴队英勇反击，将人群赶至车队百米之外，巩固住已占路段。军指挥所按事前分工，张副军长、李主任带前指赶到部队前面组织防暴排障，我和刘参谋长在先头师居中位置实施统一指挥和对上联络，杨部长带后指接应部队，组织供应，救治伤员。

时间分分秒秒过得很快，复兴路上的华灯星星点点，已串成一条银链，一直伸向此次行动的目的地。要在往常，北京人该是一家老小围坐着看电视的时候了，或者，年轻人成双成对在林荫道上徜徉，在天安门广场漫步。可是现在，成千上万的人似乎着了魔，云集到街面上，或是围观看热闹，或是喊口号扔石头。此时此刻，即使是人群中的善良人，他们的行动也与最初的愿望相差太远了。

9时刚过，军区首长带指挥组赶到了集团军前指位置。集团军前指电台同我们联系，催问B师到了没有，说军区首长催着出发。我也非常着急，B师不到，突击力量总是单薄。

时针指向9点20分。报话机里突然传来了炮兵旅、B师已经到达先头位置的消息。我兴奋地对车上的人说：“这就好办了。”军工兵团、坦克师高炮团也早已到达集结位置。部队提前半小时，于9时半出发，浩浩荡荡往东挺进。

走出不远，车队又停住。这时，政治部一位干事急急从前边跑来报告说，张副军长到军博开会，军区陈副政委让我到前边去。快步奔走中，只见远处一片火海，浓烟顺风飘过来。军区齐副司令员、陈副政委、刘副主任和机关的同志都焦虑万分。

陈副政委一见我便说：“老王，快组织部队想一切办法排除路障，保障主力和车辆顺利通过。”我立即答道：“我到前边去看，去组织。”

赶到最前边，我同正在积极组织指挥的几个师里干部迅速交换意见，完善措施，坚定行动决心。

往东看去，街边所有的隔离墩都横在路上，水泥杆、铁栅栏也乱七八糟地铺了一地。最前面的一排隔离墩，浇上了汽油，烧成一道火障，浓烟烈火呼呼地蹿起来。人群在火障后面，挥舞着钢筋、木棒，狂呼辱骂，两侧林荫道上扔来的砖石、瓶子、水泥块等，阻挡着部队上去排障。

各师领导迅速指挥防暴队捡起石块还击，将暴徒和人群打远。排障队不顾一切地冲上去，用手去搬烧得滚烫的隔离墩、铁栏杆，为车队一步一步地开道。身后的车队上空，传过来“坚决制止动乱”“动乱不平，决不收兵”的震耳欲聋的口号。有的部队在高唱集团军军歌：“钢铁的部队，钢铁的英雄，钢铁的意志，钢铁的心……”其声其势，撼人心魄。

部队在一步步艰难推进。我的衣服都被汗水浸湿了。许许多多的人被石块砸得鲜血直流，但没有一个人退缩。张副军长从军博返回，与李主任一起在前面指挥继续排障开路。

在木樨地路口，暴徒们用公共汽车、卡车、电车等交叉横排着三道车障。见部队过来，迅速浇上汽油，将车点着。霎时浓烟翻滚，火焰蹿起来几丈高，车体被烧得毕剥作响，油箱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防暴队员们奋不顾身冲过火障，反击暴徒，掩护排障队推车。有的人衣服被烧着了，在地上打个滚，爬起来又推。A师参谋长冯兆举，砸开前面一辆车上的窗玻璃，爬进车去，摘开车档，把着

方向盘，大家喊着号子，拼命把车推到路边。在推另一辆公共汽车时，一位小战士机智地冲上前去，伸手把油箱盖打开，防止了爆炸……

最难对付的要数电车，车身高不说；又是两截，中间还是软的，往路边怎么推也推不动。后来一个干部提出在中间横推，将两截车厢折到一起，给车队闪开了一条道。

我们军师前指的领导站在跟前进行指挥，有的上去帮着推车。看着自己的部队如此骁勇，我的心里感到十分自豪。我们部队从1928年跟随彭老总在平江起义之后，就是凭着这股虎劲拼劲，保卫井冈山，两占遵义城，激战直罗镇，大战平型关，辽西会战，天津攻坚，打了多少硬仗恶仗，在抗美援朝二次战役中赢得了“万岁军”的美名。靠这股劲头，我坚信，无论前面还有多少艰难险阻，都挡不住我们无畏的铁拳！

过了木柵地，沿途仍有无数的人阻拦，路边的高层建筑上，还不时打来冷枪。各级宣传车反复广播戒严部队指挥部的“紧急通告”，地上、车上的人一齐高呼：“严惩暴徒！”“如若阻拦，坚决还击”等口号，造成一种排山倒海的威势，震慑着暴徒不敢上前。

军区首长一直和我们在一起，边观察情况，边组织指挥。训练部王部长拿着话筒大喊：“快！快！”亲自指挥战士排障。军区首长在咱们跟前，给了广大官兵以极大的鼓舞和教育，增强了完成任务的信心。各师团领导也都及时给部队以鼓励。A师一个团的政治处主任话筒被打坏了，就直着嗓子喊口号鼓动。事后有人惊奇地问我们：“那晚上你们部队是不是吃了兴奋剂，噢噢叫，那么大的气势。”

在复兴门立交桥，又迎面遇到公共汽车等设置的一道道火障。

此时，部队已经十分疲乏，大家强撑着身子搬隔离墩。我们正组织排障，从立交桥南侧传来隆隆的马达声。不一会，我们军的18辆装甲车一辆接一辆地冲上桥来。他们由军区和我们军的各一位参谋、A师一个团的副团长率领，从南郊赶来，正好与军主力在此会合。干部战士都高兴地跳起来，热烈鼓掌欢呼。

军区齐副司令、陈副政委见装甲车上来，也十分高兴，他们亲自对我们军的带车参谋交待：“你们在前头为步兵开路，速度不要太快，不要把步兵丢了，开吧！”

装甲车滚滚向前，撞开路障，压倒栏杆，排障队跟着清理路面，人车互相掩护，前进速度大大加快。

到了西单路口，那里横放着十几辆燃烧着的汽车，整个街口被浓烟烈火封锁着，炙烤得人难以近前。部队被迫停下来。张副军长命令装甲车上去撞开火障。开始上去一个车没撞动，又调上去一个车。两个车同时开足马力，把左侧公共汽车撞到路口东北角上，打开了通道。部队迅猛通过，势如破竹，很快推进到新华门前。

新华门前正有一伙暴徒狂呼乱叫，投掷石块瓶子，袭击警卫战士，阻挠部队前进。A师侦察营扑上前去，迅速制服了为首分子，驱走了人群。一队警卫战士从新华门里跑出来，高举着枪支欢呼跳跃，欢迎我集团军的到来。我军官兵也都群情激奋，高呼口号，浓烈的会师之情洋溢在新华门前。

远远的，天安门广场灯光在望，那么璀璨，那么明亮，部队象打开闸门的洪流，装甲车呼啸开道，万余官兵齐声呐喊，上千车辆轰鸣奔驰，凌晨1时30分一下子涌到天安门前，迅速占领金水桥一线，继而分兵把住东西长安街口，并顶住数以万计的人群的冲击，把天安门牢牢置于人民的怀抱。军区首长立即向上报告，西路一

梯队胜利到达广场。首长们不住口地称赞：“你们真不愧是老部队！”

我心里有股股热流在翻滚。从公主坟到天安门，实际距离只有7公里左右，我们却走了整整4个小时，这是怎样的4小时啊！沿途冒着“石雨”，排除燃烧的汽车有数十辆之多，清理各种路障数百处，后来统计，一路有5000多名官兵被打，千余官兵受伤，很多车辆都程度不同地受到破坏。但我们毕竟冲了过来，顽强地冲了过来。在共和国的心脏，全国全世界瞩目的天安门，在党中央面前，我们含泪交上一份血写的答卷。

激动很短暂，清场在即。

（谷办华 整理）



开进中的防暴队

中校副政委 李 林

6月3日,17时50分,值班室里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上级命令我们机动中队当晚20时赶到军区领受任务。

我和支队参谋长立即乘车赶到中队具体组织指挥。

我们从全中队挑选身体棒、素质好、作风硬的五十名队员,按上级要求,带上了头盔、盾牌、电警棍,又装了一千发催泪弹。

自北京出现动乱以来,这个机动中队虽然多次执行任务,但携带这么多催泪弹还是第一次。

一看这阵势,队员们悄悄议论:这回要动真的了!大伙饱饱吃了一餐,乘车急速向军区开进。

军区司令部的作战室里。戎马生涯几十年的将军们缜密地布置着这场关系到共和国命运的任务,宽大的军用地图上若干个三角形红色箭头,从东线、西线、南线、北线直插非法组织“高自联”“工自联”盘踞的天安门广场。

坐镇指挥的老将军时而踱步沉思,时而看看手表,象是在等待什么。

“报告!武警的防暴队来了!”

“好!快让他们来。”

50名防暴队员走进了作战室。五十多名武警官兵面对众多的二星三星将军领受任务。

“同志们，目前，首都从学潮引起的动乱现在已经发展成暴乱。他们烧军车，抢军火，伤害解放军战士，性质已经变了。”军区政委刘振华上将进行动员，“现在搞打、砸、抢、烧、杀的不是学生，也不是群众，而是反革命暴徒。我们要开进天安门，清理天安门广场，要保卫党，保卫人民，保卫国家政权，保卫首都北京！你们的任务就是要为大部队把路打开。”

“没人阻拦要进，有人阻拦也要进！”军区周司令员挥着大手有力地讲，“军区前指首长直接指挥你们，今天一定要开进天安门广场！”

将军的面色凝重冷峻，话语落地有声，我们防暴队员们顿觉肩上担子很沉重。深深感到：能不能把路打开到天安门广场，绝不是小小的50个防暴队员的问题，而关系到大部队能否按时到位，关系到整个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全局。

大伙握紧拳头，互相注目，意思是说：这一次，豁出去了！

21时10分，车队从军区大院出发了。我们防暴队的三辆车在大部队的最前头，我们身后就是军区首长坐的指挥车。

不料，刚出大院，我们的一辆车熄火，再也发动不着了。

兵贵神速，军区首长立刻命令我们把这辆车推到路边，由前面两辆车开路，这样，我们50名队员只剩下27个人。换句话说50个人的担子压在了我们27名武警官兵的肩头上。

车子时而闭灯缓行，时而亮灯急驶，我们27名防暴队员低着身子，俯在车里，隐蔽前进。一连闯过了十几个路口。

21时55分，当车队行至五棵松路口时，遇到了第一道障碍。

五棵松路口，几十辆车横在马路上，被当作路障。只有一辆面包车比较好排除。

几十名解放军战士欲将车向北推开，而一伙暴徒在另一头将车死死顶住。

双方哎呀哎呀叫喊着僵持不下，车的后面还有黑压压的万把人，嗷嗷地起哄。见此情景，防暴队中队长带领着6个队员急速准备将暴徒驱散。

谁知，刚一下车，石头、砖头、啤酒瓶雨点般地向车飞来，噼哩啪啦，把我们指挥车、大轿车上的玻璃顿时砸得粉碎。司机王永刚、防暴队员咸国坤被砸得满面流血。

我们这些队员都有超群的绝技。倘若有人袭击阻拦，不要说用枪，就是凭我们这双铁拳，也可揍扁他的。然而这黑压压的人群中，虽然也有暴徒，但绝大多数是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好人坏人混杂在一起，一时难以区别清。为了尽量避免误伤群众，我们27名队员跳下车，一手握盾牌，一手握警棍，气昂昂地向拦路的人群逼近。

砖头、石块象冰雹一样迎面砸来，但27防暴队员在盾牌的掩护下，没有一人倒下，更没有一人后退。

望着这群打不倒的勇士，一些人吓懵了，手里举着砖头不敢往下砸。

就在这一瞬间，27名防暴队员抖动盾牌，从胸腔里发出一个共同的声音：“冲啊——”

这一喊，把前面一群顶车的暴徒吓坏了，大叫：“快跑呀！防暴队来了！”直往后跑，后面的人群一听这喊声也不知道来了多少防暴队员，也四逃而散。

就凭这一声怒喝，我们闯过了第一道难关。完成任务后，戒严部队的首长说：“过去，我说你们这些小伙子有3铁：铁头、铁臂、铁腿，现在看来这3铁还得加一铁：铁嗓子！”

闯过一道难关，又一道难关横在防暴队的面前。22时55分，我们到达军事博物馆路口，一场激烈的拉锯战已经在这里持续了半个多小时。

拉锯的中心地带，是两大排公共汽车。前后交错，象荏砖缝一样堵在路当间。公共汽车的这一面是执行戒严任务的先头部队，另一面有上千名拿着木棒、石块的暴徒和不明真相的群众。解放军战士绕过公共汽车，刚一露头，暴徒们劈头就是一阵闷棍，有的战士被打得满脸是血，有的战士当场昏死过去。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支部队还未使用手中武器，暂时退守在公共汽车这面。

但那些暴徒们把部队极大的克制忍让当作软弱可欺，他们在公共汽车的另一面，砸碎隔离墩，运来了成车的啤酒瓶、带钉子的大木棒做武器，妄图以公共汽车为屏障，阻止我们开进天安门。

正在他们得意之时，突然，从公共汽车上跳下了数十条黑影。

这些黑影落地后几乎听不到声音，二十多个盾牌刷刷刷很快组成一个半圆形，看不到人的身体的任何部分。在昏暗的路灯照射下，只看见顶部有20个浑圆的物体在微微晃动，发出一束束幽幽的绿光。

骚动的人群炸锅了，喊叫着跳着跑着退出十多米开外，尔后又收住脚步，回头屏气观望。他们虽然从电影上看见过坦克、装甲车，可从来没见过这半圆形发光体。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进口的秘密武器，不过是我们防暴中队平

时所自编自练的警棍盾牌术的一种队形。

早在前两年，为应付突发性暴力事件的发生，经公安部批准组建了这支机动部队。并在机动部队中开展警棍盾牌术专业训练。把警棍和盾牌同训练有素的战士结合在一起，闪、站、腾、挪；扑、打、戳、撇，发挥群体的合力，其威力是奇特无穷的。

就在人群还在发愣的当口，这半圆形的队形，瞬时间化为3个三角形，犹如3把尖刀插入暴徒中间。

顿时，阵阵催泪瓦斯的烟雾冲天而起，阻止军队开进的暴徒又惊恐地后退十几米。

转眼之间那3把尖刀又收在一起，变换为奇特的半圆队形。后面的解放军大部队也乘势推开了公共汽车，大踏步前进。

越向前开进，道路越加艰险。暴徒们一面煽动更多的人群把住各个路口，拦截军车。一面躲在隐蔽的角落里袭击开进的戒严部队。

有的爬到路旁的树上扔燃烧瓶，有的从高楼上的窗口端起花盆往下砸，有的爬上尚未竣工的建筑物，举起水泥块劈头盖脑砸下来。一辆送牛奶的卡车停在路上，暴徒们蜂拥而上，数千瓶牛奶成了他们袭击解放军的武器。

我们防暴队每前进一步，都遇到石雨瓶雹般的袭击。每冲一道路口都会有一场争斗。我们过处，碎砖头、碎石块、碎玻璃，在地上铺了一层，长安街竟象戈壁滩。我们防暴队员的27面盾牌上9厘米多宽的有机玻璃观察镜竟全打没了，27顶绿色的头盔打得成了白色，27名队员，人人血迹斑斑。

在这复杂险恶的形势下，我们防暴队依然斗志旺盛，士气高昂。司机小王头部负伤，但他仍然一手握着盾牌，抵挡着砖块、石

块的袭击，一手紧握方向盘开车前进。战士小威脸上挨了一砖头，左眼肿成一条缝，半边脸肿得象发面馒头一样。同志们几次劝他上车坐下休息，但他仍然靠着另一只眼的微弱视力，跑前跑后，为大伙运送催泪弹。战士小张腿被砖头砸得露出骨头，鲜血染红了小腿，他全然不顾，仍然冲锋在前。

此时此刻，我们防暴队早已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不到天安门，誓不罢休！

经过数十场殊死的搏斗，我们闯过了18个大路口，16个小路口，到达复兴门，眼前又是一片火海。

复兴门一带，马路上的隔离墩、铁栏杆被弄得七扭八歪，当做路障。搭在上面的棉被，倒上汽油点燃，成了一道道火墙。有的路段上撒了煤面，又在煤面上浇上油点燃，红红的大火连成一片。复兴门桥头，12辆点燃的公共汽车排在马路当中，浓浓的黑烟直透天际，熊熊的火光烧红了夜空，还不时传来油箱沉闷的爆炸声。

如何排除横在眼前燃烧的公共汽车，为大部队开进天安门打开通道？我们防暴队原先打算推开公共汽车。但汽车的车帮已烧得红得发亮，热辣辣的火浪，烤得人难以近身。

就在这时，从指挥车里传出一个令人心焦的消息：在复兴门另一端的民族文化宫500名卡口的武警官兵，已经被围攻了数小时，支队长身负重伤，不少战士倒在血泊中，战友的生命危在旦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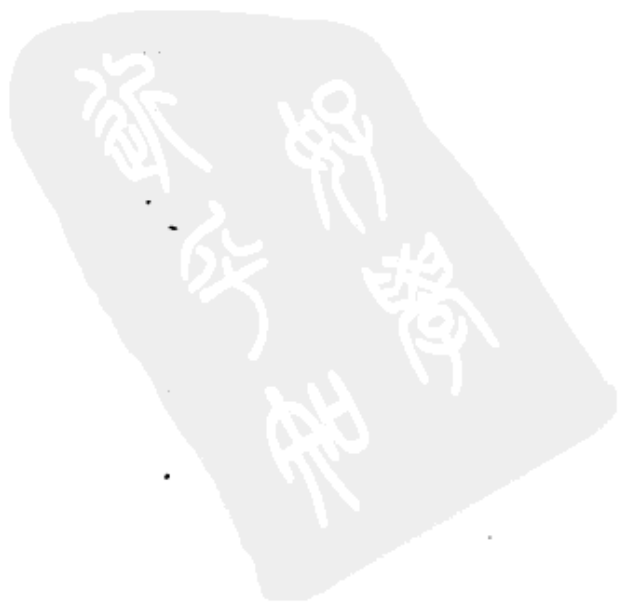
我们防暴队员听到这消息，全都急了！面对横在马路中间熊熊燃烧的公共汽车，大伙全然不顾。迎着火浪，有的几个箭步从二辆燃烧的公共汽车中越过，有的从燃烧的窗户鱼跃而过，有的一个就地十八滚，从车下过去，尔后一个鲤鱼打挺，扑向暴徒……

紧接着戒严部队急速开来，隆隆的装甲车掀翻了燃烧的公共

汽车，大批的解放军官兵抢救了被围困的 500 名武警官兵。

4 日凌晨 1 时 30 分，当我们防暴队穿过西单、六部口到达天安门广场时，在新华门前受了 50 多天窝囊气的警卫战士激动地流下了眼泪，有的振臂高呼：“向武警战士学习，致敬！”有的对空鸣枪致意。我们防暴队员一听，更来劲了。新华门前被歹徒燃烧的火障，成了大伙军事表演的跨栏，战士们一个个手握盾牌、警棍，嗖嗖鱼跃而过。有的在金水桥前翻起了空心筋斗。看着这些浴血奋战五个小时，仍然生龙活虎、斗志昂扬的小伙子，军区齐副司令员夸奖我们是：一支过硬的队伍，英雄的部队，应该记头功。

（柴建国 整理）



榜样的力量

少将副政委 高云江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这句人人熟知的名言，在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的日子里，我集团军的政治工作干部用行动为它描上了重重的一笔。

6月3日，过重的负载使历史放慢行进的脚步，让真实为它一一定格。在我们集团军各个入城点上，都遭到过一小撮暴徒和不明真相的群众的围攻堵截。

“砸了它，烧了它，不能放过腐败政府的军车！”在酒仙桥附近，一伙暴徒夹在骚乱的人群中，象疯了一样，把我们军车围个水泄不通，有数百只、数千只手一齐指向我们官兵的鼻子、脸和头。有的用棍棒敲打着官兵。嘈杂的责问，肆意的谩骂，象暴风雨般地过来了。没有谁经过这样的场面，一些官兵面面相觑，一时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一伙暴徒见我们的官兵不理睬他们，更加放肆，大打出手，石头、砖头、瓦块，雨点般地向官兵们头上砸来。在这危急时刻，团政委张发，推开车门，扒开人群，攀上首车顶，大声喊道：“住手，我是领导，有话跟我讲。”

他拔地而起地出现在人们面前，围观的群众和那些暴徒马上

把目标转向他，开始围攻他。在人群中一个嗓音高喊道：“请您下命令，把部队撤回去，不然我们就烧你们的车，让你们有来无回。”

张政委把嗓门拨到最高的音量向围攻的人群说：“北京市民们，我们是来维护首都正常秩序，不是来镇压群众的。我们必须与党保持一致，希望你们理解我们，不要被坏人利用，阻止我们的行动，干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时间在分分秒秒地过去，车上的官兵学政委的样儿，也开始与群众宣传对话，问号在一个个拉直，“隔层”在逐渐融解，大部分群众退去了，一小撮暴徒孤立了，部队没受分毫损失。

可是不久又出现新情况，一伙人不知从什么地方拉来两具尸体堵到某团的车队前，他们指着尸体喊：“这就是被你们枪杀的无辜者，快掉转枪口，不要做历史的罪人了。”

经这一煽动，一伙人一窝蜂似地从车里往外拽官兵，让其低头认罪，不那么做，就大打出手。

士气可鼓不可泄。政治处主任张录召集机关干部研究不被假象所迷惑的对策，让他们到各个车上做工作。车下仍然簇拥着人群，叫骂声不断。他们走下车，强行冲开人群，到了连队的车上。他们的衣服被撕破了，头和手臂流出了血。用不着说多少话，做多少工作，他们的行动足以使战士们坚定立场和信念。大家团结一心，驳斥谣言，使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没了市场，喧闹一阵后便灰溜溜地走了。

暮色渐浓，但闷热丝毫未减，已经被围困了近十个小时的某团车队，在遭受谩骂、围攻的同时，也经受着疲倦、饥渴的折磨。政委高培正嗓子沙哑了，本来清瘦的脸更显得疲惫。身边的同志心疼之余，想出“一招”，让他化装出去，寻找其他部队支援。高政委理

解大家的好意，但他摇了摇头说：“我不能走，有我在，战士心安，部队稳定。”

战士们看到领导和机关干部们与自己在一起，便心中有了“主心骨”，大家只有一个念头：坚持、坚持、坚持到底就是胜利。一天、两天、三天……整整七天七夜，他们啃着方便面，接雨水喝，睡车板。政委和其他领导没有离开车队半步。全团没有走一人，丢一枪，终于取得了戒严的胜利。

……

说心里话，由于近年来思想政治工作很难做，一些政治干部不那么有威信了，“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能说不能做”的问题也不是没有。在这次执行任务前，我们召开了一次政工会，“约法三章”，政工干部在这场严肃的政治斗争面前，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危急关头，冲锋在前；在艰苦环境中，严于律己，做出表率。但实际中能做得怎样，我也有一点点担忧。

令人欣喜的是，在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面前，他们都填写出一份合格的答卷。某师在进驻到农展馆后，大门被一群不明真相的群众用大客车和铁栅栏堵死，宣传科长王存刚就主动带科里干事苦口婆心地讲道理，做工作，说服了一批又一批群众，整整一宿没合眼，赢得了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自动搬走门障，保证了部队第二天正常上岗执勤。

某团在进驻临时营地后，因无住处，战士们只好住到水泥路上，看到这种情况，政委牛其林把战士让到为团领导准备的车辆上，自己把行李搬到地下，“男儿有泪不轻弹”，在这些谩骂、殴打、饥渴面前安之若素的血性男儿，此刻洒下了激动的泪水。

点斑窥豹。在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斗争中，我们的政治工作

干部用自己的行动,创造了思想政治工作更强的感召力,创造了思想政治工作更有效的开端。



浴血金水桥

大校副师长 佟喜刚

一路突围破障，闯险过关，我们 003 号装甲指挥车于 6 月 4 日零时 20 分，开进到天安门前金水桥东侧预定位置。

通过观察孔，我最先看到的是悬挂在城楼中央的毛主席画像。接着我又新奇地瞥了一眼广场。心里的滋味是几分欣喜还有几分苦涩。天安门广场这样的圣地被搞得如此混乱不堪，成为动乱的策源地，作为一个军人，我们的心里都在流血。

“与后面车队联系，告诉他们我们已经到达位置。”我向参谋命令。好象就这两句话的工夫，不知从哪里涌来那么多人，一下子把车围了个水泄不通。我格外警觉起来，两眼死死盯着观察孔。

人们狂怒地吼叫着，拼命往前挤着，转眼间就开始用砖头石块，铁棍木棒往车上攻击了。

我心里一惊，知道情况不妙，虽然我们到达指定位置，但大批车队却没有跟上来，孤车这样呆下去肯定会出事，我便命令驾驶员继续前进，从第三个城门洞闯进城楼去。可是车刚一发动，就听啪嚓一声，驾驶员的潜望镜被打碎了。他问：“看不见怎么办？”我说：“慢行，听我的，我看得见。”

加油，挂挡。坏了，发动机突突猛响，车却一动没动。我有点急：“怎么了？！”驾驶员慌了，握操纵杆的两手，只是机械地重复着加油，挂挡。一连四次车还是不动。“转向！”身边的参谋喊。驾驶员应声一动，车熄火了。再发动，转向也转不动。驾驶员头上、身上的汗象水洗一样。我心想：看来没动的希望了。全车人都惊呆了，一双双瞪大的眼睛象是在互相询问，盼着谁能有个好主意。这时车外好象有人爬了上来，把车身敲得叮咣响，捂潜望镜，堵排气孔，企图憋死我们。

“车里进烟了！”

听到喊声我猛抬头，正好看见一个年轻的身穿蓝上衣的家伙提着燃烧瓶往车上爬，身后还有指手划脚的。瞅着这阵势，我尽量使自己冷静下来，思索着对策。可是有什么全美之策呢？看来，与其在车上坐等烧死，倒不如争取主动下车讲点道理，或许能缓和一下局势。把注意力引向自己，车上的同志或许能趁机救车，脱险，就是挨几砖头也没啥。自然，谁下都没有好果子吃。可让别人下去，一是不忍心，二也不放心。还是我下！定下这个主意，我扭头和军区解副部长商量：你在车上组织灭火，及时下车脱身，我下去解释几句，看能否保住我们这台车。老解是想劝阻我，没容他说话，我已挪到车后门。刚一扭开门栓，车门象有人推似的哐地一声被车内的热气和浓烟给拥开了。一股午夜的凉气涌向我，我深吸了一口。本想找个制高点，但四周的人围得太严实了，根本看不出去。我便大嗓门儿，冲着人群喊：

“同学们，市民们，我们是来执行戒严任务的，不是来镇压……”

“啪！”话没说完，迎头就是一棒，敲得我眼冒金花。紧接着，

砖头瓦块、石头、瓶子、狼牙棒、钢筋棍，噼哩啪嚓不住点地往头上、身上落，根本没有再张嘴的机会。一些外地口音边打边骂：

“他这车轧死人了，快报仇吧。”

“打呀，打死臭当官的。”

人越围越多，越打越凶。“咚！”头上的钢盔给打掉了。我知道这玩意可是保命的家伙，弯腰拣起扣在头上，不大工夫又给打掉，我又拣起戴上，手还没离开，钢筋落下了，血喇地顺着腕子往下涌。一阵钻心疼，我右手用劲攥住左手，牙咬得咯咯响。我想看一眼车，结果连影也看不到。只觉得两腿发软，一片天昏地暗，倒了下去。疼痛、喊叫，一切都离我远去。

不知过了多少时辰，朦朦胧胧地感到有人动我的身体。他一动，我就一阵疼痛。想睁眼看看，使了几下子劲也没睁开。头象大了几倍，嗡嗡嗡不停地响。

“不能放过这个胖当官的！”这一喊，我先是一惊，转念想，豁出命去了。

“不要再打了，人眼看就要死了！”稍静一下，有人说，“恐怕不行了，赶紧拦个车送医院。”

这是一个女低音。心想，可能遇到好人了。几个人很吃力地把我抬上车，一双手紧紧抱着我满是血的头。石头、棍棒仍不时地打在我的身上和腿上。又有人喊：

“别打了，人已经死了！”我虽然疼痛难忍，心还是清楚的，感到有话要说，颤抖地发出几句：

“谢谢市民，谢谢学生，谢谢。”随后又失去知觉。

我再一次醒了。极力回忆刚刚发生的一切。极力想知道我的003号车，想知道我同车的那八名官兵，又担心任务的完成。

我们装甲车队是担任巡逻和清场开路先锋的分队。我们任务完成得如何，直接影响到步兵部队的行动。想到这，我着急了，拼命将眼睛睁开一条缝，想看一看，结果力不从心。只好依旧躺在这奇怪的地方。

四周格外肃静，身上外衣没了，身下是冰凉的地板。沿着洁白的天花板往下看，墙壁上明显的红十字告诉了我，这是医院。

医生告诉我，全身大小50多处受伤，光头部就有2—5厘米长的口子8个，共缝了30多针。左手中指粉碎性骨折，胸、背、腿都有严重损伤。这些对于我来说都是次要的。反正还活着，我最想知道的是“003”和那八个人，还有清场任务。

消息终于来了。“003”已被暴徒烧毁，其余八名同志都住进了医院。为此，我着急、懊悔，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值得欣慰的是，我们车率先开进广场，鼓舞了部队开进的士气，吸住盘踞广场准备进行打砸抢烧的暴徒，为后续部队的到来争得了时间，拉开了清场的序幕。

上尉参谋 邱 成

随着一阵马达轰鸣，003号装甲指挥车就位了。全车人似乎同时喘了一口长气。不知咋的，我却没有几分兴奋的意思，暗自寻思，后面将要发生的事情是不好预料的。我抓紧与后面车队联络，三部无线电台、一部无线电话在我的控制下继续工作着。

“黄河，黄河，我是长江，我已到达金水桥指定位置，命你加速前进……”话刚说到这，对方信号突然不见了。任我再三呼叫，传给我的只是“沙沙”的电流声。车内真热。我擦汗的手巾一拧都是哗哗的水。没有空气的流动，闷得要死。所有的心思几乎都用到

面对的电台上,更换频率,重新调试,启用备用网络,终不见成效。凭我的经验判断电台机身不见故障,肯定是露在车外的天线被拆。顺口骂了一句:“这家伙,还挺狡猾,知道抓要害部位。”电台哑了,喉舌断了,此时此刻的003号指挥车成了真正的“光杆司令”。这当口,车外石头砖头叮咣乱砸,车上有人撬顶窗盖,车前方的潜望镜砸的砸、捂的捂,对外的“眼睛”也没有了。我用沙哑的声音向首长报告了这近乎是瞬间发生的情况,焦急地等待着首长的命令。

突然,一股刺鼻的油烟伴着烤漆的燃烧味扑鼻而来,我大喊:“车内进烟了!”其实,大家都闻到了烟味,也都看到了一串串淡蓝色的小火苗从车窗的缝隙着了上来。

“排烟!”“救火!”两位首长也着急地喊。

我放下手中的作业工具,和另一名战士极迅速地扯过灭火器冲着火苗猛滋。浓烟熏得我们一个劲地流泪,咳嗽,喘气困难。其他人也都在用手和毛巾猛劲地扑打。火势越来越旺,两个灭火器眼看就要用完了,火仍有增无减。

“嘭!”不知怎么车后门突然开了,我扭头一瞧,见佟副师长要下车,大家将目光一齐投向他,心里都明白下去的危险,满车的烟也都随着他挤向门口。车里已有十多处旺火,控制已经无望,摆在面前的路只有一条——下车。这时,我冲着军区装甲兵部解副部长喊:

“副部长,赶紧下车,车里不能再呆了!”

解副部长下车后,车上还有兄弟单位的一个中尉参谋,一个上尉,两名战士和正副驾驶,我又招呼他们:

“快下车,快下车!”

他们几个听到喊声,有往下跳的,有仍舍不得离开尽力在扑火

的。我刚准备下去，突然想到岗位上还有指挥电话记录、电台密码、行动方案等机密材料没有处置。也许此时就是军人的责任感在起作用，根本没去管火已经烧到了自己的袖子。面对这些材料，有点犯难，带出去吧，万一被抢走就坏了，不带出去，又可惜这些东西将来还有用。当断则断，心一狠，全投入火中。这时候，心好象放下了，又好象丢了点什么。

“下车！”身后有人喊我。我爬似地到了车后门，一只腿刚迈出去，一小瓶汽油正好泼到腿上，我顺手抓起瓶子朝远处扔去，腿上的油让车上的火给引着了，我赶紧用手胡拉，军裤子上留下了几个残缺的口子。一支铁棍又朝我当胸打来。我用力抓住，身体后退一步，又被顶回车里，门被关上了。车里活象蒸笼烤箱，闷热难忍。下！不然会被烧死，这是心里的唯一念头。一低头，发现了自己用过的价值十几万元的无线电话，还有几种其它贵重器材，我弯腰抱起，准备外冲，可是为开车门，只好放下，车门一开，一只胳膊就被人拽住了，想拿器材没门儿了。我回头看了一眼车上，还有一个同志，正准备往下跳。

“啪嚓！”当我头上挨了一棍子时，我才发现，忙这忙那，竟忙得忘记戴钢盔了。防又没法防，护也没法护，两只胳膊在人家手里呢。没法，只好挨着吧。叮当一阵，头就象四分五裂一样疼，没多大一会儿，我就人事不省了。

当我再感到疼的时候，是两个人拖着我猛跑。棍棒还不时地打在腿上腰上。我不知道是谁拖我干什么，就拼命挣脱，其中一个哀求似地劝我：“别动！”说着，抓起我两只胳膊一抡，把我拖到他背上。

我边挣脱边喊：“放开我，放开我！”越喊他跑得越快，象飞一

样，前头有人开路，边跑边喊：

“快闪开，快闪开！”背着我的人哭着，喘着粗气，速度一点不慢，手一点也不松。来到一辆救护车旁，他一个转身，把我从后门扔进车里，迅速关上车门。外面有人喊：

“拉出来，打死这个当兵的！”就听他哭着求人说：

“别打了，别打了，他已经不行了！”他始终在车门护着。

在背我的途中，我头上的血染红了他的上衣，他头部也挨了棍子，额头也出了血，后来他挨没挨打我不知道了。跑的途中，恍惚听他说是吉林长春人。

离开广场急救中心到了医院，以后我又遇到过几位救我的、关心照顾我的好心人，我生怕忘了他们，都请他们把名字写在了我的衬衣上。

专业军士驾驶员 赵 斌

接到向天安门开进的命令，我率先跳进驾驶仓，很快做好了出发准备。当时，心里既兴奋又忧虑。兴奋的是当了九年驾驶员往天安门前开车还是第一次，何况又是为首长开车。八四年国庆大阅兵没让我去还生了几天气呢。如今虽然任务不同，背景不同，但车往天安门开是真的。忧虑的是听首长动员时说，途中危险很大，又是降坐关窗驾驶，手有点陌生，万一出点闪失，不好交代。

想归想，开归开。拿出自己的看家本事，拖也把车拖到天安门。自己暗下了这个决心。

到了蒲黄榆大桥，我一看这阵势，真有点害怕了。挤在路中间的人群，有扔石头的，抡棍棒的，狂呼乱喊的，桥上还有往车上扔水泥礅子的，这真是上有埋伏下有阻击。面对这面人墙，我思谋着，

硬撞过去，定会有人丧命，上级有要求，连伤都不行。得想个办法：离人墙远处我就猛踩油门，声也大，烟也大，他不会不怕。我双手推紧操纵杆，两眼死死盯着目标，加油，减速，眼看到了人群跟前，我猛使制动，车“噎”一声似停未停，人群“哄”地散开了，我换挡加速，车过去了。人们醒悟过来也晚了。越过这道人墙后，我一点也没轻松，预感到有什么不快在等着我。这台车，这些人，还有首长，此时他们的安全就攥在我的手里。越想压力越大，心情越紧张，注意力越集中。讨厌的不争气的汗也越流越多。

突然，正前方约200米处，从路旁窜出两个人，拖起一个隔离墩直朝我车跑来。我先是一怔，怎么办？躲，对方也会左右移动，随车向变化。倒不如……我加大油门，方向丝毫不改，径直前冲。距对方还有五、六米时，我猛一个右转向，车擦着墩子边一闪而过，俩人傻在那了。

每隔10余米路上就有一处路障。我开动脑筋，正确分析，果断处置，能撞则撞，能轧则轧，能躲则躲。说心里话还是躲的多。因为每撞一个障碍物，象岗亭、油桶什么的，心里就一阵难受，为国家财产而可惜。

车，行进到崇文门。

此时正是华灯初上的时候，淡红色的路灯光远不如我装甲车的大灯光，路上几乎没有往日那川流不息的大小车辆，街面上的热闹与往常也大不相同，来回涌动的人流，发出一声声叫喊，难以听得清楚。绕过一群群人，越过一个个路障，车在快速行驶。

坏了，又是一处大障碍。前方路中央三辆无轨电车成“品”字形拦腰挡住去路。车上坐满了嗷嗷叫喊的人，车两边是手拉手的人，这下我可险些懵了。撞吧，装甲车前沿太低，很难把高出它好

几米的电车撞倒。再说，即使撞倒了，装甲车也爬不过去。不撞吧，死路一条。最后我决定只能撞。车不倒也会把人吓跑。我挂倒档，后退，前冲，“咣！”电车晃了晃，原地未动，再倒，再撞，车仍是晃，就这一晃起了作用。车上车下的人见我来真格的，害怕了，赶紧夺路逃走。我趁机方向向右，再向左，再偏右，正好一个“之”字形路线，闯过了这道关口。

拐过东单，转眼到了长安街上。路障有增无减，一个挨一个，当时也别无选择，车在起伏，颠簸。这时我才发现头上不知什么时候给弄了个口子，手一摸粘糊糊的，心里想怪了，当时怎么连疼都没感觉出来。猛抬头，前头约二、三百米处就是天安门了，我这才稍微松了口气。但车下仍是路障重重。

刚到金水桥东侧，车就被围了。当首长再命令我前行时，车就开不动了。原来是车撞到路障上熄火了，暴徒趁机将 20 多根铁棍钢筋插进了负重轮和诱导轮上，把轮齿卡死了。

不大一会儿，车就进烟了。车开不动了，我也傻眼了。只知道着急。听到有人喊着火了，我才从驾驶仓绕过来，救火。车窗盖也被人卡死了。当我意识到该下车时，车上就剩我一个人了，我赶紧往后门跑，一步跳下去。这时，车左后方一群人正围着一个军官在打，我顺着车边跑，没跑几步，身后就有人喊：“他也是这车上的，给他留点记号！”几个人窜上来就是一棍子，正好打在我的鼻梁上，鼻子里外的血同时哗哗往外流。我一回头再看车时，车上的火已经窜得老高，火在呼呼地着。

暴徒的棍棒打得我身上疼，烧着的车叫我心疼。我总象丢了点什么似的，同时为失去这个伴我四个年头的“伴侣”而痛心。这是一辆新车，才开了 58 摩托小时，这是 84 年国庆曾接受过中央领

导和全国人民检阅的车，五年前在天安门前走过，今天却在天安门前被烧毁，我为此掉泪。

车烧了，它是作为一辆装甲指挥车开进广场的，没轧人，没伤人，我这两只手是争气的。

(魏 芳 整理)



B10—2203,你在哪里?

司机 任乃平

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迄今已经过去几十天了,在这段时间里,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昨天那一幕,无时无刻不在呼唤着你的名字: B10—2203号大轿车,你在哪里?或许那一幕太深刻了,所以才给人这样重的心理负荷,或许因世间万物都富有灵气,培养了人的爱心,所以才这样令人刻骨铭心,让人禁不住倾注无限的情愫。一场劫难过后,给人们带来的是什么呢?我们都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当 B10—2203号大轿车在烈火中扭曲变形的时候,它是否向人世间提醒了一些什么?述说了一些什么呢?

6月3日凌晨一点,我奉命驾驶 B10—2203号大轿车运送友军戒严部队某集团军某团执行任务。前两趟我按领导规定的时间和行驶路线,在平静的夜色里,安全快速地把乘车干部战士送到了集结地点。三点左右,第三趟出发了,当车行至西单附近时,遭到了一伙不明真象的群众、大学生和极少数暴徒的阻截。当时,马路上被设置了重重路障,极少数暴徒在人群里大肆鼓噪,故意在军民之间制造矛盾,煽动群众辱骂、殴打解放军官兵,很快,有人上来把我的车轮胎扎破放气,有人用砖头、石块向车上扔来,将车窗上的玻璃一块一块地砸碎。那一块块玻璃清脆的破碎声,仿佛敲击在

我的心头。我忍不住向人群高喊：“车是国家财产，是人民的血汗。”暴徒们不听劝阻，更加凶狠地扔砖头石块向车辆砸来，一时间叫喊声、辱骂声不绝于耳。

一名干部身上带着的手枪被暴徒们发现了，就叫嚷起来：“他身上有枪。”眼看局势更进一步趋于紧张，我赶快跑过去，在其他战友的掩护下，迅速把枪揣到内衣里，又坐回到驾驶位置上。为了避免发生更大的事端，车上戒严部队领导命令官兵们迅速把枪支弹药全部隐蔽起来，每个人负责保护一个窗口，决不让任何人上车，保护车内所有物资，待机在群众中开展宣传工作，以稳定局势。

为了防止暴徒毁坏车头部件，我一直守在驾驶位置上。有人看出我是司机，就大声叫嚷着叫我下车，并在市民群众中造谣煽动说，昨天夜里，一辆戒严部队开道车在木樨地附近活活压死了一个老人，一名儿童，还有二名大学生。人们对谣言非常相信，有人跳起来向我身上扔砖块，向我身上吐痰，一个身材不高的暴徒爬上来一拳打在了我的右臂上，我忍了又忍，真想……随车的首长看到这种情况以后，立即命令我到车厢里躲一躲，但我考虑到，我是一名党员，无论处境多么危险，都应该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如果暴徒趁我离开之机拉开门锁按钮，车门就会全部打开，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

B10—2203号大轿车就如同一艘在险风恶浪中颠簸冲击的“诺亚方舟”，它载着我们，使我们暂时得到了安全，武器得到了保护，尽管它已经被毁坏得千疮百孔，支离破碎，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竟成了我们三十多条生命的避风港。

看看暴徒们那样凶狠地用各种手段毁坏着我心爱的汽车，一时间，我的心禁不住一阵阵绞痛起来，千头万绪袭上心头。这辆车

陪伴我快有三个年头了，它高大、宽敞、漂亮，跑在路上又快又稳，我非常爱惜它，这感情就如同人们爱惜自己的眼睛，就如同战士们热爱自己的绿军装，爱护手中的那杆钢枪一样。我爱它，是因为它同样肩负着特殊的使命。

上午八时许，事态进一步恶化，极少数人开始动手摇晃汽车，妄图逼迫我们下车交出武器。对此，在车上领导指挥下，我们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人们从右边掀，我们人员就都到右边去，从左边掀，我们就都站到左边去，暴徒的阴谋最终没有得逞。为了不使事态进一步扩展，我们用一个个窗口反复向群众做宣传工作，用大量的事例证明，我们是一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军队，是来维护首都的正常秩序，决不镇压学生，枪口决不对准人民。我们的宣传在市民群众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一些群众停止了围攻、打砸，答应我们战士可以几个人、几个人地去厕所，但必须是在他们的“陪同”、“保护”下前往。

时近中午，气温越来越高，车四周和车顶上都站满了人，在暴徒们一片狂呼乱叫和谩骂声中，坐在车里的干部战士一个个汗流浹背，仿佛置身于蒸笼一般，窒闷焦灼得透不过气来，加上大家很长时间没有吃一口饭、喝一口水了，都显得疲惫不堪、干渴难忍了。大家都在最大限度地忍耐着，克制着……突然，我发现一个小战士正在暗暗地抹着眼角的泪水。是委屈？是害怕？还是在做出了人生重大抉择以后的宽慰和激动？我不得而知，只是也受了他的感染，禁不住鼻子一酸……

下午二时许，围聚在军车周围的人群非但没有离去，反而越聚越多，他们叫嚷着，恶行也在随着自然界气温的增高而一步步升级。他们用烂草帘、破麻布把车门车窗全部堵死，狂妄地叫嚣着，

扬言要“热死，闷死这些当兵的”。

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局势，我在想，暴徒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万一他们纵火烧车怎么办？车上戒严部队三十多名官兵和一大批军械物资的安全怎样才能得到保障？自从在开进途中被拦截、围困以后，我已经整整十多小时与上级失去了联系，车上执行戒严任务的兄弟部队也与其领导机关失去了联络，下一步该怎么办？在没有接到上级命令和指示以前，我们该采取什么行动？经和戒严部队首长协商，决定派人下车找上级联系。于是我主动提出，这一带我比较熟悉，让我去。戒严部队首长同意了我的请求。

下午四时许，同车两名战士准备同我一起下车，当时，车被人们重重围困，车门、车窗被堵死。我们在车厢里转了两圈，观察到车后窗人少一些，在这里下车比较有把握，于是就跟围在那里的几个人说：“我们要下车去趟厕所，行不行？”经过一番周折，他们终于答应了。我们刚跳下车，人群里便有人喊：“派人和当兵的一起去，别让他们跑了。”随着喊声，一个男青年走上来，大声对周围的人说：“我跟当兵的一起去，他们跑不了。”

在去厕所的路上，我们没有找到离开的机会，在回来的路上，快靠近车时，人比较拥挤混乱，我们终于甩掉了一直跟在身后的“尾巴”。我小声地对那两名战士讲：“你们快回车上去。”两名战士会意，便走在了我的前面，趁人不注意，我便混入了人群，慢慢地向北走去。由于情况复杂，我又穿着一条军裤，所以走走停停，行动非常谨慎。当我走到西单十字路口北面的时候，一个瘦瘦的青年走到我面前，上下打量了我一眼，道：“你是当兵的吧？”我望着他，略一沉吟。他没等我回答，又说：“别担心，我家离这里不远，你饿了就到我家吃点饭，现在很危险，到我家里避避吧？”说完他掏

出工作证让我看。对于他的坦诚和热情，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在这特殊的时刻，一句表示理解的话能使我们感到春天般的温暖，一声亲切的问候，能使我们忘掉一切烦恼和委屈。我对他说：“谢谢你，好兄弟！我还有事，咱们日后有机会再见。”我拍了拍他的肩膀便朝前走去。

最后我绕路来到西单交通队，时间大约在晚上6点30分左右。说明来意以后，交通队的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立即给我拨通了我们团领导办公室的电话。在电话里，我汇报了汽车被毁坏的经过和戒严部队现在面临的困境。团首长立即告诉我：“戒严指挥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已经发出通告，你们一定要忍耐和克制，要坚持，要保证自己的安全，部队很快就去营救你们。”

和团领导通过电话以后，我沉重的心情总算轻松了一些。

深夜，我正准备重新返回车上的时候，交通队一名干部搀扶着三名受伤的战士走来，他们讲局势已经进一步恶化，歹徒们正在搞打、砸、抢、烧、杀，马路上堆满了障碍物，许多车辆被点着了，这三名战士是戒严部队某装甲团的，他们的军车被暴徒毁坏焚烧了，部队许多人被打伤，他们是遭到了歹徒的围攻、追赶、殴打后与部队失散的。听了他们的介绍以后，我刚刚轻松一些的心情一时间又笼罩了一层阴云，强烈的责任感驱使我恨不得一下子飞回到车上，与戒严部队官兵战斗在一起，和我心爱的汽车呆在一起。当我准备走的时候，交通队的同志拦住我，一定要我留下来，说现在回去也已经无济于事了，外面情况太危险了。正在这时候，交通队门前突然围聚了很多人，有几名歹徒爬上墙头，站在了屋顶上，狂妄地叫嚣着，让交通队交出受伤的解放军战士。原来，他们发现三名受伤的战士进了交通队以后，便纠集一伙人追到了这里。在这种情

况下,我便加入到交通队保卫机关不受冲击、保护戒严部队伤员不再受到侵害的行列里。我们安排伤员在房间里休息,全体交通警察都行动起来,关好大门,紧紧把住院落四周。随后,交通队领导出面与暴徒们交涉,规劝他们赶快离开这里。但,暴徒们对于善意的劝告非但不听,反而变本加厉起来,一个暴徒凶巴巴叫嚷着:“如果再不交出当兵的,我们就火烧交通队,砸烂交通警车。”虽然我们有了一些准备,但听了他的话以后,还是为国家财产和三名戒严部队伤员的安危捏一把汗,因为当时交通队院里停放着十几辆交通巡逻车,交通队附近还有那么多单位,暴徒们一旦放起火来,后果将无法收拾。

双方都在僵持着,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

这时候,我更加担心还在人群重重包围之中的戒严部队战友,还有我那辆心爱的汽车,他们都怎么样了?或许,他们都被戒严部队救走了,或许……我不知道,也不敢再往下想。直到第二天上午8时,围堵的人才逐渐散去,于是,我迫不及待地往回赶,恨不得一下飞回军营,为了路上的安全,交通队的同志给我拿来了一套便衣让我换上,借给我一辆自行车,把我送出了大门。

又回到了马路上,到处是一片狼藉景象,空气里混和着橡胶烧糊的焦腥味,原本宽敞洁净的马路到处堆满了破砖头,碎石头,玻璃碴等物,原本在马路两旁摆放整齐的水泥隔离墩已经支离破碎;从西单路口往西看去,被焚烧毁坏的汽车残骸随处可见……望着这一切,我的心禁不住涌起一股凄凉,强烈地意识到,国家又经受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劫难,军队又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啊!

过了西单十字路口,我突然看见了我心爱的军车已经被毁成一具面目全非的钢筋铁骨,面对它,我不敢相信,但铁一般残酷

的现实告诉我这确实是事实的时候，顿时感到有一种撕心裂肺的疼痛在折磨着我，一种悲凉凄怆的情绪紧紧地攫住了我的心。车上三十多名戒严部队的官兵都到哪里去了？我在车上车下找遍，却没有找到一点痕迹。

据一些现场目击者介绍，4日凌晨1时左右，一些暴徒开始往汽车上浇汽油，失去人性地妄图把戒严部队官兵烧死在车里，幸亏戒严部队及时地撤离了汽车，才避免了更大的伤亡。

事后，我终于又见到了那天坐在我车上的戒严部队战友。在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之后，我们是那样亲密，都禁不住流下了热泪。他们告诉我，在他们撤离汽车的时候，遭到了一伙暴徒的围攻殴打，一名少尉排长的右腿当场就被暴徒们用铁棍打断了，还有几名战士当场被打成重伤，一部分军用物资被抢，后来，戒严指挥部派机动小分队救出了他们……

当万名少年儿童在天安门广场集会的时候，当恋人们又在公园里甜蜜依偎，当人们晚饭以后携家人悠闲地在林荫道上漫步，一切都这么美好，一切又都这样宁静，一切又都这样安详的时候，我却在想，为了驱散共和国上空的乌云，共和国忠诚的卫士们为此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代价和多么惨重的牺牲啊！

但愿人们不要忘记这段艰难苦涩的日子，不要忘记 B10—2203。

(孔 军 宋守营 整理)

西单路口：军火！军火！！

干事 丹 丁

报载：(1989年)6月3日晚11时20分，在六部口地段，一辆军用大轿车被上万人团团围住，少数暴徒在狂呼乱叫，要“杀人夺枪”。车里，是被围困的某部8名官兵和装备一个营的武器弹药。车顶，几个暴徒面向西架着一挺抢来的轻机枪，旁边放着两箱子子弹。西边不远，执行天安门广场清场任务的戒严部队已逼近西单……

这骇人听闻、千钧一发的局面，引出一段复杂曲折、惊心动魄、英勇悲壮、可歌可泣的故事。

这一事件从一开始就令我极为关注，因为事件的几位主要当事人都是我朝夕相处的战友。当初一听到他们奉命配合戒严部队执行向城里运送武器弹药的消息，我便牵肠挂肚般地惦念着他们。当城里一个个血淋淋的消息传来，我深深地为战友们的命运担忧。当他们一个个大难不死、奇迹般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时，我又是多么喜出望外啊！在多次倾谈中，他们如实地介绍了各自亲身经历的每一个细节。渐渐地，我萌生了一个念头：何不把他们的谈话记录下来，公布出去，以补报道之过简，以正社会之视听。

这是一张同1.8米的个头、85公斤的体重搭配得颇相称的圆脸，那肤色令人感受到高粱地里的馨香，怪不得他一开口就以浓重的乡音说：“我是‘红高粱家族’的后裔，莫言这家伙算是把俺高密人的风流出尽了，没想到这次轮到了我，那么多记者也不怕浪费胶卷和磁带，噤哩叭啦地拍呀照呀，比迎接国家元首还殷勤。”——也许仗义、憨厚而又狡黠、幽默是这个家族成员所固有的秉性。在采访他时就听人说，刘维新被救之后，高度兴奋的神经控制不住，总想追着别人开玩笑，三天后才感觉头疼，才吃药。当我同他那双略显疲惫、布满血网眸子相撞时，却仿佛看到了一株“红高粱”在突变的险恶处境和情感折磨时的厮杀、抗争和煎熬的情景——

接到库首长下达的为人民大会堂戒严部队运送武器装备的命令，我心头立马象压了一块沉甸甸的东西。当了这么多年汽车兵，拉运货物千万种，可还是第一次拉运武器，并且是运往全国人民心目中最神圣的地方，深感形势的严峻和责任的重大。

6月3日凌晨1点多钟，当车快行驶到西便门时，只见前方黑压压一片人用垃圾桶把路面堵死。我马上叫司机小傅向后倒车，顺路口往北改走西长安街。谁知刚到军事博物馆前，又见前边聚集着很多人，整个路面被堵得严严实实（后来才听说是一辆车发生了亡3人、伤1人的恶性交通事故），这时就听路边骑自行车的人喊：“这辆是军车，截住它！”我见情形不妙，急令小傅调转车头向公主坟方向开。

面对两次受阻，是返回呢还是想办法完成任务？记得在汽车五团时，常听领导讲，汽车五团在朝鲜战场上就是靠机智、灵活和勇敢为前线抢运物资，才赢得轰不垮炸不烂的钢铁运输团的光荣称号。眼下，部分戒严部队已着便装陆续进驻人民大会堂，作为后勤保障的汽车兵，必须把武器装备及时送上去。

“刘助理，咱们从公主坟往北开，由阜成路向东，怎么样？”小傅建议道。

考虑部队大都从南路开进，北路也许会好些，我同意小傅的意见。果真一路还算顺利。当右转行驶到民族饭店路口时，我让小傅开慢点，先观察一下路口的情况，然后横穿长安街，从四川饭店左转弯顺东绒线胡同一直到人民大会堂。谁知刚驶出路口，就发现前边和东西两边挤满了人群。真邪乎，人们都象得了梦游症啦！

小傅急问：“刘助理，怎么办？”

我马上说：“左转弯，进快车道冲过去！”

路边有人大喊：“军车，快截住它！截住它！”人群一边追一边喊。

待车临近西单路口时，人群已拥向快车道。只见三个男青年迎着车冲来，其中的一个一边喊着一边亡命地跳上保险杠，两手抓住雨刷器贴在车前方，人群很快形成了一堵人墙。

“小傅，紧急刹车！”

几乎与我的话音同时，小傅采取了紧急制动。车被迫停在了西单路口以东约 200 米处。

时间已是 3 日凌晨 2 时许。

车刚停下，挡风玻璃就被砖头、铁棍、汽水瓶打碎，轮胎也全部放了气，车的四周很快被路障包围——这一切，都发生在一眨眼的

工夫。

紧接着，驾驶门被打开了，一群人不容分说地把小傅拉下车。我刚要扑过去拽他，就被一个硬邦邦的东西击在头顶上，脑瓜子嗡嗡直叫，眼冒金星。疼痛之余，就觉晕乎乎地象喝了一碗“红红的高粱酒”。

约五分钟后，小傅被几个学生护着扶上车，半躺在驾驶座后边的座位上。只见他脸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鼻子流着血。

“小傅，你怎么样？”我顾不得朝我打来的拳头和吐来的唾沫，扑过去问。

“他大概被打昏了，没有生命危险。”一个扶小傅上车的学生坐在驾驶座上，以不冷不热的声调对我说。

这时车下有人叫喊：“这辆车刚才在木樨地压死我们四个市民，报仇啊！”“这是总后的车，他们是内奸，是家贼！”……那个一开始拦车就跳上保险杠的人怒气冲冲地指着我大骂：“把这个胖当官的拉下来打死！打死！”由他这么一煽动，人群顿时骚动，谩骂声、砸车声四起，一些人蜂拥而上，车上的电线被扯断，水杯被砸碎，我的上衣、裤腿被撕破……我简直不敢相信人们原本既丰富又复杂的感情为什么变得这么易燃易爆，既简单又偏执，一句信口雌黄的挑唆就能把人们鼓动得如醉如狂？

我忍着。咬紧牙关。

我磨破嘴皮进行劝解，请他们理智些，并一再声明：木樨地发生的车祸绝不是我们这辆车！可是这一切都无济于事，最担心的事出现了：大约早上6点钟，一个男青年声称受“高自联”、“工自联”的派遣，前来检查车上的物资。他强行从打碎的车窗爬进来，很快从麻袋里抽出一支冲锋枪，在车上耀武扬威地摆弄，让外国人

录相。这下更加剧了紧张的气氛：“当兵的良心叫狗吃了，所以拿枪对付人民！”“把枪拿出来示众！”……嘈杂声中又有人砸车，在车上书写标语。

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些学生挤到车边，他们胸前都挂着学生证，劝上车的市民下车，并宣传说：当兵的也是群众，我们要争取他们站到人民这一边，削弱他们对戒严的士气……我趁机对学生说：“看来，现在只有你们学生是至高无上的，我请求你们维护秩序，千万不要做那些出格的事情，枪支丢失了，我们和你们都是有罪的。”

有个学生对我说：“市民们已经知道这车拉的是武器了，为了防止抢枪，倒不如拿出一支枪放到车顶上去，然后由我们学生向群众宣传，只许看，不许抢。”

我赶紧插话：“千万不能拿出去，万一丢了，后果不堪设想！”车上的其他军人也急忙劝阻。

又一个学生说：“谁拿出去谁负责看管，一定不能丢了。”

有个学生急忙拿出学生证，以证明他是学生，接着便爬到了车顶上，又有两个也爬了上去。随着一阵阵车顶的踩踏声和电喇叭的宣讲声，车的周围爆发出一阵阵喝彩和掌声——这些，人们大都在电视里看到了。

看势头，一会儿半会儿是走不了啦！咋办？当务之急是设法让其他同志出去通风报信。在学生让我到后一排座位上休息的当儿，我趁机向同车押运的某戒严部队军需股宫股长打了个手势。宫股长立刻明白了我的用意。随后我扫视了一下车内，禁不住大吃一惊：小傅不见了！

在刚接到运送任务时，领导上讲要挑选最好的驾驶员，自然就

点了他这位司机班长的将。我对他说：“小傅，今个是咱兄弟俩的差使，你乐意不？”他说：“好，为完成任务，小弟这百八十斤就豁出去了！”

四下寻视不见小傅，担心他这个有股倔巴劲的山朶子忍受不住，真的豁出去了！我急得心里直喊：小傅啊小傅，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向单位领导向你老婆孩子咋交代呀！……

2

现在，这位曾神侃要在吕梁英雄传里续写自家名姓的专业军士傅里加就坐在我面前。入伍启程时他对为他送行的人说：“乡亲们，请回吧，来年英雄谱里见！”几年来，他所带领的班四次荣立集体三等功，他本人两次荣立三等功。战友们依他名字的谐音送给他一种车牌绰号：“伏尔加”——皮实、耐劳、有股子倔强劲儿。

最刺人眼目的是那斑驳的伤迹很不协调地点缀在他的额头、脸腮上——这标记让人联想到那淬火的铁块还散发着灼热——

我被一伙人死拉硬扯地拽下车来，按倒在地，一阵拳脚相加，当场就打昏了过去。多亏一名便衣警察和两名大学生把我护送到车上。等醒过来，发现我刚买的石英手表被抢去了，衬衣、背心、裤子全都撕破了，浑身上下十几处伤。

天大亮的时候，一个家伙钻进车里翻出一支冲锋枪，围观的人群立即喧嚣起来，一切都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在这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势态复杂的情况面前，要保持清醒头脑和高度理智，并以自己的行动去捍卫人民军队的荣誉和尊严，是多么不容易啊！这时，一切说教都变得苍白无力，一片赤诚都被斥之为驴肝肺！

怎么办？活人岂能让尿憋死——陡然间我被这句俗语提醒。于是我悄悄跟两位学生商量：让我去趟厕所。学生表示同意后，就一边向人群解释，一边护送我去了西单劝业场东边的公厕。

在厕所里，我对同我一起进去的一位学生说：“我有一个请求，不知你是否同意？”

“什么请求？尽管说吧。”

“我爱人生下孩子才40天，身边也没有人照看，我眼下又回不去，能不能让我往家里打个电话？”

“可以。”

这位学生带我到了路南停车场旁边的电话亭，用他的学生证向周围的群众解释一番，才允许我打电话。我向单位值班主任和参谋报告了情况，由于周围环境不允许，话不能明讲，我只好这样说：车被困在西单路口以东约200米的地方，有点损失；请告诉家里人，我们今天回不去了，明白吗？

打完电话，我就跟学生一起上了车。我低声对刘助理说：电话打了。当时他正向那位抄出枪的人和群众做劝解，也不知他听到没有。

由于枪支被暴徒抄出，围观的人剧增，一些外国记者也纷纷赶来助兴。整个六部口人头攒动，嘈杂、拥挤不堪，夏日的窒闷和仿佛要燃烧的空气让人喘不过气来。一伙别有用心的人肆无忌惮地对车上的军人进行谩骂、污辱和肉体折磨，不顾国格人格，招引外国记者录音、拍照……

我的心在无法忍受的痛苦折磨中瑟瑟颤抖：古今中外有过这样的军人吗？

——发水灾了，冒山火了，闹地震了，边关吃紧了，冲在最前头的

是他们，他们一时成了人们翘首盼望的保护神，成了最可亲可敬可爱的人，一旦事过境迁，“傻大兵”这一绰号便是赐予他们的殊荣！

——在商品经济、价值观念已进入国人的开放型思维之际，一些人一意张扬个性实现自我价值升值，一切向钱看，一些人成了腰缠万贯、肥得流油的暴发户；而他们却甘于寂寞，长年累月地坚守在边陲哨所！

为了这个古老的民族，为了这个年轻的国家，他们不惜青春，不惜流血，赴汤蹈火，慷慨赴死，该付出的全付出了……可眼下，他们的神圣被亵渎，他们的尊严被奸污，有人把极端的仇恨和百倍的疯狂都倾泄在他们头上！堂堂热血男儿谁不痛心疾首？

这期间，有几个学生把枪和钢盔拿到车顶上展览。学生说，不这样做市民们不答应，万一抢了枪事情会更糟。下面看热闹的人不知从哪儿弄到一张三屉桌也抬到了车顶上。

这样拖延下去会是什么结局呀！我心里火烧火燎。看看刘助理，他被记者和学生缠着进行无休止的对话。于是我心里一横，向学生要求再去一趟厕所。学生把我送下车，我说，请你们放心，我保证回来。

我挤出人群，见身后没有人盯梢，就沿路边向东走去。路经六部口时，见也有几辆军车被堵，其中一台拉武器装备的大轿车也是总部的。

我到了人民大会堂，找到了等待武器装备的某部师首长，报告了情况，并给分部值班首长打通了电话。这大约在上午10点。

事态的发展已相当严峻，营救危在旦夕的战友和武器装备的任务，义不容辞地落在了这两位领导的肩上，他们是仓库主任段志祥中校和政治处主任赵晓鸿少校——

段志祥： 接到傅里加打回的电话后，我们马上请示分部首长，当即决定：由分部和仓库分别派人去探明情况，设法与车上的同志取得联系。我们选派了职工王保海、李健二人火速前往，并让他们给车上的人员送些食品和饮料。下午2点30分，王、李打电话说：车被堵在西单路口东，车窗玻璃全被砸碎，车顶上架着机枪，只看到刘维新在车里，没有傅里加；人群把车围得水泄不通，无法接近，食物送不上去。

赵晓鸿： 得到这一消息时，全库正在开会学习文件，考虑到事态的严重性，立即宣布休会。之后在段主任主持下召开了五分钟的党委会，决定成立一个营救小组，马上行动。段主任请缨挂帅，我理所当然也要出马喽，因为会上我们就分析指出：要与当地公安部门取得联系，要得到他们的大力协助。我可以通过我母亲（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曾岫萍）跟他们取得联系。很快，由5人组成的营救小组成立了。我们把行动方案向分部首长汇报后，常部长给予充分肯定，李政委又亲自给营救小组作了动员，寄予很大希望。

我要通母亲的电话，简要说明了情况。母亲说：“你们先去，我马上给西城区公安分局打电话。”并告诉了分局局长、副局长的名字，后又叮嘱我：“万一你们到了，我的电话还没打通，就告诉他们，

你是我的儿子，一定请他们尽力协助。”

段志祥：小组成员身穿便装，各带一辆自行车，为节省时间，就安排司机先用客货两用车送我们一段路。穿背街过小巷，行至琉璃厂附近就难以前进了。于是，我们就下了汽车，骑自行车，相互注意联络暗号，保持好距离，向现场奔去……

4

话分两头。

在营救小组成立到紧急出动的这段时间里，傅里加和刘维新所处的情况如何呢？

傅里加：这个师的首长边听我的汇报边叫来医护人员给我包扎伤口，又让人给我送来水和一碗方便面。我已有十几个小时没吃没喝了，确实又渴又饿。可我吃不下。我说我还得回车上去。师首长不让我走，说军首长要见我，随后带我到了军部。军首长听了我的汇报，马上又领我见了司令员。军长介绍说：“这是总后的那个司机小傅，小伙子很勇敢，挨了揍又冒着危险跑来报告。”司令员点点头，详细询问了车辆、武器装备以及周围环境情况，而后就开紧急会议去了。我又回到师部，一位首长问我怎么营救最合适，我说穿便衣。很快就集合了30多名着便装的官兵，并作了动员：第一、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到现场后迅速把车围起来，必要时手拉手，保证车上人员和装备的安全；第二、出发时3人为一小组，各组间保持适当距离，注意隐蔽和互相联系。首长让我带了3名战士先走了。

到了现场一看，人更加密集，车的周围用隔离墩和垃圾桶堵

着,根本接近不了车。仔细朝车里观察,才看见刘助理在第二个座位上坐着,正跟学生交谈。再寻视前来营救的便衣官兵,才发现他们早已被人海淹没了。

我再次回到大会堂报告了情况。这大约是下午1点。

就在这时,只见某军的一支队伍穿军装戴钢盔,徒手从大会堂出发了。听一位首长说,这是去营救军车的队伍。谁知没等队伍开到南长街的红绿灯处,就被聚集的人流和雨点般的石头、瓶子击退了回来。

我看情况危急,决定还是回到车上去。师后勤的一位首长说:“我们要对你的生命负责,你去也是白送死!上级正在研究应急措施……”我说:“我死也要死在车上,跟刘助理死在一块!”他硬是叫人把我拦住。双方的声音仿佛都是从极压抑的胸腔里憋出来的,听着手指发麻。

刘维新: 六部口一带,武警部队为抢救被围困的一车军火,施放了催泪弹。

我想这下有救了,只要把武器装备救走,就是品尝一下催泪弹是啥滋味也心甘情愿,就是自己倒下了也算对得起俺那“高粱地”的老少爷们了。可是望眼欲穿,也没见打过来,可能阻力太大了。

转眼间,只见人流象漩涡一样从六部口涌过来,密密麻麻全是脑袋,看不到地面。那些吃了催泪弹苦头的、受惊的、看热闹的人象沙丁鱼般地围到我们车边撒气。

事态更加恶化了。

车上的学生见我有危险,就让我退到后面座位上,车下的学生和便衣干警也都胳膊挽胳膊地把车围住。

这时我才定神看了看车内的六七位学生,其中有一位记得最

清楚，长方脸、尖下巴，肤色细嫩，看上去是个很秀气、漂亮的小伙子。后经查寻，他是北京邮电学院的陆玮。他曾向我说，希望防暴警察来，等他们离车 30 米处再撤，并把准备好的白纱布蘸上水，发给车上的军人和学生，还讲了如何预防催泪弹。还有一位就是同我对话，并让我给他签字交朋友的王永刚，一双大眼睛，年纪不大。其他几位的面目印象不太深了。他们说，他们大都参加过军训，有的还去老山前线慰问过，对解放军是钦佩的，现在解放军陷入困境，不能看着不管；要说有分歧，就是对戒严不理解，想不通。我说，当兵的和大学生的愿望是一致的，都希望我们国家好，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有分歧，以后总会弄清的。事态的变化已经与你们最初的心愿相背离，已经控制不了局面。眼下无论如何，枪支弹药不能失散了，这样会给社会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威胁。他们都表示赞同。

在六部口施放催泪弹之后，一小撮暴徒开始大打出手。他们从一台吉普车上拖出 3 名军人（某集团军的师政委邵松高少将、上尉参谋赵敏、警卫员周强），其中一位将军被学生和便衣警察护送转移，另两位军人被学生护送到我们车上。

突然，车的西南方向发生了骚乱，一名便衣警察因拿着报话机报告情况被一歹徒发现，这歹徒鼓动一伙人对其毒打，其惨相叫人心寒。后来这位便衣警察被学生拦了一辆救护车送进医院（后来得知，该同志经抢救无效牺牲）。

相继，一个腰插匕首的家伙鼓动人群抢枪，立即被学生押到车上，经盘查是个外地流窜犯，就把他扭送到西单派出所去了。

我也记不清人海里发生了多少次冲击波，一伙人为进一步制造事端，把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推到我面前。老太太指着，泪

流满面地哭喊：“孩子啊，你千万不能干伤天害理的事啊！你们带枪来干什么？要打就先开枪打死我吧！”我也流着泪对老人家说：“我是山东农民的儿子，在俺家乡，我该叫您娘，在北京我叫您老妈妈。您的孩子决不会把枪口对准母亲、对准人民……”有人打断我的话，吼道：“要是你的长官下令要你开枪呢？”我说：“决不会这样的。”这话赢得一片掌声。

接着又有人问：“你们当兵的每人发了一个吊脖扣该作何解释？”我听了感到可笑，说：“那不是什么吊脖扣，是军帽里的帽圈。大概是有的战士打背包怕压坏了帽子，就把帽圈抽出来了。”我拿出一顶军帽作了示范。这时有个人不知气从哪来，伸手给了我一拳，结果他的手被车窗的玻璃片划破，我赶紧把一块纱布送给他，他再也不好意思打人了。

时间大约到了下午 5 点，我感到精疲力竭了，不由得抓起一块蘸有水的纱布，捂在嘴边吮吸。车周围的部分学生已经走了，车上的学生也开始坚持不住了，就听有个学生骂道：“谁个王八蛋截的车，扔下不管了，靠我们几个能顶住吗？”在有的学生提议下，他们开了碰头会，大意是：如果防暴警察来，在距离 30 米处把枪和人交给这位当官的；如果不来，天黑以前交到附近公安局或让他们来接管，我们已经难以控制局势……

就在这时，一个头缠白布条，瘦脸尖下巴，看上去有二十一二岁的男青年冲到车门口喊：“我是北大的学生，刚从天安门广场跑来。现在大兵已经在广场镇压我们学生了，你们怎么这样仁慈？快把这几个大兵拉下去交给市民处治，拿起武器支援‘高自联’！”车上的学生劝他要理智，双方发生争吵。此人见车上的学生不支持他的观点，气冲冲地向东挤去。

看到车上的学生紧张、焦虑的样子，我就好生相劝：“你们不能走，就是大部队开来了你们也别走，我可以为你们担保，请相信我吧！再说，保护武器装备你们也有责任哪！……”

随后，有两个学生让我为他们签名留下字据。

5

事件的发生令人惊诧，骚乱的局势更叫人忧心如焚，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我们的思考是痛苦的。当看到躁动于十里长街，因盲目和轻信而情绪爆炸的人群，当听到盛谈于街头巷尾，被谣传感染了的喧嚣，我们曾为此感到深深的惶惑与愤懑。想当初，党的号召，宣传鼓动，曾经是很有效的，它造就过一代精英良才，召唤起亿万人的创造伟力，神话般地将一个个奇迹展现在中国大地，但今天，人们为什么会被邪恶所裹挟而释放出如此巨大的破坏力量？人类的感情就在这爱与恨的两极中演出了多少世纪的悲喜剧……眼下，我们最不愿意看到那感情的另一极在阴谋的煽惑下拉出惨烈的电弧，爆发一场罪恶的裂变！

——我是在了解营救军车的详细经过时，聆听两位主任这番由衷感叹的。

段志祥： 约下午5时，我们一行5人骑车到达六部口南边的胡同，就见前面的人山人海有一辆大轿车。赵主任挤进去一看，不是我们的车，车窗玻璃全打烂了，里面没什么东西。于是我们上了西长安街，又看到两辆被砸烂了的大轿车，其中一辆上边挂着被撕烂的军官服和钢盔，车的顶上有两大绿箱子，围观的人很多，有人在声嘶力竭地煽动着。

我们相互暗示了一下，这正是我库的大轿车。车已被砸得千疮百孔，车后贴着一幅标语：“这就是××镇压人民的新式武器”，车里有七八位穿白衬衣的军人，刘维新坐在车门后边的座位上，方向盘附近有几个学生不时用纱布蒙眼睛……这时只见有一黑皮肤的女人在向刘维新动手动脚地叫喊：“把这个当官的裤子扒下来示众！”周围一片起哄。还有不少人在议论刚才吊打“便衣”的情景，说“发现一个打死一个”！

我们无法同车上的人接近。

我们只好挤了出来。

军人的人格遭到如此贬损和玷污，作为一个身临其境的军人，内心的苦楚是一般人难以体味出来的。

赵晓鸿： 下午6时许，我们来到西城区公安分局，见到了副局长王崇勋。他说，我母亲的电话他们已经接到了，那车的情况和整个六部口的局势他们都清楚，陈希同市长和区领导都不时打电话询问情况。那里有他几十名“便衣”，可因事态复杂，在待机行动。

能不能用防暴队驱散人群，把武器抢出来呢？这个方案立即被否决了。王副局长说：“白天试过，不行，伤了不少人，也搞不出来。”这时，一位干警将一份电传交给王副局长，他看完后说：“好了，今晚什么都解决了！”

得到这一信息，我和段主任估摸着可能晚上部队有行动。再细想想，感到并不轻松：现在西单路口至六部口一带万分危急，部队一到必定车毁人亡；武器弹药被抢也势必给开进部队造成很大伤亡。王副局长也这样分析。因此，只能“智取”不能“强夺”——还必须在部队到达之前解决问题。

情势迫在眉睫。

时间催人。

共同研究的结果是：先由公安分局设法和学生取得联系，然后派救护车进现场营救。王副局长立即起身去安排和学生接头……

段志祥： 当接到王副局长的电话要我们马上去西单商场派出所与学生谈判，我们放下刚端起的饭碗，迅即出发了。

在去派出所的路上，只见一伙人从别的车上搬来两大绿箱子弹，放到我库大轿车上，引起一片掌声。见此情景，更使我们感到急迫。

到了西单商场派出所，见王副局长正跟两个学生交谈。一个学生自称叫任建新（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重名），另一个学生叫陆玮。那位叫任建新的说：天安门广场告急，“高自联”要学生们都撤回广场去，怕丢下武器出了事要负责任，故领着这位学生代表（指陆玮）找到派出所，要求公安人员去现场接管。陆玮说：我们学生不希望看到流血事件。我们的行动被一些人扰乱了，使我们无法控制局面。我们向两位学生指出：在目前这种状况下，部队和公安很难去接管。事情是由学生挑起来的，所以你们不能走，要替国家和人民负责。希望你们大力配合，共同想办法将人员和武器安全转移。陆玮说：车上的学生也很着急，也在想办法，我们愿意和你们配合。任建新说：那日后你们可要为我们证明。

王副局长和赵主任当即给他们签写了字据。

赵晓鸿： 要说明的是，这位叫任建新的学生得到了签条，谈判达成协议之后就走了，没有参加现场营救（后来得知，某师副参谋长王小京为营救这车军火，也同“高自联”的学生代表进行了谈判，任建新是代表之一）。

晚 10 点 30 分，营救方案商定出来：1. 出两辆救护车加医务人员以救护学生为名开进现场；2. 部队方面去 1 人（多了易暴露）化装成大夫跟救护车到现场指挥协调；3. 再出动部分“便衣”维护现场；4. 由学生代表组织学生配合，对外宣传说是将武器拉到广场去。

这时，段主任接到本单位打来的电话：驻丰台戒严部队已奉命于 9 时出动。

分局的同志也得到消息：西路进城的部队已前进到木樨地，因受阻而鸣枪示警。

顿时，在座所有同志的神经都绷紧了。

王副局长请示了上级后对大家说：“行动！上级指示，只给 10 分钟！说罢，转身出去找救护车。”

段主任要化装成大夫去现场指挥，我拦住说：“你不象，我去！”因为平时人们都说我象搞医的，有大夫风度。不由分说我就把身上的军官证和段主任写给我与刘维新接头联系的“密电码”（因我刚调来，段怕刘不认识我而写的条子）交给段主任。随后接到王副局长从邮电医院打来的电话，就由一名“便衣”带路跑去登车了。身后听段主任喊：“一定要把车上人员和武器全救出来！还有——别忘了车顶上那挺机枪！还有——我们去现场暗中保护你们！……”

我和西城区卫生局马局长等几位同志上了一辆救护车，其他同志上了另一辆救护车。到达现场已是晚上 11 时 20 分，时而能听到西边响起的枪声，看到西方忽闪忽闪的光亮，空气里有股子硝烟味。

当我向弹药车望去，不禁瞪大了眼睛，只见一辆新的大轿车上

飘舞着旗帜，被人群护拥着，已逼近了弹药！

这是怎么回事？？？

刹那间，我的心跳到了喉咙口……

6

这突然开进现场的大轿车是从哪儿来的？谁弄来的？要干什么？要到哪儿去？……

也许困守在车上的刘维新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天渐渐黑了，我心里更加焦急。俗话说，贼盗夜里行。万一学生走了，一伙暴徒就会趁机放火烧车，抢枪杀人。

我打开车门，一边主动与学生交谈，一边盯着油箱附近。在我抬头之际，冷不防发现了几张熟悉的面孔——是段主任他们！我激动得发抖：在这危急关头，首长和战友挺身而出，这种感情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可我又怕他们被暴露了，便故意伸起胳膊摆摆手，把脸转向一边。

随着天色暗下来，围观的群众又多起来。尽管喧闹很凶，而车四周却显得比较平缓，后来才知道西城公安分局的不少“便衣”已靠近。我趁机向学生提议接一下发动机的线路，看能不能开得动，学生们同意了。于是我就爬下身子去接线，不料被一位年轻人推了一把，他自我介绍说：“我已开了好几年车，我来接吧！能开动的的话就到附近修理厂打上气，送到公安局算了。”我看他不象有恶意，就让他接。我问他是个哪个单位的，叫什么，他不说不说（直到现在也没有查寻出他的下落）。大约修了半个多小时，也没能发动着。这位年轻人就向学生提议：“这辆车修不好了，最好能找一辆车把枪

拉走。”我顺便说：“找辆卡车也行，拖着走。”他说：“怕是拖不动，干脆到附近找辆大轿车，我去找找看。”说罢，他和两个学生就下车了。

等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听一个学生拿着话筒喊：“市民们，我们马上来一辆车，把枪拉到天安门展览去，请大家让开道！”话音刚落，一辆大轿车从东边开过来了，开车的正是那位年轻人。后听学生说，这车是一个市民用自己的一串钥匙一个一个试捅开的，这市民为了要钥匙也跟着上车了。车是从电报大楼附近弄来的。

大轿车与弹药车门靠门停下，学生们相互分工行动起来，几个学生下车堵住两车间的口子，车上的学生和军人开始先搬运背包行李，我马上提醒一句：“别忘了车顶上的枪。”只见王永刚象猫似的爬到车顶取回了枪。

刚要搬运枪支，突然听到一阵刺耳的警笛声，只见从东边开来两辆救护车。我顿吃一惊：我的娘哟，这是咋的，闹鬼啦？！

7

应该说，这个时候矛盾冲突的凝聚点全集中在弹药车上了。

这是一种不可言说而又默契的配合！这是一次在惊险、紧迫、压抑的状态下进行的复杂合成演习！倘若这一过程中的某一环节出了毛病或万一漏了破绽，啊，那后果你想想……

赵晓鸿：当我看到这辆不知从哪来的大轿车而感到震惊时，穿便装的刑警队指导员阎国章马上走过来，声音低而急促地对我说：“这是学生找来的车，你快上去！”

救护车从人群闪开的通道开进去，还未停稳，有人就拉开车门

大声问：“你们是哪儿的？”

车上人回答：“我们是急救中心的。”

又有人喊：“你们要是救当兵的，谁也别想跑掉！”

一看这情景，我向马局长要了手提式话筒下车了。我一边喊一边向弹药车挤去：“请让一让，让一让，我是急救中心的！”

有几个人拦住路：“你救谁？”

我说：“听人报告，那车上有两个学生昏过去了。”

“你赶快救去吧！”

这个时候，学生在人们心目中简直是“上帝”。

我上了车，一眼看见了参加谈判的陆玮同学，就小声对他说：“时间不多了，装要紧的东西。”又一看学生只负责从军人手中接东西，而战士们还在拿行李且动作很慢。心想这也难怪，他们也许认为真象学生对外宣传的那样，将武器拉到“高自联”去。于是我小声对战士们说：“我是部队的，快拿武器，你们也跟那辆车走。”战士们放下行李，加快动作搬运武器。接着我故意大声说：“我是急救中心的，你们身体怎么样？能坚持住吗？”然后，我走到司机位置，对刘维新说：“你现在已虚脱，请立即跟我到医院去！”

刘维新：因赵主任调我单位时间不长，对他印象不深，加上他身穿白大褂、头戴白帽又戴着眼镜，确实没认出来。他一连拉我两次，我说：“我不能走，等把东西搬完了一块走。”他急了：“我以医生的身份命令你马上跟我去医院进行治疗！”说着在我后腰打了一拳，朝我掀了一下帽子，挤挤眼。这时车下有人喊：“赵大夫，快点！”（是阎国章在暗示要加快动作）我一听到“赵”字，又仔细看了他一眼，才算认出来。但我并没有立即下车，见车四周挤进很多脑袋朝里观望，就去劝阻。这时车下又有人冲我喊：“医生三番五

次劝你，你逞什么能？请相信我们市民会给你看好车的！”（是王崇勋在催促）车上的学生也劝我快走。

我下了车。在两车的接口处，学生给我让开了道。我简直象做梦一样，压根没想到能活着走出来。我流着泪离开了围困长达22小时之久的大轿车。

段志祥： 我们几个营救人员在不远处观察动向。我感觉空气凝固了，电报大楼上的钟声刻不容缓地在脑海里咣咣直响。当时我真怕哪个孬小子看破机关，那一切都将前功尽弃。当听到从西边飞来的流弹在头顶上空炸响的声音，我嫌时间过得太快了，嫌营救动作太慢了。我直想喊：赵主任，请你们快些，再快些……

赵晓鸿： 大约10分钟过后，我问一名押运的军人：“要紧的东西搬完没有？”

他回答：“完了。”

我又问王永刚：“车顶上的枪拿下来没有？”

他说：“拿下来了。”

尔后我要大家下车，并对陆玮说：“你跟我上救护车，其余学生和军人上大轿车。大轿车走在两辆救护车中间。”

陆玮问：“去哪儿？”

我说：“回丰台。”

他点点头。

军人和学生分别上了各自要上的车。

我和阎国章立即跳上打头阵的救护车。等大轿车一开动，两辆救护车一前一后夹着大轿车向西开去。围观的人群见方向不对，就堵拥过来，喊道：“你们到底去哪儿？”

我和阎国章相互暗示了一下，随机应付道：“我们要把武器运

去展览！”“六部口堵得厉害，我们绕道去天安门！”

我又给陆玮投了个眼色，陆玮赶快附和：“是这样，是这样，绕道去广场！”

一伙人扒开车门：“要走咱们一块儿走，看把武器运到哪儿？”说着就往上挤。

我和阎国章猛用力推开他们，关上车门，几乎同时对司机说：“开车！”

急救车拉响汽笛，突冲过去，后面的车也紧跟着闯出重围。乖乖，好玄哪！

段志祥： 这时已是晚上11时40分。谢天谢地！三辆车冲出包围圈向西开过刚5分钟，只见从西单十字路口北面出来二三百名防暴警察，驱散人群，发疯似的人群向他们投掷砖头、石块、汽水瓶，砸在盾牌上“啪啪”直响。防暴队伍退了回去。

这当口，在西单十字路口被当做路障的三辆公共汽车里和车顶上堆满了人，他们手拿消防钩、棍棒、短刀等，一副要血战到底的架势，周围的人群不断喝彩鼓掌。

不一会儿，从路口北面先后开过来两辆装甲车，一边放着催泪弹，一边撞向路口的公共汽车，看样子是要把路障推开，但没能推开，随后向西开去。这时西边的枪声越来越近。一伙暴徒狂吼着点燃了公共汽车和我们丢下的大轿车。转眼间，火光冲天，把夜空染得血红。

我不禁暗暗自语：万幸，万幸！营救车要是晚走5分钟，那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啊！同时，我又担心起来：营救车与开进部队相遇没有？会不会再遭到堵截呢？

赵晓鸿： 两辆救护车夹着大轿车向西急驶。到民族宫附近

由于前面人多，打头的救护车一个急刹车，被大轿车撞了一下车屁股！还好，还能开。又往前奔了一段，只见广播电视部附近人山人海（后来才知道，一伙暴徒煽动群众冲击广播电视部），马局长问我：“赵大夫，往哪儿走？”

“往北，去海军医院！”我当机立断。在西单商场派出所我和段主任商量，如果路况好就回丰台，若不行就去海军总医院。

车刚拐下复兴门立交桥，就听到枪声和部队开进的口号声。记不清拐了多少弯，绕了多少路，只记得从现场突围出来到海军总医院共穿过6处大的路障。最后的一道路障是甘家口，整个路面被公共汽车和一人多高的水泥管堵死，且有密集的人群。怎么办？只好再骗一次试试。我和阎国章、马局长，还有陆玮都下了车，四下向人群宣传：我们要到前边教学生，请帮忙把路障推开。大轿车上的军人和学生也喊：我们是高自联工自联的，请市民们帮忙打开通道。周围的人看看救护车，又看到大轿车上的校旗，就相信了，许多人喊着口号将水泥管搬开，更多的人鼓掌，打出“V”的手势。第一辆救护车刚通过了路障，大轿车发动不着了。我和阎国章又招呼人群帮忙推车，还好，推着了。这时隐隐听到远处时密时稀的枪声。

就这样冲过了最后一道路障，胜利到达目的地。在海军总医院的鼎力协助下，人员和武器装备均被安全保护下来。

在营救出的武器装备清单上是下列数字：

机枪×挺，

冲锋枪×××支，

手枪××支，

子弹×万发，

电台×部，

……

当让我在这些数字的清单上签字的时候，我的手不由自主地颤抖，一种庄严、神圣而又复杂的感情在胸膛里奔涌……

8

平息反革命暴乱后，该库首长和它的上级首长以及有关戒严部队首长专程前往西城区，衷心感谢区委、区政府及区公安分局、区卫生局等单位的通力协助。与此同时，段主任、赵主任、刘维新、傅里加他们也没有忘记那些参加营救的大都没留下姓名的学生和市民。他们在不停地打听、寻找这些做过哪怕一点好事的人，为这些人作证，向这些人致谢。

跟着赵晓鸿，我见到了陆玮和王永刚。

这是一张清秀、纯真、找不到一丝粉饰的、仿佛刚从酣梦中醒来的脸。他说话的声音慢吞吞的，象大姑娘似的。一个亲身经历的惊险故事让他讲起来竟这样平淡无奇：

“我叫陆玮，北京邮电学院计算机通讯专业系87届4(4)班学生。曾在丰台12中上过中学，离你们单位很近。3号那天我骑车去学院图书馆还书，想到西单看看，随便买点东西，结果就遇上了这件事。当时我想，无论如何武器不能被抢了，抢了对谁都不利。对这个问题，一开始车上的几个学生看法也不一致，随着事态越来越严重，拖延的时间又这么久，大家的观点也基本上统一了。车上

的那位比较胖的同志(指刘维新)的处境,的确让我们很担心,也很同情,他和另外几位军人(指押运的戒严部队官兵)跟我们谈得很恳切,我们深受感动。”

当我们寻问到其他几位学生、还有那辆大轿车和年轻司机的情况时,他说:

“车上的学生相互都不认识。那位司机我们也不知道他是哪儿的。把武器运走后,司机又和我们往几家医院拉了几趟伤员,我问他姓名,他不说。同车的还有一位市民,是他用自己的钥匙把车捅开的,为了要钥匙也只好上了车。”

接着,我们又问及部队和公安给他签的条子是否还保存着?他淡淡地笑了笑:

“还保存着。其实签不签条都无所谓,只是为了省略不必要的麻烦。按说,人不需要各式各样的人格面具。”

王永刚是自己找上门来的。

他今年17岁,一双很机灵的大眼睛,长长的睫毛蝉翼般地闪动着,发茬很粗的光头(他说是为了预防不测才剃的)。家住昌平沙河镇南营村安济2条11号,现在丰台铁匠营职业中学烹饪班就读。

他是一个很健谈的男孩子,说话时右肩膀神经质地跳动着,仿佛在为说话的音韵打着节拍:

“6月3日我上学路过西单,见军车被截,车顶上有挺机枪,便在那里围观。大约9点钟,人群骚动,有人喊要抢枪,我心里很急,便主动和大学生手拉手围成人墙,不让人群靠近。这以后的情况,你们也都清楚了。关于那辆大轿车和司机,在转移了武器之后,我们又拉了几趟伤员,最后一趟去了北京四中附近的北大医院,车就

放在那里了，我们和司机各自走散了。记得车里有几个钢盔、水壶、可乐瓶，还有几块擦血迹的衣布。

“6月12日当我看了中央电视台播放的《暴乱真相》里有我的镜头，并插白说：请看这一歹徒的嘴脸……我心里不好受，当时站在车顶上的我和几位学生是保护枪支的，为什么把我们当做暴徒呢？我知道现在是非常时期，事情一时难辨，但我不怪政府，如果政府为抓暴徒叫我去死我都愿意（他讲的时候，拼命压抑着，但还是流泪了）……”

“6月14日晚，我爸爸要我写了一份材料交沙河镇派出所，并回答了讯问，我说我有部队同志签的字据，可惜丢到家里找不到了。谁知第二天下午两点多，公安局出动20多个警察、4辆警车，把我家包围了，当场把我抓走。

“6月17日，我爸妈及全家把屋里屋外翻了个遍，终于找到了那张条子，赶快交到派出所。我爸随即又根据条子上的地址和姓名，赶到部队找到了这位刘叔叔。经刘叔叔证明，后又经公安局调查核实，我于6月24日被放了出来，说是误抓了。”

王永刚的爸爸是崇文门外大街王麻子剪刀门市部的经理兼党支部书记，在对待儿子问题上，态度很明朗地说：

“要是儿子真是暴徒，做父亲的决不庇护，该关就关，该杀就杀！从父子感情上讲自然是痛苦的，从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上讲，就是要大义灭亲！我让儿子上职业中学，学烹饪技术，就是要儿子有一天走上社会，踏踏实实地为人民群众做实事。在查证了儿子确实情况后，我给陈希同市长写了一封信，简述了儿子的所作所为无愧于党和政府，也无愧于他的父母。我在信中说：我儿子才17岁，刚上高中，今后人生路很长，我向您不为求功，只望您让

有关部门给个结论，他今后好去读书，好工作，好做人啊！……”

为了对两位学生的前途负责，该仓库政治处已向陆玮和王永刚所在学校(院)发函致谢。



六部口救军火

上校参谋长 李胜堂

6月3日，我们在某地待命。“叮铃铃……”上午10时1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在值班室响起。话筒传来上级首长的声音：“六部口一辆装有大批武器弹药的军用大轿车和车上十多名部队官兵，被一伙坏分子拦截围困。上级命令你部同兄弟部队、公安干警、防暴警察一起到六部口附近的……待命抢救。”

从上级那略显激动的话语中，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我立即集合部队。不到一分半钟，五百多名官兵戴钢盔、穿皮鞋，不带枪支整齐地集合完毕。尔后迅速到达待命地点。

然而，一个小时过去了，部队并没有出击。

这里离出事地点六部口只有一里多路。从院外混杂的声音里，官兵们已预感到前面出了大事。但谁也不知道具体情况，只是感到自己将要担负的任务非同一般……

又过了一个多小时，部队仍没出击。为什么？

后来才知道，这辆军车是在3日凌晨奉命到天安门执行任务

时被拦截的。一伙歹徒钻进车里，对车里的官兵大作反宣传甚至诬蔑漫骂，企图抢夺车里的武器弹药，鼓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围困军车。到上午，这里已经簇拥了几万人。

“戒严部队集合！”

“公安干警集合！”

13时30分，上级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终于下达了出击的命令。

13时35分左右集合完毕。北京市公安局的一位领导扼要介绍了六部口事态之后，又做了简要动员，要大家听从指挥，遵守纪律，夺武器要勇敢，对群众要忍让……

14时5分左右，这支队伍向六部口出发了。

二

仅用了十分钟，部队来到了六部口北侧。

此时的六部口，充满了风风雨雨。

宽阔、神圣的长安街人山人海。六部口稍往东十字路口中心，横着一辆做路障的公共汽车。指挥市民生活节奏和人身安全的安全岛被推翻。路旁写有“文明卫生街”的牌子被踩在脚下。往南，北新华街口，就是被围困的军车。军车四周万头攒动、水泄不通。再往南，是北京音乐厅。那标志着和平幸福的茶色玻璃窗内，再没有悦耳的音乐，而是挤满了骚动的人群。一些人把军车轮胎扎破、玻璃砸碎。一些人把从车里抢来的枪支架在车顶上，疯狂地向车下的群众叫喊着……

面对如此情景，有一个人流泪了。

他，就是被人称为“天下第一兵”的陆海空仪仗大队副大队长程志强。

是啊，对这位老仪仗兵来说，这里的一草一木太熟悉太熟悉了。多少个春秋，他和战友们到天安门广场接受外国首脑及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时，都要通过这里。那时，这里是充满阳光的大道，五彩缤纷的彩旗，“叮铃铃”欢唱的自行车和穿流不息的人群。今天，这里有路却不能走！他不会忘记，举世瞩目的中苏首脑会晤，由于一小撮人挑起的动乱，长安街、天安门的圣洁遭到玷污。他和战友们没能从这里走向天安门，而是绕道到首都机场接受了三十年来第一次同中国主席杨尚昆握手的戈尔巴乔夫总书记的检阅。作为一名仪仗兵，做为一名中国公民，他感到多么对不起客人啊……

这时，一些群众见解放军和公安武警前来解围，纷纷离去。然而，还有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在一伙人的煽动下没有离去。他们起劲地向走在最前面的官兵扔石块、投汽水瓶，企图阻止部队和公安、武警前来解围。大轿车顶上还有四个人在继续蛊惑人心。一人拍着一挺机枪向车下群众叫喊着；另一人举着一支冲锋枪叫喊着；一个戴眼镜的家伙用一支步枪挑着从车里战士头上抢来的钢盔叫喊着；还有一名穿裤衩、背心的家伙手里拿着个大喇叭，声嘶力竭地进行着煽动……这就是后来中央电视台播放的《反革命暴乱真相》中的一个令人愤慨的镜头。

“冲进去，一定要冲进去，决不能让这伙暴徒的阴谋得逞！”某部副团长谭先诚此时已两眼冒火。他挥动着胳膊，边下令边带领先头部队冒着一些人打来的雨点般的石块、砖块，配合公安干警、防暴警察疏散群众，开辟道路，向装有武器弹药的大桥车靠近；靠

近……

通路打开了。但只不过是二十米左右的通路。四周围堵的人并不甘心，随时都有反扑过来的危险。怎么办？如果重新被包围，武器弹药仍然保不住。不容多想，我立即指挥自己的500名官兵及兄弟部队的部分力量分成三路横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分别向东、南、西强行阻拦，形成面对人群，背向军车的包围圈，切断暴徒和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与装有武器弹药的军车的接触，以便公安干警及其警车迅速靠近军车抢救武器弹药……

车下的暴徒和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被部队用人墙挡住了。公安干警抢救武器弹药的警车已到大轿车旁边。14时20分左右，六部口南侧和西侧的一伙暴徒见公安干警开始转移大轿车内的武器弹药，又煽动数千人冲了过来。

30米，20米，当离我们组成的人墙仅十多米时，防暴警察被迫施放了催泪弹。然而，轿车顶上的四个家伙仍负隅顽抗。三个家伙端着枪疯狂地叫喊着，一个家伙手持大喇叭继续向群众煽动着。

“危险，如果枪里有子弹……”“冲上去！”谭先诚和科长刘秀华几乎同时喊道。话音未落，离车较近的六连战士王伟春象离弦的箭一般从车的西侧向车顶爬去。那个戴眼镜的家伙见有人往上爬，疯狂地喊道：“不许上来，上来打死你！”王伟春哪管那些，纵身一跃，手面摸到车顶。眼看着就要爬上去了，其中两人气急败坏，用脚残忍地猛踹王伟春的手背，另一人用脚猛踢王伟春的头。王伟春手一松，两眼冒火，从车顶摔下去……

就在王伟春从车上摔下来的时候，9连1987年入伍的战士刘加林也快爬到车顶，这时，王伟春砸在刘加林身上。刘加林一手抓住被砸碎玻璃的车窗的上顶窗沿，一手想托住伟春，但没能托住，

王伟春摔下去，右手腕严重挫伤。刘加林继续往上爬，一个家伙见刘加林快爬上车顶，急忙用右手去推他。刘加林眼疾手快，迅速抓住这家伙的手，趁势一跃，上了车顶，又顺势住下一拉，把这家伙甩下车去。

这时，那位手持大喇叭的人还在疯狂地叫喊。刘加林跳过去抓住他。那个家伙掏出一个红色本子指指划划地说：“我有权利喊话！”说着要用喇叭砸刘加林，嘴里说着：“下去，快下去！”刘加林怒从心中起，劈手夺过喇叭，狠狠地摔到车下，一掌把这个亡命徒掀下车顶。

车下，被部队拦在外围的群众仍然成千上万。一些混杂在群众中的暴徒大声漫骂解放军官兵……

在刘加林同车顶上几个家伙搏斗的同时，公安干警、武警部队趁解放军官兵挡住人群，迅速钻进军车里，把十多名官兵扶出车外。一名穿白衬衣的胖胖小子还在车里，趴在装有枪支的麻袋上，死活不出来。两名公安干警把他拖出车外。然后迅速把这批用麻袋捆装的武器弹药搬运到两辆面包车上。

车顶上，剩下的两个家伙见刘加林把两名同伴推下车去，从刘加林的前后一起向刘加林扑来。刘加林，这位在部队擒拿格斗训练的尖子，迅速拉开架式，只见他左腿腾空而起，右手猛虎掏心，几乎在同时，把这两家伙推下车去。

这一切只不过发生在几分钟内。在历史长河中，这几分钟只不过是一瞬间。但历史，将忠诚地记住这一瞬间。

三

当刘加林把车顶上的枪支递给车下的战友们时，公安干警、武警也已把车内的武器弹药转移到了面包车上。

公安干警和装有武器弹药的车辆准备撤离。

就在这时，一伙人看到武器弹药将要运走，再次煽动退到东、西、南侧的数万名不明真相的群众围了上来。一些暴徒从北新华街方向弄来汽水瓶、啤酒瓶和早已准备好的石块。霎时间，瓶子、石块满天飞，象下冰雹一样向部队及公安干警袭来。

“快！组成人墙，掩护武器弹药转移！”我大声喊着。在这关键时刻，北京卫戍区某部所有官兵和防暴警察主动担负起了掩护公安干警运送武器弹药的撤离、担负起了掩护兄弟部队战友撤离的艰巨任务。

我的话音未落，仪仗大队副大队长程志强站出来了，某团副团长谭先诚站出来了，某团参谋长站出来了，教导队长张金明站出来了，科长刘秀华、袁成喻站出来了，所有的干部、共产党员站出来了！一个个警卫战士肩并肩，手挽手，犹如一尊尊钢铁的雕塑，犹如平地立起的钢铁长城！

这时，骚动的人群在一些歹徒的煽动下，越靠越近。砖瓦块、玻璃瓶越来越密。然而，组成人墙的官兵没有一个退缩。副团长谭先诚正指挥部队挡住人群，突然一块三角石头飞来，砸在他的右脚腕上。但他仍然站立着，丝毫没有退缩……

雨点般的石块打得官兵头上的钢盔“当当”作响。一名战士见副团长头上没戴钢盔，便把自己的钢盔戴在他的头上，他又摘下

来，戴在另一位同志头上。

高大魁梧的仪仗大队副大队长程志强面向人群，左右抵挡石块，保护自己的战士……

四

官兵们受伤的越来越多。而围堵者把军人的忍让看成软弱可欺，把军人的冷静看成束手无策，砖头石块，更加肆无忌惮地凶狠地向军人砸着。干部战士也想狠狠地教训一下这些暴乱分子，但这些家伙混在不明真相的群众之中，错伤了群众，他们于心不忍。

官兵们只好忍着，忍着，终于用自己的忍让，用自己的鲜血，唤醒了围观的一些群众。在军车南侧北新华街的胡同里，三名中年群众冒着乱飞的石块高举双手高喊：“别打解放军！别打解放军！”在军车东南侧一个食堂的两个窗户里，有七八个男女群众探出头来，对着官兵们喊：“打歹徒！打歹徒！”“我们不打军人，你们快去对付坏人！”在六部口两侧街道中心，有六七名群众冲着部队喊：“千万别让歹徒们把枪抢走！”“抢走了后患无穷！”广大人民群众是理解我们的……

人民群众的理解给了军人们力量。反革命暴徒没有冲垮这绿色的长城。他们用满腔忠诚和满腔热血，以一副副肩膀铸成的柱石，擎起了坚不可摧的共和国大厦。下午2时50分左右，在我们和防暴警察的掩护下，公安干警、武警和兄弟部队的战友终于将一车军火和十多名解放军官兵转移了出去。

解放军官兵们经受了这场生与死的考验。我们虽有18人轻伤，3人重伤，但保住了军火。这使我和全体官兵感到很欣慰。

李鹏总理听说后，专门委托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到部队驻地看望了干部战士，赞扬部队官兵在抢救武器弹药中组织严密，士气高涨，动作迅速。戒严指挥部的领导高度评价了部队不惜牺牲自己，奋力保护武器弹药的英勇事迹。

(张响贤 李国良 整理)



走进血与火

少将军长 傅秉耀

一直想沿着那天开进的路线再走一遭，为的是重新感受那燃烧的夜晚，让周身的热血再沸腾一次。可因为忙，也许还因为人大都有个习惯，总喜欢过上个10年、20年再旧地重游，那时候，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

如今，北京已经恢复了平静，三环路上的载重卡车重又气派地轰鸣着；人们，一天一天又开始按自己的节奏生活。有时漫步街头，好象这个城市从未发生过什么，没有过那血与火的日子，一点痕迹都没有。东城的立交桥上，我的士兵们每天同启明星一起迎来黎明。那天清晨，我去哨位查哨，那时正赶上日出，太阳把整个东边天空都染红了，那时四周很静，我们，我和士兵们就这么许久地佇立着。

这是共和国的一个崭新的早晨啊！我心里说。为了这个早晨！我们所做的一切正是为了这样的早晨。

我就写写6月3日吧，这一天对所有进京戒严的官兵来说，无疑是刻骨铭心的。

接到命令的那一天晚上，我几乎一夜未睡。在昏暗低矮的帐篷内，我面对着那两张图：兵力部署图和北京市区图，一根接一根

地吸着烟。这将是一场极特殊的战斗啊！早些天，部队向北京开进的时候，根据要求，我先期到达集结地，我集团军部分由火车输送，部分是摩托化开进。我到达数小时后，步话机里便传出师、团长们焦灼嘶哑的声音：

“我部在×××受阻！”

“我部在×××受阻！”

“我部……”

官兵们面临的一切远比战争更复杂更严酷！这沉重的负荷均匀地分给了每一个军官和士兵，他们能撑得起来吗？这支部队，我们的这支部队犹如一只历经磨难却威武无比的猛虎，在历次战役中从数不清的疯狂的杀戮里闯荡出来，裹着一身血光，遍体鳞伤，它只是舔舔自己的伤口，又继续向前。这个部队的战士都有一股子虎气。老战士走了，又把这虎气传给新战士。这部队是“虎”出名的。

可如今……

凌晨3点，我最后一次审视了一下开进方案和兵力部署图，就接过警卫员递上的安眠药片，小憩了片刻。

早上，我来到了担任参加清场任务的我某师住地。这次行动要求保密程度极高，只传达到师；怎样才能做到既不泄密，又能让团队时刻保持准备？我便以检查卫生为名，让团队将卡车一一排列好。又让机关参谋们放出风，说军长晚间要搞紧急集合。这样，士兵们事先就会将背包枪支摆放整齐。那天早晨，我一一注视着这几支团队，我走到一个小战士面前，为他正了正帽子，帽沿下是张纯朴的孩子气十足的脸，一刹那，我心底涌起了一股父亲般的感情，“孩子！……”我真想说。

17时50分。我集团军分四路向城区开进。我率精干指挥所沿主要路线进发。当大部人马开出后，突然接到军区前指指示，令我某师改变集结地，这时，此部队已开出很远，我一面用电台通知，一面让车高速前进追上师参谋长和团政委，在两车并行中下达了命令。

这时，天还没有黑，每个路口都聚满了堵车的人群。“冲过去，追赶前面的部队！”我命令司机。

小伙子猛踩油门，小车飞速滑动，于19时10分到达指挥位置。

我打开指挥机，由于四周高楼林立，电波被阻隔，与各师的联络中断。

我于是身着便装，带着作训处长和炮兵参谋乘车去寻找。

我的车在北京的大小街道上穿梭着。有几次道路受阻，无法前行，就下车步行。我们摸清了部队受堵情况：担任天安门清场任务的我某师团在八王坟处受阻，我另一个师的官兵在建国门遭围打、分隔。

我拥挤在攒动的人群里，攒动的北京城！我此刻说些什么呢？载着我的师团的卡车淹没在人海中，但更强烈地撞击着我的是士兵们一张张焦灼的脸。人海中爆发出一阵阵吼声，这吼声撕扯着他们，也撕扯着我的心。这心在胸腔里狂跳着，我带了差不多整整30年的兵啊！这爱、这情渗透在心底里，渗透到骨血里。我真恨不能跳上车盖，朝士兵们大喊：“我是军长！我在这里！”

然而，将在谋，不在勇。我派出军机关的干部便装进入部队，商量对策，指挥开进，把军首长的命令传达给部队，并接应、寻找失散掉队的士兵。炮兵参谋安卫平就是在此时涌现出来的孤胆英

雄。后来，小伙子被予“共和国卫士”称号。

八王坟处，我受阻团队已采取第二套方案：迂回开进。

建国门立交桥上，张师长也在迅速地稳定队伍，固守要点。

天完全黑了，不，天空仍旧雪亮，那是火！火燃起来了！

暴徒们点燃了一辆又一辆军车，砖瓦石块夹杂着大量的谣言骤雨般倾泻到士兵头上。

我那时在一幢高层建筑的临时指挥所里，我站在平台上，北京城一目了然。这是火的城市，震动的城市。我的士兵们就在这血与火中！

烟蒂燃到了头，灼痛了手指，内心的灼痛却更甚。我在平台上来回踱着步。身边的参谋们全出去侦察去了。身后的小屋里只有一部电台在嘀嘀嗒嗒地叫着。现在，此刻，什么消息都没有。我突然感到一阵空落，甚至涌起一股莫名的焦躁。我，一个集团军军长……我……以往指挥的每一次大大小小的演习或大的行动，那种指挥员的兴奋感和较量的快感充溢着周身的每一处关节，我喜欢把自己关在作战室里，一关就是一天，或是更长的时间，红蓝铅笔在地图上划下一个又一个箭头，我的士兵们扬起一面又一面胜利的旗帜。30年的军旅生涯，甚至更早些时候，在故乡的三江平原上，我会辨别野兔和银狐的脚印，听得清树丛里山鸡的叫声，我喜欢潜入小凌河摸鱼，喜欢在冬天的雪原上，扣上狗皮帽子，拎着棒子追狼。是什么把我与大自然与战争连在一起？抬起头，阳光真好，天空晴朗，意味着目标清晰，我们的炮兵们又可以拿优秀了。每到一处山川林地，就不由自主地想该怎样部署兵力。有时候，自己都笑自己：“你这个人哪！……”

那时想：战争随时会来临吗？

谁想到有一天北京城内会燃起这样的大火？我站在这个小平台上，一个参谋侦察回来报告：团长艾虎生已带着他的团队沿着铁路线进了北京站，他们正以十路纵队臂挽臂，踏着正步冲过人群向天安门进发。

嘿！虎子！这是我们的一头猛虎。我当团长时，这小子在我手下任副指导员，然而，他的素质，他的魄力，他的胆略都无疑表明，他是块军事指挥员的材料，我给他改了行。此刻，他正以一副虎胆、一身虎气率领他的一群虎兵向天安门挺进！

我朝天安门方向望去：那里火光冲天，人声鼎沸。我仿佛看到无数砖石燃烧瓶正砸向虎团长的团队。

心悬起来。

心又重重地跌下。

你们一定流了很多血，很多血啊！此时，没有增援、没有接应。一切全靠你们自己。不！我们整个集团军的力量都聚集在你们身上，共和国在向你们行注目礼！

心能听到你们的踢踏声。心应和着你们！虎子！你再果敢些！再勇猛些！再坚强些吧！

时间已进入次日凌晨。张作礼师长报告：他的两支受阻团队经过一番拼闯，未丢一兵一卒全部到位。

虎团长率部也准时进入广场。

崇文门过街天桥处，一个士兵被暴徒残害致死，又浇上汽油焚烧，挂在天桥示众，直到死，这个士兵的弹夹内，子弹仍旧满满的。后经查明，他就是后来使全国人民心灵为之震撼的“共和国卫士”崔国政。是我集团军某团榴炮二连战士。

沸沸扬扬血与火交融的一天过去了。

这惨烈悲壮的一幕将铭刻在我集团军的军史上。作为军长，我说些什么呢？走出血与火同走进血与火一样艰难。

天长地久，记忆永存。



敬礼，天安门

上校团长 艾虎生

老实说，提起那一天的事情，我可以一口气和你侃上3个小时。现在，要我把这些话都写在纸上，实在是件挺费劲的事。

怎么说呢？好象每篇文章的开头都要自我介绍一番，本人就是军人，没别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军人，是从土里泥里血里摔打、跌滚出来的，是用那能硌死人的高粱米把骨头造硬了的军人。

现在，回想起那一天的经历，真是胜似百年，那天，我们接到开进命令，五百多号人乘着车浩浩荡荡地出发了，行至八王坟处，遇到上万人的阻截。在此之前，我们已经尝过这种受堵滋味，我们曾有过被围一天一夜的经历，士兵们全以沉默来对付这些煽动宣传，于是那些人得了理似的没完没了。然而，这次与以往不同。

“停车——”

“滚回去——”

人群推来拥去，疯了一样。我们的车队停了下来。

前卫车上，是全团身体素质最棒的特务连，小伙子们的身手全跟豹子似的轻捷利落。这时，跳下车两侧排开，护卫车胎。连长马国满来到车前，想向群众讲点什么，立即遭到一顿砖石的猛攻，车窗玻璃也被砸得稀碎。第2辆宣传车只喊了3声，喇叭就被砸得

卡了壳。我那时在第三辆吉普车上。我走下来，踏上车前机盖，刚对人群喊了几句话，就被挤上来的几个小子接连给了两拳。我看了看这阵势，人群更加疯狂地咆哮，我知道讲道理已无济于事。许多天前的那次受阻，我下车与学生市民对话，我们一些干部也走到群众中，道理说了三千六，恨不得把整个人剥脱得只剩下一颗心，懂吗？这颗心！我们接到了命令，我们来戒严，不是去镇压！我们是军人。就这样！没别的。

那少数暴徒仍旧不放军车通行。

人群黑压压的，煽动者们狂叫着，脸嘴都挪了位，我决定采取第2套开进方案。我从车里拿出个话筒大声对人群喊：“不让进，那我们撤！”接着，我跳下车机盖，向官兵们说：“各单位组织调车，我们撤！”营连干部们当即明白了我的用意。

出发前，团党委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设想了途中可能遇到的情况，并明确受阻的处理方案：如不能通过便采取迂回策略，改道开进。根据眼下局势，部下们都明白了我下了迂回的决心。我来到后几台车，找到副参谋长申强，命令他立即组织调车。说完，我坐上了申强的车朝后方开去。

这时是1989年6月3日20时05分。

我坐在车里，骨头节一阵阵发紧，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我，堂堂七尺男儿，在每次受领和执行任务中，说从未怕过艰难、拼打，那的确是真话。以往的每一次搏斗，都在我的头脑中形成一个念头：我，艾虎生，好象我这个人就是当军人的，这副身坯、这副伤痕遍体的身坯早已和疼痛结了缘，有时甚至还怪喜欢那滋味的，血从头上涌出来，骨头裂了缝，于是，牙床骨咬得咯咯响，拳头攥得紧紧的，又在渴望下一次的冒险与搏斗。

这次……的确有点不同，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暴徒，还有许多受蒙蔽的群众和学生。这就要求指挥员不能光有勇敢，还必须要有克制和智慧。

我们很快勘察了可进天安门的3条主要路线，处处聚满了截车的人群，乘车开进，比登天还难。

我突然构想了一个弃车徒步的方案。

20分钟后，我回到车队，组织干部们到北京某公司的一间办公室里秘密开了个分析会。大家一致同意弃车徒步的方案。很快，这一方案得到了师里的批准。

21点20分，我率团主力顺利撤到了高碑店公路与铁路交叉口。准备沿铁路进北京站，再进天安门。

然而，一个更棘手的问题出现了，许多市民学生疑心我们不是真撤，一直骑车尾随，军车一停，便形成了一个包围圈。这时，我又下车把营连干部集中到一间小屋里，规定了武器、雨衣、干粮、水壶四样携带品，并派出两路便衣侦察组，同时对弃车上铁路的方案做了周密布置……

23点20分，铁路桥100米处，集中了全团官兵，他们都是三三两两地悄悄摸上铁路线的，完全摆脱了尾随的人群。

至今，我还记得那时的情景，或者说，记得那种感觉：到处都闪着红光，有铁路沿线的红灯，也有火，这一簇簇一片片的红光在夜空跳跃，在我的士兵们一夜间似乎消瘦了许多的脸颊上跳跃。那时，我们就高高地站在铁路桥上，远处的叫喊声传来，与近处的溶在一起，那更远处的吼声又在城市的四周狂抖不止，把夜震了个东倒西歪，我们站在这摇摆不定的夜里。我的眼睛在我的士兵们的脸上扫了两扫，我们的目光都热得烫人，狂热的目光撞到一起，简

直撞出了火星，我能觉到每一根神经都在疯狂地撼动着，什么都别说了，什么都被忽略了：团长与士兵；星空和风，统统不存在了。我们变成……我们也不知自己是什么、是怎么了，然而念头却有一个：挺进，挺进！再挺进！

我们臂挽臂四次冲过堵截的人墙。

凌晨2点20分，进了北京站。并得知已有两支部队从此地通过。第1支被围打、分割，第2支硬冲过去的。

队伍中的气氛紧张起来。

我们怎么办！

“狭路相逢，勇者胜！”小时候，被几个高年级学生打翻在地，但我站起来，冲上去，就胜利了。一个想法在心中酝酿成熟。对，就这么办！我走到各个连队去，检查准备情况，发现有的战士手在发抖，于是，我一个人给了他们一棍——当然，这不是真打。然而不知怎么回事，我的小腿却突然抽筋了，最后一棍，我打在自己的腿上。

“准备好了没有？！”我猛喊。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准备了没有？！！！”

“准备好了——！！！”

我在队伍中穿行。我那时的心情，就好象看到儿子突然长大了，突然将一杯酒擎到你面前，你忍不住要捶打捶打他厚实的肩膀，弹弹他长硬的脑壳。这些小子！我们一群威风凛凛的小伙子！

“出发！”我猛喊道，“正步走！”

500人成10路纵队臂挽臂向天安门广场开进。

大地震撼着，那是500座青铜像在移动，那是秦王兵俑魂！车站外数万人怔住了，不由自主地后退着……

“一、二、三、四——！”

“——二——三——四——！！”

我们唱响了军歌，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唱着。人群中响起掌声。少数暴徒从惊愕中醒来，疯狂地投掷砖头和燃烧瓶，这些东西在队伍中不可一世地开花、爆炸、燃烧……

踢正步的脚步依然如故。

第一列中有“钢铁七连”连长尚福堂，入伍时曾是身体素质很差的兵，几年后，跃成军硬骨头战士。对他，我从未客气过，有次比赛八千米越野，他跑折了脚趾，仍夺了第1名。但我依旧冷静地注视他。小伙子！你他妈的不给我在泥里摔3摔，血里滚3滚，火里淬3淬，就成不了汉子！此时，他与指导员吴健飞和战士臂挽臂，石块击在身上脸上，步声如旧，歌声如潮。“钢铁七连”应有钢铁般的意志。抗美援朝中有名的釜谷里战斗，这个连最后打剩了7个人，辽沈战役攻打吴家小庙，打剩了19人，最后还是胜利了，七连从未败过。战士刘杰，右腿被砸坏了，跪倒在地，被战友一把拉起，血流如注的腿又溶到那个铿锵的节奏声中。班长邢德龙3次昏倒，手插在战友的臂弯里，细若游丝的意识却仍在指挥着双腿。一个战士的脚绊在路障上，当即扭歪了，自己猛地板过来继续开进。

血也从我的身上、腿上流出来。我抹了把脸，湿漉漉的，大概是血水汗水，兴许还有点激情的泪水。

天安门在哪里？

士兵们大都没来过北京，没见过天安门，心中的城墙又高大又

明亮，从未想过有一天我们会这样走向天安门。我们应该这样走向天安门！

500 双明眸射向前方，向你敬礼！敬礼！

我们在指定时间到达广场。



我们在奔进

中尉干事 张喜波

牺牲了的，极其悲壮；负伤了的，被战友架着，艰难地向前奔进。要赶到那里——共和国国旗升起的地方——天安门广场。那里需要我们。

殷红的血在流淌，浸着我们向前奔进的足迹。在首都的大街上，在崇文门人行过街天桥上，在那段不算长又很长的崇文门通向天安门的路面上，记录了发生在公元1989年6月4日凌晨，血与火交融，正义与邪恶抗争、生与死搏斗的极其壮烈的一幕……

人群的喊声，石块、酒瓶击在汽车上的撞击声震耳欲聋。我同榴炮二连指导员初慧民领着车厢内的9名战士，拼命地向车外喊：“别打我们，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是一家人！”但无济于事。事实上，我们的喊声已被淹没。石块、汽水瓶继续猛烈地从四周向我们砸来。多亏车用篷布严密地蒙着，不然，我们11人都得被砸扁了。哗！哗！哗！玻璃被砸碎的声音。真真切切，那声音是来自驾驶室。那里面坐着对于我们来说是两个至关重要的人物，榴炮二连连长王峰——这辆车的最高军事长官，司机李景民——所有人中唯一会开车的。如果他们俩出了问题……担心的事情终

于发生了。透过驾驶室后面的小窗，清楚地看到王连长满脸是血，侧靠在右车门上，一动不动。他已被打昏。仅能看到右侧半身的李景民，同样的满脸是血，但还在动着，象是在发动汽车。然而一切都是徒劳的。汽车已被砸坏。

“老王，醒醒！”我用手枪把从后面使劲地敲着驾驶室。

说实在的，我之所以能搭乘这辆车，除了曾在这个连当过指导员外，再就是奔王峰——这位辽宁海城老乡来的。

王峰动了动，见此，我提到嗓子眼的心稍微放了放。他还活着。得想办法把他弄到车厢里。我还没把这个念头跟指导员说出来，就听在车厢后面用身体紧紧压着车篷布后帘阻挡石块袭进车里的六班战士崔国政，向我大声喊：“张干事，小心！”我闻言猛一转身，几乎在这同时，一根铁棍从车的右前方厢板的缝隙中，贴着我左侧身体捅了进来。我的上帝，真玄！若不是崔国政这一嗓子，这一下非得把我捅个窟窿。

人群已逼到了车前。个别暴徒叫嚣着：“把车烧了！把这些法西斯烧死！”真不可思议，“法西斯”的称呼怎么能随便地安到了我们头上。他们怎么这么凶？我们还不知怎样称呼这些人，“暴徒”的概念还没有在我们头脑中形成。

篷布被人扯了下去。这时，借助路灯我们才看清周围就剩下我们一辆车了。记得在一个叫十五里店的地方被堵截时，一起冲出来的还有这个连的另外两辆车呢！前面100米左右有七辆公共汽车横在路中央。再看我们的车，明显地是在向回掉头时被卡在马路碾子上，致使熄火的。

石块、汽水瓶直接打到了我们的身上。鲁和平的鼻子被石块击中，满脸满身是血。

指导员焦急地问我：“老张，怎么办？”怎么办？我也不知道。做梦也没想到能遇到这么凶的人。我下意识地摸了摸手枪，那里面有子弹，车上的每个人都有枪，都有子弹，但那又有什么用啊！人群中好人坏人混一块，而且，密度又如此之大。枪，我们的手中的枪已失去了作用。

是突然在前面路口处出现一支部队暂时救了我们。他们对空鸣了几枪，人群才哗地一下离开了10多米。这时车上的官兵都吃惊地发现，在车两边一边躺着一个人。还没等我和指导员发话，六班长孙朝恒、战士崔国政已经跳下车，迅速把车右边那个人救到了车上，仔细一看，是王峰。“赶紧救另一个！”晚了……一伙暴徒又冲了上来，有两个暴徒架起李景民退后10米左右，对着我们大声喊着：“投降吧，缴枪不杀！”同时，一名穿红衬衣的暴徒抽出一把匕首对着李景民的腹部就是一刀……有谁能想象出，在眼睁睁地看到和自己朝夕相处的战友被残害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呀！战士们急红了眼，枪已同时打开了保险，但他们没有放，都把眼睛集中到我和指导员的脸上，等待着我们下命令。

车已被从轮胎处点燃，不马上走，油箱即将爆炸。我们看到，暴徒们也看到了，他们吵嚷着后退着，借此机会，我们架着王峰迅速冲到了离汽车仅二十几米远的过街人行天桥上。凭一名军人的本能，我们知道居高临下，是最有利的地势，也许能保全性命。在我们冲下车准备抢回李景民的同时，几名暴徒已架起他消失在夜幕中（后来他被救，但已被打成重伤，丧失了记忆能力，至今仍在住院）。

无意中，我看到了王峰手腕上已被打碎表蒙子的手表，指针停在4点零6分处。

汽车在燃烧。黑黑的浓烟翻滚着，象是一只只从血泊中挣扎出的黑色巨鸟，直冲向阴沉沉的天穹，似乎在暗示着将有不幸的事情发生……

桥上，12名官兵（一个负伤的），分守住两个桥头。说是“守住”不如说是“看住”更确切，因为我们形同没武器一样。三名老太太在暴徒的胁迫下，手挽着手从东北侧引桥上来了，眼睁睁地看着一伙暴徒就在她们的背后，象一群饿狼随时准备扑向我们，一步步的逼进，我们的人一步步地后退。桥宽不到两米，如果允许的话，就是没有子弹，我敢说，在我们训练有术的战士中随便挑出一人，站在桥头，用刺刀抵挡，百十来个也休想上来。

老太太已上到了桥上，她们喊着：“孩子，别开枪啊！”同时跪倒在连长、崔国政等六人面前。“大娘，您就是我们的母亲，我们怎能向自己的母亲开枪呢！”6名钢铁铮铮的军人、男子汉也同时跪在老太太的面前。连长被人架着跪在那，满脸的血已看不出他的表情，只听到他用沙哑、微弱的声音乞求着：“大娘，您赶快下去，他们（暴徒）已上来了。”三名老太太正欲返回去，但晚了，跟在她们身后的几十名暴徒凶神一般扑向我们。棍棒、汽水瓶齐向我们袭来。暴徒疯狂地咆哮着：“砸死他们，摔死他们，夺他们的枪！”枪，在我们手中虽未发挥它的功能，但要是让暴徒夺去，那将不堪设想呀！

暴徒在步步逼近。两米、一米，有的已窜进我们当中。我们大声地解说、宣讲，满心希望这些人有点良知，能住手。然而暴徒的手不停，罪恶在继续进行。我们12个人全都负了伤。忽然，几名老工人出来护住了我们。有的棍棒石块击在了他们的身上。一名

男青年悄悄对我说：“你们赶紧走，这些人疯了。前面不远处有个部队大院，那里保险。”很遗憾，当时匆忙中来不及仔细看看他，问问他的姓名。

于是，在老工人的掩护下，指导员断后，我架着王峰，从桥的西北侧引桥撤了下来。只不过是二十几米的路程，但在我们的记忆中，那段路那么长且又是那么艰难……前有堵，后有追，上面、下面、石块、酒瓶子如雨点向我们打来。

血已在每个人的脸上流淌，在脚下，在那段桥面上，印下了一个个红色的“！”号。

除了路灯，四周全是黑黑的。前面是什么地方？下桥时，两名老工人急急忙忙告诉我们顺着这条小路往里走，危急时刻我们也没多问。奇怪，那帮人怎么没追来？不好，后面有两个白影追来了，所有的人立刻紧张起来。“解放军同志，你们在哪儿？”这声音好熟，对，是给我们指路的那两名老工人。“快，跟我俩走，他们在后面找你们呢。”

天黑沉沉的，怎么看不到星星？空间骤然变小了，空气中也似乎掺进了什么东西，使人呼吸起来很吃力。

拐了几个弯，走了多少路根本记不清了，好象用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后面的喊声隐约可闻，那些人又追上来了。我们互相扶着、架着，说不上是在跑还是在走……

是血？是火？怎么总在眼前晃动……一个有橘红色路灯的地方突然出现在面前。

两名工人向前指了指，说声“到了”便转身离去。原来，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给我们带路的呀！

前面是一个大院。我们的出现，惊动了站在大门旁的四名战士。他们见状，急忙向我们招着手：“快来，这是国防科工委家属院。”

路灯的橘红色光芒是那么柔和，多么象——朝霞，我忽然想起一首战士的诗：“妈妈脊背上的我们是黎明时的那颗星星，我们怀抱着妈妈的爱，呵，早霞，早霞，太阳就是我们的妈妈！”……这诗我曾听崔国政念过，可惜记不全了。

我和指导员正欲走进大门，“站住，别过来！”四名警卫战士突然对着我们来的方向喊。我们才发现，有个穿老头衫的男青年拎着一支冲锋枪奔我们跑来了。面对警卫的警告，他当即停住步，说：“别开枪！我是给你们送枪来的。”说话间，双手举枪送到了指导员面前。指导员跪着接过了枪。他已经无法表达对这名青年的感激之情，只能用中国这种最能表示诚意的方法，尽管他是一名军人。

后面的人又追上来了，青年匆匆说了句：“你们的一个兵不行了，这是他的枪。”转身走了。

枪！是谁的？李景民的？

拿到亮处一看，这不是崔国政的枪嘛！他人呢？

崔国政，你总是在最后。在车上，你坐在最后，因为那里最危险；下车后，你又在最后，因为后面有袭来的棍棒；下桥时，你还是在最后，总是用单薄的身体掩护战友。可现在你在哪里？

后来才知道，你牺牲了，牺牲得那样悲惨。你被暴徒从桥上摔下，在还有知觉的情况下，又被浇上汽油活活烧死。尸体被割掉生殖器，嘴中插上雪糕后吊在了桥上。暴徒的凶残，举世罕见！

清晨4点40分，是你从容赴死的时刻。那天，北京的早晨来得特别早，东方的朝霞似乎又格外的红，你躺在母亲的怀抱里深深地呼吸，你在烈火中的血肉之躯，化作了一颗星，是黎明时的那颗星！多少受蒙蔽的眼睛被你照亮，多少人的良知被你唤醒……

东方已经泛白，但恐怖的阴影依然笼罩在首都的上空。

崇文门大街上，烧毁的军车、公共汽车痛苦地横在那里呻吟，有的仍在冒着浓烟，似乎在诉说着暴徒们的罪行。10个，我们只剩下10个人了，崔国政牺牲了，李景民被暴徒架走，下落不明。连长还躺在国防科工委在地下室里临时搭建起的手术台上。就是剩下的这10个人也没一个是完好无伤的。

然而，我们并没停止向目的地奔进。

一出国防科工委的北门，一伙人就尾追我们而来。他们喊着骂着，但离得远远的，怕我们看清他们的脸，也怕被别人看到他们的脸，因为天亮了，他们怕天亮。我们10人前后左右拉开5米左右的距离成两列行进。绕开横在路中央的各种障碍物，踩着满地的玻璃碎片、石块，互相照应着。虽然两边人行道没有障碍物，但我们不敢走，我曾亲眼看见从至少10层楼高的阳台上，向我们扔下两个大花盆。

从导游图上看，离目的地很近了，只有1000多米了。到了，快到了！可忽然间，前面路口处出现了一大群人，喊着，嚷着，向我们迎面压过来。他们齐声高呼着口号：“讨还血债，血债要用血来还！”血债！谁有血债？“天安门广场杀人了，血流成河，你们赶紧掉转枪口！”不知躲在哪个阳台后面的人向我们喊。造谣！天安门广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不知道，但说我们当兵的随便杀人，

说死我也不信。当了十多年兵，这一点我深信不疑。这时一直尾随着我们的几十人已经离我们很近了，只有二十多米。前后夹击的态势已经形成。看样子，如果再让他们接近我们，我们一个也活不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指导员下了对空鸣枪的口令，我们朝天打了一个排子枪，前后的人群哗地散开了，眨眼工夫，大街上一个人也没有了。当我们行进到刚才人群喊口号的地方，很多人都站在两边的路口处。看到我们到了，竟莫名其妙地给我们鼓上了掌。

7点45分，我们终于从历史博物馆的东南侧，进入了天安门广场。我第一眼就看见了在武警战士的护卫下，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面对着她，面对着威严的天安门城楼，我们的人都泪流满面，真想大喊一声：我们，共和国的士兵，来了！



镜头下的长安街

摄影记者 李 靖

6月3日凌晨，戒严部队按计划陆续向警戒目标开进。极少数动乱的组织者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到处设障，阻拦部队行动。我们解放军画报社地处甘家口，先听到来自木樨地、西单、六部口一线，有人拦截军车、殴打战士、抢夺枪支和军用物资的消息。记者本能的责任感与敏感性驱使我马上改变去郊县采访的计划，连早饭也顾不上吃，挎上照相机，登上自行车，立即奔赴现场。

一路上我琢磨着，平静了几天的大街小巷为什么又风波骤起呢？来到木樨地，才知这里6月2日晚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伙别有用心的人借此大做文章，一夜间谣言四起，许多不明真相的人都搅入了围攻戒严部队官兵的人群中。

我站在木樨地丁字路口，这里一辆部队的面包车被阻截在路中央，致使刚刚恢复的交通再度中断。众目睽睽之下，一些人将抢夺来的部队枪支、钢盔、军装、车牌和其他军用物资放在车顶，炫耀他们的“胜利”。还有的挥舞着从战士大沿帽里掏出的尼龙垫圈，向群众展示说：“这就是部队用来勒大学生的‘脖子套’。”几把切西瓜用的水果刀，也被他们说成是部队用来杀害学生的匕首。谣言虽然是拙劣的，但在那种场合，居然也能起到煽动一些人的作

用。我举起照相机，拍下了这些滑稽而又荒唐的镜头。

西单也一片混乱。几辆公共汽车被横在马路上当路障，一辆部队的大轿车被困在西单路口西侧，里三层外三层地围满人群。车上的战士已被困了十几个小时，不让吃、不让喝。战士要下车上厕所，歹徒们你推我搡地又将他们推上车，嘴里叫喊着：“憋死他们！”眼见这种情景，我真想站出来说几句公道话，可是不能，我是军人，又是记者，特殊的身份，特殊的使命，我不得不强压怒火。

再看我们的战士，一个个血气方刚，忍受着饥饿干渴，忍受着比饥渴更难受的侮辱、谩骂，一再克制忍让。他们从车窗探出头来，反复向群众做耐心的宣传工作。我被感染了，一个个感人肺腑的场面，在我的胶片上定格。它是历史的见证。

返回社里已是下午一点钟，接着又奉命前往武警部队采访。采访归来，天已傍晚了。

这时，听说六部口方向情况更加危急。顾不了一天的劳累，我又赶往现场。来到六部口，我吃了一惊，白天受阻的几辆军车已经面目全非。有的被推翻在地，有的被砸坏。六部口往东，暴徒们正裹挟着人群围堵中南海，冲击人民大会堂。当我返至西单路口时，碰上一伙暴徒拦截三辆武警部队的敞篷运兵车。他们将军车往后推；一些人指着车上的武警战士辱骂，还有一些人大打出手。没戴钢盔、没有武装的武警战士蹲在车内，一声不吭。

晚上九点多钟，我骑着自行车离开西单，向西返回。行至木樨地，只见路上人群攒动。突然，前方传来一声巨响，一团火光从军事博物馆方向冲天而起。我预感到事情的严重性，顿时忘记了一天的疲劳、饥饿与干渴，把自行车往桥头一扔，撒腿便向军博方向跑去。

迎着不断退下来的人流，越往前走，越感到气氛紧张。路上的隔离墩全被横在路中央做了路障，道路两旁的水泥方砖被砸碎，用来攻击戒严部队。我一边跑一边拍照，冲过阻拦戒严部队的人群，来到这些人与部队之间的空地。满地是石块砖头，暴徒们随手抓起，狠狠地向部队官兵砸去。干部战士手里操着枪，却千方百计地躲避象雨点一样飞来的石块，前进十分困难。

我闪身到一棵树后，一面防着飞石的袭击，一面拍摄暴徒们的暴行。现在想起来，实在太危险，但当时却顾不上，感觉不到。精力高度集中，一心想冲在前面，多拍、拍好。事实上，危险就在身边，暴徒的攻击，部队的误会，随时都可能使自己的生命遭到威胁。我身挎两台相机，在两方之间来回跑，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同时，又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灵活机动地应付各种情况，那情形可想而知。

在木樨地，我不顾一切地冲进人群，抢拍暴徒向部队砸砖头的镜头，闪光灯一亮，一群人马上冲上来将我团团围住，质问我干什么的，拍他们砸砖头是什么意思？有的还大喊大叫要砸碎我的相机。面对紧急情况，我知道不能急躁，更不能慌张。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说：“我主要是想拍当兵的，但距离太远，闪光灯够不着。等一会儿他们靠近了再拍。我现在是两头挨打，要是害怕，我就不会站到你们前面了。”这番模棱两可的话竟把他们“唬”住了。正当这时，部队又向前开进，包围我的人很快散去。事后想来，当时要是有一人提出看我的证件便糟了，挨打，相机被砸，恐怕都难幸免。

为了留下暴徒的更多罪证，我仍没有离开逐渐向东后退的人群，边退边拍。直到十点多钟，自我感觉拍得差不多了，才开始考

虑如何进入部队，随部队前进。

砖头石块在部队与阻拦的人群中乱飞，从马路上接近部队十分危险。可是，两侧便道更不安全。许多暴徒躲在路边树后，只等部队一到就一顿猛砸，战士受伤严重。部队为了安全，正兵分两路，从两侧搜索前进。要是从路边接近，容易引起误会。左思右想，我决定仍从马路上正面向部队靠近，这样反而可靠些。当我跳上马路，向部队跑去时，身后有人猛喊：“不要过去，当兵的会打死你的。”我心里说：你们要是知道我是干什么的，那才不会饶了我呢！

战士们见我身穿便衣径直朝他们跑去，老远便喝令我站住，边喊边向我冲过来。我大喊一声：“别动，我是军人！”并迅速掏出记者证。战士们检查过证件，大声说：“你不要命了，谁让你到这儿来的，快到后边去。”

先头部队之后是三路军车。我在车队里穿来穿去，想找到一位部队的摄影员，这样便能保证安全，更好开展工作。可是，转悠了半天，毫无结果。由于身穿便衣，在队伍中十分显眼，一再遇到盘查。

关键时刻，巧遇一位相识的高炮团长。他又惊又喜，迅速安排我上了他的“解放牌”。这是一辆指挥车，除一名电话兵之外，还有三名伤员，都是刚刚被打伤后抬上来的。我向他们了解情况，他们忍着疼痛，悲愤地说，部队白天就奉命轻装步行向警戒目标开进，没带武器，没戴钢盔，早晨出发就很快受到阻拦，一路上没吃没喝挨打受骂，最后被迫于下午五点撤回。他们忍受了极大的痛苦和侮辱，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他们知道，大多数是不明真相的群众，只有极少数坏人混在中间，难以分清。晚上，部队又接到命令，继

续向天安门广场开进，一出来，便遭到暴徒的袭击。许多战士被打伤，有的鼻梁被打断，有的眼睛被打瞎。他们默无声地忍受着……听着战士的诉说，看着眼前这几位伤员，我坐不住了。暴徒们正在行凶，热点在前面，我的岗位也在前面。我跳下汽车，在团长的帮助下，借到了一顶钢盔。这在当时不仅能防止砖头石块的袭击，而且是半个“通行证”。我戴上钢盔，告别团长，追赶先头部队去了。

突击队大约有一百多人，他们迎着来自三面的袭击，勇敢地排除路障，为大部队开道。我穿行在他们中间。只要闪光灯一亮，立即就有队员过来盘查，几乎是走几步就要掏一次记者证，作一番解释。最后，我干脆一手拿照相机，一手拿记者证，免得麻烦。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和突击队员混熟了，也就方便多了。

从军博到木樨地不足一公里，部队走了两个多钟头。受伤战士不断增加，部队又这样迟迟不能按计划开进。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之下，战士们被迫朝天鸣枪示警。然而，少数暴徒仍十分猖獗，他们将几辆电车和军车推到木樨地桥头，放火点燃。面对这些肆虐的暴徒，破坏国家财产的现行罪犯，如果再手软，便是对人民犯罪。战士开枪击毙了少数暴徒。同时冲上前去，冒着被打伤烧伤的危险，扑打被点燃的汽车。我紧跟着突击队员，抓紧拍摄暴徒的暴行，拍摄战士排除路障、开辟道路的英勇行动。

复兴门外，道路两旁都是高层建筑，不时有砖头石块、瓶子之类从高楼上、围墙后砸下来，我的头上挨过两次，多亏有钢盔保护。我庆幸自己的“武器”——相机没有被砸坏，要不，我只好从这里鸣锣收兵了。

后来有人谈起复兴门外的情形时说，居民楼里投掷东西打部

队,说明群众反对。这种说法缺乏分析。实际上,投东西打部队也只是少数,他们不能代表群众,再说,群众中也有一时不明真相的。当时,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站出来反对暴徒的暴行,保护部队和伤员的,不是也不少吗?在我的镜头中,就有一位女青年站在暴徒面前,迎着他们向部队投去的石块,张开双臂,高声呼喊:“不要砸了!”还有的群众自发组织起来,将部队伤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再设法送往医院,这些正义举动,不正说明了人民群众对暴徒的义愤吗?

突击队艰难前进,我挎着相机紧紧跟随。只觉得情况越来越复杂,气氛越来越紧张。一路上,各个路口路障五花八门,汽车也越来越多。战士们一面劝导群众,一面反击暴徒,一面排除路障。复兴门立交桥头,七八辆公共汽车横七竖八地挡在路上,暴徒们又一次点燃汽车,阻挡部队。战士们扑打着车上的火,竭尽全力想推开汽车。关键时刻,装甲车及时赶到,推开路障,为部队疏通了道路。

冲过复兴门,部队一路小跑,来到西单路口西侧,又不得不停下来。这里人山人海,到处是点燃的汽车,暴徒们还在路中间设置了几道火墙。为了减少误伤,部队没有强行通过,先用催泪弹驱散人群,然后,突击队员冲上前去开路。施放催泪弹时,我毫无准备,只当是燃烧塑料的味儿,一会儿便被刺得睁不开眼睛,只好紧闭双眼,用衣袖捂着鼻子,随着队伍向前瞎跑。

夜,黑沉沉的。我借着那些燃烧汽车的火光,装卸胶卷。拍摄时无法测距,只能凭概率取景。加上劳累和紧张,重重困难与危险伴随在身旁。然而,就凭着揭露暴徒、歌颂勇士的信念,我始终奋战在开进部队的最前方。

6月4日凌晨一点半钟，我随部队到达天安门。广场前，金水桥旁，部队停下了脚步，疲劳已极的战士顾不上品味胜利的滋味，许多人竟倒在地下睡着了。我看到这一张张年轻的脸庞，说不出是感激还是心痛。留下他们这安详的模样吧，我又一次举起了照相机。



六月三日,在“急雨”中

干事 王卫东

骤雨初歇,阳光洒满大地。踏着薄薄的晨露,我静静漫步在宽阔的长安街上,看着潮涌般的车流,思绪万千。一个多月前那悲壮的一幕又萦绕在眼前。

那是一个令人揪心的时刻。

6月3日凌晨2时40分左右,一支徒手徒步行进的部队在北京饭店一带,受到一小撮歹徒及数万名不明真相群众的拦堵和殴打。密如雨注的砖头、石块、汽水瓶落在极度疲惫的官兵头上、身上。许多官兵被砸得遍体鳞伤,鲜血渗过他们的衣服,滴落在长安街上。面对这样的情景,我感到深深的困惑:这哪是首都?这哪是长安街?更使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军人执行正常的勤务,维护首都的工作和生活秩序,何罪之有?为什么一些学生、群众毫无节制地殴打战士,把怨愤撒在战士身上?一个新闻工作者的使命驱使我挤出人群,拿出相机,把这突兀而来的一切都记录下来。

“瞧你们这些走狗、白痴,这儿是长安街,到这儿来干吗,傻帽。”前面一个战士正被几个人围着,无休止地羞辱着,战士眼中噙满泪水,但他始终没吭一声,他用沉默来表示他的愤懑。对着这位可敬的战士,也对着几个可耻的歹徒,我举起了相机。

不一会儿，一个看上去还不足20岁的小战士被一个五大三粗的歹徒拽出队伍，猛地往后搯去，小战士当即仰面摔倒在地，鲜血殷殷地流出来，我忙俯下身去，轻轻扶起战士，替他擦干额头的血迹。

“你是干什么的，想不想活了！”歹徒扯住我的上衣，恶恨恨地瞪着身着便装的我。

“我是学生，解放军是来执行戒严任务，是来保护人民利益的，你们这样做，国法难容。”见气氛如此紧张，我机智地隐瞒了身份，几个群众见我说得在理，也站出来为我辩护。在一片斥责声中，歹徒被迫灰溜溜地闪开了。望着眼前几个素不相识的北京人，我的眼窝一阵发热。是啊，人民最终是会理解我们，正义最终会战胜邪恶。

部队行至正义路口，我忽然发现，几个丧心病狂的歹徒正把一辆自行车砸向人群，我大喝一声“闪开！”镁光灯一闪，这罪恶的一瞬永远留了下来。

凌晨3时，路旁十几个群众正围住一个中年军官问这问那。他是某部政委李刚华。

“学生是爱国的，你们干吗来镇压他们？”

“市民同志们，请你们仔细想一想，倘若果真是镇压学生，我们干吗还要空着手、跑步进城呢？”

“那你们来干吗？”

“奉命来执行维护首都秩序的任务，请你们相信，我们热爱首都，热爱首都人民，热爱青年学生。”

……

义正辞严、苦口婆心、入情入理的解释，打消了围观群众的疑

虑。激动之余，我举起相机凝下了这位危难之时挺身而出的政工干部形象。

就在这时，右前方传来一阵痛苦的喊叫，循声望去，只见一战士腿正夹在被用作路障的铁栏杆里，身体却倒在拥挤的人群中。我正欲上前拉一把，只见他身后的某部副部队长杨启民，抢先一步，奋力地挤下身去，顶着重压，拉起战士。说时迟，那时快，我掀动快门，把这动人的一幕摄了下来。

突然，我的后背被人猛地一推，一个趔趄差点跌倒在地，紧接着几个歹徒七手八脚扭住我，任我百般解释也无济于事。

“把你的胶卷拉出来曝光，不然就打死你！”话音刚落，后脑勺就挨了重重的一击，脑袋一阵晕厥，眼冒金星。一个歹徒凶狠地拧下相机镜头，拽下闪光灯，另一个歹徒一把扯下相机后盖，拉出胶卷，扬了扬，一甩手扔了出去，看着这凝聚着爱憎的胶卷被毁，我心疼极了。想想眼前，共和国的保卫者竟然受到这般嘲讽、殴打，我似乎变得更成熟了。

1989年的6月3日已成为历史。平息暴乱也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可清晨那一幕却永远刻在我的记忆中。

戒严日记六则

大校副军长 左印生

1989年5月20日 多云

7时30分，军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赴京执行戒严任务。军党委决定由我和副政委田瑞昌带领××、××旅共×千多名官兵，立即行动，奔赴首都北京。

我随即赶到××机场。当看到战士们坐上首长乘坐的专机，谈论着飞机、天气、天空和白云，谈论很开心很愉快时，当看到航空兵××师、××师的主要运输机和大型客机紧急调运兵力，起飞时间提前再提前时，我立刻意识到北京的形势严峻，情况紧急，意识到任务特殊和艰巨。我在心里告诫自己：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在严峻的形势和艰巨复杂的任务面前，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一定要明辨是非，一定要坚定政治立场，以实际行动保卫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保卫伟大的首都北京。直至飞机起飞进入了北飞的航线，我还在思索着怎样带部队圆满地完成摆在面前的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下午5时30分，部队准时、安全到达指定位置。我立即去军

区领受任务。由于少数人操纵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堵截军车进城，营地离军区虽不算太远，但从路上走简直是不可能的。我只好乘坐上级调动的直升飞机从××机场出发，赶至军区大院。

领受任务以后，天已经很晚了，但我却久久不能入睡，一想到军区首长下达任务时的严肃表情，想到北京市混乱不堪的现状，想到情况比出发前想象的不知要严重多少倍，想到部队紧急出动前没很好地进行动员，官兵对执行戒严任务的思想准备不是那么充分时，心里就觉得沉甸甸的。然而，我相信自己的部队，相信大多数军政主官和基层骨干能够经得住这场严峻的考验。

这一夜，我失眠了。

5月21日 晴

上午，我领着旅的主要领导和机关的同志察看了驻地的环境，布置了岗哨位置和各分队安营扎寨的位置。等部队动起来之后，我把团以上干部召集在一起，详细传达上级的指示精神 and 明确任务。领导层思想很统一，态度很明朗很坚决。这使我增强了完成任务的信心，一直紧绷的神经稍稍松弛了一些。

这时，驻地院墙外传来一阵阵的广播喇叭声。一些不明身份的人打着大学生的旗号，以反官倒、反腐败为由，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同志。我还看到各式各样的大字报、大标语，肆意诬蔑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我的心里久久不能平静。这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我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斗争不仅存在，有时在一定的范围内还很激烈、很复杂。极少数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企图推翻中国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推翻无数革命先

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人民共和国。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啊。我觉得应该抓紧时间对部队进行广泛的思想教育。

5月27日 多云

今天是我几天来第一次穿上大校军服和同志们一起做大学生回校复课的工作。老实说，这个工作很难做，但不管多难，也必须站出来。

在驻地北门外，我首先听大学生谈，他们七嘴八舌谈了很多很多。有的话很尖锐，有的话则很反动。他们还指着一张大字报对我说：“八十年代的青年人应当有自己的思想和主见。”说到底，他们是让我们接受他们的观点，支持他们的行动。于是，我也指着那张大字报，对他们的错误观点一一进行了批驳。

这一天我很累，弄得口干舌燥。但当我看到部分学生在我们耐心劝说下离开了现场，心里很舒畅。晚上，还悄悄喝了二两。

5月31日 晴转多云

今天和各旅主官以及司令部的同志进一步修改完善了向天安门广场开进与清场的预案。这是我一生中从未遇到过的特殊计划。与我以往参加过的老山作战、空降演习、抢险救灾的计划完全不同。因为，在眼前这场斗争中，政治立场问题和思想认识问题交织在一起，怀有罪恶目的的坏人和受蒙蔽有过激言行的群众搅混在一起，给我们实施制止动乱的措施带来了极大的困难。针对这种情况，我进一步给大家明确了实施开进计划的指导思想，在坚决

完成任务的前提下，一是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二是最大限度地保护国家财产；三是最大限度地保护部队的武器装备；四是最大限度地保护广大官兵的生命安全。总之，决不干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以我们的极大忍耐，付出必须付出的代价，来换取首都人民群众的理解和信任。

6月3日 多云

今天，17时整，我奉命带领部队从南往北向天安门广场开进。途中，由于歹徒混杂在不明真相的市民、学生当中，把对党对社会主义的刻骨仇恨全部地倾泻到戒严部队官兵的身上，他们用种种不堪入耳的污言秽语谩骂我们，用砖块、瓦片、木棒和燃烧瓶殴打我们，致使部分官兵受伤，我也受了伤。部队严重受阻。

面对这种状况，我立即提出要求：各级指挥员都要站在最主要的指挥位置，随时让部队看到自己的身影，听到自己的声音。对群众的过激言行要克制和忍让，采取“打大雷不下雨点”的办法（即端枪上刺刀、对空鸣枪，产生威慑力量）。我让鸣枪示警的战士全部站在队列正中央，以免误伤群众，部队呼喊口号，奋勇向前开进，效果非常好，群众逐渐散开了。

午夜1时25分，我们先头部队以排山倒海之势先期抵达天安门广场的南侧，我一边派人向指挥部报告，一边命令各旅立即收拢部队准备参加清场。

6月4日 阴天小雨

今晨4时30分开始清场。

清场前，指挥部用广播反复宣传了党的政策、通知和通令，劝说群众尽快撤离广场，过后，采取30分钟熄灯的措施，迫使仍滞留在广场的一小部分学生不得不离去。

4时30分，清场开始了，我部自南往北向广场中央开进，气势如虹，威震山河。仅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完成了清场任务。整个过程，未开一枪，未死一人，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5时30分，我部在广场与×××军胜利会师，取得了制止动乱平息暴乱的初步胜利。



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大校师长 黄栋甲

5月20日，我所在的部队奉命进京执行戒严任务，可部队进城受阻。戒严指挥部命令我部在大兴县休整待命。

为了更好地完成戒严任务，我们多次派出便衣侦察，我也多次带领侦察科长和侦察参谋进城，基本摸清了地形、道路、昼夜人员、车辆流量和“高自联”“工自联”的活动情况，并根据所掌握的情况制订了进城的三套预案。

6月3日上午，我和刘副师长、作训科长奉命又一次化装进到宣武区侦察。我们将重要地段和可供利用的迂回路线再次进行了勘察以后，到区委、武装部和地方领导接上了头。在区委、武装部领导同志的带领下，我们对进城执行戒严任务时可能进驻的宣武门饭店、实验小学、3401工厂等地进行了勘察，顺利完成预定侦察任务，返回大兴驻地。但是，刚到皮各庄村口，就碰见正在编队进城的车队。集团军首长见了我们，立即命令我们掉转车头率先头B团向市区开进。我的车子冲在全师的头里。

然而，车队在木樨园被不明真相的群众和障碍物阻挡，预定的进城路线被封闭，情况十分危急。

部队按时到达集结地域，应是指挥员的最高原则，也是部队行

动的最高纪律。因此，我立即命令部队改道行人稀少的马家堡、太平街，穿街过巷，一直冲到太平街口，部队又一次严重被堵。有的车被暴徒砸毁，有的战士负了重伤，通信车上的电台也遭严重破坏，行进的部队被冲散，我也只能徒步指挥了。

为了减小目标，我让警卫员等在光明日报社附近，我绕道赶到虎坊桥，指挥被围堵的部队弃车徒步强行开进。部队刚冲过去，一个蓄着长发的小青年跑到我跟前，指着我对围观的群众大叫：“他是个军官，抓住他。”

未等我开口，从他后边转过一个人：“哥儿们，你认错人啦，他是我街坊。”说罢用身体挡住我，掏出香烟递过去。这人是宣武区武装部的王参谋，上午还带我们勘察地形。看看部队已过去，我继续徒步往返于被围堵的各部队之间，指挥强行徒步开进。

7时左右，几辆军车冲到宣武门时被围堵，指挥员的责任感促使我不顾一切地向被围堵的军车跑去。刚到校场口，大概是我身上的军人气质总无法被便装掩盖的缘故，被一个痞子认出来，他当即喊道：“抓住他，他是便衣，起码是个少校！”一位站在便道上的妇女先是一愣，接着跑过来，也用身子挡住我：“你别胡扯，他是我亲戚。”痞子揪住那位妇女骂道：“放屁！他是军官。”随着话音，几个响亮的耳光落在她脸上。

我再也忍不住了，冲上去推开痞子，对那位好心的妇女说：“谢谢您！大嫂，这里危险，快走。”接着转身对痞子正色道：“你说错了，我岂止少校！”痞子一把抓住我的衣领，要扒我的便衣。我一甩袖子，同时出拳给他一记“黑虎掏心”，痞子哭爹喊娘趴在地下，再也爬不起来。又有两个家伙冲过来要动手，我指着那痞子厉声说：“谁敢再较量，他就是下场！”两个家伙见我一甩袖子，未见拳

头就将他们的同伙击倒在地，顿时软了，站在那里呆若木鸡。

我采取多次派出联络参谋和利用地方汽车、自行车和徒步等办法接近各个被围堵的部队，指挥他们向前开进。但还有部分后续部队在南三环路，极需找一个隐蔽的地方建立指挥所，用电台指挥他们强行进城。

正在这时，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同志轻步走到我身边，端详了许久，试探地说：“如果你是部队领导，就跟我走。”说完就头也不回地朝 62 中走去。

我迟疑起来：是同志，还是引我钻圈套的坏人？我没有马上跟过去，而是细心观察周围情况。

那人又转悠过来，贴近我，加重语气重复着刚才的话：“如果你是部队领导，就请跟我走！”说完又朝 62 中校门走去。

我不再犹豫，进！管他呢，便带着刚与我会合的警卫排长和警卫员两人跟过去。校园里一片静寂，不象有暴徒的迹象。我们三人跟着那人进了教学楼。

后来才知道那人是天桥办事处主任王洪惠同志。

王洪惠在楼道里迎住我，他身后还有几位同志。他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说：“同志，我是区委派来找你们的。请说吧，需要我们做些什么？”

我这时真如同见了救星，竟连感谢的话也说不出，对围过来的几位街道办事处的同志说：“请马上给我找个设指挥所的地方，还有，请你们赶快与 3401 厂联系，我们还有 11 台通信车和两台机要车，上面有机要密码和密码机，关系到党的核心机密，必须马上转移到厂里保护起来。”

指挥所很快在 62 中楼顶上设立起来。通信排长和警卫排长

迅速做好了一切准备。不到半小时，后续部队都接到我的命令，部队徒步开进，不怕流血牺牲，要不惜一切代价，迅速向前门箭楼集结。

4日凌晨，我们全师所有建制单位都赶到了天安门广场，参加了清场，终于将天安门广场夺了回来。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广场上空。



热血军魂

上尉连长 王宏伟

我们师是一支所向披靡的英雄部队，许多重大军事行动，都少不了我们。可是，到祖国的首都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的确使人意想不到。

执行任务中，师长、政委点名要我们连打头阵，刘副师长亲自给我下达命令。我说：“副师长，您放心好了，我一定给您干个漂亮的，决不给咱们师抹黑、决不给侦察连丢脸，保证完成任务！”话虽这么说，其实当时我心里虚得很。老兵刚退伍，新兵尚未补入，全连满打满算才60来人，再留后几个，只能出征50多人。并且连队当时只有我和副连长管宏福、一排长刘家宏三个干部，我们就是浑身是铁能打几个钉？打头阵并非易事。但侦察连从来都是“全师第一连”，每次执行任务都是冲锋在前，啥时候也没后退过，就是打肿了脸也得充胖子。开进前我给大家鼓劲儿：“大家好好干，干出成绩来我去请功。”就这样我们呼呼隆隆开过来了。

我们连的任务是调整勤务、侦察道路和清除路障，由于路程遥远、道路不明、时间紧急，干部战士深感责任重大，从驻地一出发就分乘三台汽车发疯似地往前赶。一路上，边勘察道路、排除路障，边设置路标，没吃一顿饭，未合一次眼，比大部队多跑了200多公

里,三次避免了全师遭受围阻,为部队顺利开进创造了条件。

到达京郊集结地后,我们立即组织分组化装进城侦察,把戒严地区的大街小巷走了个遍。一排长刘加宏竟和两名战士巧妙地深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的“高自联”指挥部,他们所搜集的一些重要情报,为部队首长迅速定下决心提供了可靠依据。

6月3日,部队奉命向天安门广场紧急开进。当时我正患痢疾,病得厉害,别说走路,就连喘气也感到心里发慌,发虚,只好让两个战士扶着爬上车。在副连长和一排长的指挥下,15分钟就做好了出发准备。

下午6点50分,我们赶到了太平桥丁字路口。眼前满是熙熙攘攘的人群,还有两台被当作路障的公共汽车躺在那儿,把整个路口都给挡住了,议论声、吵闹声盖过了一切音响,要想顺利通过,谈何容易!

前面的车“嘎”地一声停下,立足未稳,就被蜂拥而上的人群团团围住,质问声、责骂声潮水般涌过来:

“北京不欢迎你们!”

“滚回去!滚回去!”

“你们不要做历史的罪人!”

面对这狂涛般的人群,我深知先锋连责任重大。如果我们连从这里冲不过去,全师就会被堵在后面,就会影响戒严任务的完成,而现在又只能做好群众工作,不能硬冲。

我们耐心地向人们解释着,宣传着,人群逐渐平静下来,有些人开始离去。

这时,从后面响起一阵喊声:“把他拉出来打呀,他是个大官!”

我一听到喊声，说声：“不好！”就从车上跳下来，一排长刘家宏也带领十几个战士跳下车，跟在我后边往前挤。当时只想着救首长要紧，也不知从哪里来那么大劲，好容易挤到了，正见几个暴徒将一位大校军官从车上拉下来，拳打脚踢。后来才知道是我们集团军政治部岳副主任，到前面来了解情况被围攻。我们连问也顾不上，保护首长要紧，十多个人挤到吉普车边，把打人的暴徒推开，围成一道人墙。我们连的战士可是一个是一个的，人人都有一身过硬的功夫，人们冲了几次没冲开。就听一个暴徒在人群中大叫：“都往后退，拿石头砸呀！”围观的人群哗地一下退了回去，把我们孤立的路中央，砖头石块滂沱暴雨一样袭向我们。岳副主任没戴钢盔，一排长把头上的钢盔给了他，自己的胳膊却被石块砸伤。那时钢盔就是救星。小战士韩青摘下钢盔就往刘加宏头上扣，刘加宏又摘下来推给韩青。两个人你推我让的时候，一块砖头落在韩青头上，韩青一把捂住头，“哎哟”一声，就见鲜血从指缝间涌出来，流了一脸。刘加宏大叫一声：“韩青，躲开！”他把韩青拉到身后，迅速用急救包为他包扎。韩青挣开他的手，一边哭一边嚷：“排长，你不能受伤，咱连长病成那个样子，就靠你和副连长了。”脸上的鲜血被泪水冲了一道道的。我听着，心都碎了……

我们十多个人都受了伤，再僵持下去战士们受伤会更严重，我赶紧把岳副主任推进吉普车。歹徒们一看，马上停止砸砖头，叫喊着：“推翻车！把当官的砸死在里边！”当即就有四五十个人冲过来。我一看这阵势不对头，吉普车早让歹徒们放了气，失去了平衡，随时都有被掀翻的危险。我也不知怎么地就来了劲，大喊一声就冲了上去，战士们也都冲上前。暴徒们把矛头立即指向我们，围上来就打，我们只是躲着，没一个人还手，有几个小战士被打得直

喊娘。当时我真想下令让大家还击，我们一对三不成问题，何况我们人人有枪，还带着匕首。可是，为了既不误伤群众，又能保护首长，我们不能那样做。

岳副主任已脱险，我看看一排长，他说：“冲吧，连长。”我一咬牙，冲吧，再这样拖下去等于送死。这叫什么任务呀，明明手里有枪却不敢打，我好几次拔出枪又无可奈何地放回去。你想想，歹徒后边那么多围观的群众，万一误伤怎么办？我们是硬钻硬挤，前面是一层又一层黑压压的人群，好些战士被打得满脸是血，用手把血水抹抹，再挤！那可真叫惨，简直是玩命了，有几个战士冲散了，我们又退回来拉上他们一块冲。我什么也不怕，就怕被冲散，看看战士们被打的那个惨样，刚开始还喊叫几声，后来简直就一声不吭了，闷着头冲，只听见砖头与钢盔的撞击声。我心里说：“完了，打不死也得气死！”我们哪受过这种窝囊气呀！在师里，我们侦察连个个都是挺胸昂首地，只要一说是侦察连的兵，就连黄师长胡政委都佩服，前一个月我们连还在师阅兵式上囊括了所有军事项目的金牌呢。战士们一个个都红眼了，反正你打不死我我就得冲过去。

冲到虎坊路时，我们又被一群暴徒围堵。我们都累得精疲力尽了。我的肚子咕咕叫，已迈不开步子，四班长刘大宏和一个战士架着我。在遭到又一次袭击时，一块大石头砸在我的钢盔上，我当即不省人事。后来才知道是刘大宏把我背到了天安门广场，然后又送到市急救中心。

这次开进，我们连伤了39人，一排长在我被砸昏后也受了重伤，是副连长一个人率全连冲进天安门广场的。战士们就这样凭着一腔热血，为我军的光荣历史写下了新的一页。

（晓 丁 整理）

血肉支点

上尉干事 刘建奇

6月4日零点20分，我们奉命向天安门广场开进，部队在砖头、石块、汽水瓶和棍棒的疯狂夹击中，艰难地行进到木樨园立交桥附近。

这里是“高自联”重要把守地段，扬言要“御敌于立交桥之外”。歹徒们运输堆积了大量的石头砖块，带来了铁棒、棍子，把守着铁路道口，气焰十分嚣张。

先头部队刚踏上铁路道口，就受到疯狂的袭击。一时间，砖石如雨，棍如林。十几个暴徒抓着铁路栏杆，拼命地提上砸下。昏暗中，许多战士被砸倒砸昏。部队行动受阻，伤员骤然增多。

“决不允许暴徒猖狂！”一声大喊，旅政治部主任樊友义上校拨开拥挤的人群冲过来。当栏杆再一次疯狂地向战士头部砸下来时，他拼命上去扛住肆虐的栏杆。

几百公斤重的压力砸在肩上，他觉得剧烈的疼痛，全身象承受着一座山似的沉重。

但是，栏杆再也不能疯狂地砸向战士的头部了，栏杆下出现了一个坚强的支点，这是樊主任用自己的血肉筑成的。

“同志们，快冲过去！”

• 干部战士顿时热血激昂，呼喊口号，快速冲过。

这时的樊主任，已成为暴徒们袭击的重点目标，石块砖头雨点般向他头上身上砸来。鲜红的血涌了出来，他多处受伤，摇摇欲坠。

二营教导员王好新少校毫不犹豫地冲上去接着扛起栏杆。没一会儿，一块石头砸中了他的腰部，王好新一下子跌倒在地，但支点并没有消失，五连指导员袁保国上尉又冲过来顶住，暴徒们仍然无法用栏杆猛砸通过的部队。

栏杆上溅满鲜血，手握上去湿漉漉的。袁保国被打晕了，四连长赵冰上尉又冲上来。接着，贾月军，郭虎成……一个倒下，又一个冲上来，各级干部骨干，前赴后继，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成一个坚强不可摧毁的支点，保护着向天安门广场艰难而迅速挺进的部队。

历史上有一个阿基米德支点，那是著名的物理支点。而在这天晚上，在木樨园铁路道口出现的支点，虽由血肉筑成，却是一个体现人民军队本质的精神支点。它来源于我军几十年的革命传统，同样，以此为基础，它以自己独特的力量，支持着人民共和国大厦。

1点35分，我们部队抵达预定集结地域。四点半，参加天安门广场清场，一个多月来藏污纳垢的广场，终于开始恢复庄严神圣的面貌。

带 路

人武部部长 屈承明

6月3日下午下班后，我们留下来的几个人正在忧心忡忡地议论着这一天的形势。就在这时，戒严部队某部师长黄栋甲风风火火地闯进了武装部院子，急三火四地叫道：“我的部队已经开进，并在广安门、永定门、太平街、牛街一带被堵。军区副司令带前辮随我师开进，也受到了堵截围攻，请求你们支援！”

这一消息，差点把我们震懵。

上午，黄师长等来了解情况，我们才知道他们要进驻宣武区。我详细地介绍了本区的社会情况、学潮和动乱影响的情况、街巷道路情况以及重点保卫目标和可以驻扎部队的地方。刘政委立马儿向区委汇报，使他们同当地政府取得了联系。下午，我边带他们实地勘察地形，边向他们建议：部队开进最好避开晚上和假日。他们请示上级后，采纳了我的建议。可是，刚刚送走他们不到一小时，区里部署欢迎解放军进城的紧急会议也才结束，部队怎么就进来了呢？

但是，我们从黄师长那焦急的神态中，清楚地看到了局势的严重性。此时此刻，分毫的犹豫和退缩，就是对祖国和人民的犯罪。

戒严的需要就是命令！

准备回家的，锁上了自行车；扑克打得正激烈的，扔下了手中的牌……整个武装部，立即处在一种“箭上弦”的紧张气氛之中。

“黄师长，下命令吧！”

“先救副司令！”

政工科长刘守权和动员科参谋田敬东带着黄师长出发了。他们利用人熟地熟的优势，从小胡同中直插太平街。他们把黄师长一前一后夹在中间，小心谨慎地混到人群中，一辆车一辆车地搜寻起来。从北头找到南头，也没有发现副司令的踪影，把黄师长急得直冒汗。

于是，他们又从头开始……再次寻到南头时，黄师长突然站住不动了，双眼定定地盯着一辆车。

“副司令在上面吗？”刘科长见状，赶忙问道。

“没有。”黄师长扭头看他一眼，“我们王政委在那儿；得想办法叫他出来问问情况。”

“好。”刘科长目光转向田敬东，“小田，你保护老黄到路边等着，我去叫出王政委。”

刘科长目送黄师长和小田走到路边，才挤过一堆堆的人群，慢慢接近了王政委所乘的车。当时，接近车子并不困难，困难的是部队分不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任凭你说什么，他都不理。刘科长心里盘算着，必须让王政委亲眼看到黄师长，他才能相信自己的话。可是，黄师长被一群人挡着，恰好看不见。他同王政委闲聊着，等待着时机。一会儿，那堆人朝一辆车涌去，闪开了一条空隙，刘科长赶忙凑过去，低声说道：“王政委，您往马路那边看，黄师长在那儿等您！”

“你是谁？”王政委疑惑地问。

“我是武装部的。”刘科长低声对王政委说两句，又随着叫嚷的群众高声喊两句，见没人注意，又低声对王政委说：“我掩护你，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偷偷溜过去。”

此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天将黑未黑，一片朦胧。身着便衣的王政委在刘科长的掩护下，悄悄来到马路边上同黄师长见面了。

“老黄……”

“我在武装部了解完情况就回赶，可还没出宣武区，就碰到部队开进来了……”黄师长突然打住话头，焦急地问道：“副司令呢？”

“副司令走了。”王政委警觉地看看周围，压低声音说道：“被堵时，副司令的车就在前边那块儿。后来，他不顾警卫员的劝阻，站出来大声向群众说道：我是中将副司令，我既没有接到向群众开枪的命令，也没有下达向群众开枪的命令。我的部队，决不会向人民开枪。请你们让开一条道，叫我出去！群众听完，高呼‘解放军万岁’，接着就闪开一条道，放他走了。”

“去哪儿了？”

“不知道。”王政委指着前边的丁字路口，“就从那儿往西去了。”

“老王，你还留下组织部队，我再去寻找副司令。”

“好。”

黄师长和王政委的谈话，刘科长全听见了。他思谋着，副司令已经暴露了身份，自己单枪匹马在这地形复杂的小巷里闯荡，若遇上心怀叵测的坏人，那麻烦可就大了。必须赶紧回部里报告，采取紧急措施。他当机立断，拉起黄师长就回走。

他们一行三人，虽然都穿着便衣，可有两个穿着军裤，再加上

黄师长那件不很合体又崭新的夹克衫和标准的军人姿态，很容易引起怀疑。果然，刚走到丁字路口，就追上来一个小伙子向田敬东问道：“那是你们首长吗？”

这一问，把田敬东弄得好不紧张。在那样的情况下，真是连思索都来不及，就得作出决断，丝毫的含糊，都会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这位长着一张娃娃脸的机灵的小伙子，虽然心儿“扑哧扑哧”比平常跳得快了许多，但脸上却一直挂着一种坦然的微笑，他操着流利的“山东普遍话”，不慌不忙地说道：“什么首长，那是我们街坊，出来转转怎么了？”

听见对话，立马儿围上来好几个人，有的说：“瞧那小平头，是当兵的，没错！”有的说：“官准小不了，至少是个少校。”七嘴八舌嚷成一团。

田敬东麻利地从兜里掏出一包美国进口香烟，不由分说给每人塞过一根，边点火边说道：“哥儿们，什么眼力，瞧那老头象个当官的样子吗？”

趁田敬东递烟的时候，刘科长一拉黄师长，穿过马路，直奔一幢居民楼后而去……

他们回来报告了这些情况，我感到局势远比想象的复杂得多。一方面，副司令暴露身份后，随时随地都有危险；另一方面，部队提前进城，说明城里已到千钧一发之际，而现在部队却被分段分车截断围堵，只有尽快找到副司令和前指，把部队重新组织起来，依靠自身的果断行动才能突围。想到此，我立即问黄师长：“要不，多派几路人马分头去找吧？”

“没用。”黄师长摆摆手，“谁也不认识副司令，派再多的人出去也是白搭。给我一个人一辆车就行了。”

动员科长白永进和黄师长走后，我随政委、副部长守在电话机旁焦急地等待着。不一会儿，刘政委的额头上就沁出了黄豆粒儿大的汗珠。这时，我才猛然想起，他的脊椎骨裂还未痊愈。动乱一开始，他就拖着病体上了班，组织大家学习，参加各种会议。有时在区委开完会回来，哪怕再晚再累，也要及时给大家传达。正是有了这样的“领航人”，武装部这条“船”才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中避开迎面而来的暗礁，坚定不移地沿着党中央指定的航程破浪前进……

时间在难捱的沉寂中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白科长象入海泥牛似的，毫无一点音讯。

“老屈，不能再等下去了。”刘政委艰难地站起身说道。

“我去看看。”我阻止了争着要去的钱副部长，“你们通知各街道武装部，让他们全力寻找、营救副司令。”

我走进政工科办公室，屋里的人一下子全站了起来。“部长，有任务吗？”“我去吧！”“我去！”看着这一张张熟悉亲切的面孔，我心里顿时感到热乎乎的。自从脱下军装成了地地道道的老百姓，各种实实在在的问题就落到了他们头上：工资平均每人降了四十多元；住房紧张；孩子入托、上学……从82年在部队调过级后都七、八年了，绝大部分同志还在原地踏步；还有按规定享受的公安部门工资福利待遇，其实仅只享受到个工资标准，那福利待遇差得远呢！尽管平常他们也有牢骚、不满，但在党和国家需要的时候，却能抛弃一切，奋不顾身地站出来……

“学德去吧。”我不能再想下去，扔下句话就出了门。

此时的大街上，到处响着砖头砸在钢盔上沉闷的“嘭嘭”声。我和政工科干事张学德骑着自行车在大街小巷中穿行，不时下车

步行，在拥挤的人群中挤来撞去。广内、广外、永定门、陶然亭豁口、虎坊桥、太平街、牛街一大圈转下来，虽然没有找到副司令，也没有见到黄师长和白科长，却对部队被围攻的情况以及方位、人数和车数有了大致的了解。一路上，我就盘算着如何把这些情况报给部队上级领导，让他们迅速组织部队突围。正好，某军临时指挥部一小时后秘密开进了武装部，使这些情况适时地派上了用场……

刚回到部里，刘政委就兴奋地告诉我：副司令已被群众救到区委。紧接着，白科长也从第六十二中学打回了电话：“部长，副司令没有找到。”

“副司令已到了区委。你要保护好黄师长，再设法找到军区前指。”

“军区前指已经找到，就在六十二中附近。区里和街道都有人在这儿，现在准备把前指的十四辆机要车和电台车转移到对面的总后三四〇一厂去。”

“好，抓紧时间。前指早一分钟投入工作，部队就能早一分钟突围。你设法和三四〇一厂武装部联系上，让他们配合行动。”

“是！”

放下电话，我才突然感到腰酸腿疼，浑身的骨头象要散架似的，肚子也“咕噜咕噜”直叫唤。我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习惯地抬起手腕看看表——哟？！都十一点多了？再一细看，表停了。那会儿，觉得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吃点什么，然后靠在椅背上打个盹儿。这么想着，眼皮就真的打起架来……不行！部队还被围困在街头，许多工作等着去做，不能睡着，不能睡！我使劲地撑开苦涩的眼皮，艰难地站起身来，朝刘政委办公室走去。

“老刘，几点了？”

“4号已经过了47分。”刘政委朝我笑笑，“老屈，你吃点饭躺会儿吧。”

“没事儿。咱们还是合计合计下一步工作吧……”

凌晨三点半，黄栋甲师长、王政委带着几人再次来到部里。管理员端来热腾腾的包子，他看也不看就推到了一边。“老屈，从这儿到前门，得多长时间？”

不用问，我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你得在几点赶到前门？”

“四点半。”

“不行！”平常我抄近道穿胡同走到前门，得五十多分钟。现在到处都在设卡围堵军人，大街行不通，钻小巷他们又不熟悉，在这斜街套斜街小巷连小巷的北京，要迷了路，那还了得！“还有一个钟头的时间，我走差不多，你走不行。”

“不行也得行！”黄师长急了，“我的部队大部已突围开进，上级命令我们必须于四点半前赶到前门集结待命，到时我师长、政委去不了……”

“汽车肯定开不过去……”情况确实紧急，我也犯难了。“这样吧，我给你们找几辆自行车，再派个人给你们带路……”

“不行，不行！外面太危险，不能再让你们去。再说，我们骑车的技术……”说着，他转身就往外走，“走走走，不能再耽搁了。”走了没多远，他们又突然返了回来，“老屈，快找自行车！”

听到黄师长这句话，早等在院子里的干部职工马上推出自行车把我围上了：“部长，我去带路吧。”“我去！”“我路熟！”“……”

“有车子就行，不要去人！”黄师长和王政委坚决拒绝。

我没有说话。此刻，争论只会耽误时间。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必须有人给他们带路。说实话，要不是部里还有某军的临时前线指挥部需要提供情况，我真想给这位果敢的战友去带路。我环视着围在身边的部属们，从各个角度衡量对比……

“小田去吧！”我把目光落在田敬东身上。他当过通信员、司机，道路比谁都熟悉，又胆大心细，灵活果断，担当此重任不成问题。

动员科参谋田敬东带着黄师长、王政委等人横穿广安门内大街，直插对面的小胡同。此时的大街上人声嘈杂，凌乱不堪，地面上几乎铺满了砖头石块。不远处有辆军车被烧着，桔红色的火光映着一张张疯狂的脸，显得狰狞可怖。小巷里边人也不少，有的围在一起低声议论；有的凑成一堆高声咒骂；还有的独自站在黑暗处，仍在思索着什么，又象在观望着什么……

走了没多远，听得旁边有人说：“这几个骑车的会不会是大兵？”这话传进黄师长等人耳朵里，他们便暗暗加了几分劲，车速明显地快起来。后边那些家伙见状更来劲了，高声喊起来：“就是大兵！”“截住他们！”

田敬东紧蹬几下追上超出自己的黄师长，低声说道：“别管他们，就当不是喊咱呢。一跑，反而暴露了身份。”

越往前走，胡同越窄，几乎没有人骑车了。田敬东心想：在这小巷里四五个人结伙骑车，很容易引起坏人的怀疑。再说，要是被人堵住，跑都没地儿跑，不行，得走大街。可大街上行吗？到处都在烧军车、打军人，万一出点什么事，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不，还得走大街，别看大街上闹得正凶，那里骑车人多，便于隐蔽，万一有情况，还可以再钻胡同。这样想着，他便带着他们钻出小胡同，

从校场口、菜市场直插宣武门，然后，顺着地铁上面的路在拥挤拥挤的人群中顺顺利利地奔前门而去。

把黄师长等人交给部队来接应的同志，田敬东如释重负地吐出一口气，低声对黄师长说道：“首长，没事我回去了。”

黄师长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没有吐出来，只是抓住田敬东的手，使劲地握着，握着……

太阳虽然被厚厚的云层包裹着，但毕竟冲破了黎明前的黑暗，霍然跃出地平线，带给大地一片生机。彻夜未眠的武装部，仍在一派忙碌之中。我从当作某集团军临时指挥所的小会议室出来，看到昨晚下班回了家的人，几乎全部冒着危险在这星期天的清早“上班”来了……一时间，我喉咙发梗，真想对他们说声“谢谢”。但是，时间太宝贵了，我顾不上感叹——很多事情还在等待着我们：清理路障、接运保护伤员、为进入城内的戒严部队筹措给养……

（刘跃林 整理）



两退两进都是情

上士 朱双喜

6月3日下午5点20分，我团880名官兵从临时营地京郊南苑机场出发，急行军25公里，一路上16次遭群众围攻拦阻，511人受伤，于4日凌晨2点，行进到天坛公园东门外，团队被分割成三截。我作为一名报道员，也和300名战友一起被6万多不明真相的群众挤压在公路旁的铁栏杆和公园围墙上，动弹不得。饥饿，干渴，疲惫不堪，一张张常年风吹日晒的脸庞在微弱的路灯光下，显得更黑更瘦。

战士们向市民宣传、解释，道理讲了三千六，好话说了一箩筐，一个个点头称是，可就是死死堵住部队，不让前进。队伍滞留不到一个小时，11个重伤中有的已经昏迷。只见团长陈荣富眉头紧锁，苦苦地思索着。良久，才拿起半导体喇叭：

“市民同志们，我们是人民的子弟，我们的战士也是父母所生，也是血肉之躯，现在我们不少战士身负重伤，请大家救救他们！”

团长话音刚落，便有人送来了汽水，还有人送来点心。一家姓刘的个体户父子俩，为我们送来一筐苹果和香蕉。一位中年妇女为腿部负伤的参谋长张秋林清理创口，杀菌消毒。两位老大娘蹲

在旁边，一个劲儿嘱咐：“轻点，轻点，这儿也有伤……”北京市第四医院的一位女医生悄悄走到团长身边，要求把11名重伤员送到她们医院治疗……

围攻的群众后退了一步，部队这才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原地坐下休息。先前“走狗”、“帮凶”之类的叫骂声没有了，转而开始“政治攻势”，对我们进行“开导”：“解放军弟兄们，不要为腐败政府卖命，脱下军装，回家去吧！”“我国国债已达××亿美元，你说政府腐败不腐败？！”……

战士们闭口不言。有的沉默，有的打盹。只有团长抬起手腕看了看表，脸上布满了阴云——现在已是4日凌晨3点20分，离到达预定集结地正义路南口只有一个多小时了，怎么能不焦急呢？

我知道，团长已经两天两夜没合眼。这位36岁、作训参谋出身的中校“团座”，尽管1979、1985年两次参加对越自卫作战，经历过枪林弹雨，在长期的军旅生活中练就了一副健壮的体魄，机警的头脑，素以干练著称，然而，面对眼前这场特殊的“战斗”，却也显得有些“莫可奈何”。一路上，手臂、腰部七处受伤，两块石头同时砸在他的脖子上，现在还红肿着。此刻，我既为他的身体担忧，又为他感到焦急：作为一位指挥员，怎样摆脱眼前的困境，胜利完成任务，不能不说是严峻的考验。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远处，兄弟部队开进时被推翻的军车横在街中间，熊熊燃烧着，不时响起油箱爆炸的“喇叭”声。

这时，团长蹲到政委李成星身边，耳语了一阵，然后捱近我们，示意我和十几名战士围成一圈，并派出6名战士在外围警戒，不让市民靠近。我正纳闷，一只用被子裹着的木箱轻轻放到了我们面前。沉重的箱子迅速启开了，露出一粒粒晶亮的子弹！团长把子

弹分发给 17 名射击技术过硬的干部，轻声作了交代。各自散开后，他又回到原处，扫视着黑压压的人群，点燃一支烟，轻轻地吸着。

后来的实践证明，团长的分析是正确的：凌晨 4 点，围堵部队的人群经过一天一夜的折腾，已经疲倦，一部分人将会回家休息；而 4 日是星期天，天亮之后又将有更多的市民涌向街头。因此，眼前正是来去交替的空隙，也是行动的最好时机，机不可失！可是，用什么办法带出部队？在开进前的动员会上，团长不是亲口说过，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的枪口也不对准群众吗？……我不敢再沿着这思路想下去。

4 点 5 分，6 万多围堵的市民果然散去了将近一半。只见团长猛地掐灭烟头，站起身来，喊道：“部队集合！立正——！——向右看——齐！”

一声令下，官兵们顿时忘记了疲劳、饥饿和伤痛，一跃而起，面向天安门方向巍然挺立。市民群中也“嗡”地躁动起来，齐声喊道：“把头掉过去！”“把头掉过去！”“不准镇压学生！”

团长没有答理，只向 17 位子弹上膛的干部作了一个暗示。很快，他们便按预定方案，迅速分为四组，分别站到队伍的前后左右。团长站在队前，高声说道：“同志们，先整理着装，一路上要走好。我们是人民子弟兵，要给首都人民留个好印象！”接着下达口令：“向后——转！齐步——走！”

“哗……”人群中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有的高喊“解放军万岁”，有的打着 V 字型手势，表示“胜利”。

然而，部队后撤大约 30 米，团长突然下令立定、向后转。人群中复又一阵骚动，接着一拥而上，围住了部队。团长沉思片刻，只

得重令部队后撤。

10米,20米,30米,正行进间,只听一声“立定”、“向后转”,队伍又一次刹住脚步,猛地转过身来。队伍两侧几个“陪行”的年轻人仿佛明白了什么,喊道:“拦住他们……”然而就在这时,“哒哒哒哒……”第一组4名军官一齐对空射击,清脆的枪声划破了黎明前的夜空。

“哗!”人群趴下一大片。不少人拔腿就跑,逃离了大街。几名穿白色上衣的女学生吓得哭了。战士们对她们说:“别哭,快离开,我们不打你们!”

前方亮出大片空地,已无一人阻拦。

“齐步——走!”随着雄壮的口号,六路纵队浩浩荡荡,从天坛东门北侧出发,沿崇外大街,一路高唱战歌,高喊口号,向正义路南口开进。

东方天际刚刚露出鱼肚白,我们的团队顺利到达预定集结地。直到这时,我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回望来路,感触良多,不能不为我们团长的胆魄与指挥艺术所折服。正是:

鱼水丹心卫国志,
两退两进都是情!

感情洗礼

中尉指导员 潘荣清

6月3日子夜，我部成六路纵队，沿南三环路、木樨园、永定门、珠市口向天安门广场开进。

我刚从教研室调到四连，我连在营的编成内担任营的后卫。同时，也是旅的后卫连，负责行军后方的安全和收容。

我同连长分了工，我走在队伍的最后。

部队一进入南三环路就遭到砖石的袭击，成千上万的人围堵我们。行至一处公路铁路交叉点时，袭击更凶了。老远就看见一个老头和几个青年人死死地按住道口栏杆，不让部队通过。他们看到无法阻止部队时，就操纵栏杆，狠狠地朝我们的头上、身上砸，嘴里还喊着“一、二”。四周的人群向我们投来暴风雨般的石头、砖块和玻璃瓶。

在一阵拥挤中，我的鞋子被踩掉了，正准备弯腰去拾，看到前面刚入伍只有两个多月的新兵冯万军被铁栏杆砸昏倒地。我顾不得鞋子了，对身旁的排长游得高说：“三排长，你照顾部队，我去去就来！”

我跳跃到小冯身边，正要扶起他，铁栏杆在“一、二”声中狠狠地砸在我背上，一下把我也砸倒在地上。我爬起来忍着疼痛，背上

小冯回到队伍中。

脚早被石块、砖头和碎玻璃划破了，鲜血流个不停，地上留下一道血脚印。“砖石雨”仍不停地打在小冯和我的身上。

前进至永定门，小冯醒了。他在我耳边说：“指导员，我没事了，快放下我。”说着就往下跳。

我说：“没事了好，要坚持，千万不能掉队。”

“是。”随即，他跑了几步，消失在前进的队伍里。

我站下来，一面招呼部队，一面向围打我们的人群高喊：“热爱首都人民，热爱青年学生！”部队也高声喊起来。

当我回到后卫的位置时，发现三排长游得高不见了，我心里一紧，我向后面追砸部队的人群看去，没有发现游排长的身影。事后我才得知，游排长在抢救新战士江小时，被暴徒围堵打昏，幸被两名便衣警察救走，但他已被打成脑震荡，部分意识丧失，成为终身残废。

部队仍在棍林石雨中向着天安门广场跑步前进。

一些新战士已经体力不支。我就喊着：“同志们，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他们发现我光着脚，便围过来说：“指导员，你的脚破了。”“指导员，你受伤了。”说着就要脱自己的鞋给我。

我说：“谢谢你们，不能停留，后面太危险，大家快跟上去。”但这些新战士说什么也不到前面去，反而围着我保护我前进。

前进至珠市口，我被从楼上砸下的石头砸昏过去……

当我醒来时，我发现新兵孔峰和炊事班长郭长新背着我，许多战士围住我，用身体挡着飞蝗般的砖石雨。

我挣扎着跳了下来。我向围打的人群喊：“你们不要再砸战士

了！”可是，人群早已丧失了理智。

一阵石头、砖块又飞了过来，我再一次被砸倒。这时，一个不认识的新兵箭似地从队伍里冲进人群把我扶起。

我的腿已经不能动了。我说：“你快扶我到我的指挥位置上去。”

他说：“不行，指导员，太危险！”

我说：“我必须去。”

从那时起，他就一直搀扶着我。

自珠市口，街道上的障碍更多了，围打的人群也更疯狂。出现了三道火墙和即将爆炸的燃烧车辆。垃圾箱、交通隔离墩遍地都是，公交车一道又一道，前后共十一道障碍。战友们互相搀扶着，帮助着，激励着，都冲了过去。4日凌晨1点25分，我们抵达了人民大会堂前。

这位新兵把我搀坐到台阶上，给我一壶水。

我说：“你快通知几位排长，整理部队，清查人数。”当时连长已经昏迷。

他说：“指导员，我不认识，我是六连的。”

我知道六连，六连是一支老英雄连队，抗美援朝荣获过“打响出国作战第一炮”尖刀连的称号。

我握着他的手，狠劲地摇了又摇。

周围，人群仍在高声谩骂和砸我们。

4日凌晨4时半，天安门广场清场开始。我连负责毛主席纪念馆一线的警戒任务。大学生和围观的人群从我们面前撤出。我们整理好被撕破的军衣，带着浑身斑斑的血迹，紧密排列着，坚定、笔直地站在哨位上。

推车挺进广场

连长 彭 虎

当我们在沙沟下车，手挽手搭成人墙，掩护师指挥所的车辆开进过后，落日的余辉已消失了。前面的车队缓慢地向东驶去，后面的部队还没过来，路两侧少数人煽动群众向我们扔砖头、石块。我立即收拢部队，往东追赶大队。

跑了约摸4里多路，到了翠微路百货商场，看到一伙暴徒正向停在公路上的军车袭击。大家一拥而上将暴徒驱散。我近前一看，哎，这不是我们连的那台吉比亚车吗？司机邹信峰左脸被打了一道很长的口子，血水直流，还蹲在发动机旁的叶子板上修车。

“连长，我对不起大家，车出毛病了。”邹信峰见了我内疚地说，眼泪差点掉下来。

邹信峰是84年入伍的老司机，技术是全团拔尖的，怎么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了问题。

“你怎么搞的，快修！”我大声吼了起来。

全连战士愣愣地站在车旁。没想到跑了半天追上车，车却坏了。望着离去的车队和追在后面的歹徒，谁能不急呢？

我决定边推边修。我让邹信峰驾驶汽车，调来司机李志华、刘国彬在车头上修车。为了保护司机的安全，一个战士提着防暴棍

站在驾驶楼左侧，用身体挡住砸来的砖头。不一会儿，车启动了，排气管冒出一股黑烟，但很快又熄了。战士们只好继续使劲推，石块不断落在发动机上，砸在修车的司机李志华身上。然而，这台车光喘气，就是发动不起来。司机邹信峰的脸色难看极了，任大家怎么说也没吱声，谁也不瞅，直勾勾地瞪着发动机。就这样推了不到2里路，司机刘国彬一屁股坐在叶子板上说：“连长，这车是修不好了！”

一句话不要紧，战士们都把手从车厢板上放下来，好象也被放了气。司机邹信峰把头深深埋在方向盘里，哭了起来。我本想发火好好地训他一通，但事情已到了这个地步，骂他还能管啥用？

突然，不知谁喊了一句：“快看，这块儿在漏油。”

我一看，通向发动机的油管，不知什么时候被砸坏了，柴油汨汨地流着。

邹信峰和几个司机都围过来，确认毛病就在油管上。眼下去哪儿找油管呢？车是修不好了。我组织战士把车围起来，反击暴徒的袭击，和指导员王建庄等4名干部一起研究，决定：要保住全连唯一的一台车，指导员带领炮一排战士推车，我带领指挥排为车开路，副连长和唐排长带领一排人员为防暴队。

布置已定，我把人员集聚一起，大声说：“车是坏了，但咱们绝不能丢，车要丢了都完蛋。谁英雄，谁好汉，现在咱们比比看，看到底谁是英雄，谁是软蛋。”

汽车在战士们的推动下开始行驶了。这是一辆进口牵引车，自重7吨，车上还有粮食、煤、战士的行李约3吨，推着这10多吨重的庞然大物在长安街上，还要与暴徒进行搏斗，是吉是凶我心里

没有一点谱。

果然，暴徒发现缓缓而行的这台车，以为是唾手可得的猎物，嗷嗷直叫：“没来过北京，推车逛马路，打丫挺的，点了他！”接着蜂拥扑来。

排长唐燕勇呼地跳了出来，他不等我命令，手举防暴棍，大喝一声，“不许动，不许胡来，车是国家的财产，解放军不是好欺负的！你们退回去！”

唐燕勇是全团最老的排长，平时爱发个牢骚，说个怪话，号称自己是“唐老鸭”，可他为人直爽，快人快语，战士们都很喜欢他。

暴徒被老唐的举动震住了，但我们只有40多个人，比起涌来的人群还是势单力薄，在雨点般的砖头、石块袭击下，不少战士顿时血流满面。黑压压的人群继续向我们冲击。

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的老唐大吼一声：“国际战功连的勇士冲啊！”

我们连50年代在抗美援朝中和兄弟部队一起击落（伤）敌机十余架，受到志愿军总部的通令嘉奖；60年代末参加了抗美援朝越战，和兄弟部队一起击落击伤敌机40余架，被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授予“国际战功连”的称号。一提这些荣誉，三连的兵没有不来劲的。

防暴队的战士在老唐的带领下，犹如猛虎下山，拾起歹徒扔来的石头，边还击，边往前冲。但躲在暗处的歹徒似乎早有准备，向我们开始投石灰包，向汽车扔燃烧瓶。好几个战士被白灰迷了眼，10多个暴徒趁机围上来，举起棍棒朝战士们身上乱打。老唐顾不上自己身上多处受伤，手提防暴棍左右冲击，营救被打的战士。被暴徒煽动的群众越聚越多，眼看防暴队的战士就要被“包饺子”，我

正准备营救，但汽车篷布已被燃烧瓶点燃，情况更严峻了。老唐这时高叫起来：“同志们，向我这靠拢，咱们擒贼先擒王！”说着带头向一个头缠红布条的暴徒冲去，一名战士抢过来一个灭火器，抱在怀里，高声喊着：“快起开，要爆炸了！”

暴徒乱了营。缠红布条的小子，扔了铁棍撒丫子就跑，老唐带着七、八个战士高喊着：“冲啊，抓活的！”追过去。

这边，我迅速爬上车去救火。由于篷布系得紧，怎么也解不开，火在篷布上呼呼蔓延，再烧下去，车体可能就被点着，不知是谁喊了一声：“连长，这有小刀。”

我接了过来，使劲割着系篷布的麻绳，一连割了4个。就在这时，从路右侧的树丛中，跑出4名暴徒，抓住了在后厢板推车的战士王金印的枪，他们一边用棍子猛击王金印的胳膊，一边使劲拽王金印背在后面的冲锋枪。

暴徒要抢枪了！我在车上发现后大声嚷道：“王金印坚持住，一定要保住枪！”一面命令其他战士快来营救。

这几个暴徒也红了眼，抓住冲锋枪使劲朝后拉，王金印双手紧紧抓住后厢板，怎么也不松手，身体都成了弓形。脸憋成了紫色，直到指导员带了几个战士冲过来，暴徒才跑掉。王金印却一下子栽倒在车旁，晕了过去。

这时，我和几个战士已把篷布从车顶上掀下来，篷布在地上烧成一个火团，车保住了。

我突然想起，我们的“唐老鸭”冲到哪儿去了呢？见从地铁站口里跑出几个戴着钢盔的士兵，原来是老唐把头缠红布条的暴徒逮住了。我心里骂了一句：他妈的，这个老唐，胆还真大，就是跑得离车远了点。

我让老唐把暴徒交给武警部队，全连又继续推车前进。

车越来越难推了，路上到处是横七竖八的隔离墩，路面尽是石头，后面的汽车一辆接一辆从我们的左边驶过，为了不影响车队的行驶，我和指导员王建庄商定，在路的右边走。这样，我们不仅需要自己清理路障，而且还要保护右侧的安全。

约12点，我们接近复兴门立交桥。这块儿是一个很长的上坡，车慢慢地向前爬。指导员王建庄边推车，边动员。从后面驶过来的一台解放车，一个中尉军官在和王建庄打招呼：“伙计，上我们车走吧，咱们挤一挤。”

“你们有钢丝绳吗？”司机问道。

中尉一摆手。

“那你们先走吧。”指导员说。

几个战士悄悄议论：“路旁这么多自行车，咱们骑自行车走吧。”

“我一点劲也没有了，走路都不行了，还推车呢！”

车终于停了下来，是一块砖头挡住了前轮。看来，战士们已经相当疲劳了。

在车厢旁，我和指导员把战士们召集在一起。

“大家说，这车我们还能不能推动了？”我火急火燎地问。

一片沉默。

司机邹信峰站了起来：“我是党员，我是这车的司机，我绝不离开车一步。”

我理解邹信峰的心情，他是这个车的第十一代主人。这台车伴随着连队走过了近20年的路程，战士驾驶它，参加过唐山抗震

救灾，为灾区人民运过物资，参加过华北某地大演习，受到邓主席的检阅，参加过英、法、美、德四国打武装直升机对抗演习。它，可以说是我们最亲密的战友，在这个车轮上，记录着我们无数难忘的岁月。

党员、团员纷纷站了出来，“车绝不能扔下！”

指导员王建庄声音嘶哑地说：“好，这车绝不能丢，就是用头拱，也要把车拱到天安门！”

我简直不相信战士们还有这么大的劲头，吆喝着又把车推上了立交桥。从出发到现在已经走了快三个多小时，由于出发时间紧，好多战士没来得及吃饭，我们的战士难道是铁人吗？

下桥时，公路右侧横放着两辆燃烧的公共汽车，火光冲天，冒着浓浓的黑烟，车体的一侧都烧红了，左侧是缓缓行驶的车队。

不能与车队争道。但继续从右侧走路面窄，燃烧的公共汽车随时都有可能爆炸。可是不过又不行。

十几名战士不等我说，把背的水壶拿下来，往身上一浇，在燃烧的公共汽车旁排成一线。他们的意图我明白了，他们要挡住火苗，保护汽车。

推车的战士猛力地推着，他们也明白，要尽快冲过火区，使保护车辆的战士赶快离开燃烧的公共汽车旁。

军车接近火区了，脸上被烤得火辣辣的，热浪袭得人喘不过气来，站在燃烧公共汽车旁的战士，军装的后背有的已被烤焦了，头发烤糊了。

我急得火燎燎的，军车刚一通过，就指挥战士迅速撤离，这时，已有两名战士晕倒在地，被大家抢了过来，刚走不到五米远，“轰”的一声，公共汽车爆炸了，火星四溅，我们的军装也被烧了许多小

洞。

不过，总算闯过了这个火海。

到民族文化宫的时候，相继有七、八名战士晕倒了。

战士周勇丰，是个独生子，个头不高，身体瘦弱，入伍那年刚十七岁，全连都叫他“小不点”，他推着推着晕了过去，扑的一下栽倒在车底下。

指导员见状立即组织人员把晕倒的战士抬到车上进行抢救。

为了减少晕倒的战士，指导员让大家边推边喝些水，我突然想起，在冲过火区的时候，战士们把自己的水壶的水都浇在身上了。指导员解下自己的水壶，递给战士，接着副连长、老唐和我都把水壶递到战士们手中。

战士们又把水壶都递到车上，让给晕倒的战士喝。

车又开始前进了，不一会儿晕倒的周勇丰醒了过来，一下子从车上跳下来，含着泪说：“你们推车，我怎能忍心坐车呢？”车上的几个战士都不顾劝告相继跳了下来，加入了推车的行列。

车到六部口了，指导员高兴地叫起来：“同志们，前面不远就是天安门了，加把劲啊！”

突然，从六部口的胡同里冲出来一伙暴徒，为首的边扔石头边狂叫：“当兵的要到广场去了，哥们儿，点了它。”

这时的战士，不要说与暴徒搏斗，就是捡起石头反击，恐怕力气也不足了。我灵机一动，让大家把枪端在手中，在车的右侧排成两列，第一列蹲下来成举枪姿式，我大声命令道：“全连注意，做好射击准备，谁烧车就打谁，没有命令不准开枪。”这一招虚张声势可真灵，暴徒吓得纷纷钻进胡同。

战士们见状乐了起来，大家谁都知道，从我这个连长到士兵，

谁也没有一发子弹。

前方的路面越来越宽阔了，指导员登上汽车，向着前方眺望：“同志们，天安门到了。”声音嘶哑，颤抖。

我抹去脸上的汗水，睁大眼睛望去，只见灿烂的灯光下，国徽在闪烁，一会儿华灯变成满天星星；一会儿国徽变成一片血红；一会儿灯光和国徽又变成无数条彩带。在这一片绚丽的境界中，我们推着车走了过去，尽管我们已是步履蹒跚，尽管我们已无力呼喊……

我们终于到达了天安门广场。

我们即将迎来一个新的黎明。

(苗小平 整理)



八闯三元桥

上校处长 刘新力

后来有人说,那天我们所以能完成任务,多亏了那一套供三人穿的便衣。可我琢磨,没有象裴震一家那样值得信赖的北京市人民群众的支援,我们的成功是不可思议的。

我们从沙河机场出发的时间是6月3日15时50分。在这之前15分钟,上级前指用保密电话下达了“紧急命令”:要求部队按既定布置立即行动。命令是我接的。军长当即决定首先组织A团出发,由我任组长,带一名作训参谋、一名通信参谋和一部10瓦电台组成军先遣指挥组和A团一起赶到东直门,在海运仓开设指挥所。在这之前,我们曾穿便衣,对北京市内的热点地区以及道路通行情况作过侦察,接到命令时,我们都没穿军装。但命令要求体现我军威武之师、正义之师的形象,我才换上了军装。作训参谋徐义华临登车前还没换上军装,我说:“你怎么不穿军装?”他说:“来不及了。”我说:“不行,赶快找。”徐义华这才抓了一套军装,一边登车,一边往便衣上套,急得满头大汗。这样我们三个人,只徐参谋有一套没来得及脱的便衣。后来这套便衣却派上了大用场。

我们从集团军指挥所赶往A团驻地。A团战争年代能攻善守,曾被誉为“铁拳团”。去年,参加军区战备检查紧急出动演练夺

冠。这次他们动作也相当快，仅差 20 分钟，我们赶到时，他们连尾车都没影了。作为先遣组，我们必须赶到 A 团的前面去。我对司机下令：“追！”

跑了一段，才看到 A 团的尾车。“超！”我喝了一声。我们的北京 212 吉普车就一辆一辆地超到最前面。当我看见赵副师长的车、A 团团长的车都被我们超过时，三元桥不远了。三元立交桥是三环路的重要枢纽，是首都机场通往城内的咽喉。三环路各种车辆多，情况复杂。我想在进入三环路前，把部队开进的情况向军指挥所报告一下，便命令司机加足马力，赶到前面架设电台，实施短停发报联络。

通信参谋翟卫东按照我的命令迅速架好电台，可是联络不通。于是他又架起斜天线，仍旧联络不通。这时我发现 A 团没有尾随我们车辆跟进，而是朝左边的路拐下去了。我说：“赶快调头截住他们！”于是我们的车又拐了回去。A 团的车队已进至东坝河东侧的京顺路。我看见有两辆大客车突然插过来，将 A 团的车队拦腰截断了。紧接着，过往的车辆都纷纷停下来，车上的人、周围住宅里的人、周末下班的人“呼啦”一下子聚集起来，不到十分钟，就聚起上万人。我心里说：“这下坏了。”我知道，当时只过去一个营，后边的几个营都被阻住了。徐参谋当时很着急，问我：“怎么办？是不是采取措施？”我说：“对！按上级指示，采取坚决措施前进。”徐参谋立刻跳下车，对我们前面解放车上的战士喊：“赶快下车，听从指挥，强行开辟通路！”战士们听到命令，马上从车上跳下来，徐参谋组织战士拨开人群往前冲。这时，几个头上缠着布条的大学生举着大旗迎了过来，高喊：“我们是高自联！”周围的群众立刻哗哗鼓掌。他们便喊：“他们是来镇压群众的！”有的人举起膀

腾说：“大家看，这就是在天安门广场受的伤！”群众一下子被激愤起来了，口号声惊天动地。我一看，这样根本冲不过去，徐参谋这时急得满头大汗，扭头来看我。我一摆手，示意他指挥战士赶快上车。因为军长临出发时有指示，强行开辟通路不行的话，就要保护好车，防止人车分离。于是徐参谋下令：“上车！”战士们又纷纷登车。

这样一来，我的身份暴露了。我听到人群中有人喊：“那儿有个上校，叫他下命令，把部队后撤！”我心想，不能活人让尿憋死，我有我的任务，还得保住电台，保住指挥车。我说：“小赵，加足马力，下道，拐下去。”小赵一踩油门，吉普车轰的一声从人行道拐下去。冲过了一个花池，又冲到一条人行道上，前面有个小胡同。我说：“钻！”那时我想：豁出去了，管它通不通呢，总之得赶快脱离人群。

钻进胡同，我看有一个大院，正好有个老大爷，象是看大门的。我就摆手，示意让他开大门。他看我摆手，就把铁门打开了，我们的车一直开到后院，老人把门关上了。我说：“赶快联络！先头团受阻，得赶快报告给军长！”

“01！01！我是02，02呼叫！”

报务员嗓子都喊哑了，还是联络不上。这时大院外面围上了人，这家单位的领导害怕了，对我说：“你们赶快出去吧！要不他们进来砸我们，我们可受不了，我们这小本经营，可经不起折腾。”我们当时心里明镜似的，这是撵我们哪！回想我们部队盘锦抗洪、唐山抗震、大兴安岭救火，什么事没经历过，到哪不都受到当地群众热烈欢迎！可这次走哪哪撵，把我们当成什么人了！我心里真不是滋味，我也是三十好几的汉子，哪能没有骨气。我说：“走！上

车！”

车冲出院子，向左，向右，再向左。

“死胡同。”司机说。

“死胡同也拐！”我说。心里憋了一肚子气。

车开进去，再拐，然后停下来。我让再联络，可还是联络不上。

我知道，按原定计划，C团马上也要开上来了。如果C团开上来，弄不好就会跟A团一样，被阻到东坝河一线。必须通告C团改变开进路线，迂回上三元桥。

我问：“谁有便衣？”为了完成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只能穿便衣进行联络了。我的军衔太显眼：上校。徐参谋说：“我有。”说着他脱去军装，把军装里面的夹克上衣给我，把便裤脱给翟参谋。这样他的一套便服一分为三，他自己穿背心，短裤。

我下身是军裤。为了掩人耳目，我把裤腿挽起来，并且故意一边挽高点，一边挽低点，打扮成一副不拘小节的样子。然后我又从裤带里拉出背心，盖住手枪和弹夹。

此时，宽阔的京顺路面，让人群、车辆围得水泄不通。有不少黄头发的外国人，正用照像机和摄影机在车里向这边瞄准。我和徐参谋穿过人群往北跑，留下翟参谋继续用电台联络。当我们跑到京顺北侧路口时，发现有一台解放车拉着战士由首都机场路从北向南疾驶而过。紧接着，C团团长的指挥车也开过来了。我急得不住招手，可是因穿的是便衣，团长没留意，车“刷”的开过去了。

坏了，果然不出我所料。A、C团全被阻在东坝河一线了。

我通过人群，挤到C团团长的指挥车跟前，看见团长这时急得汗都下来了。我朝他使眼色，他发现了，脸上表情这才稍微松弛了一些。因为他知道我是军指挥所的，我在这儿就说明军指挥

所已经知道了他们部队受阻的情况。

我看两个团一点前进的可能性都没有了，就派徐参谋再到前面侦察一下A团先头营的情况。自己又跑回村里，翟参谋这时还没有联络上。我问翟参谋，有没有别的办法，翟参谋说，可以利用团指挥所的电台试试。团指挥所有一部大功率电台。我让翟参谋将部队受阻情况写在纸条上，因为群众跟部队搅在一起，没法口头传达命令，只能靠传纸条。翟参谋拿着写上自己名字的纸条，挤进人群里，找到了电台车，他就把纸条塞到干部手里。后来我们知道部队接到纸条，也没有发出去，因为每台车周围都有几百人围着，跟本没法呼叫。

“最好能找个地方电话。”我悄声跟翟参谋说。我的话被一个穿大背心的挺胖的中年男子听到了。事后我才知道，他盯着我和翟参谋已经有一会了。

“你想打电话？”他说，“跟我来。”

他样子挺神秘的，开始我还不能完全相信他，但我还是跟着他去了。因为当时没有别的办法，有一点机会就得抓住。

他把我们领进一个大院。院里有一栋二层小楼。他把我们引到楼上，屋里桌子上有部电话。这可真是遇到救星，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了。我说：“大叔，你这电话是个人的，我们掏电话费！”他说：“你这说哪去了。”这时外边有人喊：“刚才那个当官的呢？”他赶紧下去，怕群众发现我们，冲上来。

后来我们知道这个人东坝河村党支部书记裴震。他的叔叔拉上窗帘，告诉我们：“说话小声点！”后来又帮助我们看守车辆，掩蔽干粮、背包。可是平息暴乱后有人竟举报他抢劫军用物资、砸军车。老人被抓，挨了打，写了“交待材料”。我们得知这一情况

后，专门派人去公安部门说明情况和事实真相，放了老人，并给裴震一家送了匾。

我们使用裴震家的电话，通过总参要通了军指挥所。谢天谢地，总算跟军长通话了。军长听了我的汇报，当即做了指示：要求稳定部队，寻机前进。有了军长的指示，我心里踏实多了。

为了避开盯梢，我还是采取写纸条的方法，把军长的指示写在纸上。然后，就朝C团指挥车跟前挤，不料我刚过去，就被C团的参谋长发现了，这人是个急性子，瞅见我老远就喊：“处长！处长！”我一听，掉头就走。那时我要答应，周围的人围住我，我就脱不了身，军长交给的任务还怎么完成？我和徐参谋悄悄地给两个团的领导递了条子，传达了首长的指示。接着我们又步行四公里，穿过三元桥，赶到东直门斜街。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下來，斜街上数万人正团团围困着十几台军车和二百名官兵。我和徐参谋在人群里看到了A团的作训股长，他穿个大裤衩子，花衬衣。看见我，先打了我一拳，说道：“哥们儿，上哪儿去？”这小子够机灵的，我把纸条悄悄给他，说：“赶快交给团长。”

半夜零点，我们赶到海运仓时，又接到军长的指示，命令部队一定要在拂晓前按时到达指定位置，必要时可以对空鸣枪示警。同时获悉军杨参谋长正在组织防暴队准备配合行动。我接到命令，马上借了自行车，与徐参谋一起先赶到东直门。A团先头营这时只差60米没有上桥，东直门立交桥上人山人海。有个自称“高自联”的人站在A团的指挥车上破着嗓子进行宣传，公布天安门广场“最新消息”，造谣说天安门广场正在进行血腥屠杀，打死的人中有几岁的孩子和几十岁的老人等等。我挤过去，看见战士们都抱着枪，坐在地上。周围的人问他们有没有子弹，战士们说没子

弹，有的战士还把空弹夹举起来给周围的人看。当时战士们确实没有子弹，出发时明确不准开枪，以团为单位只有少数干部带了子弹。我秘密找到A团作训股长，传达了上级指示，告诉他们秘密发子弹，听到枪声，马上组织突围，占领立交桥。

接着我又骑自行车经三元桥赶回东坝河，这时已是四日凌晨1时左右，我和徐参谋分头把C团团长、政委、参谋长、作训股长，A团一营和炮营营长，二营教导员等人悄悄找来，着便衣躲进两条公路中间的树林里秘密开会，传达军长的指示，具体明确了两个团鸣枪突围的协同动作。要求他们在听到防暴队的枪声后，所有车辆立即发动，迅速组织清除路障，对空鸣枪驱散群众，部队趁机突围前进。考虑到A团被阻的三个营没有团的领导指挥协调，我干脆按作战时指定代理人的老办法，宣布指定一营营长负责指挥。

会后，A团一边组织秘密发子弹，一边安排战士假装睡觉。C团组织力量把扎破的轮胎换了下来，并悄悄对每台车轮子都派了警戒。这时我借路灯光看了一下表，心想应该利用部队正在秘密进行突围准备的这段时间，到太阳宫向参谋长汇报，让被围部队的突围行动和防暴队的解围行动合起拍来，不致于乱套。

于是，我和徐参谋又快蹬自行车，赶到太阳宫。杨参谋长同意我提出的协同意见。政治部籍副主任告诉我，他刚刚听到了中央电台的广播，说“北京的动乱已经发展为反革命暴乱了”。看来这一趟没白跑，这一夜我总想听广播也没有机会。现在明白了斗争的性质，就知道下步该怎么对付啦。

3时06分，远处传来一声响。A团炮营营长傅勇说：“处长怎么样？打吧？”我说：“打！”他“砰！”地朝天上放了一枪，然后我们就带十几名战士，一个箭步冲到设障碍的大客车跟前。傅营长

边鸣枪边逼驾驶员倒车，我也跟着喊：“快让开！”当时，我看到那驾驶员一开车门就吓瘫了。大客车一动，我们的车“呼呼”地一台接一台地开过去了，周围的人听到枪声只好把路让开。这时人群边喊“法西斯！”边朝我们的车上扔砖头和汽水瓶子。我和徐参谋的身份也暴露了，他们也朝我们身上砸。我看A团开动了，就推着自行车朝C团方向跑。徐参谋喊：“危险！”我想顾不上那么多了。我跑到C团，看C团已开动了。于是我们就在两个团中间的道路，与部队一起冲上了三元桥。我因为骑自行车没敢从桥下过。当时桥上人山人海，两辆载重十吨的大卡车，轰隆隆开过来，车上拉的，都是大煤块，人群一截，司机就把煤快“哗”地卸到了桥上。暴徒们就用煤块砸在桥下穿过去的军车，有人还在桥上指挥喊口号：“砸呀！跑过去啦，快砸呀！”连铸铁的垃圾桶都从桥上扔下去了。有的车篷布都砸出了大窟窿，战士们只好戴上钢盔，再顶着背包，不少同志负了伤。

主力开过去了，我怕负责支援的炮兵旅防暴队再从桥下过有危险，又骑上自行车从三元桥重返东坝河，追上了炮兵旅防暴队的9台牵引奔驰车。车上的李参谋认出了我，他说：“处长，危险，快上来！”我说：“你们千万别走桥下！主力都过去了。你们返回吧。”此时，一些人不停地用石块砸军车，打得牵引车两侧厢板“啪啪”响。我一看，防暴队车一走，可就剩下我一个人啦。不行，我得脱身回指挥所，我就大声喊：“不许向我们开枪！”这样周围的人就不知道我是什么身份了。

3时20分，部队全部突围成功。我又赶到东直门，这时部队已经占领了立交桥。立交桥周围仍旧人山人海的，部队持枪牢牢地控制住立交桥，不让人群上来。我挤过去，炮营营长傅勇发现了

我，他很机灵，用枪对着我，说：“不许动，你想干什么？你过来！”我就走了过去。我到了他跟前，他低声问我：“部队都过来了吧？”我说：“都过来了。”他问：“还有什么指示？”我说：“你们一定要控制住立交桥，一步不能退！”他说：“你放心吧。”

就这样，部队提前到达了上级指定位置，有力地配合兄弟部队完成了在天安门广场的清场任务。这一夜，我先后八次通过三元立交桥，徒步和骑自行车往返行程四十多公里，圆满完成了军指挥所交给我的先遣指挥任务。

（吕永岩 整理）

车头永远向北京

上校团长 张振生

我接到向市区开进命令的时间是6月3日的16点45分。不瞒你说，在沙河机场的厚棉帐篷里憋屈了十多宿，大伙早就盼望着这一天啦。13分钟后，我们的41台车就舒筋展骨疾速西行了。

当我们行至京顺路与西八间房的交叉路口时，我发现兄弟部队的车在前方被围，我当机立断，指挥全团闯红灯，越警线，改走平时禁止卡车通行的国际机场路。在距三元桥约800米时，一辆公共汽车突然横过来挡在路中。与此同时，在京顺路上围攻兄弟部队的三、四千人狂呼乱叫着涌过来，立刻就把我们围了个水泄不通。有的跳上汽车叶子板挠司机的头；有的人在汽车后面抓住战士的胳膊往下拽；4名打着“化工学院”大旗的家伙坐在一台大解放的保险杠上洋洋自得；两条汉子在一个长脖子少妇的率领下，手持铁矛荡来荡去，而后来到我们指挥车前，用手拍拍车轮就要扎。

“不许乱来！”我一看要坏事，一步跨到车轮前，对他们说：“我是部队长，你们有意见可以跟我讲，但军车是国家财产，拿它出气可不行。”“嗨，仨花，俩杠，官儿还真不小。”长脖子少妇打量了一番，尖声尖气地道：“好，今天就找你了。”

身着海魂套头衫的大汉把铁矛往地上一拄，也跟着嚷嚷起来：

“这是国际机场路，是你们军车呆的地方吗？快把车领回去吧，要注意国际影响。”

僵局。无论我们怎样阐述人民军队的职责和宗旨，表明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目的和意义，都无济于事。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飞逝。我回首西望，残阳舞动着血红的画笔，把我的兵车、我的官兵勾勒成钢浇铁铸般的剪影。逆光里，指战员们有理有节，正在与围堵的人们展开激烈的舌战；造谣者的嗓门沙哑了，辟谣人的嗓子也沙哑了。逆光里，我们的战士持枪而立，用身体保护着每一个汽车轱辘和油箱，任人怎么推搡也不退移，推搡者汗流浹背，被推者也被汗浸湿了军衣，我心里更急，因为上级命令，4日4时前我们必须到位。

然而，僵持仍在继续。不知什么时候，有些碧眼褐发的外国人也掺和进来，伸出两根指头向围观者频频致意，一时间，围堵的人们精神焕发，更加有恃无恐。

你还别说，“急中生智”这个词可是千真万确，就在这进退两难的当口，我的脑海里突然蹦出两个兵家术语：瞒天过海，一箭双雕。我对长脖子少妇说：“还是这位师傅说得对，这是国际机场路，要注意国际影响。依我看，你们是不是先把市民疏导一下，把外国人的车放行国际机场？至于我们之间的分歧嘛，好商量。”这个建议恰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长脖子少妇犹豫了一阵，只好答应了。

就在他们转身去扒拉市民的时候，我迅速上车，向作训人员秘授了命令：“先头连派人下车，快速清障准备，其余各车收拢人员，做好强行通过准备，看首车行事，全速前进！”尔后，我也装成疏导交通的样子，站到吉普车车盖上，手拿电动喊话器喊道：“市民们，请大家往边靠一靠。现在，我们要调整一下车辆，让外国人去机

场！”话音刚落，我的小车引擎响了，其它各车心领神会，也相继发动起来。

说真的，还是那长脖子女人的话好使唤，很快，左侧道路就有了一条缝，十几辆满载外国人的大小面包车和小轿车缓缓前移。

就在最后一辆车行驶过去，而前方路障尚未来得及恢复的时候，我迅速带领车队冲上左道。长脖子少妇等人一愣，仓惶后退。我早有准备的先头车官兵把他们连人带车推至路旁。说时迟，那时快，我们的车队犹如脱弦利箭，冲出重围，喇叭长鸣，直扑三元桥下。

“他妈的，真狡猾。”有人气极败坏地骂着。

我目睹华灯和鲜花簇拥的大桥，眺望京都恢宏而又朦胧的城郭，心里一阵激动：“党啊！你的忠诚卫士报到来了……”

万没想到，当我们行至桥下十来米时，桥上的鬼影出现了。蓦地，一团黑物迎面飞来，只听咔嚓一声，我们眼前的挡风玻璃骤然开花，玻璃碴子稀里哗啦溅了司机小张和我一身一脸。鲜血，从小张的手腕上沁出来，我的左脸颊上，也分明感到热呼呼的虫子在往下爬。

“他娘的。”我推开车门扭头一瞅，好家伙，大煤块、果皮箱和自行车还在接二连三地往桥下砸来。当时，我真想命令值班火器开火打击这帮歹徒。可是，人影幢幢，良莠莫辨，你打谁呢？万不得已，我们只有按命令对空鸣枪……

枪声，吓跑了居高临下肆意施威的暴徒，把部队的损失减少到了最低限度；枪声，也引来了更多的好事者，数以万计的芸芸之众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奔来。

此刻，我身边的一辆15瓦电台车和另一辆大解放被砸坏了水

箱，正冒着烟，呼哧呼哧喘着粗气，一蹦一蹦地往前颠，首当其冲，我们这3辆挂彩最重的车成了围堵者嘲弄的重点目标。

“当兵的，滚回去！”一时间，口号声此起彼伏，震天价响。

“热烈欢迎解放军——那是一九四九年……”一个骑在三轮车上的大光头嬉皮笑脸，冲我数着小快板。

几个无业游民模样的人，也一个劲地给我的战士灌迷汤：“政府腐败了，你们还为它死卖命，何不学学张学良？”

“只要老弟说声走，车票包在大哥我身上。”

“要是觉得穿军装不方便，到我家里去，咱负责给你换。”

还有一个叫“陈光生”的小瘦子，晃着一叠人民币和外汇券，细声细气地吆喝：“哎，想好了就来领路费，每人50元，包你们回家去团圆。”

被歹徒砸破前额，刚刚包上纱布的电台兵王成巨再也忍不住了，呼地站了起来：“小瘦子，你听着，我们是支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队伍。40年前，我们的老前辈凭着对党的一腔忠诚，一举攻克了南苑机场，为和平解放北平立下了汗马功劳，今天，我们保卫首都北京，仍然凭着对党的一腔忠诚，你拿几个臭钱，就想把我们收买去，妄想！”

“你你你……”小瘦子恼羞成怒，连连跺脚。一个穿西装短裤的青年人挑拨他说：“这些小当兵的，你跟他们说顶屁用？”说着，又窜过来围攻我，“现在你都看到了，我们都是自发来拦军车的，谁也没有指使者，这就充分说明军管不得人心，快下车掉头吧！”

我说：“我部奉命执行戒严任务，三元桥是我们执勤地域，应该掉头的是你们，而不是我们。”

“嘿，这家伙还嘴硬，师傅们，上，把它的车头掉过去！”顿时，

一伙人冲上来，不容分说，就在一阵哦哦的乱叫声中，将我的小车连抬带掉，逆时针旋转了半圈。

此刻，我也真急眼了。我想，我是一团之长，在这万人围堵的关键时刻，40台军车上的八百多双眼睛都在看着指挥车的方向。绝不能让歹徒的阴谋得逞，只要人在，车头就要向北京。我当即召来担任警戒的战士，顶着歹徒的拳打脚踢，一个“一二三”，又把小车顺时针旋了180度，使它重新向着北京的方向。

太阳出来了，三元桥沐浴着灿烂的霞光，我的41台车也在朝辉的抚慰中冉冉发光。



砸不哑的大喇叭

下士放映员 朱士芳

反革命暴乱平息半个多月了，可是每当我听到“军营之声”广播时，却始终觉得这熟悉的声音是从北京最大的立交桥——三元立交桥上空传来的。

6月4日零时45分，刚刚到达指定位置的部分官兵突然紧急行动起来，有的卸车，有的跑去开会。我刚想过去问究竟，只见赵主任跑过来，严肃地对我说：“现在兄弟部队被围，情况万分危急，上级命令我部迅速组成防暴队接应，你们马上卸下车上的东西，把广播器材架在车上准备出发。”

我来不及想别的，一口气卸下车上的东西，随后便准备架设广播，这时我却傻眼了：原来，一些广播器材都被暴徒用石块、砖头砸坏了。4个高音喇叭，3个变得象唐老鸭的嘴似的，喇叭头和喇叭筒也分了家，扩音机也哑巴了。

我是刚从放映员集训队毕业的，放电影我不怕，可修理广播器材我哪行啊！但眼下广播车对“防暴队”来说是多么重要，“防暴队”能否解救出兄弟部队，对整个戒严部队能否按时到位又是何等的重要……我简直不敢再往下想，只觉得脑袋嗡嗡直叫，汗珠一

颗接一颗地掉在地上摔成几瓣。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电影队队长宋金财大汗淋漓地出现在我面前。部队执行戒严任务前，宋队长已被确定转业，可他担心我们完不成任务，非要求出来不可。当时我还认为他是个“多余”的人。现在面对一堆“破烂”，他甩掉已经湿透了的背心，光着膀子立刻投入抢修。集团军籍副主任、宣传处长和赵主任都焦急地问他：“怎么样，能修好吗？”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只见他一会儿拿起电烙铁焊接，一会用万用表的表笔仔细检查喇叭线圈、测量电路，又几次爬到车底下把导线接到电瓶上。不到半小时，4个喇叭都会说话了。

凌晨3时，天上的繁星仍在闪耀着，“防暴队”在“保卫首都，平息暴乱”的口号声中出发了。车队行驶到三元立交桥附近时，只见路上设上了木头、隔离墩和三角石等路障，上万人蜂拥到路中央，把车队团团围住。随着人群中“扎轮胎、打死他们”的狂叫声，石头、瓦块雨点般地向车队袭来，砸得汽车“嘭嘭”作响。就在这时，宣传车上的4只高音喇叭突然响起来，发出振耳欲聋的喊声：“北京市民们，现在首都已经发生了有计划、有预谋的反革命暴乱，一伙暴徒企图推翻共产党，颠覆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奉上级的命令平息这场反革命暴乱，请不明真相的群众和青年学生迅速离开现场，不要阻碍我们的正义行动，否则后果由你们自己负责！”这声音真象是一串串炸雷，震醒了许多不明真相的学生、群众，震呆了正在作恶的暴徒，同时也激发了“防暴队”百余名官兵坚决完成任务的激情。车队终于通过了三元立交桥，解救了被围困的部队。

完成任务返回，再次通过三元立交桥时，宣传车变成首车，车队再次遭到人群阻截，宣传车成了暴徒重点攻击的目标。一名戴

墨镜的家伙，用手提式喊话器狂叫：“你们不要再为腐败政府卖命了，赶快滚回去！”并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打砸军车。

面对暴徒的暴行，宋金财毫无惧色，干脆丢掉宣传稿，慷慨激昂地说：“你们不要造谣惑众，我们是人民军队，一切听从党的指挥，你们想瓦解军心，推翻政府，办不到，绝对办不到！首都人民迟早会醒悟的！”讲了几遍后，我看到人群中有人扔下了手中的石头，有的停止了叫骂，有的似乎在思考着什么。军车又一次通过了三元桥。

在准备返回驻地时，又接到护送某团到东直门的任务。当我们第3次即将从三元桥下通过时，我突然觉得头上有个黑影一闪，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宋队长一把把我搂在怀里，顺势压在扩音机上。这时只听“咣当”一声，一块十六、七斤重的水泥方砖落了下来，砸在他的钢盔上，砸得他眼冒金花，半晌没出声，我急忙上前换他广播，他顽强地说：“只要我不倒下，就坚决守在岗位上。”当我们护送某团第4次通过三元桥时，一伙暴徒开过来两辆大客车停在路中央，使车队前进又一次受阻。他及时喊话，要求暴乱分子立即撤除路障。这时，几名暴徒奔向宣传车爬上车拽断广播线，砸毁广播器材。宋金财一面用身体保护器材，一面怒斥暴徒，警告他们立即停止作恶，否则将受到严厉制裁。在他的宣传下围观的群众纷纷撤离，几名暴徒也在鸣枪示警下慌忙溜到路边。

4点20分，天色刚刚露出一点晨曦，我们的“防暴队”胜利地返回了驻地。

不消失的浪漫曲

专业军士台长 王荣义

“嘀哒、嘀哒、嘀嘀哒……”集团军来了急电：命令你部6月3日15时30分向戒严地域开进。已经两昼夜未合眼的我顿时又精神起来。17时，开进部队行至太阳宫北铁路交叉口时，被数千名学生、群众分割成几个部分，我们的小八一电台车被迫开进太阳宫乡敬老院内。

电台工作由日频改为夜频时间已到。夜频工作，频率降低，再用车体天线，信号太小，工作困难。我当机立断：趁围观群众不多，立即架天线。与主台集团军指挥部取得联系。我和3名报务员只用3分钟时间，就将44米双折式天线架了起来，沟通了联络。

此时，400多名群众已经冲进大门将电台车团团围住，当听到“嘀哒”声音时，一个二十多岁、身穿背心的家伙狂叫：“这是电台车，砸了它，不能让它联络。”一名留着披肩发的女青年带领3名男青年一拥而上，割断两根天线拉绳，又扯走一根，天线杆“叭”地倒在地上，联络立即中断。暴徒们一边用天线杆抽打车体，一边煽动周围不明真相的群众：“乡亲们，这帮土匪开进北京，是镇压学生和人民的，明天北京将会血流成河，人头满地，快动手干掉他们吧。”群众的情绪被他们一下子煽动起来，指责、咒骂四面而起。

我大声向群众说：“老乡们，我们是人民子弟兵，到北京是为了保卫人民，维护秩序，不是镇压学生和群众的，请不要妨碍我们的公务，把天线杆还给我们。”

一个手拿天线杆的暴徒叫嚣着：“我们北京的秩序满好，你们赶快滚回去，再联系就砸烂电台车。”

面对丧心病狂的暴徒和神经麻木的人群，宣传教育已经无济于事了。我和3名报务员商量：要不惜一切代价夺回暴徒手中的天线杆。

一场激烈的争夺战开始了。报务员申桂林和一名20岁、头扎白布条的暴徒争夺天线杆，暴徒手持天线杆向他身上砸来砸去，身材魁伟的申桂林既没有还手，也没有动口，正当暴徒高举天线杆砸他头部时，他机智地向右一闪，顺势将天线杆抓在手，又用力一拉，第一根天线杆被夺了回来。报务员梁广时受到周围几名暴徒围攻，拳脚齐下，鲜血从他的头部流了下来，他死死地抓住天线杆不放。天线杆全部夺了回来，我们迅速重新架设天线。车外异常危险，话务员在车内工作，我在车外左手扶着没了拉绳的天线杆，右手拿着没有子弹的冲锋枪示警。这时，一个暴徒指着我叫：“他是领头的，先收拾他。”随着他的喊叫，雨点般的砖头、瓦块砸得车体“咚咚”直响，落在我的钢盔上、身上。半截砖头“嗖”地从人群中飞出，正巧砸在我的左臂上，我忍着剧痛继续紧握天线杆。人群中又有人叫嚷：“扎坏轮胎，烧死他们。”一名暴徒划着了火柴。情况万分危急，车里的战士更替我着急：“台长，快进车内躲躲吧。”

如果躲进车内，电台、车辆将被暴徒烧毁，战友将被活活烧死，损失更大的是部队与上级失去了联系。我左手扶住天线杆，右手高举冲锋枪，向围观的群众大声疾呼：“现在，北京市已发生了严重

的反革命暴乱。谁破坏军用装备，妨碍我们的公务，我就自卫。请乡亲们迅速离开，防止误伤你们。”

暴徒们被“镇”住了，猫进了人群中，围观群众也纷纷离去。一出“空弹计”解了围，我马上用背包绳固定天线杆，迅速联络。

“嘀哒、嘀哒、嘀哒……”电台又发出了悦耳的声响，象永不消失的浪漫曲。



我不是“娃娃”，我是兵

上等兵 刘兴茂

我今年19岁，当了一年兵，可是个头不争气——才一米六五，还长了个娃娃脸，简直糟透了。老兵们都不叫我大号，整天“娃娃”、“娃娃”地挂在嘴边，拿我开心，叫人好不窝火。我有时偷偷对着小镜子，瞪着自己，心里骂道：你小子也不争气，啥时候才能长得“老梆”一点。

不管什么“娃娃”不“娃娃”的，这次执行戒严任务可叫我给“蘑菇”来了。刚接到命令，连里9个车长，有1对半不同意我去，理由是我年龄太小，兵龄太新，训练时间太短。我可不管那些，你是兵，我也是兵，保卫天安门凭什么不让我去。也不知哪来那么大胆子，我竟冲进连部，连“报告”也没喊，拉着连长胳膊就哭，弄得连长不得不哄住我这个娃娃，把手一挥：“去吧，去吧！”

6月3日傍晚，我们接到命令，立即出发。排长王玉品、二炮手吴敬英、副驾驶员我——刘兴茂三人一辆坦克，“轰”的一声就向北京开去。刚开到北京东郊焦化厂一带，我们的车队就被人群挡住了。我看得好清楚：为首的几个人，手里举着凶器，张牙舞爪地喊着什么。顿时石头、砖块、燃烧瓶蝗虫一样向我们飞来，有的车着火了，有的战友被砸伤了。我的脑袋也鼓起两个鸡蛋大的包，摸一

摸，好疼的！自小在家没受过这样的欺负，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没掉下来，我使劲拧了一下鼻子：“没出息！”突然，我们的车摇摇晃晃地栽到路旁，熄火了。

“咋啦？”我和吴敬英紧张地叫起来。“我受伤了！”排长兼驾驶员王玉品声音微弱地回答。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忙爬到驾驶室去看排长。“天哪！”我吓得捂住了眼睛：王排长的前额有一道三寸多长的大口子，鲜血一个劲儿往外冒。

这时，暴徒们更嚣张了，团团围住了我们的坦克。

救人要紧！

我对吴敬英说：“你快背排长离开，我在这守车！”

“你背着排长离开！”吴敬英比我兵老。

“我学过驾驶！”

“可你还是个娃娃呢！”

刷的一下，我脸红了，我感到全身的血直往头上涌，两只拳头攥得紧紧的，死死盯着吴敬英。“娃娃？”我此时听到这两个字，比暴徒们的石头砸在头上还疼。吴敬英见我动了肝火，就不再争执了，不放心地嘱咐了一句：“多加小心！”背起排长冲出了人群。

吴敬英走后，我感到十分委屈，一个人坐在车里竟“呜呜”地哭起来。心里气乎乎地说，以后谁再说我是娃娃，我就跟谁动真的了。哭够了，我才注意到外边有人在爬我的车。

“就这一辆坦克了，别让它跑了！”

“还有一个，打死他算了！”

人群乱哄哄地喊着，我这才看清楚，偌大一辆坦克，只剩下我一个人了，而整个车队也只剩下我这一辆坦克了。不觉周身一阵

发冷，牙齿不听话地打开架，说实在的，我有点害怕了。我感到太孤独了。这时，有两个穿花格衬衫的青年，坐到坦克顶上，看着我怪笑起来：

“噢，留下个毛娃娃……”接着，又拖着长长的浪腔说，“娃娃，不要犯傻啦，快逃跑吧，再不跑就没命啦！”

我一声不吭，定了定神，攥紧了拳头。我知道，我丢掉坦克逃命，将是一辈子的耻辱，我没有别的路，只有拼了。这时，我想到了死，想到了当烈士，想到部队给我送花圈，写着“刘兴茂同志永垂不朽”，那我将再也不是娃娃了。顿时，我感到力量正从周身向内心聚集，我感到一下子长大了许多，我将与一台价值百万元的铁甲雄狮共存亡。我腾地一下，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吓了两个“花衬衫”一跳。不一会儿，几个趿拉着拖鞋，裸着上身的人，也爬上了坦克。一个揪住我的头发，另外两个从两边撕拉我的耳朵，嘴里喊着：“一、二、——三！”把我从坦克上拖了下去。

“咚”的一下，我的头正撞在路边的石头上，一股腥腥的、咸咸的液体从嘴里流了出来，我想大概是血。那几个又从坦克上跳下来，在我的头上、身上踢个没完，还狠狠地说：

“踢死他，让他去见马克思！”

我抱住脑袋一动不动，心想，这就是“民主斗士”？简直他妈的一群流氓打手。前一个时期，他们打着“清除腐败”、“打倒官倒”的幌子，许多人上了当，连我也有点同情他们，谁知竟是这样一群家伙。

他们打得没意思了，又想破坏我的车。我看到他们从路边搬来一块块石头，去砸潜望镜。我急眼了。潜望镜是坦克的眼睛，如果砸毁了，驾驶员关窗驾驶就成了瞎子，想再开车追赶队伍，就没

门儿啦！我“腾”地从地上跳了起来，冲上去拦腰抱住一个正要砸潜望镜的暴徒，和他滚在一起。车上的几个暴徒见状，“呼啦”一下跳下车向我扑来，一阵雨点般的拳脚过后，又把我扔到10多米远的一个水坑里。我咬着牙，不顾一切地又爬起来，扑在坦克上，用身子护住潜望镜。暴徒们急了：

“你小子是要车不要命的主儿啊，好！那就成全你。”说着，一个戴“哈蚂镜”的家伙，照着我小肚子就踩。

“奶奶的，老子跟你们拼了！”我发疯一样，抄起一块石头就向“哈蚂镜”的脚上砸去。“哎哟，哎哟，”那小子杀猪般地嚎叫起来。我趁势又捡起两块石头，一手一个，“大”字型立在车前，作出一副要“决一死战”的架式。

“给我往死里打！”一声狂叫，几个暴徒举着铁棍、匕首向我扑来，成扇形围住了我。

“别打啦，别打啦，他还是个孩子呢！”几个上了岁数的老奶奶忙上前拦住了他们：“求求你们，别再打他了。”

这时，几个戴着校徽的大学生也从人群中挤过来，推开了暴徒，然后，他们又手拉手围成一堵人墙，把我送进坦克驾驶室里，并在坦克前为我站岗。此时，我望着这些好人只是哭，说不出话来。是人民群众救了我我的车啊！

上车后，我关紧车门，一处处察看车辆有没有受损和故障。什么仪表板、配电板、指示灯、水路、电路、油路，尤其是那操纵杆，我扳了又扳，看了又看，唯恐有了差错。这可是方向啊，它要失灵，一切都完了。里边检查完了，我又到外边检查，一切都好。我放心了。我不能待在这里，我要追赶队伍，去执行戒严任务。可是，要开到天安门，水不太够了。

想到水，我才感到嗓子干得要命。当时，我已经十几个小时滴水未沾、点食未进了。饿还好忍，渴却真叫人受不了。

排长受伤撤离时，我把食品饮料都一古脑地塞给了他们。现在唯一的“生命线”就是一壶水了。

坦克也缺水！这铁家伙，不是感情动物，万一到不了广场就用完了，它可不象人能忍得住呀。“呵，老伙计；还是让给你喝吧，喝了可得好好地给我干啊。”我自言自语地把水壶里的水倒香油似的倒进水箱里。好像还是不太够，我按了按肚子，行！有泡尿。对不起啦，是水就行。我用饭盒接着，又给坦克加进些“饮料”。

一切准备停当，我悄悄地打开驾驶窗，轻声地告诉为我站岗的大学生：

“告诉大家，闪开点。”

大学生们会意，又拉起人墙。

我把脚放在油门上，一踏到底，用了平时发动车时几倍的油量，迅速地扭动起动开关。坦克“轰”的一声，轰隆隆地响起来，冒出滚滚浓烟，那些歹徒不明白我搞什么名堂，急忙往两边躲闪。我趁机起车，加油，还未等他们明白过来，车早已爬上公路，冲出百米之外了。

我心说，“拜拜”了。

此时，已过午夜，天黑得象锅底，不少路灯被暴徒们破坏了。天黑，路不熟，我这个只训练过三个摩托小时的新兵，开着这36吨的庞然大物，行进了20多华里，还捏着一把冷汗呢。由于我个头小，踩油门、制动都困难，我就把随车带的小马扎和背包都垫在屁股底下，伸长了脚死死踩着油门，两只眼一眨不眨地搜索着前方。

车刚拐个弯，迎面遇到个“丁”字路口。见鬼！我真有点“刘禅

姥进大观园”了。

“管它呢，走吧！”我沿着一条较宽的马路，加足了油。

谁知约摸走了两分钟，却又回到了原地。我伸长脖子仔细一瞧，噢，原来是一座圆形立交桥。

娘的，费了半天劲，却让这个“大王八”开了个玩笑。见到这里很静，也没有人影，我就把车停下来，打开车窗，脱下了湿漉漉的军装，只穿着裤头和背心。我琢磨：两条路，一条错了，另一条准对。“走喽！”我连连打了几个响指，挂上档，冲下了立交桥。

真来劲！凉风吹着，树枝晃着，宽宽的路上只有我和我心爱的铁骑，我在庆幸，谁说我“毛嫩”，谁说我“不知坦克有几条腿”，通通见鬼去吧。我故意“呼呼”地踏着油门，坦克象挨了鞭子的牛，飞快地向前蹿去，多神气哟！

平时不苦练，战时难过硬。别看我才经过3个摩托小时的训练，但是，我除了吃饭一直没日没夜地泡在坦克里，每天都要练个够，捣鼓个够。有时，为了弄懂一个问题，半夜12点，还把连里的“百事通”拽起来请教，顶多上根烟抽呗。他们把我当娃娃，我把坦克当娃娃，平时可疼它了，这不，关键时刻，它也挺给我作劲的。

正走着，突然我发现前面有一排黑压压的东西。打开大灯一看，两台簇新的公共汽车，象两条卧龙拦住了去路。我想，不能撞，留着它还得为人民服务呢。我两边一看：左是砖垛，右是小树，权衡一下，这几棵小树价值不足百元吧，就让它“发扬点风格”吧！

绕过公共汽车，再往前走，渐渐变得明亮起来。远远望去，西边有一条长长的火龙，染红了半个天空。附近影影绰绰还有人群。车开近了，才看清那火龙是一辆辆燃烧的军车，一些歹徒正举着火把抢东西。

我顿时紧张起来，加足了马力。

见有坦克开来，一伙人迅速聚拢，在前头堵截；一伙人在后边紧追不舍，嘴里喊着：“缴车不杀！”想随时攀上坦克。

我也长了个心眼：不停地推拉操纵杆，作曲线运动，气得他们“嗷嗷”乱叫，到底也没能爬上坦克。

我的车继续前进，路障、火障、车障……我数了数，一共13关，我比关云长还厉害呐！

4日凌晨5时半左右，经过9小时的单骑追队，我终于开到天安门广场，与大队铁骑汇合了。

打这以后，连里都不叫我“娃娃”了，连比我大十几岁的老志愿兵见了我都挑起了大拇指：

“象个兵样，有种！”

（石国本 整理）



奇速用兵太阳宫

大校参谋长 杨福臣

说实在的，那天部队拉出去，我的心一直在半空悬着。我最担心的是部队不能按时到达指定位置怎么办？

本来接到军区前指按清理天安门广场方案立即行动的命令以后，我们的想法都很明确，那就是：兵贵神速。只有行动快，才有可能按时到位。具体地说，一是动作要快；二要隐蔽，尽量不要过早地被发现。为了实现快，我们先是要求部队提前做好准备，保证一声令下，能立即出动。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简化了指挥程序。接到军区前指的命令后，我们没有按部就班，而是把军区前指的命令和集团军行动方案融合到一块，仅用5分钟给先头团明确了任务。然后用了20分钟给所有部队下达了命令，提出了具体要求。先头团在20分钟后全团就开出去了。整个集团军所属的5个团，一个旅，在一个小时30分钟内全部拉出驻地。这个速度可以说是相当快的。

另外就是隐蔽。行动前，我们预想到部队进入市区，可能受阻，所以事先勘察好了3条机动干线，2条机动支线，10条迂回路，20个重点目标，6个重点地区和9个依托点。这次行动一开始，我们就按照事先侦察好的路线避开主要公路，选择村镇道路，多路隐

蔽开进，做到出其不意，争取了主动。但是部队一进入主要干线，仍遭到了数万不明真相的群众和所设路障的堵截。结果除先头团一个营的兵力抢先开到距我们执行戒严任务的东直门桥 60 米处以外，其余部队全部受阻，被围得水泄不通。

当时的时间是 6 月 3 日晚 20 时左右。我按军分层次交替指挥的方案，前出到太阳宫实施指挥。部队受阻与群众搅在一起，通信工具也被砸坏了，无法进行联络。为了摸清情况，我只好派出两名参谋，化装成市民，到前面去侦察。两名参谋回来报告说：“部队全在大路上被堵住了，人山人海，根本没法前进。”于是我就指挥部队采取反复宣传、劝说、绕行突围，但由于人太多，都没有效果，部队仍不能前进一步。这时已经有许多车辆被砸，人员被打伤了。我想这不糟了吗？这样僵持下去，部队怎么能到位？到不了位，部队怎么能完成上级交给的配合天安门广场清场的任务呢？

“得想个办法。”我说。正在百思不得其策的情况下，恰好这时上级下达了可以对空鸣枪示警的指示。军里研究决定组织接应部队，帮助受阻部队解围。当时我在太阳宫恰好有一个旅，这里距部队受阻位置很近。当时我就提出使用这个旅，军长同意了我的意见。于是我组织了 180 人，分乘 9 台大型牵引奔驰车，带上信号枪、冲锋枪和烟幕罐等装备。并研究了具体行动方案。

当时，我想：上级鸣枪示警的命令是下达了，但这是一场特殊的任务，不同以往我曾参加过抗美援朝的战斗，那时没有这么多说道，敌人来了就打，使劲往死里打，那是对付敌人。可这次情况就复杂了，一旦开枪误伤了群众怎么办？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不是儿戏。要是鸣枪群众不散，部队又到不了位，又怎么办？必须想一个既不误伤群众，又能使部队按时到位的良策才行。为此，我

进一步分析了围堵人群的情况,认为不明真相的群众是多数,暴徒是少数。只有大力宣传,采取猛烈突然的行动,造成巨大的威慑力,才能避免或减少伤亡。

于是,我就给接应分队提出了“一定要先广播,大造声势,不行就集火对空鸣枪,要突然猛烈,造成一股锐不可挡的威慑力”的要求。

这时带领接应分队的旅参谋长王建平同志又问:

“鸣枪后群众不散怎么办?”

这真叫哪壶不开提哪壶,其实这也是我最担心的问题。但我想,今晚部队必须到位,这是命令。

“那就朝地下打。”我咬咬牙,说,“但无论如何不能对人群开枪。”

“是,坚决执行命令。”王参谋长脚跟一磕,大声说。

命令是下了,我还是坐不安,站不宁。恰好这时我派出去的军先遣指挥组的刘处长听说我前出到了太阳宫,于是主动赶来跟我联系。我看他走的时候穿的是板板正正的军装,这会儿已经被不得体的便衣代替了。他浑身是汗,见我就说:“部队受阻了。”我说:“我知道了,我已经组织了接应部队,上级命令可以对空鸣枪,你赶快回去告诉受阻部队,做好准备,搞好协同,听到枪声,马上突围,一定按时到位,鸣枪时一定要注意别误伤群众。”

“是。”刘处长转身跨上自行车就走了。

接应部队开上去了,还不错,9台进口奔驰车,一齐呼叫,32支冲锋枪,一起对空点射,围堵的人一下子就吓得散开了,部队突围成功了。听到消息,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这时的时间是4日的3时10分。军长从后面指挥所赶到前面来了。我向军长报告,

部队突围已经成功，全部到位。军长说：“走！到指挥所去。”我说：“等接应部队回来护送一下吧，这样安全些。”军长说：“来不及了，咱们得赶快到位。”……

我们走隐蔽路，一口气赶到和平街北口。不料，兄弟部队有一个连的兵力在这里被堵住了。我看前面有个大客车横在路上，整个路口全是人，走在前面的方副部长车上的警笛一叫，人群闪开了，可是军长和我的车暴露了。我听见有人喊：“是军车，还是大官。”

“推翻它！”有人叫。人群呼啦一下涌上来，我觉得“山猫”车突然象海面上的船一样，左右摇晃起来，一下比一下晃得厉害，眼看要翻了。前面军长的车也被掀得直晃悠，情况非常危急。我说：“对空鸣枪！”一听到我的命令，警卫员把车窗摇下来，从车里伸出冲锋枪，向空中打了一个点射。这小家伙长得很文静，平时见人总是笑眯眯的，可是关键时刻还是很麻利的。枪一响，掀车的人“哗”地一下吓跑了。这时砖头、汽水瓶纷纷飞过来，“咚咚”地砸在车厢上，军长和我的车上的挡风玻璃都被砸碎了。到了海运仓军指挥所，我们向上级报告了部队到位情况。被砸的车开不出去了，因为当时一出去，肯定还得被砸。我们只好骑自行车到部队了解情况，掌握部队。

向共和国保证

大校师长 张作礼

从69年我带侦察连去珍宝岛执行任务到现在,算起来已经过去20年了。岁月总喜欢在人的额头上刻下年轮。20年间,我迎接了一批又一批的士兵,就象迎接一次又一次的日出一样,心里头总是带着那么一股子新鲜的感情。一年一年,我带着这些年轻的士兵去进行演习拉练、国防施工、抗洪抢险,去执行各种复杂危险的任务,那数不清的惊险回忆经常在晚上临睡前的那一刻,电影镜头般地从眼前掠过去。军人呵,我常琢磨着,你得有副硬肩头,得有副蜕去了几层皮磨出了厚茧的肩头,因为有时需要你的肩头担负起共和国赋予的重任,就是说,整个共和国都擦在你的肩上。

说起6月3日那天,我们的任务是控制住朝阳门、建国门立交桥和二环以东、三环以西路段,配合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想起数天前,部队向北京开进时,在华北某城的那次受堵,我们全师每个干部都意识到6月3日的行动决不是件轻松的事儿。所以在前几天里,我们组织部队对全师所有的车辆都检查保养了一遍,培训驾驶员在开进中对几种情况的紧急处置能力。我又带着师、团机关的领导们3次深入城区勘察路线,要人人都成为活地图,指挥员更是如此。并制定了几套开进方案。然而,仅仅这些是不够的,我似

乎模糊地感到了什么。

那几天的北京城，就象一场大暴雨和大地震前的天空，骚动不安，时时向人传达着某种神秘的暗示。我周身充溢着一种奇特的感觉：既有受领任务的兴奋感，又有隐隐的不安，说没有不安那是假话。5日18时，部队奉命分两路由集结地域向北京市区开进了。我将通常首脑机关中路跟进的做法改为前卫跟进，便于先期到达对部队实施有效的组织指挥。一旦受阻，也便于临机处置。又将纪律作风硬的“红军团”作为先锋团。在后续团队里也安排了一名进城勘察过路线的师机关干部，保证部队一旦被分割，也能有效地进行指挥和组织。

我们出发了。我与政委同乘在一辆车里，我们没有说话，各自的心里都在翻江倒海：部队能否顺利到位？出现意外，部队长能否掌握住战士的情绪？这是一次特殊的行动，一次前所未有的行动。对每一个士兵包括我自己都无疑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车队骤然加速，一辆连一辆的军车宛如一股绿色的旋风，首先从气势上压倒对方。当一些暴徒醒悟过来，哩啦哇啦地煽动人群拦阻时，先头部队已冲了过去。于是，一些家伙跳上摩托车想赶到前面设卡地点报信，先头部队已闪电般地到达了指定位置。

第一个回合，赢得很是漂亮。

然而后续部队受阻。

这时，天渐渐黑下来，道路上的人却越聚越多，暴徒们也越来越疯狂。他们叫嚷着，有人已向中南海、新华门发起冲击；打军人烧军车的行动也已经开始。凭着军人的本能，我觉到了肩头担负的分量。

我下了车，环视了一遍四周，见我的部下们都目光炯炯地站在

我面前，什么都不用说了，不用做动员，不用喊口号，彼此间都触摸到了那一颗颗惴惴急跳的心。

我与政委碰了碰头，5分钟内定下了决心：寻找受阻部队，选择迂回路线，组织开进。当下，组成了4个侦察组。我亲自率1个小组绕小路出去，7次进出受阻路段，发现双井、劲松地区，暴徒破坏了我两个团队30多辆汽车，并将1辆指挥车掀翻作路障。

士兵们在哪里？

一片叫嚷声，一片攒动的人群汇成的海。

隔着厚厚的制服军装，我仍听得见自己的心跳，感觉到血液在皮下急促地流淌。

这些小伙子们，这些小伙子才和我的孩子同样大，是一些刚刚离开母亲身边的小鸟，翅膀长硬实了吗？能经得住这急风骤雨吗？

我攥紧了拳头。我垂下了头。

我迅速作了几点指示，并派两名同志组织受阻部队强行开进，不许丢掉一兵一卒。

这时，建国门立交桥上的先头部队正在遭受六、七万人的围攻。人流涌向卡车上的士兵。洪水冲向那一块仅存的陆地。世界摇摇欲坠，世界瞬间浓缩到了这小小的卡车上。也许，这是我的世界。

侮辱谩骂者，造谣煽动者，更有趁机打、砸、抢、烧者。人们啊，你们的良知呢？你们的那颗仁爱之心呢？难道这些士兵不是同大学生一样是希望和未来吗？北京！北京！人们呵，你们知道吗？我们的士兵是怎样地贴近她，用心去拥住她，就象在梦中拥住太阳和妈妈一样。从营房开进时，在火车上，几乎每个士兵都把信纸铺在膝头上，认认真真地写着：“我要去北京了。”北京就是士兵心中

的丰碑。珍宝岛零下30多度的雪窝里，我与战友们连续潜伏了7天7夜，那时候，心里头想着什么呢？渴了冷了，想想北京，就好比抽了一口东北叶子烟。喝了一口老白干，什么都顶过去了。如今，20年过去了，20年岁月，弹指一挥间。

夜里1时左右，一辆开往天安门广场的装甲车行进到建国门桥上，为了躲避人群阻拦，避免撞伤群众，不慎将暴徒推作路障的我某连1辆卡车刮翻。顿时，少数坏人大造谣言，说：“你们被某军包围了，快起义吧！”一时间，队伍象脱了缰的马，有的战士甚至痛哭喊叫起来。我意识到，如不迅速控制局势，稳定情绪，部队就很难坚守住建国门桥，一旦这里失守，等于打开了天安门广场的东大门，必将直接危及到广场的清场行动。我当即与政委、主任秘密碰头，调整了行动方案，并分头行动。那时，桥上到处是混乱的人群，散开的军队，到处是喊声。我握着对讲器，我真想将自己的心也握在手里，直到攥出血来。

这正是暴徒们需要的场面。多少天来他们不是一直这样期望的吗？我感到自己在这场角逐中只剩下了最后一着棋，这着走败，必将输得一塌糊涂。我向急速赶来的团干部们下达了命令，并说：“不要纠缠我们自己部队的得与失，我们是军人！是军人就得为全局着想！全局！懂吗？这是大于一切、重于一切、高于一切的！”暗夜里，我似乎看到自己的眼睛冒着火。

4日凌晨4时半，天安门广场清场开始。在路灯熄灭的瞬间，围观的人群正在发愣时，部队迅速按计划行动，仅用5分钟时间，部队调整完毕。全面控制了建国门立交桥的交通要道，将万余人拦阻在立交桥外侧。

推倒“女神”像

中尉连长 张东旭

6月4日凌晨2点6分我们到达广场西侧，向前没走多远，在朦朦胧胧的灯光中就看到了那个所谓“民主女神”像。她象个幽灵似的，矗立在一片帐篷堆里。

去年国庆节，我带小女儿来过广场。这里曾是一片花的海洋，两条金龙在花海中腾空欲飞，那天我们拍了好多照片，其中有一张，我就站在那个摆放女神像的地方。

一些战士在议论：

“那大概就是女神像吧？”

“我还以为是西游记里的观音菩萨呢！”

“啧，原来是这个样子……”

“……”

我们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前停下，面向广场，准备执行清场任务。

广场上空不停地回响着劝说学生退场的通告。人群慌乱地涌动。“女神”像仿佛也和广场上学生一样，彷徨中带着恐慌。

这个洋玩意，我们在几天前就从报纸和广播里听说了。她竖起来后，那些崇拜者们仿佛有了精神支柱。扬言谁要破坏她，将不

惜付出鲜血和生命！

凌晨4时许，团政治处主任王剑和教导员冯书静来到我们连。王主任严肃地对我说：“团里奉命派人推倒女神像，这个女神像是‘高自联’的一面旗帜，他们不是要和女神共存亡吗？咱们推倒她，摧毁他们的精神支柱！”

“我们商量准备让你们五连去；五连是英雄连队，你们老连长在天安门广场还讲过话呢。所以，这个任务交给你们最合适不过了！”教导员在旁边插话。

王主任又说：“现在广场很乱，你们要机灵点儿，快去快回，推倒女神像，把它的头带回来！算你们完成任务。”

我听主任讲完，心里十分兴奋，两脚跟使劲一并，“啪”敬了个礼，说：“坚决完成任务！主任，你放心吧！”

经过短时间的准备，4时11分，我率领由8名精明强干的战士组成的小组，携带冲锋枪和木棒，成一路纵队由东向西进入天安门广场，在距国旗旗杆3米远的栏杆前停住。

这时，广场的情形看得更清楚了，守卫在旗杆旁的两名武警战士，目视前方，对广场上的喧闹没有丝毫的畏惧。女神像下围着一群人，吵吵嚷嚷的，发现我们在向他们张望，立即有几个人跑过来，一个戴眼镜的青年人手里挥着铁棍问道：“你们干什么？想破坏‘女神’像吗？”其他几个人跟着喊：“解放军，回去吧！”“人民军队不打人民！”

等他们喊完，我大声说：“同学们，请你们马上离开女神像，撤出广场。这个女神像是违法建筑，有碍广场的神圣和庄严，现在我们奉命拆除！”

话音未落，一块砖头飞过来，落在我脚前。“混蛋，不象话！”

我心里骂了一句，真想抓起砖头回击他们，但又忍住了。

正要继续向他们喊话，突然广场上的灯一下子熄灭了，“女神”像下的学生“呼啦”一声跑散，四处乱窜，混乱中一个嘶哑的嗓子大叫：“不要跑，我们被军队包围了，四面都架着机枪呢！出不去了，反正是死，大伙一块儿死吧！”接着，“咚”的一声，一块砖头砸在旁边一个战士的钢盔上。“连长，我去把那个小子抓来！”挨砸的战士气坏了，一拉枪栓就要往上冲。

“别乱来！”我一把抓住他，继续喊，“请你们快走，我们不打大学生，我们不开枪！”

乱挤乱跑的学生这才纷纷涌向纪念碑方向，可我觉得“女神”像底座上还有个人还没有下来。刚才亮灯时，我看见底座上堆满了花篮，花圈，在这花丛中，有一个带眼镜的学生，低着头，好象在本子上写什么东西，身边放着手提包。现在灯灭了，他还在上面干什么？他的手提包！会不会要搞爆炸？想到此，我紧张起来，必须尽快赶走他。我立即下令：“夏卫国，你带5个人推女神像，我和王家明、赵建军警戒，动作要快！”接着大喊一声：“上！”战士们如猛虎一般，越过栏杆向“女神”像扑去。

“快离开，要不然，我们就不客气了！”大家边跑边喊，把枪栓拉得“哗哗”响。其实枪膛里根本就没有子弹，因为怕误伤学生和群众，出发时没发弹药，只不过是吓唬一下。

突然，女神像白光一闪。跑在前面的两名战士迅速卧倒，原来是三个人在照像。

“不许照像！”

“抓住神像上面的那个小子！”战士们吼叫着，冲上前去。那三个人吓得双手乱摆，把底座上的那个人拖下来，拎着提包，飞也

似的跑了。

夏卫国、杨殿洪、张洪义、霍文平很快跃上两米多高的底座，绕到神像的后侧，用力猛推。但神像摇晃了几下，没有倒。

我听见夏卫国在上面喊：“连长，这里面有两根钢管，胳膊那么粗，跟底座连着呢！”

“再上去两个，不行就拆底座！”

张吉年、刘庆方听见我喊，也爬上了底座协助他们推女神像。赵建军、王家明也赶过去，用杠子撬，拆去底座的木板。

远处的一伙人见只有我一个警戒，象疯子一样窜过来。还没等他们靠近，我大吼一声：“闪开，找死吗！”一拉枪栓走过去。见我这个架式，他们如惊弓之鸟，慌忙跑走了。

接着“一、二、三”、“轰”的一声。我回头一看，那神像头朝地，背朝天从底座上栽了下来。

“女神倒啦，女神像完蛋啦！”

战士们欢呼雀跃。一名战士从底座上跳下来，就地打了个滚儿，冲上去摘“女神”脑袋，拽了几下没动静，气得踹了两脚。

我用铁棍砸了几下，震得手生疼。这才发现，神像的脑袋用三根钢筋连着呢！我仔细一看，神像的脑袋已经摔得面目全非，干脆把火炬带回去吧。于是，几个人七手八脚的砸下了火炬。

正在这时，广场上华灯重放，清场开始了。学生们见“神像”倒地，大势已去，正纷纷向东南方向撤走。随后，装甲车开过来，把那被推倒在地的女神像连同底座压得粉碎。

（张富春 整理）

清场前的谈判

上校团政委 季新国

一辆乳白色的面包车，象喝了酒的醉汉，东绕西穿地穿过人群，从广场南面慌慌张张地向北驶来。

正在广场北侧集结待命的战士们大声喊道：“面包车，快瞧！过来一辆面包车。”

这时团长赫飞也发现了驶来的面包车，忙对身边的几个战士说：“快！截住它，别让它跑了。”

几个战士拿枪和防暴用的棍子，指着驶来的面包车，大声叫道：“别过来，赶快回去！”

面包车“吱”地一声，急刹住了，而后又慌张掉头，顺原道往回开。大概是车上的人发现并没有人开枪和追赶，车子很快停了下来。

此时，正是6月4日凌晨两点三十分。戒严部队的官兵经过艰难的开进，陆续到达东西长安街和广场周围的集结地点待命，准备清理天安门广场。

很多围观的群众看到这个阵势，在喇叭里听到了广播的北京市政府、戒严指挥部的通告，有的夺路而去，有的混在学生中，围聚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

面包车在离我团集结地点 50 多米的地方停下后，远远地看到从车上下来四个人，他们都高举着双手向我们这边走来，其中一个边走边喊：“别开枪！你们别开枪！！我是侯德健！！！”

赫团长和王主任带着警卫人员走过去。一个警卫员拿着手电筒照了一下戴眼镜的人，旁边的一个忙指被照的人介绍说：“他是侯德健！”

我闻声走上前去，只见被称为侯德健的人，将右手按在胸前，慢条斯理地说：“我是侯德健。”

听说来人是侯德健，不少战士纷纷围上来，都想看看这个以一曲《龙的传人》而轰动艺坛的歌星。

我细细地看了看侯德健，他瘦瘦的，穿着茄克衫、牛仔裤，戴着眼镜，留着长发，港味挺足，手里还提着一个大塑料兜。但是，我怎么看，也没有在电视上看他唱《龙的传人》时那么顺眼。

和侯德健一起来的另外三个人，象是医护人员，他们穿着白大褂，胸前还印有红色“协和医院”的字样。

有一个战士从人群外挤到侯德健的面前，有些不明白地说：“侯德健怎么跑这儿来了？”

另一个拿手电筒的战士，又用电筒在侯德健脸上晃了一下。

侯德健用手推了推眼镜，眨巴了几下眼，显得很窘迫，没有回答那个战士的问话。团长对围观的战士们说：“你们都回去，别在这儿瞎嚷嚷。”

我和主任王剑走到侯德健跟前。

经过一番询问，知道侯德健是来广场的“四人绝食团”成员之一。他看广场周围布满了部队便被推为什么学生代表，来找戒严部队领导了解一下情况。

赫团长立即前往师指挥部，向师首长做了报告。

我看了看广场上的情况，发现多数学生和群众都很惊恐和慌乱。隐隐约约可以听到“当兵的要血洗广场，我们要血战到底”之类的煽动，整个广场象开锅的饺子，拥挤翻腾起来。

侯德健赶紧解释：“你们可别误会，我们是想和平撤离广场的。”

王剑主任接话说：“你们早就该撤离了。”

“是的，是的，我们正准备撤。”侯德健连忙说。

王主任看了我一眼，将两只胳膊交叉抱在胸前，故意一字一顿地说：“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你们再不撤，我们就不客气了！”

侯德健也不知道“不客气”的分量轻重，说：“撤，我们这就撤！”

一个战士在旁边插嘴说：“说走，你现在就走啊。”

也许是侯德健看到我们对他还比较客气，心里大概轻松了一些，他说：“我一拍屁股就走，可广场上还有几千名学生，不大合适。”他又对我说，“广场上好多学生现在都想撤，可都有顾虑，想让你们给指一条撤退的路。”

正说时，赫团长带着刘师长，还有戒严指挥部的顾副处长，一同来到我们团集结地点。刘师长和顾副处长听了我们汇报后，建议团里派一名领导到金水桥上，向军区领导和戒严部队指挥部请示汇报。我和团长、主任商量谁去汇报时，刘师长点了名：“老季去！”

我随师首长立即到了金水桥上，向上级首长做了全面的汇报，并说明，侯德健表示愿意做学生的撤离工作。

军区首长指示：“他们自动撤，我们欢迎！”

然后，军首长说：“让他们向东南方向走。”

根据上级首长的指示精神，我和同去的顾副处长迅速返回到团集结地点，经过研究，决定由我和侯德健谈话。

在原地等我们回话的侯德健，见我们回来，忙迎上来，一边用手帕擦着满脸的汗，一边急切地问道：“让我们从哪儿撤？”

我告诉侯德健：“刚才，我请示了戒严指挥部，欢迎你们自动离开广场，你们可以从东南角走，请你回去，马上告诉他们。”

侯德健连忙说：“可以，可以。”

“你向学生们讲清楚，我们真诚地希望他们和平地离开广场，不要再听信一些人的谣言，抱有什么幻想了。”我说。

侯德健听完，原来紧张的神态，有些放松下来，但随即又问：“你敢保证不向学生开枪？”

我立即回答：“戒严部队来首都都是为了维持秩序的，决不会向学生开枪。”

侯德健从茄克衫里掏出纸和笔，将我告诉他的话记了下来。

侯德健回到纪念碑下，不一会我就听到从“高自联”的喇叭里传来他的讲话。断断续续地听到他说什么“精英”、“胜利”之类的话。

侯德健讲完话，戒严指挥部也用喇叭反复通知：我们同意同学们和平撤离广场的呼吁，请同学们从广场东南方向撤离。

这时，从纪念碑下传来一个男人声嘶力竭的声音：“……我们不能撤……谁撤……谁是叛徒！”

凌晨四点，在广播一遍又一遍播送北京市政府、戒严指挥部的通告后，还有几千人围聚在纪念碑周围。四点一刻，广场上停了电，纪念碑周围骚乱起来。

我和王剑带着警卫员，悄悄地向纪念碑靠近，想摸摸学生们的情况，警卫员阻拦我，不让我靠近人群。我就在一处能进能退的地方，悄悄地观察了一会。侯德健和一个人从纪念碑边走来，见到我后，有些沮丧地说：“刚才，我在广场里讲话，你都听到了吧？”

我说：“听到了一些。”

侯德健说：“他们大多数人都同意撤，也有人反对，骂我是叛徒！”

我问：“怎么还不见有人撤？”

侯德健说：“现在同学们意见不统一，有的还有顾虑，怕你们乘撤退时开枪。”

这时，戒严指挥部恰好又广播通知：“我们同意同学们和平撤离广场的呼吁，欢迎你们自动离开广场。”

我说：“你听到了吧？”

“听到了，听到了。”侯德健双手合十，向我拱了拱，“请你让广播再多播几遍。”

“这可以。”我大声地说，“请你回去转告同学们，不要再拖延时间啦。”

王主任在边上插话说：“越快越好。”

“那……请你给我一点时间，我回去再和他们说说。”侯德建又急匆匆地跑回纪念碑下混乱的人群中。

纪念碑周围响起了一片嘈杂的喊叫声，有人在喊“撤离……”有人在喊“坚持……”声音既杂又乱，嗡嗡的，我也没有听清是喊“撤离”的声音大，还是喊“坚持”的声音大。但是不多久，我就看到那些自称为青年中的“精英”和非法组织“高自联”的“勇士”们，打着他们自己制作的旗帜，夹在人群中，按照戒严部队指定的通道，

撤离了天安门广场。

(金凤山 苏学文 整理)



红墙外的较量

上校团长 罗 刚

6月4日凌晨5时18分，我带领部分坦克和所属的特种履带车辆，历时4个多小时的艰难开进，撞开了10余道路障，提前20多分钟由东长安街进入上级指定的位置——天安门广场。此时天安门广场已清场完毕，由戒严部队控制。

5时20分，上级命令我带领部分坦克立即前去驱散正在冲击围攻新华门的歹徒及不明真相的群众、学生，以保证中南海的绝对安全。军令如山，责任重大，我立即向部队传达了上级的命令并作了简要的动员，迅速按团的部署，八辆坦克一字排列，共4排向西长安街并驾齐驱，以形成威慑力。

坦克刚行进约2华里，就遭到了一些暴徒的拼命抵抗。在他们的煽动下，10多米的路面上已横躺了几百名学生和群众，以阻止坦克前进。100米、50米、30米，坦克离“人障”越来越近了，速度不得不降下来。怎么办？当时如果停车，慢慢作疏导工作，就无法解救新华门，但继续开进，又会误伤大批群众和学生。这时我坐在指挥车里，头上直冒汗，电台不时传来“新华门告急！”“中南海告急！”的呼叫，时间一分一秒也不能拖延了，我命令：迅速采取1、2、3号方案。首先用广播器劝说，3分钟过去了——无效；对天

鸣枪示警，3分钟又过去了——仍然无效，而且部分歹徒借机开始向我车投掷燃烧瓶，企图烧车。迫不得已我只得命令施放少量催泪弹。刚投出去两颗催泪弹就有了反应，躺在地上的不少人还没弄清扔出来的是什么就慌忙爬起来向两边跑去。我抓住这个有利时机立即命令部队缓慢向新华门推进，一定避免误伤群众和学生。车队慢慢地向前拱着人群，在催泪弹的配合下，经过30分钟将新华门前的人群全部驱逐到电报大楼以西，然后将坦克在新华门前一字排开，并在六部口设卡镇守，终于解除了对中南海的威胁。此时是6月4日晨7时25分。在整个驱逐过程中，我的部下没有向人群开一枪，也没有轧伤轧死一个人。

上午8时，一些暴徒又纠集了近万人，聚集在六部口设卡的坦克前，以“解放军血洗天安门广场”的谣言来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和学生，寻机再次挑起事端。在一些暴徒的怂恿下，砖头、石块、啤酒瓶雨点般地向我们车队袭来，暴徒们扬言要烧掉所有的坦克。这时各车向我告急，“团长，我车炮手头部负重伤”、“团长，我车潜望镜被砸碎”、“团长，歹徒要烧我们车”！此时我明白，部下的忍耐、克制已达到了极限，他们要求自卫了。一场严重的流血事件迫在眉睫，怎么办？我在问自己：是听凭暴徒杀伤部下，烧毁车辆；还是允许官兵开枪自卫，由我承担误伤群众的责任？我的心里斗争十分激烈，我在努力寻找这两者之间的间隙——第三条路。8时40分，我决定带着几个干部下车，到六部口的最“前沿”与群众“舌战”。尽管大家都担心我的安全，但我认为这是唯一能选择的办法。

“我是这个梯队的负责人，是刚从天安门广场过来的，‘血洗天安门广场’纯属谣言，请大家不要上当受骗被人利用。我们是人

民的军队，武器是我们第二生命，你们要烧坦克、抢武器，这是绝对不容许的。我们只是奉命执行戒严任务，你们要冷静、理智，千万别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来。”听了我的这番话，大概还有我这北京人纯正的“京腔”，一些群众开始交头接耳，情绪有些缓和了。就在这时，几个歹徒从后面抬出一具尸体来，声称此人是刚在天安门广场被坦克压死的，是“血洗天安门”的“罪证”。人群的情绪又一次激愤起来，我和副团长贾振禄上前仔细查看了这具年轻男性的尸体，然后我指着尸体说：“大家看一看，这具尸体是完整的，但是已经腐烂，而我们进入广场还不到6个小时，尸体会腐烂吗？再说一辆坦克36吨，压得人早成肉饼了，还能这样完整吗？”许多群众听了我的反驳，再看看尸体，没话说了，都纷纷离去。暴徒们见弄巧成拙，便气急败坏地叫喊起来：“别听他的，打死这个当官的！”随着叫喊声有少数人开始向我们拥来。副团长贾振禄见状毫不退缩，理直气壮地向前迎去，大声喝道：“谁要想和军人较量就站出来！我们是执行任务的，就是打死我们，部队也不会因此而撤退，放弃戒严。再这样对峙下去，你们当中的好人只能成为坏人的牺牲品。大家想一想，我说得对不对？……”整整2个多小时的“舌战”终于使对立情绪得到了缓解。部分群众和学生开始主动地维持秩序，并为我们的坦克车队站岗。上午11时，六部口一带的秩序基本恢复了正常。

天线,在历史博物馆上升起

上尉 唐 成

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我和营长张言华、班长张树文,相约来到天安门城楼,站在这用我们忠诚的热血捍卫的地方,心情无比激动,眼望坐落在广场东侧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不禁使我回想起那难忘的一天。

6月4日凌晨,我所在的通信团,经过一整夜的艰难开进,大家以“誓与装备共存亡”的决心,冲破暴徒的多次围攻、堵截,没毁一台车,没损一部电台,没丢一枪一弹,终于按时到达天安门广场。

我们在历史博物馆门前下了车,举目望去,昔日在我们心中无比神圣的广场,此刻垃圾遍地,一片狼藉。我们顾不上仔细看看雄伟的天安门城楼,瞧一瞧高高的英雄纪念碑,就开始了紧张的通信联络工作。在团长指挥下,我们所有的通信器材全用上了,400瓦电台开机了,150瓦电台开机了,10瓦电台也用上了,电话车也开始工作了。但是,在周围高大建筑物的笼罩之下,广场犹如一个盆地,无线电波发射不出去,通信联络出现了“死角”。一分钟、二分钟……十分钟过去了,报话员的嗓子喊哑了,与城外的部队和集团军前指还没有联系上。怎么办?时间刻不容缓。这时,只见团长与作训参谋王立元,营长张言华,围着一张地图蹲在地上仔细研

究，唐团长手里拿着一只红蓝铅笔在地图上比划着。唐团长是个四川人，个头不高，与略瘦的体型十分相称，宽宽的额头下一双大眼睛，明亮有神，头发总是梳理得整整齐齐，给人一种机敏干练的印象。他在团、师、军三级机关担任过通信参谋、当过通信营长、通信科长，通信专业技术在同行中是有口皆碑的，过去拉练、演习中什么难题都没有难倒过他。可是今天毕竟是在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地形上，进行一场特殊的斗争。面对高楼林立的现代化都市，通信能否顺畅，大家心里都没有底。我的心紧张地怦怦直跳，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忽然，团长手里那支笔停住了，崑钉截铁地往下点了一点，舒展开紧锁的眉头，望着眼前的历史博物馆，立起身，一挥挥手，果断地下达命令：“上去，开设接力站！”在他身边的张营长和王参谋自告奋勇地接受了这一任务。

这时，在博物馆北侧的东长安街上的南池子附近，一伙暴徒正煽动上千人，向天安门广场反扑，一次次向执勤部队冲击。叫骂声，砖石的打击声，燃烧瓶的爆炸声，还有哨兵示警的枪声响成一片。这些告诉我们，这个时候要到楼顶上去是非常危险的。团长关心地嘱咐：“注意隐蔽，保证安全。”他俩点点头回答：“团长，放心吧！”随后向我们早已等候在旁的接力员一挥挥手：“走！”我和班长张树文、还有与我同年入伍的杨耀东，背着接力机和接力天线，紧跟在后面朝博物馆跑去。我们顺着楼梯很快上到了博物馆四楼，再往上就是一条很窄的通道，用铁板焊起来的梯子摇摇晃晃，里面没有一丝光亮，伸手不见五指。营长和王参谋走在前面带路，班长压后，我和杨耀东在中间，大家摸索着向上攀登，我的头撞在过道顶上，也不觉得疼，记不清是怎么爬上去的，终于到了楼顶。

楼顶上面，光滑的水泥板无法设置接线、天线，按常规固定十

分困难，天线杆不能全部拉起来，我们只好把天线头固定在楼梯口处突出的墙壁上。接力机打开了，我戴上耳机话筒，按联络文件要求进行呼叫，可是收不到对方信号，我下意识地检查一下机器，没发现有什么毛病，其实我心里明白这是多此一举。我是个半老不新的兵了，参加过好几次演习，可是从没经过这阵势，遇到这样的难题，今天怎么这样“倒霉”……我正这样想，只见营长眼睛盯着东北方向也在琢磨着，这时我才有机会仔细看看他，发现他好象瘦了一圈，连日来的紧张工作，连夜的艰难行军，几天没吃好饭、睡好觉了，他的方脸型显得棱角更分明了。他想了想，立即作出判断，转身对我们班长说：“前方有遮蔽，转移位置。”为了快速找到最佳位置，营长急中生智，他一边告诉我不断地呼叫，一边举起天线朝楼顶东北方向作“之”字形运动。

这时的楼下面，人流如潮水一般，在一小撮负隅顽抗的暴徒煽动下，狂呼乱叫地向广场方向涌动着，有的用石块、砖头向执勤战士猛砸，情况十分危险。这时王参谋和小杨已下楼向团长报告情况，楼上只剩下营长和班长我们三人。为了尽快把天线竖起来，沟通联络，保障首长顺畅指挥，营长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由班长配合坚定地向前走去。如果平时走在这楼顶上，俯瞰共和国的首都，那是多么惬意的事呀，而此时每向前走动一步，都要多一分危险。“不要再走了！”我和班长都焦急地喊了起来。此时，营长的身体已全部暴露在人流的视线中，下面传来的声音也清晰可辨：“当兵的滚回去！”“当兵的滚下来！”显然，下面的人已经注意上我们了，为了缩小目标，避免意外，营长让班长退到后面蹲下，做好固定天线准备，他一个人继续向前走去。一步、两步、十步……“通了！通了！”当营长手举天线走到东北侧最边缘时，忽然我从耳机里听

到了前指的回叫信号。终于与前指沟通了！我们高兴得忘记了一切，跑过去与营长拥抱在一起。

天线竖起来了，固定好了，团长打来电话，表扬了我们。通过这根天线，与军区和集团军沟通了联络，并由此与市内电话联网，建立起广场上一个最大的通信枢纽。前指首长的指令很快传下去，部队的情况很快汇报上来，各部队正有序地进入各自执勤位置，失散的战友顺利地回到了部队……

傍晚，夕阳的余辉映衬得天安门城楼金碧辉煌，眼望重新回到人民手中的天安门广场，手扶着高高升起的天线，一种神圣的自豪感也从心底升起。

（王志峰 整理）



二十七分钟

中尉连长 李胜顺

咱那兵！

咱是连长，自个儿夸自个儿的兵有点儿那个，可不信你来咱连看看，看咱那兵到底儿咋样。

中国有句老话，叫作“往事不堪回首”。我却常爱想起融注在短短的27分钟里面的一切一切。

当时，我们已是第4次进城第4次受阻了。时间从公元1989年6月4日9时30分开始缓缓向前移动着，缓慢得让人心焦让人发疯让人想骂娘。我们前面是烧毁的军车、公共汽车以及冰凉坚硬似乎带着浓重感情色彩的隔离墩，我们身后两旁则涌动翻滚着血与肉组成的人的海洋。6个小时！整整6个小时里，我那些兵就象我们车上的每一个部件，牢牢地拧在每个人自己的位置上。

指责谩骂，忍了。

砖头瓦块，忍了。

各种各样的花样翻新的羞辱围攻，狠狠正正军帽，也忍了。

忍无可忍也得忍。

我重重看着我那些兵，我心底一撞一撞地疼。这种窝囊、委屈、痛彻肺腑的忍耐对那些血气方刚胸膛里同样跳着一颗鲜活活

的心的兵们来说,是何等伟大何等的可歌可泣。

然而,忍耐不一定能唤起良知。

下午3点40分,当我们连接到“以最快的速度恢复车辆行驶,向指定地域机动”的命令时,我们连20台车,除运送弹药的车受损程度较轻外,其余9辆车的轮胎全部被放了气,其中有4只轮胎被扎穿;油管、电路全被切断;13辆车的发电机、启动机被损坏;两辆车的电气盖、9辆车的分缸线、分火头被抢走,整个儿车队处于瘫痪状态。

人们有的开始散去,并扬言要回去找人烧车!怎么办?我看着眼前长长的、气息奄奄的车队,一股火直往头上蹿。我们连的车就是全团的腿,我们车辆的好坏将会直接影响到全团的生死成败。

我又看看我那些兵。

我们全连30个人的目光相互交织碰撞着,无声地溅起了串串火星。

于是,就象电影上那样,代理排长、共产党员曹凤生站起来重重喊了声:“2排的共产党员出列。”

“1排的共产党员跟我来。”79年入伍的专业军士张文军又喊。

“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这是我们连共产党员进城前的誓言。

共产党员、志愿兵张文军看到有个新司机有些慌,便撤下自己的车,主动帮这位新司机换上了轮胎。然后又去帮另一个新司机……

共产党曹凤生在进城途中始终驾车行驶在车队的尾部,因而两次遭到暴徒袭击,脸和手臂被打伤。当他见新司机车上安装的

备用的分缸线全被暴徒抢走时，便马上把自己急需的唯一的分缸线给了新司机，自己则忍着手臂的疼痛，咬着牙制作了简易分缸线。

共产党员陈会生的汽车启动机开关钥匙被暴徒抢走，就打开启动机的防护盖，用铁丝连接点火线，使汽车启动。

共产党员、一班长崔洪泉的汽车发动机上的分火头被暴徒窃走，他就在自己手指上缠上胶布作为分火帽，使发动机运转起来。

.....

太阳热辣辣地凝固在天上，整个大地也热辣辣地象烤着了火。我们连 30 颗热辣辣的心热辣辣一起跳荡着，跳出了一个声音。

平时过得硬，关键时刻也就冲得上。我那些兵关键时刻真给我露脸了。

仅仅 27 分钟，全连所有被破坏的车辆全部启动，向前开去。

我坐在飞跑的车里，几天来第一次舒畅地笑起来。

(董辉整理)

共和国,请接受女儿的敬礼

少校军医 王 竞

6月3日晚9时,我们部队从翠微路口向天安门广场开进,在公主坟就受到反革命暴徒和不明真相群众的阻挡。反革命暴徒在路边冲我们狂喊谩骂,疯狂地投掷石块、砖头、玻璃瓶……打在战士们们的钢盔上“砰砰”作响。

我们的救护车在行军序列的右翼中间,紧靠马路边,也遭暴徒袭击。四块玻璃被砸碎,司机刘宝亮的右臂被打伤。

只听见一个暴徒高喊:“砸救护车,不能让他们抢救伤兵!”须臾,二十多名暴徒将救护车团团围住。

一个赤臂的暴徒将头伸进车内看了看,冲我说:“哈哈,还有个女少校,下来陪哥们玩玩。”

我正在给一位右面颊受伤的战士包扎伤口,没理这家伙。只听见军医董建军向暴徒吼道:“滚开!”

暴徒们并没有滚开,他们用钢筋撬开车门,硬要上车。我左手护住伤员的头部,右手拔出手枪。大喝一声:“谁敢上!”

暴徒们看见黑洞洞的枪口,立即退出几步远,又企图将救护车

推翻点火烧毁。这伙人刚要动手，董医生端起冲锋枪朝天点射示警。暴徒们撒腿就往路边树丛里跑，边跑边骂。

部队的行动严重受阻，干部战士们不得不下车，在车的两侧结队，以人护车，车随人行。指战员们手挽着手，唱着军歌，高呼口号，犹如滚滚的浪潮向前推进。

二

救护车碾着满地的石块、砖头、玻璃碎片缓慢地向前开进。时而停下收治伤员，时而前进。

在木樨地西一百多米，我们看见前方友邻部队的一辆车突然熄火。路南侧的一伙暴徒见机蜂拥而上，向熄火的车投掷石块、砖头和燃烧瓶，情况万分危急。我叫司机加快速度，上前营救。

救护车在这伙暴徒面前急刹车。暴徒先是一愣，随即露出凶相。一个暴徒说：“找死，砸！”边说边举起一块半截砖向车内就砸。又一块玻璃被砸碎，军医张建勋的腰部重重地挨了一砖头。

我气愤极了，喊了声“打！”话音刚落，车上的4个人跳下车去鸣枪示警，把暴徒赶开。

我对左侧那辆熄火车的司机说：“快摇车，我们掩护你。”司机跳出驾驶室，取下摇把，跑到车前摇了几下，车还是发动不着。他又打开发动机盖排除故障，忙乎得满头是汗。

这边，退出五十米外的暴徒还在向我们投石块、砖头。此刻，我握枪的手都出汗了，真想瞄准暴徒给几枪，让他们尝尝厉害。但看到暴徒身后黑鸦鸦的人群，只能对空鸣枪，阻止他们靠近。

解放车终于发动着了。我向司机招手，示意叫他先走。随后，

他们离开了木樨地，追赶部队。

越往前走，路障越多，阻塞街头的人群越是密集。部队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在复兴门立交桥东侧的路中央，暴徒们点燃了事先推来的一溜公共汽车。当我们救护车赶到时，燃烧的公共汽车已被先头部队推到了路边，火光冲天，烤得人脸上炙热。

我们冲过火海，发现徒步的队伍中不少人挂了彩。我们几个军医抓起急救包，迅速跳下车，跑到队伍中边走边为伤员包扎。有的战士不愿耽搁时间，拒绝包扎，边快速前进，边用手绢擦血。多可爱的战士啊，看到他们的背影，我的眼睛湿润了。

一辆挂着炊事车的解放车驶了过来，一看车号，是友邻部队的。这时，我看见紧靠车后帮坐着一名胖乎乎的战士，他的左前额正在淌血。我急忙跑了上去，跟车跑了十多米，等这辆车停下来后攀了上去，立在汽车与炊事车的挂钩上，撕开急救包，展开三角巾，要为这个战士包扎。这个战士一个劲地喊：“不用，不用，你快下去，车要走了。”我对他说：“你拽着我的胳膊，掉不下去。”刚包扎完，车启动了，我跳下来就往前跑，追赶救护车。

三

部队冲破重重险阻，到达了天安门广场。

我看到了那座不伦不类的女神像和崇拜女神像的男男女女，看到了横七歪八的帐篷和满地的垃圾，还闻到一股刺鼻的酸臭味。

我佇立在广场的西北角，思潮翻滚。5岁那年我随父亲进北京，算起来，在北京整整生活了30年。童年，我在广场上放过风筝；上小学时，在广场上过过队日，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过花圈；当

兵以后,也没离开北京,节假日,经常到广场上游览。在我心里,广场是那样的神圣、庄严,是那样的洁净、明朗。今天,看到广场被糟践成这个样子,我心里真难受。

5月19日,我们部队奉命从市郊向城区开进,在呼家楼被围困了19个小时,吃不上饭、喝不上水都是小事,我难过的是这么多北京市民、青年学生不理解我们。在围困中,我含着眼泪向市民和学生解释,嗓子都喊哑了,多数市民和学生还不觉醒,真叫人揪心。在现场,一名香港报纸记者在人群中穿来穿去,进行造谣煽动,我气愤地叫:“你过来,有什么话对我说,别鬼鬼祟祟。”这位记者上前问我:“你对学潮怎么看?”我说:“什么学潮?纯属动乱。”记者又问:“你对你讲的话敢负责吗?”我答:“笑话,这有什么不敢的。”

记者递上采访本让我签名,我掏出笔刷刷签上自己的名字。

政府发布戒严令以后,电视里播音员每天都说,今天是戒严的第几天,解放军仍然没有进城。难道真的没有进城的力量?如果强行开进,谁也阻挡不了,就象今天晚上一样。

四

我们部队在人民大会堂北侧暂且待命,西长安街的部队陆续向广场开进。

这时,只见一名军官背着伤员向这边跑来,我迎上前去:

“哪个单位的?”

“××集团军通信团的。”

“伤着哪儿了?”

“腿。被暴徒的枪子打穿了。”

我一把接过伤员，背起就往救护车跑。

这是一个典型的贯通伤，弹头从战士的右小腿外侧穿进，又从内侧穿出。由于失血过多，伤员脸色苍白，昏迷不醒。

我把伤员平放在救护车上，赶紧与董医生、张医生给伤员扎上止血带，包扎伤口。尔后用担架将这个伤员送到天安门左侧的急救站抢救。

我身体瘦小，体重不足九十斤，也不知哪来的劲，抬起伤员一口气竟跑了三百多米。

送完伤员，我满头大汗地往回跑，碰上了集团军的张助理。

张助理叫住我说：“有个战士烧伤了，在新华门，你坐面包车去把他接过来。”

车到新华门，我问执勤的战士，执勤的战士说没有看到烧伤的战士。我又带车往西跑。

一直跑到六部口，才看到那儿停了一溜坦克。两边路口聚集着黑黑的人群，不时有人向坦克投石头、砖块。我跳下车询问，才知道那个烧伤的战士刚刚送走。

我沿着坦克往回跑，一边跑一边喊：“还有没有伤员？”

一个战士把头从坦克车里探了出来，向我要急救包。

我见这个战士的左眼负了伤，就要往坦克上爬，这个战士急着喊：“别上来，小心坏人扔石头。”

我不顾一切地爬上车顶，看到这个战士的左眼血肉模糊，上眼皮搭拉着，就对他说：“你下来，坐我的车到急救站。”

“不，我是驾驶员，我一走坦克谁开？”战士说。

“那好，我先给你包扎一下，到广场后再找我。”我给这个战士

包扎好伤口，跳下坦克，返回了广场。

到广场没一会，坦克就开过来了。我找到这位左眼受伤的战士，把他送到急救站。

五

天安门广场回到了人民手中，我们的救护任务还没有结束。

4日9时，第一架直升飞机往广场运药品，接伤员。没等直升飞机降落，我就带着救护车将17名重伤员送到临时停机坪。

飞机上没有护理人员，我征得机组人员的同意，随机护送伤员。

飞机在北京上空盘旋。我从窗口望下去，十里长街到处是燃烧的车辆。有的地方火光冲天，有的地方冒着黑烟。看看舱内受伤的战友，看看北京被暴徒糟践的惨景，共和国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啊！

机舱太窄小了，伤员一躺，我连坐的地方都没有。我多想坐一会，但只能站着。

飞机在郊区某机场降落，机场上的医务人员早已做好了接收伤员的准备。我一边抬伤员，一边向几位医生介绍伤员的情况，以便他们尽快手术。

17名重伤员很快被送往医院，机场上的医务人员劝我吃了饭再走。我说：“我不吃饭，广场上缺担架。给我们几付担架吧！”几名医生很快扛来了三副担架。担架装上飞机后，他们还不让我走，两个女军医架着我的胳膊，硬往伙房里拉。

我被拉进了伙房，他们要给我准备碗筷，我说：“不用了！”顺

手拿了个馒头就往飞机跟前跑。

从昨晚9点到现在，我没喝一滴水，没吃一点东西，但不觉得饿，只感到特别疲乏，两只胳膊酸痛，两条腿也不想动弹。

跑到飞机跟前，人们正在往机舱里装压缩饼干。我把馒头往兜里一揣，搬起一箱饼干往舱口递上去。机组的同志看我太累了，不要我搬，我对他们说：“快点，广场上的伤员还等着。”

飞机起飞了，我靠在舱壁上，咬了一口馒头，不知不觉睡了过去……

我被颠醒时，飞机正着陆……

我庄严注目徐徐飘扬的五星红旗，内心说：

共和国，请接受女儿的敬礼！

（兰中玉 整理）



黎明即将到来

北京市公安局 陈葆琛

“A 陆洞，A 陆洞，你在哪里？大本营呼叫，听到了请回答……”

我用汗津津的手，捏住乳白色的话筒，一遍又一遍地呼叫着。

长方型电台上的红色指示灯在闪亮，那是我发出信号的标志，只有当下方桔黄色指示灯闪亮时，才表明对方已经听到了我的呼叫，并向我回报。然而，那桔黄色的灯始终没有亮；岂止没有亮，电台里连嗞嗞啦啦的电流声也没有。

这是 6 月 3 日晚 11 点钟。自 4 月 15 日到现在的半个月里，处办公室的电台里，几乎每昼夜都可听到我们和兄弟单位的呼叫声。一忽儿是劝阻游行的学生，一会儿是维持天安门广场的秩序，一会儿是迎接戒严部队……

电台创造了建台以来的最高利用率，呼叫声、回答声、嘈杂的电流声不绝于耳，人们仿佛扔下了日常该做的工作，卷进了一个巨大的漩涡里，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牵着鼻子走。

我和我的同事每天都在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随时都想为扭转这种被动的局面出一把力，都坚信这一天终究会到来。

这天晚上我下班回家，在郁闷的气氛中边吃饭边看北京电视

台播放的新闻。忽然我看到电视荧光屏上映出了“北京市人民政府、戒严部队指挥部紧急通告”的字样。

“当前北京的事态发展已十分严峻，极少数暴徒……随时可能制造更严重的暴乱……北京市人民政府、戒严部队决不能置之不理。为此，全体市民要提高警惕，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到街上去，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

紧急通告的内容随着播音员的声音进入脑海，我的心脏莫名其妙地一阵狂跳。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当别人为了安全呆在家里之际正是我们这些共和国卫士出征之时。用不着通知，我撂下吃了半拉的馒头，穿好警服，最后望一眼正在用担心的目光默默注视我的妻子，转身出了门。

机关里的气氛紧张而热烈。住在附近的同志都和我一样，自动赶来请战。一位接近退休年龄的老同志边走边啃着刚出锅的烙饼；一个年轻的女同志把年幼的孩子往娘家妈手里一塞，说声：“万一我回不来，孩子就靠您了！”然后英姿飒爽地出现在领导面前。

胖胖的处长不错眼珠地盯着写字台上那包着红绸布的专线电话。市公安局的大门已经被围堵两天了，上级无法召开战前会议，局领导的指示只能靠专线电话来下达。

电话终于响了，那铃声清脆得令人振奋。处长放下电话后郑重宣布：“局领导命令我们：一、派40名预审干部，20名和宣武分局的同志一起做审查工作，集结地点在前门东地铁南侧的泰丰楼饭庄；20名和东城分局的同志一起做审查工作，集结地点在新华门附近的二十八中；二、做好机关内部的保卫工作，特别要确保看守所的绝对安全。”

不言而喻，今夜将有暴风骤雨。人人摩拳擦掌，个个跃跃欲

试。处长点起 40 名审讯、记录过得硬的能兵强将，但如何运送到集结地点却成了难题。

不时有从全城各地家里赶来请战的同志报告，通往长安街各个路口交通要道均被放了气的公共汽车、拆毁的隔离带上的铁栅栏、水泥墩和垃圾桶所堵塞，暴徒和不明真相的人们阻拦、烧毁军车，哄抢物资，追打军人和他们认为是便衣警察的人。到处飞石如蝗，烟雾弥漫。

不能放弃快速赶往集结地点的努力。处长在让大家准备出发的同时，让司机班的同志先开 212 吉普车出去探探路。如有可能，用小车走胡同去送送参战人员，送不到目的地送一程也好。

15 分钟后，开车出去的小蔡和小贾风风火火地回来了，见了面未曾开口，连连摆手。原来，街上除了被阻的军车，一辆跑着的汽车也没有。他们开车刚走到离机关不远的大街上，就被人团团围住。人群中有暴徒鼓动：“这是辆 212 吉普，草绿色的，不是军队的就是警察的，推翻它烧掉！”几个人拥上来就要动手。车上的小蔡探出头：“别，别！咱们是一伙的，一伙的！”暴徒们不吃这一套：“这会儿开车出来，不是警察和军队，也跟他们有关，推啊，烧啊！”小贾开门跳下车，喇地拽开衣扣，露出健壮的胸肌：“小子！巴不得你们烧了呢！一辆老掉牙的破车，跑趟郊区这会儿才回来。烧吧，烧了老子赶明儿开新的！”暴徒们真给唬住了，其中一领头的说：“这哥们是北京的，不定是哪个厂子里的破车呢，让它快滚！”他俩就这样开车返回。

开车去已无可能。那天晚上大街上的暴徒见了解放军和警察就往死里打，而战士和警察在没接到新的命令时却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上街不能暴露警察的身份，到集结点上级要求必须着

警服，否则将无法开展审查工作。为了不暴露身份和目标，处长们研究决定，人穿便服，把警服装进手提兜里，分散开步行前进。

“这叫什么事？建国40年了，共和国的人民警察，在首都居然成了地下工作者？！”

准备外出执行任务的同志愤懑地说着，每人揣上以备充饥的六个煮鸡蛋，然后三三两两地走出大门。

这一次该我这个办公室主任在值班室不错眼珠地盯着外线电话机了。按照事先约定，外出执行任务的无论是去泰丰楼的还是去二十八中的，只要一到达目的地立即给机关打电话报平安。我们机关离这个地方大约十来里地，按正常速度用不了一个小时，但一个小时过去了，还不见电话有动静。

又过了半个小时，9点30分，带队去泰丰楼的副处长来了电话，他说街上很不好走，他们七绕八绕总算陆陆续续地到达了预定地点。去二十八中的人的情况他们不清楚，只知道对面人大会堂西侧路和长安街上，形势相当紧张。

我把情况报告给在家坐镇的处长，他急得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在这之前他刚接完市局通过专线打来的电话，催问那20人为什么还没有到二十八中？并告诉天安门广场非法组织的头头可能已知道二十八中内有警察，很可能组织人围攻。我处派出的20名同志下落不明，而上级又要求他们必须在今夜赶到集结地点去执行特殊任务，同志的安危、上级的重托，怎能不使一处之长心急似火？

“这么办，你去找一下小孙，让他去联络一下。”处长说。

小孙是大家公认的能人，这些日子别人上街寸步难行，他却依旧奔忙于机关到火车站之间，迎来送往外地来京工作的客人。常

常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刚买了车票，因为外地“民主自由斗士”们卧轨阻拦火车进京，又不得不再排队把票退掉。这天晚上他好不容易把几张票退掉，刚回家去吃饭。他家住在右安门外一条胡同内租借的民房里。

街上静极了，没有人影，也没有车辆，显得这个不寻常的夜晚格外暗淡。我一溜小跑来到离机关有两站地的右安门里，那里的情景又不能不使我震惊：

几辆原本规规矩矩停放在汽车总站的56路大公共汽车，被横七竖八地堵塞在护城河桥的这一头。从桥上望去，往右安门外大街尽头是一辆挨一辆的军车。一帮痞子模样的人在为首的军车前张牙舞爪。他们对着军车上岿然不动的军人，有的嘴里不三不四，有的在拍打汽车，还有的上去动手动脚。这一切都似乎在宣布，北京是他们的地盘，共和国的军队就是不能到共和国的首都执行戒严任务。

一个戴着某某大学牌牌的青年爬上横放着的公共汽车车顶。他的头上扎着一条布带，使我想起来前些日子在一部电影里看到的踩着摇滚乐跳扭摆舞的年轻人，只不过后者头上的飘带是红的，前者是白的，上边歪歪扭扭地写着几个黑字。

“市民们！”车顶上的青年手里举的小铜喇叭发出了南腔北调，“头可断，血可流，自由民主不能丢！我们一定要顶住部队，不许他们进城！天安门广场最新消息：美国总统说，中国如果发生流血事件，美国政府将采取严厉措施……”

“好！”

“好！”

堵车的人们喊出了如旧社会戏园子里捧场时才有的叫好声，

并且有的伸出大拇指，有的用食指和中指做出了横行着的螃蟹的大夹状。那狂热的劲头儿似乎他们不是中国人！

我迷惘，我愤怒！我无法越过这些挡道的人们去唤我的战友。正在这时，他却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我的面前。

“你怎么过来的？”我悄声问小孙。

他憨厚地笑笑：“正在家吃饭，总觉得气氛不对头，饭吃了半截我就来了。”

他说得那样轻松，似乎是刚刚通过无人之境。

处长向他交代任务之后，他依然轻松地憨笑笑。我从二楼办公室的窗子里见他出了楼门，把一个巴掌大的无线电报话机掖在后腰上，用衬衣后襟盖好，然后推上一辆二八自行车。

“千万别暴露报话机！”我叮嘱了一句。这天白天在天安门东侧的南池子，我们有一个区的公安分局副局长被打，并且被抢走了报话机。今晚如果被暴徒发现身带报话机，肯定不死也得脱层皮。

“没问题，到时候我给你们回音。”小孙又冲我憨笑，跨上那辆黑二八自行车，毫不犹豫地驶向越来越浓重的夜色里。

“A 陆洞，A 陆洞，你在哪里？大本营呼叫，听到了请回答……”

40 分钟后，当我们没有听到小孙的回音时，我和值班员开始轮流用办公室的电台呼叫。

派到二十八中执行任务的 20 名同志依然没有音信，市局来专电连连催促，处长亲自来到办公室和我们一起紧盯着电台上收讯的指示灯。

那桔黄色的指示灯像坏了一般，没有一丝光亮。

办公室里的气氛沉闷得如胸口上被压上了铅块。窗外的夜色

似乌云压城般的幽暗，如死一般寂静。世间的一切都似乎处于停滞状态。

突然，从西北方向传来了枪声。那枪声似乎离我们这里很远，但在黑暗与寂静中却使人听后为之激动，就像新年听到辞旧迎新的爆竹一样昂扬。

“开始反击了！老陈，你到看守所院去看看，那里别发生什么问题。”处长对我说。

我快步赶到看守所大院，那里大墙外大约1千米处就是右安门桥头。静夜里我听到从右安门桥头方向传来阵阵喊叫声。那喊声真像我幼时在乡下听到的暴风雨即将来临之际的蛤蟆吵坑。具体喊什么无法听清，似乎是在叫：“当兵的，回去！”“不准进城！”

我担心地望了望旁边的监所，那里关押着全市刑事犯罪的尖子。在这关系到国家存亡的生死搏斗关头，且不说这些十恶不赦的家伙越狱出去为虎作伥，就是乘机闹起监来也不易收拾。

幸好干部们的保密工作做得极好，从一扇扇关着的窗子里，透散出昏黄的灯光，看出犯人们像往日的夜半一样正在酣睡。

从右安门方向传来机动车前进的轰鸣声和部队向城里挺进的整齐的脚步声。

我看到，在东方，大约虎坊路南和天桥一带的上空，随着枪声一束束耀眼的火光冲向夜空。

那是战士们在对空鸣枪开道。那枪声虽不很急，火光也不很多，但却似雷鸣，似闪电，猛烈地撕扯着团团笼罩着北京的黑色夜幕，迎来即将黎明的曙光。

我怀着欣喜的心情跑回处办公室报告。不等我开口，处长兴奋地告诉我，小孙已有了消息，他在电台里说他已经找到化装去执行

任务的同志，并且4次闯过封锁线，把他们送到了上级指定的新的集结点。

这一晚小孙的经历可谓惊险。化装到二十八中去执行任务的20名同志，原计划从人民大会堂西侧路穿过西长安街前往。谁知还未到路口，就见广场非法组织派出的“敢死队”、“纠察队”里三层外三层地封锁住去路。他们在检查行人，追打着他们认为是士兵和警察的人，不准警察和士兵进入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无奈，这20名同志只好分散开，绕道附近的胡同、街口，想迂回穿过长安街，到二十八中集结。没想到各个路口均有人把守，想到达目的地已十分困难。

小孙却骑着车在西边的路口随着围观的人们，早早拐上长安街。那从事重体力劳动一般的健壮身躯，那总是乐呵呵的面容，没有人会拿他当公安人员。当他终于来到二十八中门口时，一眼就看到那里的情况有些不妙。暴徒们已发现那里是警察的集结点，用砖头和木棒发起了一次次冲击，先期到达那里的东城公安分局的同志们不断有人被打伤。

就在这危急时刻，解放大军从西边浩浩荡荡地鸣枪开进。暴徒们时而聚拢用砖头瓦块向部队袭击，时而如鸟兽般抱头鼠窜。小孙乘机跟东城分局的同志接上了头，分局的同志告诉说根据需要审查点改在中南海警卫部队礼堂，让我处20人迅速向那里靠拢。在混战中，小孙在路口，在道边，在小树林里，找到了正在迂回前进的我们派去执行任务的同志。然后在枪声中，在石雨中，4次带领同志们闯过封锁线，使大家按时担负起对现场被抓获的暴徒的审查任务。

“首都今晚发生严重的反革命暴乱……人民解放军多日来保

持了高度克制,现在必须坚决反击反革命暴乱。

“……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立即离开,以保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

凌晨,北京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市人民政府、戒严部队指挥部的又一个紧急通告。

我估计大军已经进入天安门广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空达一个多月的阴霾即将散去。我“嘿”地一声,长长地吐出了积郁在心中已经多日的一股闷气。

按理说我该上床休息了,但我毫无倦意。一个巨大的问号渐渐地充塞了我的头颅:

建国40年了,在我们首都,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没有硝烟的战斗

北京市公安局 刘成社

6月4日凌晨，漆黑的夜空被暴徒焚烧军车的火光映照得忽明忽暗，清新的空气被呛人的浓烟污染得混浊不堪。三三两两的外国记者无视北京市政府令，混迹于北京市区内的大街小巷。照相机的闪光灯不停地闪耀，照相机的录相带不间断地转动。

凌晨1时整，几乎是与钟声敲响的同时，北京市公安局外国人管理处值班室的黑色电话机的铃声响了。值班员小王左手抓起电话听筒，右手执笔在电话记录纸上一字不漏地记下了上级的指示：“即刻派人去北京饭店收缴外国记者违反戒严令非法摄制的录相带、胶卷，并对他们违反戒严令的行为提出警告！”

地处东城区北池子大街的北京市公安局外国人管理处与北京饭店相距咫尺，乘车或骑自行车不消片刻即可抵达。而此时此刻，丧心病狂的暴徒们正手持木棒、铁棍、军用枪支在各路口设置路障，堵截、烧毁军车，殴打戒严部队官兵和公安干警。各种仇视人民警察的不法分子也混在学生和群众中，乘机对公安人员进行报复。去北京饭店要穿过南池子和南河沿两条大街，随时都会遭到

暴徒和不法分子的袭击或被流弹击中。在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我们的外事干警丝毫没有惧色，人人争先恐后。为了不让绞尽脑汁寻找不利于我们共和国形象素材的某些外国记者的图谋得逞，干警们完全把生死置之度外。为了避免造成不应有的损失，顺利完成任务，处领导果断地决定：“刘建华副科长带领6人去北京饭店执行此次任务，全体同志着便装携带警服，穿胡同步行前往。”

凌晨1时40分，刘建华等人安全抵达了北京饭店大厅。他们迅速换上警服，立即开始检查每一个进入饭店的外国人。

二

北京饭店位于东长安街与王府井大街的交汇点上，是北京城的中心地带。它的右面是举世闻名的天安门广场和劳动人民文化宫。它的左面就是相当于东京银座的王府井商业区。从北京饭店出发，行至天安门广场和王府井商业区只需十几分钟的时间。北京饭店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被居心叵测的某些外国记者一眼看中，他们千方百计地占据了一席之地，不分白天黑夜地频频出没于天安门广场、王府井、东单等地。

5月20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根据李鹏总理签署的国务院关于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发布的第1号、第2号、第3号令规定：“在戒严期间，外国人不准介入中国公民违反戒严令的活动及未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外国记者、港澳台记者不得进行采访、拍照、录相等活动。”但部分外国记者对我市政府令置若罔闻，肆意进行采访、拍照和录相活动，大行恶意中伤、造谣诽谤之事。6月3日夜，在戒严部队奉命平息反革命暴乱时，他们又倾巢

出动了……

三

凌晨3时10分，外国记者A肩扛摄影机大汗淋漓地走进饭店大厅。英语翻译小苏迎上去礼貌地用英语问：“你是哪国人，会讲英语吗？”“我是M国人，当然会讲英语。”外国记者A傲慢地回答。

“请出示证件。”小苏对外国记者A说。

“我是一家新闻社的记者。”

“请问你刚才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到天安门广场看了看。”外国记者满不在乎地回答。

“去天安门广场看看为什么携带摄影机？”小苏穷追不舍地问。

“我的职业是记者，带摄影机是为了采访、录像。”外国记者A回答。

“你未经允许进行采访、录像的行为违反了戒严令，请交出录像带，听候处理。”小苏斩钉截铁地说。

“好吧。我错了。”外国记者A见势不妙，来了个好汉不吃眼前亏，乖乖地交出了录像带。“可惜，可惜！”他一边说一边一步三回头地看着小苏手里的录像带。

凌晨3时21分，一名大胡子的外国人B走到大厅门口，见大厅门口两侧站着穿警服的警察，大胡子先是一愣，继而又面带微笑，装做悠闲自得的样子缓步向电梯走去……

他脖子上、肩上、手上无不挎着、背着、提着好几架照相机，又

是三更半夜外出，是外国记者确定无疑。外国记者 B 明知拍照是违反戒严令的，而且也明知英国广播公司记者麦杰恩、日本读卖新闻社记者大岛则之因在戒严期间违反北京市人民政府令于 6 月 1 日受到了公安机关的警告，但他又不忍心错过千载难逢的良机，犹豫再三还是决定冒一次险。刚才看见警察后着实吓了一跳，但转念一想也许可以蒙混过去。

不过，令外国记者 B 始料不及的是今天的对手十分不好对付。他的几个理由均被一一驳回了。他先是佯装不知市政府令；又谎称不知到什么地方办理采访、拍照的申请；最后又诡辩说现在北京市每天有上百名外国记者在活动，为什么不去管，而专门与他过不去？

民警老张说：“北京市政府发布的第 1 号、第 2 号和第 3 号令，电视台、广播电台、报纸均已做了宣传。你作为一名记者，对这样的大事不能不知道吧？如果你想申请进行采访，真的不知到什么地方申请的话，给外交部新闻司打个电话即可得知，可以说这个理由根本不成为理由，只不过是抵赖而已；至于一些外国记者到处采访一事，我希望在华的每一个外国人都应遵守中国的法律规定，谁违犯了都将要受到惩处。”

老张的一席话驳得外国记者 B 张口结舌，对方只好无可奈何地交出了全部胶卷。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飞逝，喊声稀稀落落，时近时远。军车燃烧的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外管处的干警们多想亲自参加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战斗、亲手抓几名暴徒啊！可是不行，为了共和国的利益，需要我们坚守在这没有硝烟的战场！

四

凌晨4时半，天安门广场上广播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关于迅速恢复天安门广场正常秩序的通告。停留在广场上的数千名青年学生听到通告后纷纷撤离了广场。混迹人群中的外国记者也陆续开始返回。

凌晨4时45分，两名外国记者C和D谈笑风生地走进北京饭店大厅。外国记者C背着小型照相机，D两手空空。他们在听了外事干警的宣传解释后，C十分痛快地交出了录相带，可以说未费任何口舌和吹灰之力。刘建华副科长忽然发现D的背后衬衣微微隆起，怀疑里面藏有东西。但纪律又不允许搜查，怎么办？只见刘副科长巧妙地拍了拍D记者的肩膀说：“谢谢你们的合作！”而后顺势把手滑向D记者的腰部，感到有硬物后便笑着说：“请问这是什么东西？”D记者十分惊慌地说：“是……是……是两盘微型录相带！我们错了。”

原来外国记者C和D在进饭店前见大厅有警察，虽不知警察在干什么，但作贼心虚的心理驱使他们把录制好的两盘录相带藏了起来，本想丢车保帅，谁想“全军覆灭”了。

凌晨5时，天将拂晓，紧张忙碌了一夜的外国记者们鱼贯而入地进入大厅。刘副科长见状，立即吩咐大家围成一个半圆形。一方面加快工作速度，一方面让外国记者把录相带、胶卷交出来，力争不让一盘录相带、一个胶卷漏网。

突然，一声粗暴的声音传来，大家不约而同地停下手中的工作。“我抗议！”身强力壮的外国记者E一手提台照相机，一手拨拉着小李的胳膊，企图夺路而逃，拒绝交出录相带。

刘副科长义正词严地对他说：“你抗议什么？你违反了戒严令，非法从事录相，拒不认错，而且还无理地对待执行公务的民警。我对你提出警告并令你交出录相带！”

外国记者 E 见硬的不行，马上转换口气说：“我只是出去转转，想录相但还没录，不信你们自己看。”说完把索尼 2000 型摄像机拱手交给了刘副科长，来了一着“将军”。

经验丰富的刘副科长并未惊慌、紧张，他熟练地按了一下倒带键，接着又按了放带键，照相机的取景器上立即显示出重重路障和军车被烧的画面……刘副科长指着摄像机对外国记者 E 说：“看看这是什么，你不是说未录吗？”

外国记者 E 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一屁股坐在了大厅红色的地毯上。他软硬兼施的伎俩不仅没有唬住中国的警察，反而使自己陷入了无地自容的困境。他低着头喃喃自语地说：“真不走运……没想到……几个小时白费了……中国警察太厉害了！”

五

上午 7 时 30 分，太阳冉冉升起。刘建华副科长与同志们披着满身征尘回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外国人管理处。在紧张紧张的一夜里，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圆满地完成了收缴外国记者非法摄制录相带、胶卷的任务，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

这就是共和国的坚强卫士，值得骄傲的外事干警。他们在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中虽没有亲手抓获暴徒，可却与违反戒严令的外国记者进行了短兵相接、针锋相对的斗争，捍卫了共和国的声誉，打击了某些外国记者的不法行为，为维护国家主权做出了贡献。事实证明，他们无愧于佩戴的金色国徽、闪光的盾牌。

利 剑 吟

北京市公安局 赵庭昌

6月4日，是首都爆发反革命暴乱的第2天，也是国务院颁布戒严令的第15天。早晨清新的空气并没有给喧嚣了一夜的人们带来片刻的宁静。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仍然笼罩着一些街道和路口。

白纸坊派出所副所长王忠宽为了及时掌握暴乱情况，顾不上宿未睡，带上一个民警，二人着便衣前往出事地点进行观察。

在右安门大桥北侧，被两辆56路公共汽车堵截在街道上的10多辆军车横七竖八地挤在一起，四周围满了成百上千的人。有的军车玻璃被全部砸碎，有的军车轮胎被扎破放了气，有的军车电瓶被拆掉抢走，地上散落着不少军用物资。

一些暴徒在疯狂地用石块和铁管砍砸军车，嘴里还不断狂呼乱叫着：“现在是我们的天下了，警察不灵了，没人敢管我们了！”一位老大妈看到这些军车被破坏，心疼地说了句“这都是工人制造的呀，也是国家财产，你们砸也不对啊”，就被几名暴徒围在中间，凶狠地推搡着，辱骂道：“你老不死的知道什么，你怎不说他们在前边杀人呢！”周围有人附和着，一些愤愤不平的群众敢怒不敢言。

亲眼目睹这一情景的王忠宽不禁义愤填膺，双拳紧握，他的心

在颤抖：“人民共和国最悲壮的时刻，历史不会忘记这些血和泪，这些爱和恨。有朝一日定要向他们清算。”他把怒火强压在心里，更加仔细地观察着，牢牢记下一个个暴徒的猖狂罪行。

这时，只见一个身材粗壮的暴徒赤裸着上身，手里挥舞着一把菜刀，在军车上蹦来蹦去，乱砍乱剁，嘴里狂喊着：“抢呀，快抢呀！他们回不来了。”他把军车上的食品和衣物不断扔向人群。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王忠宽紧紧盯住这张有些熟悉的丑恶嘴脸，迅速在脑海里回忆着。终于认出这人叫罗红军，曾因打架斗殴欺压群众，多次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这样一个社会渣滓，居然也跑到这里来伪装成“民主斗士”，进行反革命煽动。王忠宽的肺都要气炸了，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迅速赶回所里，决心要给这样的暴徒一点颜色看看。

当王忠宽向民警们讲述了见到的情况后，民警们愤怒了，个个摩拳擦掌，纷纷要求出击严惩暴徒。看到民警们一扫倦容、跃跃欲试的样子，这个平日以冷漠著称的领导激动了，他感觉到了民警们那一颗颗对党、对人民的赤子之心，仿佛看见一把把利剑，闪烁着灼灼逼人的光彩，使他对胜利充满了信心。

但是，这时所里原本不多的警力，由于昨天被上级抽调 20 人前去参加保卫市局的战斗，家里只剩下 30 来人。他们不仅要坚守住自己的阵地，还担负着保卫白纸坊地区 10 多万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重点单位设施不被破坏的重任。在这紧要关头，10 余名干警深入到数以千计的人群中去抓捕罪犯，在反革命白色恐怖仍然十分猖獗的时候，将面临怎样的危险是难以想象的。领导上一丝一毫的疏忽都可能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王忠宽副所长紧张地

思考着，额头上不禁沁出了汗珠。“这时候抓人，可是全市第一啊，万一出了事可怎么办？”但是，一想到近两个月来，党的命运、国家的前途牵动着他度过的一个个不眠之夜，浑身的热血就往上涌。“我豁出去了，绝不能让暴徒逍遥法外！”望着民警的期待的目光，他终于下定了决心。

这时，一位老工人气喘吁吁地跑进派出所报告说：“在右安门桥头，有一小伙子从军车上抢了一三轮车的东西，往南菜园方向跑了！”

刻不容缓，他迅速和其他领导安排好所内安全保卫工作后，立即挑选了有8名党员参加的11人组成的战斗小组。“党需要我们的时候到了，我们绝不能做缩头乌龟！”

“对！”小组成员们响应着，立即行动起来。他们有的着便衣，有的穿制服；有的骑自行车，有的驾驶着摩托车，在王忠宽副所长的带领下，疾风一样地向出事现场赶去。

宝剑终于出鞘了。

街道两旁，人们在不安的议论着，谣言象阴云一样在蔓延。恐怖情绪仍沉重地压在人们心头。不时有三三两两的人喊叫着向桥头奔去。

此时，右安门桥头的人群比清晨时更多了，熙熙攘攘，人声鼎沸，不时还掺杂着“打倒反动政府”的喊声。有些暴徒在军车上翻来翻去，还在破坏着有些尚完好的器材。一个半导体扩音喇叭被摔在地下，碎了；一辆军车的油箱被点着了。反革命气焰仍然十分嚣张。

看到这些情景，民警们的眼睛里喷着火，恨不得立刻冲上前去将暴徒全部抓获。无奈力量悬殊，寡不敌众，只有紧握的双拳在微

微颤抖。

这时有人发现了民警，喊着“警察来了”。人们似乎愣了一下，接着便有人喊“打倒警棍”的口号，甚至有些人手里提着棍棒喊叫着向民警们逼来。形势一下子变得十分危急。民警们的心在急剧地跳动，不由得把目光一齐集中在王忠宽身上。

只见他紧张的表情丝毫不比民警差。是啊，十几个民警生命的安危都系在他一人身上，绝不允许他有一丝一毫的怯弱。他沉着地说道：“哥儿们，别忘了那首歌，‘危难之中显身手’，今天就看我们的了！”民警们互相对视了一眼，耳边仿佛又响起了那熟悉的“几度风雨，几度春秋”的歌声，不由得勇气倍增。

这时，罗红军已不在现场，抢劫军用物资的暴徒已逃离现场200多米远。为了避免陷入重围，在王忠宽副所长的带领下，趁人群尚未围上来时，民警们迅速穿过人群，向逃跑的暴徒猛追下去。

近了，近了。王忠宽副所长一眼就认了出来，三轮车上的暴徒正是刚才在军车上猖狂已极的罗红军。他的怒火不禁又冒了上来，于是不顾周围可能出现的危险，迅速指挥民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扑上去。这个暴徒正沉醉在发财美梦中，只觉得身后一阵冷风袭来。还没等他清醒过来，已被几个同时扑上来的民警死死地压在车上，一副锃亮的手铐紧紧铐住了他的魔爪。

大胡子兵自传

军士 王洪祥

也邪了，战士不准留胡子，是条令明确规定的。我这脸大胡子，几次提出想刮，首长却偏偏不让。

关键时刻还真派上了用场。

6月3日22时30分。上级的一道命令下达到指挥部，需要迅速传达到部队。

部队在哪？命令如何下达？

整个戒严部队都处在受阻途中，通讯设施被破坏，上下联络中断。怎么办？上级的决策如何变成千军万马的实际行动，是能否夺取胜利的关键。

上级首长着急，指挥部着急，部队因失去联络而无法行动，更着急。司令员当即决定，派作战部唐处长化装进城，口头传达命令。

“谁的车去？”将军们点来点去。

“王洪祥。”艰巨的任务又一次落在了我的身上。虽然感到担子很重，但也看出了首长对我的信任。自己是共产党员，在这种时刻还能说什么呢？我当即向首长表示：“有千难万险，也要上！”

唐处长、张参谋、警卫员小王，加上我，4个人带着上级的命

令，带着崇高的使命感，也带着生与死的考验，出发了。

入夜，北京城的形势更加严峻。所有进城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都被截在途中。有的车辆被砸、被烧，有的被强行检查，歹徒们猖狂地叫嚣：“一兵一卒也别想进城。”煽动者甚至印发小字报，到处宣传：“凡是穿黄裤子、白衬衣的，说话外地口音，留小平头的，拿着地图四处找路的，坐吉普车、不挂牌子的，没有北京市民身份证和学生证的，都是当兵的，发现就抓。”

我们虽然都穿上了便服，车也挂着地方牌子，可路不熟悉怎么办？白天，我拉着指挥部首长进城勘察地形，东绕西绕，总算平安地回来了。但夜间，大路都被堵住了，走胡同，还不敢问路，我心里真有点发懵。

“大爷，前边能走通吗？”走投无路了，我试探着朝路边的几个老头儿问了一声。

“快回去吧，小伙子，你没见街上哪儿还有车呀！”

“我们想找高碑店。”

“不能走。哪儿也不能走。”

我心里想：不能纠缠，传达命令要紧。一把方向盘，把车拐走了。

拐来拐去，第一支部队找到了。唐处长悄悄传达完命令，我们继续赶路。

想问一问路，不敢停车；想查查地图，怕被发现；想弃车步行，怕耽误时间。当然，我不同意弃车的方案还因为舍不得这台崭新的北京213吉普。

不知怎么走的，摸到了北京站。刚往回走几步远，又不通了。

“干什么的？停车！”这伙人见车就堵。

“我们刚从外地回来，回建国门。”对方一听不是北京口音，便冲着我审视起来。见我一脸大胡子，头发挺长，还穿一件蓝格衬衣。不象当兵的。

“拿出证件来！”旁边有人叫喊。

“没带证件。”

一个小子打开车门，把我拽了下来。

“你干嘛！哥们，客气点。”我说着瞪起眼睛，攥起了拳头。那小子一看我不好惹，松开手走了。我们迅速启车，摆脱了人群。

建国门立交桥，被堵得不知道怎么能下去，转了三圈，也没找到下去的路。我们决定下去套近乎，争取他们让开点路。

唐处长变成了“唐经理”，张参谋被称为“张科长”，还有“供销员小王”。

“唐经理”走上前去，刚想说一句“这大兵进城干啥”，一紧张吐出了真言：“这大学生总闹啥呀！”对方一听，不对味儿。“你是干什么的？”我一看要坏事，赶紧把他们拽上车，一踩油门，转到另一个路口去了。

我想出了一套办法：不停车，不纠缠，遇到路障就绕，碰上人群就躲，穿小胡同，迂回前进。我就是靠这种胆量和自信，冲破了一道又一道障碍，按时赶到了最后一个指挥所——大雅宝。

这时的时间是：6月4日凌晨，2时30分。

共和国首都正在经历着惊心动魄的一夜。

(宋景森 整理)

开 进 电 波

下士班长 段晓雄

6月3日中午14时,北京南郊一个行军帐篷里。

“……现在已经到了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了。我们是通信兵。步兵掉队丢一个,通信兵掉队丢一窝。我们在开进中不但要保证电台通信畅通无阻,而且要学会保护自己,更重要的要保护好电台。再检查一遍机器、耳机、电池……”

15时30分:连长曹秦川的声音又在帐篷响起:

再把机器检查一遍,频率再校准一次,一定要校准……

16时10分:“嘟…嘟…嘟…”传来了上级的命令。

16时25分:“无线电连一切准备完毕。”

“出发!”

16时30分:“尚义,东城就位回答。”“东城,我是尚义,明白。”“尚义,西城就位回答”……

27分钟,全部就位。

16时55分:“东城,我是尚义,令你部登车。”……

17时20分:“尚义,我是东城,登车完毕。”……

17时25分:全旅登车完毕。

17时30分:一声令下,车队出发。

通信信号良好。

17时40分：随着车队向前的开进，主、属台之间的距离越拉越远，信号也越来越小。“武汉……尚义呼叫……请回答……”汽车发动机吼叫。距离越来越远。高大建筑物屏蔽。指挥车与收尾车的通信中断。加上加感线圈，无效！“西安，我是尚义，你作为第二主台呼叫武汉。”“……行，通了！”

17时50分：部队在大红门受阻。数以千计的不明真相的群众拦住车队，将车团团围住。

“各台注意，保护好汽车轮胎。”

“各台注意，请向围观群众作好政治思想工作，向他们讲明，我们是进城维护首都秩序的，不是镇压学生的。”

“尚义，我是东城，个别围观群众向我部扔石块。”

“我是尚义，一要忍耐，二要作好宣传工作。”

“尚义，我是西城，有人在向我们作反动宣传。”

“我是尚义，高唱战歌，压倒他们。”

一道道命令随着电波下达。一条条情况通过电波上传。

19时35分：部队迂回前进。

19时50分：迂回至洋桥，指挥车过去了，后面车队又被数以千计的不明真相的群众拦阻。

20时10分：“各台注意，上级命令徒步开进。”

“东城明白。”

“西城明白。”

“武汉，武汉是否明白，回答。”

“收尾车信号太小，通话听不清楚，怎么办？”

“发报。”

“达…… 嘀……”

20时30分：由于围观群众的阻拦，部队寸步难行。

“各台注意，指挥部令西城，狼山向东佯动，西安、武汉寻机从正面通过。”

向东佯动的部队刚一动身，无线通信兵李信就成了暴徒的袭击目标。“抓住那个背电台的。”“砸他，砸死那个背电台的。”雨点般的石块将他当场砸昏。他又被喊叫声惊醒。“夺电台，打死他。”他两手死死抱着电台，任凭暴徒殴打不松手，直到他被友邻部队的战友救走。

6月4日零时5分许：部队强行向天安门广场开进。无线兵平均每人负重25公斤。电台体积大，加上高1.5米的鞭状天线，目标更大，一行动就成了暴徒们攻击的重点目标。

连长曹秦川，在过第一道铁路与公路的交叉路口时，看到暴徒们用起落杆一起一落猛打部队。他毫不犹豫同其他战友一道用双手顶住起落杆。暴徒们看到他佩带军官肩章，背有电台，喊道：“那个背电台的是个指挥官，砸死他。”雨点般的石头砸向他。他肩部、腰部、腿部受伤，直到最后一批战友顺利通过交叉路口，他才松了手。回头看到后面有掉队的战友，就高喊：“我是上尉，是指挥员。跟我来。”并立即通过电台向指挥组汇报情况。到达目的地时，他身上被砸10多处伤。

中尉分队长李增利，身负电台及备用电瓶达30公斤。但他凭借自己的身高体壮，跑前走后，扶起一个个摔倒的战士，并用自己的身体保护受伤的战友。同时，用电台及时同指挥组联络，向上级汇报情况。

下士班长周景阳，身负电台及备用电池，负重达25公斤。他

行至一处路障，看到一位战友摔倒，紧跑几步伸手扶起摔倒的战友。一刹那，一块砖头打中他的耳部，鲜血直流。但他硬挺着向前进，同时手握话筒，耳扣耳机。到达天安门广场时，白色的袜子变成红色，耳朵被砸了一个洞，积血已变成血块。

上等兵郭金生，16岁，体重仅43公斤。当他身背16公斤的电台行至木樨园时，一块横飞的石头打中了电台。他想都没想的就把电台从后背上移至胸前，抱在怀中。砖头打他的背，砸他的脚，脚已失去了知觉，只知道机械地往前迈步。

.....

6月4日1时25分：胜利抵达人民大会堂东门前。胜利完成了开进途中的通信联络任务。



不平凡的征程

上士 徐 准

1989年7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予首都戒严部队某团炮兵营一连战士张震“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

我双手捧着7月28日的《北京日报》，凝视着照片上的张震，泪水一下子模糊了双眼，脑海里清晰地浮现出一个多月前那惊心动魄的一幕——

6月3日夜晚10时30分，我们部队奉命向天安门广场开进，行至五棵松附近时，突然遭到一伙反革命暴徒的疯狂袭击，石头、砖块、汽水瓶雨点般向车上砸来，驾驶室前面和左右玻璃顷刻间全被砸碎，车厢和车篷被砸得咣咣作响，骚动的人群从四周拥来。

我旁边的司机张震立刻意识到事态严重。此时，上级指挥所也跟着这支队伍一起行进，作为首车驾驶员，不能有半点闪失。他一拳将驾驶室前面残存的挡风玻璃击碎，锋利的玻璃划破了他的手，鲜血直流。他抹了抹脸上的玻璃碴儿，双手紧握方向盘，缓缓地向前行驶。

忽然，汽车“咯噔”了一下，紧接着车体忽左忽右地摇摆起来。

“怎么啦？”带车的军务股长陶祥礼问道。

原来，一块锋利的石头从左侧飞来，砸在张震的左耳根部，他耳后裂开了一道5公分长2公分深的口子，颅骨受伤，小动脉血管断裂，鲜血直往下淌。陶股长赶紧撕了一个急救包给他包扎，但仍止不住血，转眼间他的白衬衣被鲜血染红。我急了，抓起一卷卫生纸压在张震的伤口上，陶股长再用三角巾紧紧地缠住他的头部。

听说张震头部受伤，坐在车厢里的新战士孙利华一下子呜呜地哭了起来：

“都是为了我啊，要不他的头部怎么会受那么重的伤！”

出发前，身为代理排长的张震，一一检查排里战士的准备情况。孙利华刚刚从后面上来，挎包里什么吃的也没有。张震转身把自己包里仅存的一袋饼干和两袋方便面塞进孙利华的包里，并把雨衣也给了他：“带着，前边都用得上。”

汽车发动时，张震忽然想起了什么，匆匆跑到车后，取下头上的钢盔，不由分说递给孙利华：“快戴上吧，坐在车尾很危险，戴上它多少能遮挡一点。”

现在，我们车上的人都受了伤，但看到张震被砸成那样，心里都一阵阵刺痛和焦虑。

张震深知此次任务的艰巨。部队出发的前一天晚上，他命令全排战士，早早休息，自己却拿着手电筒，连续检修了9台车，整整一夜没合眼。第二天一早，他特地找来一把小干辣椒预备路上发困时提神用。临上车，他对我说：“没想到我第一次到天安门，就执行这么重要的任务，我们一定要把部队按时送到。”

“张震，你可要挺住啊！”我在心里呼唤着。

汽车缓缓地向天安门广场行驶着。张震紧紧靠在背垫上，双眉紧锁，头在晃动。因失血过多，他脸色苍白，直冒虚汗。

见此情景，陶股长不无忧虑地问：“怎么样？要不停下车，我去找个司机换你？”

张震吃力地摇摇头，说：“现在到哪儿去找司机？我这辆首车一旦停下，后面的车队就会被围住。你不能下，车也不能停！”

话未说完，汽车忽然晃动了一下，熄火了。

张震猛踩油门，汽车也发动不起来：“油路断了！”

陶股长心头一惊，忙说：“我们下去看看。”

“你们下去不能修，我去。”张震猛地推开车门，跳了下去。霎时，石块、瓶子朝张震身上砸来，他全然不顾，仔细地检修油路。原来是一名暴徒关掉了油箱开关。就在他以最快速度接通油管，返身上车时，一名暴徒凶狠地开了枪，子弹从张震身边穿过。

这时，站在前沿指挥的李政委也多处受伤，血流满面，他冒着危险跑上前来，关切地问道：“小张，伤得怎么样？能行吗？”

“政委，我一定坚持到底。”

本来宽阔平坦的长安街，此时到处是暴徒们设置的路障和正在燃烧的汽车、装甲车，不时有油箱爆炸，腾起丈把高的火柱，黑烟滚滚，热浪炙人。由于流血过多，张震越来越感觉到头晕目眩，伤口的疼痛更加剧烈。他抓起水壶咕咚咕咚服下止痛片。每走一段路，陶股长就喂他一口水，并不时用毛巾蘸点水，擦去他额头上的虚汗。

就这样，他一步一滴血地坚持了5个小时，越过木樨地，穿过复兴门，顽强地向天安门开进。

凌晨3点半，张震艰难地支撑着身子，刚刚把汽车驶进西单路口，暴徒们就狂叫着扑了过来。突然，红光一闪，暴徒朝驾驶室开了一枪，击中了张震的右臂，顿时血流不止。紧接着，又是一道红

光，张震的右胸被火枪打成马蜂窝，鲜血直往外流。

“张震！张震！”陶股长抱住张震，大声喊道。

张震睁开眼睛，不顾一切轰起油门，想继续行进，可他的身子在一点点往下沉，右臂挂档时怎么也使不上劲。

“股长，快帮我缠住胸部。”

陶股长把一条毛巾撕成4条带子连接起来，垫上急救包给他缠住胸部。张震连声说：“紧点再紧点。”

“张震，能行吗？”我问。

“只要我有一口气，就要把车开到目的地！”

张震失血越来越多，浑身发软，他让陶股长扶住他的右手，帮他挂档。他两臂趴在方向盘上，保证车辆平稳行驶。

“股长，我口渴得很。”

陶股长摸出水壶，摇了摇，一滴水也没有。不知什么时候，水壶被子弹穿了一个眼，水全漏掉了。

“张震，再坚持一下。”

张震吃力地点点头。

车轮在转，鲜血在淌。陶股长怀抱着这位同乡，止不住眼泪往下流。

此时，为保卫共和国，保卫首都，保卫人民利益的信念和神圣的使命感，在张震身上产生了神奇的力量，他那血染的身躯如一尊钢铁雕塑，一动也不动地耸立在驾驶室里。

4日凌晨4时许，车到新华门前，张震艰难地问：“股长，还有多远？”

“快了，还有200米……”

“我不能倒下，车不能停下……”

张震的眼皮已沉得抬不起来了，可他仍紧紧地趴在方向盘上，嘴里机械地重复着这句话。

从他的头部受伤至现在，他已整整坚持了6个小时；从他身中两枪到此时，他又坚持了快1个小时。在这漫长而艰难的6个小时的历程中，可真是“捱一刻，似一夏”啊！

4日凌晨4时30分，汽车终于驶到了部队的警戒区。

“张震，到了！”

张震猛地抬起头：“车上的战士和武器都好吗？”

“车上37人和武器装备全部到达！”

“后面的车队跟上来了吗？”

“一辆车没少都上来了！”陶股长答道。

张震扭头看了一眼新华门上的国徽，脸上带着胜利的微笑昏了过去。鲜血渗透了四个急救包，染红了衣服、坐垫，染红了方向盘……



“我是王强”

中尉干事 王 强

(一)

四连乘坐的卡车被烧，火势来得最快。

那辆车始终在我们前边，行至翠微路，猛烈的“砖石雨”就降下来，满天砖石象飞弹。我看得很清楚，疾驶中那辆车突然喝醉酒似的左晃右摆当即就向左侧翻倒了，后来我才知道是石块击中了司机的头部左侧。大火一下子冲起来，是油箱擦地炸开，形成车的前后左右全方位的燃烧，整个车厢象是侧着身漂浮在火上。这是6月3日晚10点。

此刻大部队在向天安门广场开进，严峻的情势已不允许部队主要领导留下来处理这事，我是团里的保卫干事，立刻请示团长、政委：“我去！”

我跳下了车。这一跳，就意味着我从大部队分离出来了。洪流似的车队滚滚而去，我留在了这里，就要在这“砖石雨”中孤军作战了。

四连这车上有38个人，在翻车中大多随着车篷杆和车篷被甩

了出来，飞出十几米远。有个战士头冲地，戴着钢盔使柏油地面出现好几米长的擦痕，牙齿也碰掉了四个。我也一时弄不清他们都伤在哪儿，车中还留下几个人没出来，火已将车厢包围，战士们还是冲进火的包围圈，将里面的五个人都拽了出来，摸出了枪支，又将驾驶室的门踹开，救出司机、营长他们。

趁着我们收敛枪支，自救互救，人群蜂拥上来，向受伤的人员砸石头，围着焚烧的车看热闹。我们想把伤员转移到路边去，四面全是人墙，无法突出去。我故意高喊：“快走开，车要爆炸！”前面的人一听这话，慌乱地往后跑，后边的不知怎么回事也跟着跑，我们趁机把伤员转移到路边。

董营长从消防队找来一辆消防车，扶进去10多个伤员。不一会那辆消防车回来了，我挺高兴，以为送了一车，再拉一车就行了，司机恼火地喊：“走不了，前边不让走，快让他们下来！”我一看，那些伤员果然还在车里塞着，只好又把他们折腾下来。

围过来的人越积越多，人墙在增厚，面对飞来的石头蛋子，伤员们无法躲，也无法跑，只能紧抱枪或是拿手护着头，其它部位就顾不上了。人墙步步逼了过来，我提醒战士：“注意武器！”这一喊有人就往后退，我明知枪里都没子弹，但还是大声吼道：“不能开枪，子弹不能上膛，关上保险。”有的战士明白我的用意，站起来端着枪。

这一招还灵，人们一时不敢贸然逼近。一位30多岁的群众摆着手过来：“不要打，我给你们想办法，赶快拦车！”

恰巧来了一辆小面包车和一辆黑色的小轿车，我给拦下了，从车后边装伤员。人墙又压过来，有人煽动说：“别让他们走，他们是把伤重的留下，把伤轻的送到车上了，是让他们去天安门广场

的！”

面包车内塞了十几个人，还想再塞几个，车已经开动了。小轿车里也扶进去了四、五个人。轿车刚一起动，有人就对我说：“那是大使馆的车！”是不是大使馆的车，我根本没顾得上注意，现经人这么一说，我害怕了，使劲跑上去追那车，追了20多米，车已经开跑了，跑就跑了吧，反正不会把伤员拉到外国去。

营长也找来一辆车，把剩下的伤员全转移走。

我带着18名没怎么伤着的同志转移到附近的通信兵部大院。

最愁的是失去了和上级的联系，人家大部队在执行最艰巨的任务，我们却在这儿躲啊藏啊，没人能再给分配任务。街上乱糟糟的声音传来，就觉得到处都需要我们。军人总希望任务召唤自己。我利用通信部大院的电话寻找军、师后指，真给挂通了，我一听是师炮兵秦主任的声音，心里立刻踏实多了，大声喊：“我是王强！”

我汇报了情况，记下了上级对我们的要求，很快又找到了军务处的李处长，我们这19名同志被编入预备队，有情况随时出动。

情况接踵而来。

先是老大哥团一辆卡车在附近熄火，车上有8名炊事员和连队的轻武器，人们已将车团团围住，受了伤的司机和一名战士跑到这里来，我通过电话向师里报告了此情况，师里要求：“让他们这辆车上任何人都不能离开，人在车在枪在。”我向他们传达了这个要求和上级要采取的援救措施。

没过多久，又有一辆卡车在附近被歹徒焚烧，我喊了一声：“有情况，集合！”我们预备队的同志集合起来就往外冲，一出门就高喊：“一、二、三、四”的口令，人不多，很有气势，人们不得不让开一条路。那辆被焚烧的车还在冒着火，有一位战士是从火中爬出几

米后死去的，身上大部分被烧焦了，有人还往尸体上扔石头，吐口水，这比刚才歹徒朝我们身上扔石头还令人难受。无论如何要把战士尸体弄回来，就派人回去抬来一副担架。我和四个兵走上前，谁都不忍动手，我先抓住被烧焦的一条腿，和其他几个战士一起把这个还不知姓名的战士的遗体抬上了担架。

(二)

想到被车送走的 14 名伤员还没下落，也不知道大部队开进了什么地方，我用电话请示过师炮兵秦主任，换了一身便装就出去了。

这已是 6 月 4 日凌晨，大街上，路面完全是由碎石碎玻璃铺成的，一眼望去，就可以看到 30 多辆被焚烧和砸毁的汽车，一辆还冒着烟火的汽车内有 5 个被烧成一团的战士遗体，再往前，便是被堵塞在一侧的军车。7 点 25 分，我正在木樨地大桥桥头，装甲车队轰轰隆隆开了过来，桥上是用电车构成的路障，只有两边还有窄窄的通道。有一部分装甲车通过之后，暴徒们从大桥的桥头和桥尾的四个方向同时朝装甲车队扔一种能发烟的东西，绿色的，茶杯大小，象放爆竹一样能响，烟很浓，我闻到了气味，当即流泪、咳嗽不止，看来是毒瓦斯。整个桥头全是浓烟了，对面不见人，两辆装甲车撞在路障上，后边的装甲车全被堵塞了。在桥头最早扔完的几个暴徒退下来，也不停地咳嗽，还说：“没用，白扔了。”“呆一会儿就行，有透气孔。”

没过多久，刚才撞到路障上的那辆装甲车里钻出四、五个战士，刚出来还不太紧张，使劲往河边跑，一个还拿毛巾捂着嘴。河

那边有人扔石头，他们就折回，朝反方向跑，这边也聚了很多人又追又堵，追上就打，几个战士绕着小树林跑，但怎么也跑不脱。我也赶紧追过去，追近了就告诉他们快往那边有武警站岗的大院跑。一个小战士身上没见挨石头却一下子栽倒了，人们忽忽拉拉包抄上去，手里都没拿什么家伙，只照着小战士肚子一脚踹上去，小战士叫了一声，翻了个身，又一只脚照着翻过来的脊背踹上去，小战士又一声叫，身子又翻了过来，另一个人也在抢着去踢，一踢翻一个个儿，人们都不弯下腰动手，只用脚踢，小战士很快就气弱声消了。

我挤进去，又不能表现得太热情，就说：“人家解放军都不行了，还打？”这话一出来就带泪音，这时候就顾不了这些了，我伏下身把小战士抱起来，托起他就往200米处的大院跑，我知道那大院门口有两个武警在站岗，另外几个兵边跟着往这边跑来了，一口气进了门，一进去大门就关上，外边怎么叫也不管了。战士们进去见屋子就钻，我托着小战士进了值班室，放到地上，他浑身是伤叫也不应，我以为不行了，就掏出了他的身份证，上面写着他是坦克部队的技工，河北容城县人。

这时小战士喊疼，说千万给他打一针，我一听知道还有救。人们围过来追根问底，打听他是哪个部队的，他只说了部队的新的代号，不说是哪个部队，有人说：“你说了我们好救你。”他不再吐一个字。

把这个小战士安顿好之后，我见街上被追打围攻的战士有增无减。有的歹徒蹿上了装甲车顶，眼瞅着他们为非作歹，我却束手无策，自己头一次感到了一个人的力量竟会这么小。当我和部队同志在一起的时候，包括在老山前线见习，尽管一个猫耳洞内只有

几个人，可那时随时保持着和上级的联系，随时可以呼唤战友和火力的支援，就象背着一个稳固的大山。现在自己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连一个军用电话也没有。我急了，我就不信一个大活人能让尿憋死。我连推几个房间，有个房间里有六部电话，都是地方线，有一台红色电话，有人说那是首长用的，我就拿起来直接要到了通信部部长那儿，通过部长问到了军后指的电话，我真没料到还会接通，是军后指的杨部长接的电话，我攥着这宝贝电话喊：“我是王强，我在中联部大院。”我把这里的紧急情况作了汇报，杨部长要求赶紧把新的情况搞清楚，随时报告。

上午10点，我和中联部保卫处的干事王水生一起出来，想多救一些战士到大院里来，王干事家住武警大院，听说歹徒要血洗武警大院，我问他怎么不回家去看看，他笑笑：“万一血洗，我在这儿，还能留下一个么！”

街上的装甲车被点燃了，一伙暴徒，从前往后，一辆一辆地烧。有人爬上装甲车用杠子乱撬，暴徒们把军装什么的扔到装甲车下面，倒上汽油，点着了，火也不大，就用这个办法来熏装甲车里的战士，装甲车成了一个烤炉，暴徒们不断往火里添些破布烂木头之类的让它慢慢烧，里边的战士烤得实在受不了啦，就不得不自动钻出来，头一个出来的光着上身，一出来就跑，还有一个没戴帽子的一出来就象迷糊了似的不停地给人们敬礼，但还是有不少拳头落在身上，也只好死命地跑。

战士一出来，放火的暴徒们就把被子点燃扔到装甲车里边去了，这一伙不打人，是专门烧车的。里边的火越烧越膨胀，火就往外喷，不时发出爆破声。

那个光着脊梁的战士身体很壮实，头上被石头击中了，淌血，

也顾不上捂，还是挺欢实地跑。人真经打啊，挨了这么多石头，还能跑。

我和王水生跑着招呼他们赶紧往那边大院去，告诉他们进去就不用挨打了，不信你们看门口不就是武警吗？但那个挺壮实的战士还是被撞倒了，没看清是用什么家伙撞的，当时见他吐白沫，我就说：“先把这个吐白沫的架回去吧！”我和王水生一人架一只胳膊，他见我俩穿便装，以为我们是歹徒绑架他，使劲想挣脱，好歹把这个战士架回了大院。

我们清点了一下，这三次出来，和中联部保卫处的同志一起已经把 62 名挨打受伤的同志转移到大院严严实实地隐藏起来。

就在这时出现了新的情况，直升机从这里飞过。我看见一辆装甲车顶上坐满了暴徒，这才知道里边是一个暴徒在开车，装甲车上的高射机枪在朝着天上射击，有人喊：“直升飞机再来，用这个揍！”

我赶紧拨通了电话，火速地报告：“我是王强，我是王强，暴徒正用高射机枪射击，企图打直升飞机。”

(三)

装甲车上的高射机枪都被暴徒拆卸了下来，有的被扔进河里，我见河中有支枪半截露在水面上。街上有几个人围着在摆弄一支冲锋枪，有个 40 来岁的人走过去说：“我是这个大院保卫处的，枪我拿过去！”他抄起枪就走，我有些不放心，担心他是骗子，就影子似地追着他，直到他真走到保卫处拿出钥匙开了门，我才走过去说明了身份，他也吓了一跳，慌忙解释说这枪是他缴来的，我说这我

都看见了。他就是中联部大院保卫处的刘处长。

上午 11 点左右，在木樨地见一个青年弄到一支冲锋枪，我想上去把枪缴过来，但围观的人很多。自己一个人不是他们的对手，就装做漫不经心地跟着他走。

机会来了，这个青年提着枪走进一条胡同，我环视周围，这里就我和他两个人，不知怎么搞的，离开嘈杂声和“砖石雨”，来到这样的胡同，静得森人，没有一个战友在身边，显得那么孤单。人家手提的是枪和子弹，不是烧火棍，只要食指一动给咱一梭子，上哪儿再找他去，谁还能知道咱是谁，连抚恤金也领不成了。可我也不能眼看着他把枪拿走。我走上前说：“这枪，不能往回拿。”

他站下盯着我，我劝道：“你最好交到那个大院保卫处去！”

他不在乎地看着我，反而问：“你是哪儿的？”

我估摸他是想知道我的身份，我就很稳当地说：“我是公安部门的！”

他忙说：“要交你去交，我不交！”

有了这话，我伸手就抓过了枪。他撒手就跑了。

这下我对收缴枪有了底，想尽可能多缴几支，以免流到社会上种下祸根。在大院门前有个市民把一支枪交给了中联部的杨局长，还说：“那边有人也弄到一支。”我听到情况，就象听到一道命令。走不远，果然见一个人拿着一支枪，旁边有个围观的端起照相机照像，他站了起来：“哥们儿，别来这个！”那人连陪不是。他挺神气的，一有了枪，人们都畏惧他几分。他用一件战士穿的衣服包枪，我就上去帮他包，还跟他聊了几句，然后和他相随着走。走到僻静处，我若无其事地问他住什么地方，他不说话，我说你把这枪拿回去没好处，我是公安部门的，还是送到大院保卫处去！这个人只

好把枪给我说：“你送算了。”

后来我又和保卫处配合缴回 8 支冲锋枪，2 支手枪和 10 箱子子弹。

(四)

又听到了告急电话，这是在大院西门，上千人把 69 个军人围困了。这个西门一直是锁着的，我绕出去一看，那些军人被逼进了自行车棚，黑压压的人群把这里围得铁桶一般，溜不走，也冲不出去。后来我才知道这 69 个人是 10 多个不同单位的干部战士，是被人们打散又驱赶到这里的。一位自称是大学生的人命令他们都乖乖坐下来，不得乱动，不得乱抬头。这些战士早已疲惫不堪，又挨过不少人打，无水、无饭，有的光着背，满手满脸都是黑的汗道子。人们对他们围而不打，还说在优待“俘虏”，这是世界上独有的手里有枪有子弹却听任人们摆布折磨的“俘虏”。

有人还在煽动群众向他们围攻谩骂。

由于这些军人大多互不相识，干部的标记都取了，没了指挥员，失去了和上级的联系，处于被动受欺的位置。我想找到他们的干部，他们根本不给回答，有个兵还说：“这儿没干部！”完全是一副宁死不出卖阶级兄弟的架式。我见有 4 人有些象干部，就挪动着凑过去，谁知刚蹲下，走过来一个胖乎乎的青年，他是人群中出头露面的人物，给了我一句：“你给我走，我不希望再见到你！”

显然他不是第一次见到，我在东门出出进进的活动他大约看见了，他要是向人们揭露我的身份，就糟了，我立刻转身往人群中挤，藏在人群中他就找不到了，谁知这个人尾巴似的，怎么也甩不

开。我就直奔王干事那儿，在他耳边说：“你看那个人，盯上我了！”王干事说他认识那个人，一直在这里活动，自称大学生，是个神秘的人物。

既然如此，我也神秘神秘让你看看，我说话中就故意朝他指指点点，他有些不自在，先到一边去了，我趁机绕进东门，给军后指打电话：“杨部长吗？我是王强，现在有 69 名军人被围困在自行车棚……”

上级明确指示，想办法帮助他们往军事博物馆转移，并提出具体要求。

天开始下雨，围观的人少了一些，我回到那个志愿兵身边，把情况给他讲了，他相信了，就把旁边的一个连长“出卖”了。

我向连长转达了上级的安排。听到这个消息，他们就开始做准备。中联部派车由我和王干事先去军事博物馆找部队联系接应的事，在当时环境中没人接应，这 69 人是很难安全转移的。

谁知那个自称大学生的神秘人物也在车上，他说要和王干事一起去联系，一定要让解放军安全转移，王干事同意他去，他在围观的群众中说话挺灵的。

我们举着手走向军事博物馆，象是投降的那种姿势，我知道这里受过暴徒的多次冲击，我们穿便服，真担心会把我们当成冲击这里的暴徒。

转移的事很快谈妥了，但那个神秘的人物反复要求一定得派车来接应，我想万一这个人不可靠，要是他采取引蛇出洞的办法，等我们接应的军车一出来，暴徒就用火焚烧怎么办？我坚决不同意出车接应。回来时雨停住了，路上又堵满了人，谣言满天飞，我临时决定这 69 人暂不往军事博物馆转移，先瞅机会把他们接到大

院里来。

在周围人少一些的时候，保卫处的同志把西门打开了，69个人转入进来，也跟着冲进了一些群众，不多，很快就关上了门。

这69个人被安置在车库，我按照上级要求的精神，把干部集中起来开了会，一共是7个干部，大多互不相识，有的单位只有士兵没有干部，有的单位只有干部没有士兵，我把69个人编成5个战斗小组，由一位连长和一位指导员全面负责。浮动的人心平静了。保卫处的刘处长他们都来到了车库，大家很快进入了休息状态。

我睡不着，大街上人们还在肢解拆卸装甲车上能搬得动的大小部件，这个大院还另外藏有18个军人，是他们在6月2日化装深入时被人们认出来追打而跑到这里的，被藏到了地窖里。我把这些情况向上级做了汇报，上级要求必须保证这87名同志的安全。

本来已背着背囊回家去的那神秘的人物又突然出现了，在各处打听情况。大门外聚的人也越来越多，很可能会冲击这个大院。我和大家商量了几种转移方案，化装转移枪支不好带，有的士兵说话走路都带兵味。不化装转移又必须有接应，还需要在天黑才能进行。几种方案，都未能实现，多盼望上面来人啊！

就在这时，来了两个人，穿着白衬衣，有一位是军区政治部的孙忠泰副处长，是军区听到了这里有87名军人的情况后，派他们来看望大家的，路上车辆还无法通行，他们就骑自行车来，当面商讨夜里安全转移的方案。

孙副处长问：“谁是王强？”

我真动了感情，人们都说我们保卫干部铁石心肠，这时候我真

想哭，自己听着声音也变了：“我是王强！”

深夜，我和一名副指导员在前面引路，全副武装的 87 名同志按预定方案在 4 点 30 分走出大门，4 点 50 分和接应的部队汇合，5 点钟转移到了军事博物馆。

他们都安全。

蘇子如
舟

脱 险

少校营长 周美清

6月4日清晨7时许，我团大部分车辆受阻于木榔地桥头西侧地段。

我带019装甲车从后侧插上来，先后以高速撞击、低速推挤7次，都没有冲开路障，两辆横在路上的公共汽车死死地抵在路边的台阶根部。七九年入伍的特级驾驶员徐棒田和我摇了摇头。

我转动潜望镜，见我车左侧是友邻部队的车辆，右侧是高压电线杆，尾部又被429装甲车顶住了。

原先站在公路右边台阶上向我们疯狂投掷砖头、石块的暴徒，趁机手持木棒、铁棍、镐头、燃烧瓶蜂拥地围了上来。3个留长发和一个穿“T恤衫”的男青年声嘶力竭地叫喊着：

“打死他们！”

“烧死他们！”

顷刻间，潜望镜就被敲碎砸烂。“呼、呼……”随着十几个燃烧瓶的破碎声，暴徒把车烧着了。

我赶紧命令同志们：

“准备灭火。”

驾驶员徐棒田迅速打开车窗站起来，上身刚探出车外，迎面一

块半截砖头打在额头上，他当即倒在驾驶座上，血流满面。紧接着三颗瓦斯弹从驾驶窗滚进车内。顿时，车内烟雾弥漫。不一会儿，就感到肺部象撕裂了一样，呼吸急促，头晕目眩。

我距离瓦斯弹最近，中毒最重，已经浑身无力。我心里明白，车内黄烟滚滚，人员马上中毒就要昏迷；车上烈火熊熊，油箱随时可能爆炸，大家的生命已经在万分危险中了。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我一边剧烈地咳嗽着，一边上气不接下气地命令大家：

“同志们，带上轻……轻武器，保护好伤……伤员，我们徒步前进！”

我吃力地打开车窗，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看到刚下车的通信员魏强，被七、八名暴徒围打，昏倒在地，可是他的怀里还死死地抱着冲锋枪。我伸手去摸手枪，竭尽全力喊道：

“住手！”

恍惚中，我感到有人正架着我急走。我艰难地睁开眼睛，看到两位穿白衬衣的中年人架着我的两臂，连拉带拖地向前跑，我一边无力地挣扎，一面用沙哑的声音说：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我们是中联部的，是来救你们的！”

右边 40 多岁的同志说。

当我们走出离装甲车 20 多米远时，身后传来一声巨响，油箱爆炸了。我回过头来，看见整个装甲车被烈火吞没了，火苗窜了 10 多米高，我痛苦地闭上了双眼。

暴徒扔下燃烧的装甲车，又把我围住，有的狂叫：

“这是当官的，把他留下，打死他！”

几名暴徒在身后不断用脚踢，用石头砸。一个穿花格衬衣的

暴徒，猛地窜到我的面前，一边辱骂，一边撕烂我的军装，后来又是一阵拳打脚踢，几分钟后，我已经遍体鳞伤。

中联部的两位同志不断地向周围的人们解释，并用身体护着我。他们的身上被砸伤多处。

在危急中，又有七、八名同志冲上前来，把我抱进了中联部。

我被架进了东门值班室，在三间不到 40 平方米的房间里，挤满了我们的伤员。有的同志中毒昏迷、四肢抽搐；有的同志头破血流，遍体是伤；有一位同志的脑浆从头顶的伤口流了出来，躺在地上已经不省人事。我注意到，我车的 9 名同志已都被救出来了。中联部保卫处长带领十几名同志，正在进行紧张的抢救和护理。他们把衬衣、窗帘撕成布带为受伤的同志包扎伤口；用凉水擦拭中毒的同志身体，把湿毛巾敷在额头上，并不时鼓励和安慰伤员们。

我被他们扶在椅子上刚坐下，身子就不由自主地倒了下去。一位同志急忙把我抱在怀里，给我喂水，另一位同志把凉水洒在我身上后，轻轻地按摩着。

这时，有一位同志在不断地拨着电话，焦急地与各个医院联系，要求派救护车来。

突然，前后窗的玻璃被打碎，室内不时扔进砖头、石块和鞋子，在院外叫喊的暴徒冲到了院内，把值班室团团围住，有的堵住窗口辱骂，有的在人群后狂呼：

“把他们交出来，不交出来，就把房子点了！”

“先杀当官的，后杀当兵的！”

有几名暴徒在门口冲了 3 次，企图抢走伤员。

保卫处长指挥几个强壮的小伙子堵住。看到地方同志舍身救护子弟兵的情景，我们许多伤员流下了热泪。

经过护理，我们的身体有些恢复。我立即与步兵营副营长王长柱，步兵二连排长张拜和步兵三连技术员吕金武一起登记伤员的单位、姓名，了解掌握情况，与保卫处长商定转移方案。

307 医院的一辆救护车终于来了，我们研究决定，重伤员和青年、团员先走，轻伤员、党员和干部后走。中联部的同志在房门口与东门口之间，手挽手组成两道人墙，我们每 4 个轻伤员拉着一个重伤员，其他人相互搀扶着上了车，这样分 5 批被接到 307 医院。

我们 4 个干部和 9 名党员是最后走的。上车前，我紧紧拥抱着保卫处长，抚摸着他那被砸伤的臂膀，热泪不住地滚落下来，千言万语只凝结成两个字：

“谢谢！”



在协和,有三十四名伤员……

军医 杨容娅

6月4日是我盼望已久的日子。我将要参加在京召开的中美国际皮肤病专业会议并在会上交流论文。作为一名刚刚毕业的研究生,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机会呀。

7点30分,我便骑车奔向协和医院。今天路上非同寻常,马路中央布满了水泥墩、人行护栏等路障,小巷深处站着一群群静观事态的居民。听他们说,戒严部队昨晚已开赴天安门广场。北京,笼罩着紧张的气氛。想必今日的中美学术会议不会按期进行了。

自从今年元月来到北京市协和医院进修,转眼已经半年了。我想:“今天是星期天,医院的值班人员少,工作一定会很紧张。”想到这些,我没有再过多地停留,急忙向医院急救室走去。

急救室的病人比往常多好几倍,大多数是外伤,我帮助包扎、止血、上药。约9时左右,我跟随医院的救护车往中日、安外等医院转送伤员。中午12时,我又回到体疗室,继续参加救治。

体疗室是医院为应付紧急情况而临时设置的,内有30多张床,床上躺着许多伤员。我发现楼道地铺上有一位解放军战士,便走过去,一检查,发现这个战士左手动脉被打断,已做了初步处理,便小声问:“同志,你是哪个部队的?”小战士用疑惑的目光扫了我

一眼，一声不吭。

我真有点着急，悄悄说：“把军装脱下来，不要说话。”

这时候，协和医院五官科总支方书记小声告诉我说：“有不少部队伤员被送进医院，为了安全，已将他们藏了起来。你是军医，能否去查看一下他们的伤情？要小心，注意保密！”

我立即答应了，跟随医院保卫处牛进凯处长来到这些伤兵的藏身之处——住院部大楼○层的一间内分泌功能实验室。一进屋，带有血迹、满是汗水的受伤官兵，立即紧张地警觉起来。牛处长马上向大家介绍说：

“这是杨医生，是来给大家医治伤口的，大家有什么不舒服都可以对她讲。”

我开始检查伤情，询问他们注射抗菌素及破伤风抗毒素的情况。多数人的伤口已经过缝合及处理，少数人因当时情况紧急，伤口没来得及处理。人多，房间较小、门窗紧闭（为了安全），空气不流通，室内温度较高，不少人的伤口开始出现感染，个别人的伤口有渗血，这些伤口均需要做进一步的处理。我迅速返回体疗室将这些情况向方书记讲明。方书记说：

“你是医生，你说怎么办？”

“派一名护士来，我们做进一步治疗。”

方书记的行动很快，一会就叫来一名护士。我们3人带着一些药品、注射器和找来的食物，绕道来到了内分泌室。护士负责做皮试和打针，我负责检查伤口、清创、换药，方书记也动手帮忙。一一诊治完毕后，我们又将剩下的几瓶生理盐水留给战士们喝，然后把内分泌实验室的门锁好、灯关上。

现在得想办法给战士们补充食品，没有营养，无疑是雪上加

霜。下午4时左右,我和保卫处任干事去食堂领到8瓶酸牛奶,送到医院东门附近的一间消防器材仓库内,这里还隐藏着另外4个战士。我给他们检查了伤情。其中一位叫刘修的战士,因过度疲劳和精神紧张,不停地出虚汗、出现虚脱,神志有些恍惚、嘴里不停地喊叫着:“闷呀、痛呀、渴呀!”我找来两瓶生理盐水,任干事又找来两壶开水,先后给他们送去。

从4日凌晨1点多钟起,协和医院门口就围聚了不少暴徒和近万名群众。人群前推后拥,要冲急诊室。暴徒们不时地叫喊着“砸烂协和,烧死伤兵”的口号。混乱中有些暴徒钻进医院体疗室,手里拿着酒瓶、砖头、石块等要砸受伤的战士,均被医务人员阻挡回去。围攻持续了十几个小时,医院门前仍被围得水泄不通。我每次来到医院门口,都见人群不散,喧嚣声不停,谩骂声不断,“当兵的滚出去!”“不许给当兵的治疗!”等等。有的人揪住医务人员的白衣,举着酒瓶子问:“伤兵在哪里?不说就打死你!”少数暴徒闯到体疗室寻找伤兵。为了这些伤兵的安全,医院对解放军伤员的住处绝对保密。除我们少数人外,其他人都不知道。尽管如此保密,我们几位同志来来回回的行踪也免不了引起人们的注意和猜疑。我们打饭时,有人就问:“给谁送饭呀?”我们领药品,也有人用怀疑的目光跟随着我们。凡遇到打听解放军伤员者,我们都想办法支吾过去。但这终不是长久之计,时间一长,会不会暴露呢?医院领导很着急,我们几个人也很着急,老这样藏着,不是个办法,各方面的条件均受到限制,不仅伤口会出现感染,而且也很不安全,一旦走漏风声,后果将不堪设想。为此,协和医院多次和北京军区总医院电话联系,可一直没联系上。我是北京军区总医院的医生,人熟些,就向牛处长提出:“把和部队医院联系的任务交

给我吧！”牛处长同意了，立即带我到医务处，但看到前来医务处办事的人员较杂，联系不方便，我就随牛处长来到保卫处房间。电话很快就拨通了，接电话的是正在医务部值班的科技训练科科长蔺学兰。我汇报了协和医院34名部队伤员的情况，讲明协和医院的处境和困难，并转达了协和医院要求总院派车来接伤员的意见。蔺科长当即请示有关领导后回答说：“我院派到天安门广场抢救受伤解放军战士的两辆救护车，途中一辆被烧毁，一辆被砸坏。司机和几名医务人员被打伤，但请放心，我们尽快想办法去接。”

4日下午，在等候军区总院来人的过程中，我又多次去查看34名伤员的情况，又给他们送去几瓶生理盐水，询问了他们的伤情。有一名叫李金辉的战士，由于头部棍棒伤疼得厉害，不想吃饭，我劝他道：“坚持下去，身体是本钱，说啥也得吃点。”我和伤员们谈家常，聊执行任务情况。他们精神好多了。一位脚部受伤的战士哽咽着说：“杨大姐，等我们养好伤，一定要列队给你唱一支《战友之歌》！”

下午5时左右，我和牛处长再次要通总医院电话，电话说：“军车暂时出不去，再说用车接伤兵目标大，也不安全。我们已派出接应小分队到协和，因为协和医院门前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围住大门，根本无法进入，只好暂撤回再想办法。”

我在电话里告诉总院：

“东城区政府已送来30套便衣，能否乘天快黑时将化装的伤员三三两两领回去？”

总院领导和医务部领导商量后很快回电话说：“派出的接应人员已出发。”

我立刻和牛处长来到内分泌实验室及消防器材室通知大家迅

速做好转移准备。大家换好便装，洗净脸，整理完毕后，我和牛处长再次和大家交待了转移途中的有关注意事项和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要求大家相互帮助、听从指挥、注意安全，和前来接应的人员合作。一切安排就绪后，我和牛处长赶到医院大门前接应。

这时已是晚上8点多钟，医院门口仍聚集着不少人，在这里执勤的医院工作人员也较多，大门紧闭，闲杂人员不许进入。

有人问我：“只见当兵的伤员被送进医院，为何不见出来？是不是把他们藏起来了？”

又有人说：“医院里找不到伤兵，不知道他们都去哪了。”

还有人叫嚷：“当兵的不敢出来，你们别给他们治疗。”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仍不见来人，我担心总医院的人会不会走错了路，或者出了什么事。我告诉牛处长等在门口，我出去迎接，牛处长点点头。我出了医院大门，穿过人群向右拐，经过中央美院门前的小路又拐向校尉营胡同，向着总院的方向又走出一段，直到米市大街，仍未碰上总院的来人。停留了一会，我突然发现自己是穿着白大褂跑出来的。这段街道上几乎没有什么行人，显得比以往安静，静得有些令人生畏。偶尔，还听到几声枪响。我感到自己好象是这附近一个极引人注意的目标。说真的，我不由有点害怕。抬手看看表，已近夜11点，总院的人估计来不了了，我几乎是跑步返回了协和医院。和牛处长又打电话询问，方知总院派出的小分队在南小街口处受阻。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让战士们等了这么久，结果还是出不去，怎么办？可又一想，也好，这么晚了出去，路上一定不安全。于是我赶紧来到内分泌室，战士们已关灯休息了，我叩了两下门没动静，又叩了几下，战士们听到我叩门的暗号迅速打开门，我有点不好意思地向战士们做解释，告诉他们外面的情

况，请求大家多多体谅两个医院的难处。大家对眼下的处境非常理解，有几个人对我说：“杨医生，我们没关系，可你要注意安全。”

夜 11 时 30 分，在院领导和保卫处的安排下我和任干事来到食堂准备给伤员打饭。管理员见我们推车进来问：“给谁打饭？”

“给急救室的病号打饭。”小任回答。

“病号半夜吃什么饭？”管理员不解地问。

我慌忙补充：“给病区的病号打饭。”

忠于职守的管理员更怀疑了，小任赶紧给院领导打电话。听到指示，管理员立即递过来一盆稀粥和一些馒头、咸菜。

我们推小车，带着碗筷，分别把饭送到了伤员手中。在他们吃饭时，我和伤员中的一名连长刘奎堂商定，第二天一早由我先带 2 名伤员回军区总院，汇报情况并联系转院问题。尽快设法在第二天内将大家都转送到军区总医院。大家是完全信任我的，似乎此时只有我说了算。越是这样，我越是感到自己的担子不轻，回到病房，我还是静不下心来，脑袋嗡嗡作响，感到又累又渴……

6 月 5 日清晨，我在体疗室遇见协和医院陆副院长，我告诉他准备回军区总院一趟，联系转送伤兵之事。院长叮嘱我路上注意安全，快去快回。

我来到急诊室，忽然发现一位熟悉的病人，他是司机，我曾为他治过病：他正要开一辆双排座的货车出门，我忙喊：“等一等，捎我一段。”司机答应后，我又找来连长和头发较长、面部无伤的战士关俊印，告诉司机说：“这是我的两位老乡，来京玩，被困在这里了，把他们和我一起捎回去吧！”司机答应了，很快我们乘车平安地来到总院大门口。我们径直找到医务部施凤池主任，施主任立刻找院领导商量，制定了化整为零的转移方案，并迅速安排刘连长

和小关住院治疗。方案商定后，施主任又赶快向军区有关部门请示。头天夜里医务部及院里的领导们就一直在谋划着这 34 名伤员的转移方案。

5 日上午大约 10 时 30 分，在接到军区有关部门的指示后，医务部施主任、杨主任找来身强力壮的张兴义和刘桂珍两名助理员，向我们 3 人下达了任务，让我负责和协和医院联系，由他们派出两人配合，组成 5 人临时小组，负责 34 名伤兵的转送。

中午 12 点我们来到内分泌室，先挑选了 6 位头发稍长、面部伤少和伤口较隐蔽的伤员，经化装后由我和任干事、王干事各带 2 人，错开时间，拉开点距离，尽可能避开人们的注意，来到医科大门口。刘助理及张助理各负责带 3 人，相互间也拉开距离，但又能彼此照应，他们徒步走向军区总院。

首批伤员出发后，我骑车来到街上，从东单头条起到隆福大厦，又折回王府井寻找鞋帽，可大部分商店门窗紧闭，近一个小时我没找到一家买鞋帽的商店。返回医院，任干事告诉我说第一批伤员已安全到达军区总院，很快又来接第二批。我赶紧来到内分泌室为下批要转送的伤员做化装准备。因找不到帽子，我只好同伤员商量，折除了 3 位战士头上的纱布，用酒精消毒，再敷上些药膏。没有鞋，王干事从医务人员那里借来 8 双。

15 时 30 分，张、刘二人领着两位女同志出现在医科大门前，她们又带来 10 多双新买的布鞋。和前批同样的方式，我们又带出 6 个伤员。张、刘二人用自行车各带两个，两位女同志各带一个，第二批伤员又安全转移总医院。

还有 20 多名伤情较重的伤员，多数行动不便，另外便衣、鞋帽都不够用，化装起来比较困难。总医院一直在设法找车，万一不来

车，如何是好？我心里很着急。伤员也有些担心。我一边安慰大家，一边寻找帽子。

17时15分，总院借来3辆出租车拉这20名伤员。伤员轮流戴着我的太阳帽两个两个地出去。第一车带着6个人开走了。第二车先绕到协和医院东门接上藏在这里的3名伤员，又绕到医科大正门处接上3名伤员，装满6人又开走了。东门消防器材库内剩下刘修一人，因身体过度虚弱和精神紧张不想走。我动员他离开，并搀扶他走出院，上了汽车，然后车又绕到医科大门口，我们将剩下的几名伤员全部送上了车。看着这最后8名伤员全部上了车，我心情难以控制，忍不住流了泪。

最后一批伤员走后，我随王干事、任干事回到内分泌室和消防器材室，收拾清理了伤员们留下的军衣、皮鞋、袜子、皮带、挎包、水壶等物品，此时正好碰上前来询问伤兵转移情况的两位副院长。当他们得知全部伤员都已安全转送到军区总院后，激动地对我们说：“谢谢北京军区总医院的党委、医务部及医务人员。”我当即也向两位领导及保卫处的同志转达了军区总院领导及医务部的谢意。

18时30分，我随前来还鞋的总院张助理一起返回总医院，见到了一直等候着我们的院领导及医务部两位主任。向领导汇报完情况，我才觉得特别的累，30多个小时没有合眼，没有吃一顿象样的饭了。此时我只想睡觉，我觉得能美美睡上一觉，就太幸福了。

（张梅珍 崔长生 邸过海 李建辉 整理）

送“神枪手四连”去广场

司机 吕敬东

“师傅，请停车——”

路上人很多，又有路障，嘈杂声灌满耳鼓，所以，路旁一位解放军同志的喊话我听得有些模糊，印象挺深的是他连连向我打着的手势。

这是6月4日凌晨，我驾驶解放牌CA141卡车到河北高碑店送货回来，在玉泉巷环岛附近听说前边有人拦车当路障，就开车到了朝阳区高碑店，打算从通县走李桥回家。刚出路口，就看到一辆东风240军车被烧，路途受阻。我一想，干脆跟戒严部队的车队走吧。正走着，发现前面一辆军车停在路边，我正打算错车开过去，就见那名军人做出了让我停车的手势。

“师傅，我们到天安门广场执行任务，车出了故障，你能帮忙把我们送到广场吗？”

车门还没打开，那位解放军同志便急急地向我说了起来。我边听边顺他手指的方向一看，见那辆车上有20几名战士，石块、砖头、汽水瓶从路两侧向他们飞去，雨点一样打在车上、战士身上，钢盔叮叮咚咚响，一些人正在向他们逼近，喊着：“当兵的车坏了，打死他们，把车烧了！”军人们怀里都抱着枪，可他们就那么任人打

着，好象怀里抱着的不是枪而是烧火棍——不，连烧火棍也不如，烧火棍也能回击、自卫呀！

我看得焦灼、愤怒，不是滋味。当时我就想，就是搭上命，也不能让这些解放军在这儿挨打。我一挥手：“快叫大伙上车！”我和我身边的那位解放军（后来知道他叫许广福，是一位指导员）都觉得军车不能扔在那儿，那样非让暴徒们烧了不可。我从驾驶室找出一根粗绳子，折成四股，一头拴在那辆军车的车头，一头拴在我的车尾，向天安门广场驰去。

“别放过这辆地方车，那上边有当兵的！”

“打死那个开车的，他是叛徒！”

“打死他！打死他！……”

我的车成了众矢之的。砖头石块急雨样打来，挡风玻璃、车灯、倒车镜全碎了，许指导员脸被打伤了，我的腿也被玻璃扎出了血。由于路障多，拖车的绳子拉断了，也顾不上那辆军车了。凭着对北京道路熟悉，拐弯抹角绕过重重路障，只想着尽快一点冲出包围赶到天安门广场。

5点多钟，我们终于赶到了天安门广场。

当时广场的气氛还相当紧张。我和连队一起来到他们的首长面前，许指导员上前报告：“报告首长，神枪手四连奉命赶到！”

接着，许指导员把我介绍给他们的首长，首长紧握着我的手连连说：“谢谢你，谢谢你！”

我一句话也没说出来。我说什么呢？这些手里握着枪、却被砸坏了军车、很多被打得头破血流的军人，竟是全军赫赫有名的“神枪手四连”的官兵！比比这一切，我做的这点事算什么呢？

（赵广志 整理）

在机要车被围困的时刻

中尉参谋 邓 炜

6月3日凌晨，我团执行戒严任务的1千多名官兵从河北省三河县一带出发，奉命向首都开进。我和机要股长李聚刚带领电台台长刘虎林、宋开银、报务员罗国元、熊立岩、驾驶员朱金玉乘一台轮胎式电台车随坦克车队前进。6月4日凌晨6时半，车队被堵截在朝阳区垡头一带。不一会，我们便被包围了，由于前后是坦克和装甲车，我们这辆没有“铁甲”的电台车，便成了歹徒施暴的“重灾区”，砖头、石块、汽水瓶雨点般倾泻到电台车上，汽车玻璃被打得粉碎，我的左臂、驾驶员朱金玉的脸部被碎玻璃划伤。鲜血染红了我的军衣，汗水和血水模糊了小朱的视线。歹徒们并不就此罢休，他们一拥而上，有的用钢针扎车胎，有的上车抢我们车上的背包、挎包、水壶。我们几个人死死抱住电台、密码和唯一的一支冲锋枪。尽管那里有10发子弹，但是李股长却死死地把它压在身下，大家明白，只要一旦发生冲突，电台、密码就都保不住了，所以不管他们怎么踢打，我们几个一声不吭，大家只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只要保住电台和密码就行。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殴打和浩劫结束了，我们望着满车狼藉，首先想到要保证电台及时收发报及时传达上级的指示和部队的报告，使首长能够实施正确果断的指挥。

于是，我们把电台转移到了车内一个隐蔽的角落里。我和股长李聚刚、台长刘虎林、报务员罗国元组成人墙堵住已被砸开的车窗，保护着宋开银、熊立岩迅速地收发电报。我们的后背几乎不断受到砖头、石块的攻击，不管谁被砸倒了，都咬着牙不吭一声，又毫不犹豫地站起来堵住窗口护住电台。我一共被砸倒了16次。大家的背部、衣服都砸破了，皮肉裂开了，血水夹杂着汗水浸泡着伤口，疼痛难忍。忽然我急中生智，让大家把钢盔背到腰上，脑袋顶着车棚，这样我们4个人身后的钢盔聚集在一起几乎占满了整个车窗。腰部和外部接触的面积明显减少了，石块、玻璃瓶和钢盔的撞击声虽然不绝于耳，但减轻了皮肉之痛。但是，闷热、口渴、饥饿又向我们袭来，车内的温度计已指向摄氏41℃。我们几个早已浑身湿漉漉、血乎乎，车内狭小闷热的空间，几乎让人窒息。此时已是6月4日下午4时，我们已被整整围困了10多个小时，已经23个小时没有喝过水、吃过东西了。人是铁，饭是钢，我们必须保持一定的体力，决不能垮下来。可我找了半天，只发现了7块脏乎乎的饼干和一个被砸破的军用水壶。为了使大家保持体力坚持战斗，我和李股长动员大家每人吃一块饼干充饥，可大家谁也舍不得吃。最后李股长只好把饼干分开，命令大家吃下去，人称大肚汉的报务员罗国元伸手刚接饼干，裤子就滑到了大腿根，小罗提起裤子一看，原来是裤腰带的眼儿不够用了，他顺手捡起一把锥子又在腰带上钻了一个洞，才把饥肠辘辘的肚皮制服。大家的嘴唇干裂了，血从裂缝里流了出来，用手一抹象涂了口红。我以前曾听说过牙膏能防唇裂，就给每个人的嘴唇上涂了一层雪白的牙膏。猛一看去，真象“小丑”，我忍不住笑了，大家也都笑了。一笑嘴唇上又渗出了点点鲜红的血水。

这时，前面的路障已经排除，坦克车向前开进，随着一声轰鸣，电台车紧随在后面向前冲去，突然，十几名市民出现在车前，为了怕撞伤群众，司机一个急刹车停了下来，瞬间电台车就被人群分割包围了。我猜测，一定是有人对车上耸立的天线和传出的电台“嘀哒”声注意了。果然，几名歹徒喊叫起来：“快砸这台车，抢走他们的电台，让他们指挥失灵！”接着我的耳机便被一个歹徒夺走了。没有耳机，就等于没了耳朵，我不顾一切地跳下车去和歹徒扭打在一起，在地上滚了几个来回，硬是从这个比我高出半头的“大块头”手里把耳机夺了过来。耳机保住了，但我的下巴却挨了“大块头”的一记“下勾拳”，牙齿也给打活动了，我吐了吐满嘴的血水，不服气地瞪着“大块头”，把耳机攥得紧紧的。

歹徒们暴怒了，他们纠集了30多人开始掀车，还有的砸开车上的油箱准备点火，事不宜迟，在车上多呆一分钟，电台密码就多一分危险。在这危急时刻，股长李聚刚当机立断，决定舍车救密码，他命令大家携带电台、密码转移到离我们大约50米远的一辆兄弟部队的军用卡车上。大概他们看出了我们的意图，李股长刚一探头，就被砸了回来。怎么办？这时车身已在倾斜，车头已被点燃，我们死了不要紧，电台密码就全完了。李股长急了眼，他下令我们成菱形保护电台一呼而冲，给他们个措手不及，由自己断后。时间紧迫，不容分辩，我们抱紧电台密码一起冲下车去。也许是我们的无畏精神使歹徒们恐惧了，或者是我们用牙膏涂的白嘴唇和周身的血污使人们惊懵了，歹徒们在我们奋勇的突围面前怔住了，我们趁机冲了出去。瞬间，歹徒们醒悟过来，他们象受骗的赌徒，把仇恨全倾泻在了断后的李股长身上，顿时李股长被打倒在地，歹徒们拳脚相加，只见一个家伙凶狠地抄起一个酒瓶子朝李股长的

脸上砸去。“啊呀！”李股长一声撕人心肺的惨叫，捂住了左眼，我们不顾一切地要冲回来救援，只听李股长大叫：“邓炜，快跑，别管我！”接着便没声了，我们爬上后面一辆军车后，看到从人群里突然冲出一位穿白大褂的40开外的女同志，她大声哭叫：“别打了！他是我弟弟！”她边拉起李股长边说：“快跟我回家。”歹徒们罢了手，李股长被她死拽硬拉地救了出来，这时一个带眼镜、头裹白布条的高个子青年冲着这位女同志骂开了：“你她妈的糊弄谁？他讲的明明是一口山东味，你撇一口京腔！”女同志头也不回地厉声说：“他是我爱人的弟弟，你管得着吗？”高个子这才怏怏地走了，我顿时明白过来了，她是在设法救我们啊。当时，我的泪水刷刷地往下流，真想扑上去喊一声：“姐姐，您是我们的救星啊！”

李股长被救到垡头门诊部后，医生们给他进行了包扎，可他始终惦记着电台和密码，询问我们的下落，当得知我们已安全转移到军车上后，不顾医生的劝阻，在医生的搀扶下又来到卡车前，命令我们立即查对设备，要尽快和部队取得联系，誓死守住电台和密码，说完就昏倒了。我命令小宋陪医生一起把李股长送到医院进行抢救。

经过查对，我们发现还少一部802电台，这时我看到电台车头已是烈焰升腾。决不能让歹徒损坏电台！我快速冲刺到车前，要向里钻，周围的人们惊叫了：“当兵的不要命了！”我冒着烈火钻进车里，浓烟呛得我几次跌倒，但我终于在车箱角落里把电台抱了出来。我刚跳下车，身后“轰”的一声，电台车淹没进火海里。

我刚回到这辆车上，又被人群围住了。为了保证密码、电台的绝对安全，我一面命令迅速开机和部队联系报告我们的情况，一面打开密码箱，把密码本和密码机一个个拿出来，化整为零分到大家

手中。大家神情严肃地看着我，我抹了一把满脸的烟黑，低沉地说：“我们万一被冲散的话，一定要把这些东西交给咱们军队的机要部门，大家知道，如果密码出了事，我们整个戒严部队的指令便会被坏人控制，况且，他们还与国外敌对势力有勾结，密码一旦被他们夺去，后果不堪设想，我提议大家宣誓。”我和几名战友相视着默默念道：“人在密码在，誓与密码共存亡！”

后来，几经周折，我终于找到了兄弟部队的一位机要处长，在他们的协助下，将密码和电台转移到了安全地带。

7日，我们携带密码、电台随部队平安地到达了天安门广场。当得知上级机要部门的同志还没上来时，便主动请求接受办理电报的任务。得到批准后，我们迅速展开了工作，使上级的指示精神，及时地得到传达。

转院途中又遭歹徒围攻的李股长，终于在医护人员的掩护下清除了眼睛里的玻璃片，保住了左眼，他在住院期间，受到了吴学谦、李锡铭、陈希同、洪学智、秦基伟等领导同志的接见。中央领导同志对我们舍身忘死保护密电码的事迹给予高度评价，赞扬说：“你们保住了党的核心机密，立了一大功！”

(许金来 整理)

油槽车历险记

下士 刘洪林

北京的6月，天地烤得象下了火。火的影子每时每刻都在我的脑海里闪动。我与火打过不止一次交道：驻地居民房里着火我救过，山林失火我扑过，可心情却从来没有象6月4日那天那样紧张过。

那天凌晨4点，我驾着一辆满载汽油的油槽车随本部车队向天安门广场进发。当军车行至体育馆路时，我们突然被数千人团团围住。一伙穷凶极恶的暴徒对军车又砸又拆，对军人又打又骂。

3个暴徒蹿上驾驶室，扯着我的衣领子要我下去点油车。我刚想解释，一个家伙当胸就给了我一拳，瞪着眼睛对我嚷道：“不让烧车，我先揍死你。”我看着周围数千名群众和四周丛立的楼群，心想油车要是让他们点着，那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

我们其它的几台军车已经被暴徒们砸坏，有的已被推翻，几个暴徒拿着火把和燃烧瓶将军车一一点着，火光陡起，车在燃烧，我的心在滴血。两个拿着火把的暴徒直奔油车而来，我的心突地一下提到嗓子眼：不好！正当两个家伙要点火时，我一下子跳出驾驶室大喝一声：“不要命了！一点火油车爆炸，谁也跑不了。”两个暴徒呆呆地站在那里不敢靠前，愣头愣脑地问我：“车上真有汽油？”

我一看有门，便对他俩、也是对其他群众解释说：“油罐子里有油，满满的。这是我们的油料保障车，如果点着了，一罐子油当场就会爆炸，谁也跑不了！”

几个暴徒看着已经围得水泄不通的人群，情知点着之后自己也跑不了，便声色俱厉地说：“我们到附近把油放掉再烧车。”“对，把油放了，把油放了！”喊声一浪高过一浪。

面对凶残的暴徒，怎么办？莫不如把车开出去，借机逃走。于是我两个为首的家伙说：“好，在这点车太危险，容易危害人群和居民楼，我先去把油放掉！”“就在这儿放！”一个家伙怕我跑，跷着脚儿喊。“在这儿放还不如不放！”我一句话把那家伙顶了回去。可暴徒们并不傻，他们选了两个家伙跟在车上扬言要监督放油。没办法，为了伺机逃走，我只好答应他们。人群闪出一条胡同，油车来到了一个小工厂的大院前，两个家伙跳下车要放油。咋办？为了拖延时间，我灵机一动，对两个暴徒说：“要烧车你们先烧死我，大不了咱们同归于尽。哥们，你看车已开出来了，如果你们把油放了，回去我也没法交差，不如你们找个水塘，咱们把车开进去再烧，来他个隔岸观火，你们看怎么样？”不知是两个家伙怕放油费事，还是真想看一看水中烧车的壮景，便一口答应下来。两个家伙要进驾驶室，我说太热，不如你们一边车门口站一个，拿着木棒和布条指挥，也能威风一下。其实我心里已有打算。两个家伙真的站在了车门口，指手划脚地领着我找起水塘来。

他们让我把车开到龙潭湖去，一个劲地让我加快车速，趁两个家伙指手划脚让我拐弯时，我猛地一踩制动，两个家伙根本没防备，一下子都摔了下去。我再猛地一踩油门，车顺着岔道飞奔而下。

油槽车保住了，一罐子油保住了，我驾着车格外的轻快，轻飘飘的，仿佛那就是腾云驾雾。



“我们是文职干部”

护士长 穆立萍

1989年6月3日17时，我们医疗队奉命跟随某集团军担任一线医疗保障任务。听首长们说，在整个戒严部队中我们医疗队是唯一跟随大部队担任一线医疗保障的。医疗队里只有我们7个女同志，那么，我们也是唯一随军担任一线医疗保障的女同志。我们的心情激动、兴奋、还有点紧张。特别是我，除了千方百计和大家一块完成抢救护理工作外，还必须关心爱护好每一个同志。因为在这7个人中我的年龄最大，28岁，又是代理护士长……

汽车在一条土路上颠簸着，一会摇向这边，一会又甩向那边，我们几个坐在里面就像摇煤球一样。我的头昏昏沉沉的，五脏六腑都要吐出来了。她们几个肯定也好受不了，特别是小关、小乔晕车晕得厉害。

忽然，“嘎吱”一声，汽车停住了。一阵不堪入耳的狂喊滥骂在四周响起。“出什么事了吗？”年仅18岁的卫生员小崔有点惊慌。“不知道。”我也感到莫名其妙。“拦住他们，他们是镇压大学生的……”“他们是刽子手……”一个声嘶力竭的声音，频率特别高，听起来让人发痒，一定是坏人拦截。我们几个互相对视着，不由得紧张起来。紧接着，我们的车篷不知被谁掀起个大缝隙，“呀，快来

看，这里还藏着军妓呢！”“不错。满漂亮，够味……”几个不三不四的小青年吹着口哨，尖叫着。人们像发了疯一样，你攀着我的肩膀，我踩着你的肩头，伸长脖子向车篷里张望。我们7人的平均年龄不足25岁。只有两人结了婚，大家哪受得了这些啊！小崔眼睛里含满了泪水。小张、小吴已由紧张变为愤怒，禁不住握紧了拳头；我把牙齿咬得格格响。要在往常我们早以唇枪舌剑相还击了。医院里的姑娘们不是好欺负的。可是今天，大家忍住了。不仅是因为队里有纪律，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还因为我们已看透了，与这些人争辩没有意思，他们是不讲道理的。任你们去骂吧，我们不予理睬。过了一段时间，这些不三不四的人或许是骂够了，或许是自己也感到骂得没意思了，反正他们灰溜溜地躲开了。

汽车绕道来到朝阳区双桥附近，这里有一条绿色的“长龙”被层层围住。暴徒们夹在大学生和不明真相的群众中间，挥舞凶器，并不时地乱扔石块、砖头等。这里肯定有伤员。一股强烈的责任感在我们胸中升腾，大家纷纷向队长请战。队长开始有些犹豫，看我们年轻，又是女同志，怕我们经受不住这样的场面。我们几个姐妹们都急了，既然来了，为什么不让我们上？关丽军激动得声音都有点颤抖：“我们一定要上去！我们是来干什么的？……”是啊；小关结婚刚半个月，按常理讲，她是不应该来的。可她却那样坚定地来了。为什么？不就是因为自己是医务工作者吗？小两口分手那天，虽然有些恋恋不舍，但双方是那样理解、信任和乐观，以致于在我们这帮年轻人中传为佳话。

队长终于同意了我们的要求，把我们7个人分到了治疗、巡诊和抢救三个小组。我们背上卫生包和男同志一样，穿行在水泄不通的人流中。我们用手拨开拥挤的人群。看到我们是年轻的女同

志，有人给我们让了路，有的人却故意撞我们，挤我们，踩我们的脚。对这些我们都不在乎，只知道一点一点地向大部队靠拢。我们终于来到了大部队中间，看到了战士们。他们有的被一天的烈日晒得精疲力尽，嘴唇上爆起了皮；还有的左挡右护，抵御着不知从何处飞来的石块，有的已被打伤，流着鲜血……我们女同志哪见过这种场面？我们顾不得许多了，只知道不顾一切地扑到战士们的身前，用身体掩护这些受伤的战友，并快速地给他们包扎。包扎好这一个，又包扎那一个，哪里有伤员，我们就到哪里。不少战士感动地拉着我们的手说：“你们是女同志，怎么也……你们不该到这里来。”

天渐渐黑了。我们寻找、救护伤病员的工作仍在进行，我们猫着腰，穿行在队伍中，一遍又一遍小声重复：“有伤员吗？”“有需要包扎的没有？”

忽然，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我们发现有几个围成一堆的战士，护士小关首先挤了进去。一看，地上正躺着一个战士。她忙问：“怎么了，是病了吗？”没人理睬她。“让我看看吧，我是兵站医疗队的。”她焦急地解释着，仍然没有人理睬她。估计这些战士们把她当成了围观的群众。“我真是当兵的，你们不信看这个——”她掏出了自己的文职官员证，用手电照着说。这下战士们相信了她，纷纷向她诉说着。原来，这个生病的战士叫董全贵，已经发烧二、三天，三十多个小时没吃东西了。“为什么不早点看看？”小关问。“他是瞒着领导来的。他说保卫天安门，这样重大的任务可不能把他落下。”有人解释着。多么好的战士啊，我们几个听着，禁不住肃然起敬。“我们一定要把他抬上救护车，送到兵站去治疗。”我斩钉截铁地说。于是我们几个并排组成人墙，用自己的身

体挡住不时飞过来的砖头、石块，由关丽军同志搀扶着小董，向救护车走去。关丽军同志这几天正患感冒，身体本身就很虚弱，再加上小董高大的身子几乎全部靠在她的身上，她实在力不从心，只是咬紧牙关，一步一步艰难地向前挪着，几次歪斜着要摔倒，但始终没有倒下来。到救护车前，我急忙跑过去替换她。小董被抬上了救护车，她却一下子瘫倒在地上……

不一会儿救护车又被暴徒们截回来了。危重病人得不到及时治疗 and 抢救怎么办？医疗队长汪功久找我商量，决定就地抢救董金贵。

这时小董已被确诊为急性菌痢，发着近40℃的高烧，需要立即输液。可车上连输液用的吊篮都没有呀！焦急中我忽然想到在医院时，有时病人多，输液吊篮不够用，老护士们就用绷带编。于是，急忙找来一卷绷带，“刷刷刷”只几下就编成个很像样的吊篮。车厢里没有灯，我就跪在地上，打着手电筒，让基本功不错的张虹为病人打针。张虹沉着地握起病人因几天没吃饭、血管已干瘪脆弱的手，轻轻按摩着，细心地观察着，然后猛地一扎，居然一针见血。这个动作又利索、又漂亮。

液体一滴一滴流进小董的肌体，我们一次一次地为他擦去脸上的汗，并一口一口地用自己的水壶喂水给他喝……

已经是4日凌晨两点多了，远处不时传来“乒乒乓乓”的枪声，还有熊熊的火光和浓浓的烟雾。前方到底怎么啦？车底下的人急，我们更急！

从火光的方向驶来一串自行车，他们老远就喊：“天安门广场的大学生全被当兵的杀死了！”“当兵的用坦克把学生压成了肉泥！”经他们一煽动，人群统统发起狂来。他们大喊大叫，气急败

坏地用木棍、砖头砸军车，并扬言要把军车推翻烧掉。

这显然是谣言，你们喊你们的，我们干我们的。

关丽军同志仍在为战士们巡诊；

吴柳敏、崔丽艳同志仍在小心翼翼地为伤员们冲洗伤口、轻轻地包扎；

我仍一趟又一趟地为各个车厢的同志们运送各种药品；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护士小苏搭着便车，几经辗转，也赶到了。

“不是让你送完病人就在兵站留守吗？”我问。

“我才不呢，你们都来了我干什么不来？”她一边说着，顾不上喘口气就参加了工作。

我拿着一瓶酒精往做手术的救护车上送，一个留着长头发、戴着眼镜的暴徒拦住了我，他误认为我是为伤病员送水的，大声叫道：“不要给他们水喝，渴死他们！”

我说：“我是医务工作者，谁有病我就得给谁治疗，这是我的职责。”

“你们不听话，我们就对你们不客气了！”

我不屑一顾地反问道：“如果你有急病，别人阻拦我们去治疗，行吗？”

“这……”他愣住了，半天说不出话来。他一定体验到了，部队里的女同志可不是好惹的！

天亮以后，这支部队冲破重重障碍，向前开进。我们却接到上级的指示，到附近暂时隐蔽。

白天，我们几名女同志在卡车的车篷里料理伤病员，又闷又热，又渴又累，汗水湿透了衣服。晚上，就和伤病员们一起住在卡车上。为他们扇扇子，赶蚊子。生活中虽然有许多不方便，但是在

“漫长”的两天两夜中，却没有一个人发牢骚。医护人员和伤病员之间、女同志和男同志之间，心竟是那般纯洁，感情竟是那般神圣……

(王福良 张 平 整理)



戳穿谣言

少校教导员 白志华

1989年五、六月的北京，谣言四起。

6月4日上午9时，“血洗天安门”的谣言达到了高潮，不明真相的学生和群众与戒严部队的敌对情绪也达到了高峰，我们部队在学院路受阻。石头、瓦块、汽水瓶、啤酒瓶等雨点般飞来，部队被团团分割包围。“不准解放军进城屠杀人民”、“解放军已不是人民的子弟兵，是历史的罪人”、“让他们回去”……呼喊声此伏彼起。学院路乱成一锅粥。

执行戒严任务开始后，部队首长就派我当“宣传队长”。我和政治机关的几名同志往前挤，找堵车的指挥人员对话做宣传工作，心想，当年“文化大革命”，多少人因为听信谣言一时怒起，帮倒忙，甚至走向犯罪道路，一旦事实澄清又追悔莫及。这些人怎么就不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呢？又想到前几次被堵时做群众工作的成功经验，人民和我们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只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是会把手握在一起的，会理解和支持我们的。

好不容易挤到前面，找到了那帮堵车的指挥人。我说：“我是这个部队的梯队负责人，有话对我说，有气也可向我出，但请你们不要烧军车，打骂战士，因为战士手中都是真枪实弹。大家先理

智、冷静一点，我们好多战士已经流了血，不要再造成流血事件！”

这时候，一个戴近视眼镜的大学生模样的人比比划划地说：“解放军已在天安门枪杀了2千多人，你知道不知道！”旁边一位女中音也跟着高喊：“天安门已死了4千多同胞，血都淹到脚脖子了。”

我说：“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你们刚才讲的这些，你们自己见到了吗？你说死了2千多，那位女士说是4千多。叫大家到底信谁呢？”

一些围观群众听我说得有道理，鼓起了掌。

这时，开来一辆平板车，载着一个死孩子和一帮男女，有人抖动“血衣”，声泪俱下地边走边讲这死孩子是解放军“血洗天安门”的“罪证”，把群众的激愤情绪推向了顶点。此时此刻，战士们心里没有底，我心里也有些发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刚才和我辩论过的几个人，手指着我的鼻子，恶狠狠地问道：“这个孩子也是暴徒吗！你们想进城屠杀人民，门都没有，你们再不听我们的，别怪人民对你们不客气了。”

这当口，如果一句话说得不妥当，一个动作做得不得体，那后果将不堪设想。一时我也感到哑口无言。我定定神，弯腰仔细看了看那个死孩子，心里有底了。

我问：“请问，你们说血洗天安门是什么时候，现在是几点了。”这伙人有的看手表，有的在算钟点，说：“都五六个小时了，你们连这个也不知道，说明腐朽政府不敢说真话。”

我淡淡一笑，对着人群大声道：“五六个小时，这死孩子就能浮肿成这副模样？这死孩子死了至少有一天多了，怎么能是血洗天安门的罪证哪！这完全是别有用心，天大的谣言。请大家看一看

死孩子，想一想是真是假，问一问有些人想干什么？千万不要做出那种仇者快、亲者痛的事情来。”

这时，人们不断往载死孩子的车边挤，看了后有的摇头，有的摆手，嘴里不断地说：“这扯的啥事呢！”不少人扔掉了手中的石头、瓦块……

几个家伙见民心动摇，气急败坏地喊：“不要听这个当官的瞎说，打死他！打死他！”

我理直气壮地说：“打死我倒没什么，请大家冷静地想一想，你们如果烧军车、打砸战士，那是违法的。法律是不承认动机和感情的，是以事实为依据的，千万别上有些人的当，做他们的牺牲品……”

我的话还没说完，群众明显开始倒向我们，不断高喊：不许打解放军，不准烧军车。不断有人撤出来主动保护战士，保护装备，不少人把我围在中间保护起来，一个劲说：“多亏你提醒，要不咱自己就稀里糊涂毁了自己。有的递烟给我，有的给我点火，有的递水要我喝……”

(王丛音 沈建国 整理)

马 嫂

北京市公安局 马卫东

自打5月底到现在我已经好几天没回来了。开始是“工自联”的一些痞子们围攻市公安局。因为我们抓了“工自联”的一些人，他们就煽动“工自联”的成员和一些学生，把市公安局团团围住，声嘶力竭地叫骂，疯狂地要和公安局“秋后算帐”。那几天我负责广播室的宣传工作，组织人写广播稿、录音，随时向大门外的人群广播，揭露极少数组织者的阴谋，劝说大多数不明真相的群众离去。整天忙得不可开交，晚上更要坚守岗位，不能离开。

到了6月3日晚上和4日凌晨，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之后，我又接受了组织有关人员编辑《反革命暴乱纪实》电视专题片，揭露反革命暴乱真相的任务，一干就是一天一宿。接着又投入了新的宣传工作……一晃又是几天。这种“连轴转”，别说回家了，就是想家也顾不上。

这天晚上我正在局里写宣传稿，突然接到了妻子的电话：“给你打了好几次电话，你屋里没人接。昨天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见市公安局被暴徒砸成那个样子，我真不放心，还以为你出事了呢！你们没事吧？怎么也不来个电话？把老婆、孩子扔在家里你就放心？”我连忙向她说好话、赔不是，并小声说：“我心里一直

想着你哪，谁说谎谁是小狗！”她“噗哧”笑了：“得了得了，少来这一套，你心里想着谁我哪知道！算了，说正经事吧，咱们院出了个抢救解放军的英雄，你这搞宣传的不回来采访采访？”“是谁？”“东屋马嫂。”“在金龙服装厂工作的那个马战勤？”“对，就是她。怎么样？回来采访吧，这可是你的本职工作！”嘿，她倒“将”了我一军。“你不就是想让我回去吗？过两天我就回去！”

妻子笑着挂上了电话。

马嫂——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抢救解放军——她是能够做到的。我把马战勤的情况在脑子里过了一遍以后，迅速作出了结论。

马战勤，无论在住家院里还是在单位，官称都是马嫂。这不仅是因为她爱人也姓马，还因为她待人接物象个大嫂的样子。她三十五六岁，中等个，不胖不瘦，平时大大咧咧，爱管闲事儿，好帮助别人，特别是有胆量，遇到打架斗殴的、耍流氓的，她敢去管。这兴许和她有着10年“兵团战士”的阅历有关。

第二天晚上，我抽空赶回家去采访马嫂。

说我是英雄，我英什么雄！那天夜里我回到院里就哭，这你爱人是知道的，院里其他街坊也在场。我当时哭，一是精神紧张，一是有些后怕。你想，过去我哪经历过这样的场面？哪见过这么多血？那天回家，一路上的人都看我，我低头一看才发现我浑身上下全是血，回到家里，说换身衣服，换双鞋，可鞋和袜子被血粘在了一起，脱了半天才脱下来。我坐在家门口，手里抱着血衣，头脑怎么也镇定不下来。暴徒们围打解放军发狂的吼叫声，被打得遍体鳞伤的战士们发出的呻吟声，老在耳边回响；暴徒们凶残地殴打解放军的结果和战士们被打得血流满面的惨状，更是像过电影一样在

我头脑里萦绕。说不清为什么，我哇哇地大哭起来，街坊们怎么劝也止不住，似乎只有哭最痛快。

那天抢救解放军也是偶然赶上的。我是去看“热闹”碰上了。

6月3日晚上，电视里说有重要新闻请注意收看。我在屋里等着看重要新闻，时间长就靠在沙发上睡着了。朦胧中，大街上的一片嘈杂声把我惊醒。因为咱们住的地方离大街很近，大街上人们的呼喊声、叫骂声都听得很清楚。只听有人喊：“坦克过来了，别让他们过去！”坦克？平时可没机会见。出于好奇，我来到南新华街和平门路口。这种好奇，就是常说的看热闹。有句俗话说“北京人好看热闹”，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儿。不过这不是个好毛病，经过这次平息反革命暴乱，一些人因为看热闹被误伤，恐怕以后再有什么事儿，看热闹的就不会那么多了。

我赶到和平门路口时，坦克车已经开过去了，远处还可以听得见坦克行走的隆隆声。而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幅可怕的场面。和平门路口一改平时整洁、宽阔的面貌，象是经过浩劫，经过战争，变得乱七八糟。马路上横满了垃圾桶、交通隔离栏杆；马路两侧，上千人围聚在那里，其中有一部分人狂呼乱喊，一部分人向马路上跑步前进的解放军砍砸砖头、石块。雨点般的砖头石块落在战士的钢盔上，发出一阵阵噼里啪啦的响声。战士们也不反击，只是一个劲地往前跑，路面上有路障过不去，就拥上了马路东侧北京烤鸭店西边的便道，继续往前跑。但是便道上人山人海，部队跑不起来，速度慢下来了，一些暴徒打得更欢了。

我被眼前的情景吓懵了。这是怎么了？人们咋都疯了？怎么都打起子弟兵来了？我茫然不知所措，心想八成出了什么事了，得赶快回家去！

我转身正要往回走，忽听前边不远处有哭喊声，有一个稚嫩的声音在揪心地呼喊着：“……大叔、大哥们，你们别打了，让我过去吧，我是解放军……”“打的就是解放军！”“打死他！打死他！别让他跑了！”几个人恶狠狠地喊着。“你们别打……呜……呜……”战士的哭声搅得我一阵心酸。我忘记了回家，径直朝发出哭喊声的地方赶去。

那是在马路东侧的一块草坪上，数十名暴徒正在踢打一名小战士。他们象是在踢一只皮球，这边几脚，把战士踢到那边，那边几脚又把他踢到这边。小战士双手抱着头、蜷着腿，鲜血顺着他的双手往下淌：“……大叔、大哥们，别打了，让我走吧！……”他的伤势很重，声音已经很微弱了，但是有几个人仍然在狠命地踢打他。

这是怎么了？人家小战士招你们惹你们了？你们干吗往死里打他？我也不知道从哪来了这么一股邪劲儿，扒开前面的人，一下子冲进去把小战士紧紧抱住。小战士紧紧搂住我的脖子，无力地说：“大娘救救我吧！”我的眼泪禁不住叭嗒叭嗒地流下来。

周围的暴徒见一个女的冲进来抱住了这个战士，先是一愣，叫骂声停了，时间也好像停止了前进。我趁这个“时间差”抱起小战士就往外跑。“别让他们跑了！”“打丫挺的！”这些人明白过来，呼喊声、叫骂声骤然而起，象火山突然爆发，打破了短暂的寂静。随着叫骂，拳头雨点般向小战士打来。我一边死死地护住小战士，一边跪在地上向周围的人哀求：“不要打了，再打就把人打死了！”这时有人狂喊：“我们就是要打死他！你要救他连你一块打！”说完，人群中一阵狂叫：“连她一块打！连她一块打！”一阵喊声后，又一个人冲到我面前，用手指着我的脑袋说：“你算什么，算一算

六？要不看你是个女的早就拍死你了！”我怕他们一起上来打小战士，又向他们哀求：“各位大哥，谁没有兄弟姐妹，他年纪还小，你们就饶了他吧！”这时人群中又一次静了下来。我趁机抱起小战士朝马路西边的急救中心跑去。一边跑一边隐隐约约地听见身后传来的叫骂声：“他妈的哪来的女精神病，手心往外拐……”

我抱着小战士艰难地朝市急救中心跑着。等摆脱了那伙暴徒，我也精疲力尽了。小战士已经完全昏迷过去，原先紧搂着我脖子的双手也耷拉下来。这时我才感觉到小战士是那么沉，再往前迈一步都要拿出吃奶的劲儿来。我的跑变成了走，又从走变成了一点点地往前移。

正在我“寸步难行”的时候，有三四个小伙子出现在我面前。“大姐，干吗去？”“去急救中心。”“是被打伤的战士吧？”我没有马上回答。这几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我在心里迅速地判断着。如果是坏人可就麻烦了，小战士的命可就难保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也得保护他，除非先打死我。我下意识地吧小战士抱得更紧了。

这几个人见我沒有言声，知道我不相信他们，就小声对我说：“大姐，你放心，我们就住在附近，我们跟你一样不同意这样对待解放军。”

我仍然有些不放心。我用目光挨着个儿地审视他们，从他们一个个真诚、坦然、渴望的眼神可以看出他们不是坏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在关键时刻你可以从他们的眼神儿里看出来。真的，你别乐，我是有体会的，你们搞公安的能没体会？“大姐，你别犹豫了，再耽误会儿战士的生命就危险了。”望着他们真诚的样子，我放心地把小战士交给他们。我想，小战士已经奄奄一息，我又无力抱他

到急救中心，靠我一步一步往前蹭，等到了急救中心恐怕小战士也救不活了。更何况在这附近随时可能遇上暴徒……“大姐你放心吧，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把他安全送到急救中心的！”

这几个小伙子抬着小战士快步向西走去。我刚松一口气儿，这时又听见不远处人群中传来一阵阵的呼喊声和叫骂声以及砖头石块打在战士的钢盔上发出的啪啦啪啦的响声。我的心又缩紧了。天呐，这是怎么了？难道人们都疯了？这是在干什么呢？这……

我在路边坐了一会儿，镇定了一下情绪，然后转身回家。经过北京烤鸭店西侧草坪时，又见一伙人在殴打一名解放军。这名解放军趴在地上，几个暴徒围着他，在他身上连踢带踩。他一动不动，任凭暴徒站在自己的身上乱踩。“莫非他死了？”见此情景，我又禁不住哭了起来。

“别打了！别打了！人都不行了你们怎么还打？你们都疯了？你们不能这样！”我不顾一切地冲到这位军人面前，把踩在军人身上的暴徒推开，随后俯下身把这位军人翻过身来。

这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军人，大约有50来岁。看身材，他个子不算高，是个身材略胖的人。他紧闭双眼，表现出极度痛苦而又非常慈祥的样子。他的脸上，特别是太阳穴两边满是鲜血，血还在缓缓地流着，弄得他的脖子、上衣都是血。任凭我给他翻身，他依然是一动不动。他是对暴徒的野兽行径不屑一顾？还是对那些受坏人煽动、对解放军进城戒严不理解的那一部分人的等待？

望着这位老军人，不知怎么了，一瞬间我忽然想起了父亲。父亲的年龄和这位老军人差不多，也是一副饱经风霜而又非常慈祥

的样子。几十年来，父亲风里来雨里去，为了把我们兄弟姐妹拉扯大，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当我生下女儿咪咪以后，越来越深地体会到做父母的不易。由此我又想到眼前的这位老军人，他也一定有妻子儿女，甚至有孙儿孙女，他们都在等着他啊！妻子不能没有丈夫，儿女不能失去父亲，孙辈们正在盼望着爷爷的“隔辈爱”。他不能死，一定要想法儿救他！

我跪在地上把这位老军人扶起来，让他趴在我的身上，力图把他背走。这时，周围的一些暴徒又狂喊起来：“你救他干什么？他是当官的，打死他！”“别让他们跑了，打啊！”随着喊叫声，有几个暴徒挥舞着棍棒冲到我跟前。

“求求你们不要打了，饶了他吧！他都那么大岁数了，他也有妻子儿女呀，脱了军装他和你们一样啊！”我边哭边向他们哀求。这些人可能还没遇见过我这样的架式，一时懵住了，不知如何对待我好。我趁机把这位老军人的两只胳膊搭在我的肩上，用两只手紧紧地拽住，然后使劲往起一站，就势把他背起来。他的脑袋靠在我的脖子上，只听见他用微弱的声音说了句：“谢谢你！”我顿时力量倍增。虽然只有3个字，但字字千斤重。这说明他没有死，他还活着！同时，这也是父辈对我的信任和希望。我就是死了，也要把老人救出去！

我也不知哪来的那么大劲儿，背起这位老军人就走。边走边对他说：“你要坚持住，我死活也要把你背到急救中心去！”他没有言声，脑袋耷拉在我的肩上，又昏迷过去了。

暴徒们见我把老军人背走，就在后边打我。有的人拧我的胳膊，有的人在后面用脚踢我，还有的人抓住老军人的脖领子使劲往

后拽。我用右手紧紧抓住老军人的手，腾出左手向后边的暴徒狠抓了几把，只听见后边的人“唉哟、唉哟”直叫唤，抓住老军人脖领子的手松开了。“他妈的，要不是看你是个女的，非打死你不可！”后面的人骂了一句，但没有继续追我们，只是向我们扔来了数不清的砖头瓦块。这些瓦块有的打在老军人的身上，有的打在我的腿上、肩上，痛得我心里一阵阵发紧。但我已经顾不上这些，只是一个劲儿地朝西边急救中心的方向跑。草坪的西边是一尺多高的护栏，我只顾拼命地往前跑，也不知这栏杆我是怎样迈过去的。

我背着老军人一口气跑过了和平门十字路口，又穿过了马路西北侧的地铁车站口。这时我已经累得浑身大汗淋漓，双腿一阵打颤，脚跟灌了铅似的，迈一步都要使出吃奶的劲儿来。但我知道这里离急救中心已经没多远了，只要再走几步就要到了。“要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我咬紧牙关，暗暗地使着劲儿。

“你这么背着不行，快放下，我们帮你抬！”我正在低着头哈着腰艰难地往前走，忽然听见有人和我说话。我当时只顾低头看路，没看清他们是些什么人。我心说好不容易逃出了虎口，可不能再落入坏人的手里。我哭喊着：“你们别打了，别打了！我不给你们，不能让你们打死他，他是有妻子儿女的人呀，求你们啦！”

“大嫂，请相信我们，我们不会打他，我们也是来救解放军的！你这样背着不行，让咱们一块抬吧！”听他们一说，我才意识到，是呀，我这哪是背，是在拖！我想起了我的右胳膊曾经摔伤过，不能从背后驮着背，只能在前面拽。一路上我是把老军人的胳膊搭在我的胸前，用双手紧紧拽住，这么连背带拖走过来的。照我这种背法，老人要受多大的罪啊，何况他已经身负重伤！是啊，这时候能有人帮助自己抬有多好！我认真地看了看眼前的年轻人，他们共

有4人，都是20来岁的样子，看上去不象是坏人。我说：“那好，咱们一起抬，你们要是打他，我就和你们拼！”说着，我把这位老军人从背上放下来，由4个年轻人抬着胳膊和腿，我双手捧着他的头部，快步朝急救中心走去。

急救中心门前灯火通明，有数百人围聚在那里。快到急救中心的时候，有人发现了我们，老远就问：“嘿，你们抬的是当兵的还是老百姓？”我使劲喊：“是老百姓！”和我一起抬解放军的年轻人也高声喊：“是老百姓！老百姓！人不行了，快闪开！”我们小跑着朝门口冲去。

到了急救中心门口，由于灯光很亮，我们抬的这位老军人又穿着军服，人们一下子看出了我们抬的是解放军，而不是什么“老百姓”。于是，有几个人挤到我们跟前朝我们一阵乱打。我们顾不上疼痛，只是一个劲儿地朝大门里冲。正在这时，大门里冲出几位身穿白大褂的大夫，把我们接进楼里……

这位老军人是死是活？那位小战士是死是活？我一直放不下心来。6月15日，在急救中心工作的一位朋友到我家串门，我向他问起了老军人和小战士。他说那天晚上急救中心收治了100多名解放军伤员，绝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哪位是你抢救的小战士没法查，但是老军人只有一位。他是解放军某部少将副政委张堃，他已经转到305医院去了。我这位朋友还告诉我说这位老军人特别好，当时急救中心的大夫问他暴徒这么凶狠打你们，你们为什么不开枪？他说宁可自己吃亏挨打，也不能误伤老百姓。听了朋友的介绍，我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这是多么好的解放军！多么好的老人！不管他是不是我救过的那位老同志，我也得去看看他。

当天我就赶往医院看望，一眼就认出了，这位老同志正是我那天晚上背过的那位老军人。他一听我说话的声音，也认出了我。我们双手紧紧握在一起，象是久别的亲人重逢再会，都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只是一个劲儿地往下掉眼泪。张副政委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激动地说：“北京人民是大好人！你是大好人！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太谢谢你啦！”我连忙说：“您不要这么说了，你们到北京来是执行任务，是为了国家好，为老百姓好，我们市民也是希望国家好，希望人民过好日子，咱们的目的是一致的。不用说谢了，更不用说什么救命恩人了，咱们军民是一家。只要您能平安无事我也就放心了，这也是我的最大心愿！”

……

几天后，马嫂挺身抢救解放军将军的事儿在市民中、在戒严部队、新闻界里传开了。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法制报等新闻单位，纷纷发消息介绍她的事迹，很多工厂、学校也都请她去作报告，她一下子成了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

后来随着形势的稳定，我也能经常回家了，天天都能见到她。她还是原来的样子，原来的脾气秉性，还是那样大大咧咧，每天正常的上下班，洗衣、做饭……似乎她没有经历6月3日夜那惊心动魄的场面，没有抢救过一位将军。

那天妻子认真地告诉我：“你知道马嫂得到了什么奖励吗？区里奖给她一朵大红花。事后她连家都没回，径直把花挂在了南新华街厂甸市场门前一位解放军烈士的遗像下面。”

我没有说什么。只觉得有一幅图画展现在我眼前：马嫂站在烈士遗像前，庄重地把红花放在烈士遗像下面，然后站在那里默哀。

千斤顶

中尉连长 孙彦

6月26日晚10点多，我们20余名官兵带着戒严一天辛苦换来的欢乐，乘坐一辆大卡车从执勤点驰向驻地。刚到昌平路回龙观路口时，“砰！”——左前轮胎突然“放炮”了。

司机尹忠义翻遍工具箱，也没找到千斤顶。刚刚取得平暴胜利的北郊大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夜色茫茫，风吹树叶沙沙响。汽车“放屁”和歹徒打黑枪难辨，给人一种胆怯怯的感觉。

堵车求援。将近一个钟点了，往返大小汽车过了十多辆，有的停下车后淡淡一笑：“非常对不起，我们也没带千斤顶。”有的还讥讽说：“站到天亮吧，多好的立功机会呀！”有的干脆连车都不停就“拜拜”了。

我看了看手表，11点都过了。从这里到驻地沙河机场，往返百多里路。可也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派人回去取千斤顶了。

就在这时，从城内驶来一辆黑色轿车，风驰电掣般呼啸而来，在我身边不足100米的地方“吱”地一声刹住车。车门开处，两个人影匆匆向我们走来。未待我下令，战士们就自觉地各就各位，注视着来者的一举一动。来人显然看到我们的一举一动，人未到洪钟般的声音先到了：“合格！合格，邓主席夸你们合格，眼见为实

呀！”

走到近前，看清面前是个老人，1米8的个头，魁梧结实，上着长袖的衬衣，言谈举止豪爽中透着学者的儒雅。老人掏出名片递给我，上面写着：“北京农学院院长乔柏年”。

旁边的司机笑呵呵地说：“你看我们象不象暴徒？我也当过兵，82年复员的。院长当年曾是王震旅长的老部下，还给周总理当过联络员。刚才，院长判断准是你们的车坏了，让停车看看。”

我们紧紧握着乔院长的手说：“谢谢老首长，谢谢……”

司机说：“不换轮胎是不行了，我也没带千斤顶，怎么办？”

乔院长说：“孙连长，请你派两个人坐我们的车到我们学院找个千斤顶。大家辛苦一天，也好早点休息。”

这时，有人在背后捅捅我，提醒我“小心”。实在话，这一个月来，对于一些坏人玩的花样看得太多了，一张名片就能证明身份吗？但无形的第六感官得出的结论，常常比有形的五官更生动，更准确。

轿车驶进农学院已是第二天零点以后了。司机一会儿就找来两位师傅，带上千斤顶就准备出发，一位工人提醒说：“坏的是什么车？”一排长韩军营说：“吉比亚。”那位工人说：“不行，这小车用的千斤顶哪能行。”轿车司机醒悟过来后，跳下车又消逝在夜幕中，好久才气喘吁吁地跑回来……

半小时后，我们的卡车启动了。

(王丛音 沈建国 整理)

野村先生的心愿

大校政委 刁九健

天安门广场清场后的第六天早晨。

“政委，有位日本老人要见您。”警卫员小叶的声音。

“哦，快请进来。”

这是一位两鬓斑白，体型瘦削，略显驼背的老人，鼻梁上架着一副高度近视镜，穿着十分简朴。他行了个日本礼，用汉语对我说：“解放军首长，见到您我很激动，中国军队真正好！”老人布满血丝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

他夫人立即接过话题：“刁政委，我是中国人，早年同野村结婚，86年来北京定居。他大半辈子的心血都花在中国的建设上，中国是他的第二故乡，在中国定居是他多年的心愿。”

我对野村先生说：“感谢你对我们国家的信任，我们很高兴。”

夫人似乎怕野村听不懂，又把我的话重复了一遍。野村听了连连点头，满面笑容地对我说：“听得懂，听得懂。”

野村望了望夫人，一字一句地对她说：“你快把来意给政委讲讲吧。”

“好。前一段时间，北京出现了游行示威，开始我们出于好奇也上街看看，后来越来越不象话，公开打出‘打倒共产党’、‘推翻政

府’的反革命标语，而且谣言四起，坏人猖獗，我们一家真是为国家的前途担忧。”

“刁政委，我们十分担心很有希望的中国被极少数人毁于一旦，担心我们一家的命运。”

我说：“您们放心，那是极少数反动分子，他们不得人心，手里没有真理，推翻不了共产党。”

野村夫人接着说：“那几天，我们一家没有一个敢出门，野村他整天睡不着吃不下，彻夜坐立不安，特别是传说解放军进城镇压多少群众学生，血洗了天安门，更是使人提心吊胆。”我很理解他们一家的心情，从野村那憔悴的面容上也不难看出，他当初是怎么熬过来的。

我安慰了他们几句后，野村先生接着对我说：“电视台播出了解放军进城的实况，我们一家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眼睛，暴徒太残忍了，战士们都是十八九岁的孩子呀！”野村声音颤抖得变了调，他摘下眼镜，不停地擦着泪。

听了他的一番话，我也一阵阵酸楚。

约有半分钟谁也没吭声，我对野村先生说：“我们部队担负着捣毁‘高自联’指挥部的任务。清理天安门广场过程中，我们没有开枪打死一个人，这一点历史会作证的。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任何情况下也不会忘记党的教导，人民的利益……”

“是啊！我走了大半个地球，到了十几个国家，可没有一个国家的军队能与你们相比，不愧为仁义之师，威武之师。中国的士兵太伟大，太可爱了！”

野村先生起身从一个包里取出3张总面额为32万7千日元的支票，还有一封慰问信，双手捧到我的面前：“政委，这是我们的

一片心意，天热，让战士们买瓶汽水喝。”

我连忙摆手说道：“您的情，我代表战士们收下了，但这钱我们不能收，这是纪律。”

听了我的话，他们都急坏了，野村夫人一边擦泪，一边对我说：“刁政委，我们可是真心实意冒着危险来的。这钱你如不代战士们收下，我们老俩口就给您跪下，不走了。”话音未落，野村便真的要下跪，我急忙上前扶起，劝他们不要这样。

3张支票推过来推过去，还是落在我的手中，望着这两位老人那种真诚期待的神情，我也只好答应先收下，再转交上级婉退。

野村见我同意收下，笑着对我说：“这样我就安心了。”

野村夫妇告别而去了，留给了我们一束真诚的目光……



北京人印象

少尉干事 任立本

我到北京执行戒严任务，心情格外激动。作为一个从豫南农村出来当兵的毛头小子，对北京的向往、对北京人的羡慕之情自不待言。而且我对北京人还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为我热恋中的女朋友也是北京人，以致于自打在北京对上“象”，我就不知不觉地把自己当作北京人的一员了。北京的动乱愈演愈烈，我为北京人的担忧越发加重。接到戒严的任务后，我恨不得一步跨到北京，心里不停地默念着：“北京人，我来了，我保卫你们来了！”

6月4日凌晨，我随着坦克装甲车队向北京开进。

当我们车队行进到朝阳区十里堡时，车队突然停下来了。我迫不及待地正要打开车窗，忽然听到车体发出“叮叮咚咚”的响声。我以为下冰雹了，便小心地把窗盖支起一条缝，把手先伸到窗外试了试，没有下雨呀！这时，我听到四周呼喊声、叫骂声响成一片。我这才意识到有人阻拦车队，便急忙探出头来。“咚！”一块石头正好砸在我的钢盔上，脑袋一震，人歪在车上，钢盔被砸掉一大块漆。我定了定神一看，四面黑压压的都是人，他们有的拿着木棍、钢筋；有的拿着砖头、石块，疯狂地向车队袭击。我估计至少也有几千人。在人群的前方停着6辆公共汽车，一层两辆，正好把道路

堵个水泄不通。这些人一定弄误会了，不知道我们去干什么。我立即与另一个同志拿起话筒，喊道：

“我们是奉命进京维护秩序、保卫北京人民的，请你们协助一下，把道闪开……”

没等我把话说完，雨点般的石块就砸了过来。有的还喊着：“砸死这些杀人狂、刽子手！”我一下怔了：“北京人这是怎么了？我们来保护他们，他们反而打我们，说我们是刽子手！”我不顾一切地跳下车，问近前一位50多岁的老大爷：

“你们为什么不让我们保卫北京？”他把眼睛一瞪：“看看你们这些坦克大炮吧，分明是来镇压我们的，如果真来维持秩序，为什么要带武器呢？”

他身旁的一位老太太接着说：“我这么大年纪了，还没见过坦克大炮进北京呢！”

我忙解释道：“坦克装甲车是我们的装备，可我们并没有向你们开一枪一炮啊！”

他们仍然摇头不相信。几个青年人嚷道：“别相信他的鬼话！”

我心里又急又气，真有点浑身长嘴也说不清的难受。我不明白这些北京人，怎么这样固执，睁眼看看事实不是明摆着的吗？可爱的北京人，理解我们子弟兵吧！感情驱使我又拿起话筒向市民们继续解释。也不知喊了多久，只觉得口干舌燥、嗓子疼痛，真想到哪抱着水管子喝个痛快。可在这人的海洋里，哪有地方找水喝呢？我吃力地咽着唾沫。而我们的宣传只换来几个青年的叫喊：

“把他的喇叭夺下来砸了！”于是有几个人向车上爬。

我急忙护住喇叭大声质问：“我们连说话的权力都没有吗？”

我感到自己的眼眶里已充满了委屈的泪水，北京人，你们今天怎么变得发疯了？！正在这时，电台里传来“破障突围”的命令。车队冲开了路障继续开进。

我看着被抛在后面的人群，心里想着：“这下就好了，天安门马上就要到了，到那时北京人就会理解我们是干什么来的了。”行进中，车上几个人议论开了，有一个干事问：“到天安门后咱们第一件事干什么？”

大家七嘴八舌：“我要找个饭馆猛吃它一顿！”“我要看看广场被破坏成什么样子！”我说：“我第一件事是先找个自来水龙头喝个够。”“别瞎说了，你第一件事是给对象打个电话！”他们开起了我的玩笑，弄得我脸通红。

我们正说着，车又停了下来，大家以为到广场了，都十分高兴，可刚一开窗，被眼前的情景吓了一跳：“真见鬼，又受阻了！”

我借着晨曦一看：这不是我曾与女友来过的呼家楼吗！以往干净的街道，现在满是铁栏杆、隔离墩、垃圾桶等障碍物，一地的砖头、石块、碎瓶子，前方道上横七竖八躺着一些公共汽车，车队的周围同样围满了人。他们叫骂着，呼喊。我们又一次受到砖头、石块的袭击。更令人可气的是：我们前面的装甲车被暴徒用燃烧瓶点燃了。不一会儿，整个车体被大火吞没，车内的7、8名战友浑身是火地跳出车来，强忍着剧痛扑火。就在这种情况下，暴徒们仍不罢手，继续用砖头、石块猛砸这些被烧伤的战士。在我们的支援下，才把这几名战友救出来，而我们那价值几十万元的装甲车却被大火烧掉了。目睹这一惨状，我的心都碎了，泪水流到嘴里咸咸的，我狠狠地咬着下唇，直到咬出血来。这时，我们车又遭到居民楼上的袭击，各种硬物劈头盖脸地倾泻在我们车上，鲜血染红了战

友们的军装。此时我发誓：完成戒严任务后，我再也不到北京来了，哪怕连对象也断绝关系！

我们终于艰难地到达了天安门广场，部队奉命在六部口设卡守卫。由于一夜的劳累，加上几天待命没有吃上一顿正经饭，大家饥饿难忍，肚子“咕咕”直叫。当时哪怕是个发霉的窝窝头我也能一口吞下去。首长让我带着两名战士到附近居民区买点吃的东西，当我们走出戒严区时，投向我们的是一束束愤怒的目光，似乎要把我们吃掉似的。

我走到一位中年妇女面前，问：“大嫂，哪里有卖吃的？”

她把脖子一扭：“哼，卖吃的，不怕死啦！”气咻咻地走了。

我们一声不吭，因为我的心已经彻底凉了。又走了不远，一位六十来岁的老大娘来到我跟前，轻轻地拉了拉我的衣襟，示意让我们跟她走。我的心“蹦蹦”直跳，心想：她是什么意思？我们3个人非常警惕地跟着她，穿过胡同进了她的家门，她这才回过头来说：

“孩子，我这还有一些鸡蛋，都给你们吧，唉，没法子呀！”

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我怔怔地看着这位面目慈祥的老大娘，眼睛湿润了。一天来，我第一次听到这样和蔼可亲的北京味十足的话语。

我那颗因痛苦而变得麻木的心灵震颤了，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来。为了不给大娘惹麻烦，我们马上付了钱装好鸡蛋返回了部队。

回来的路上，我心里翻腾得很厉害，我想，北京还是有许多许多人，而且我的“那位”也是其中的一个。我按捺不住想给她打个电话。晚上，我利用进中南海办事的机会从中央警卫团给她拨了个电话。当时，我的心情非常复杂，怎么也想不出第一句话说什么好。我拿起“沉重”的话筒，拨下了号码，啊！通了！当她听出我

的声音时，“啊”了一声便泣不成声了。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说：

“这几天，全家人都把心揪在嗓子眼里惦记着你。”

我说：“我一切都好。”

她说：“暴徒们太残忍了！我看完电视后就哭了，一是担心你，二是恨暴徒，我亲眼看到你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受着那么大的委屈，还吃不上，喝不上，睡马路……”

我拿话筒的手也颤抖了。这一切都是真的：她还是那样可爱，那样理解我们军人……

当我回到六部口时，发现战友们都在大口大口地吃着雪白的馒头，喝着喷香的鸡蛋汤。我纳闷极了，心想：哪来这么丰盛的晚餐？战友们看我站在那发愣，都笑了：“还不赶快吃！”他们告诉我，这是附近一个商店的职工做好的饭，让交通中队转给我们的。我们正在路边吃着饭，人流中有一对年轻夫妇骑着自行车，突然停在我们车旁，把两条“牡丹”往装甲车上一放，没等我们说话，扭身骑车走了……

望着这对年轻夫妇远去的背影，我怎么也吃不下这顿丰盛的晚餐。北京人，这就是北京人，多么复杂而又多么纯洁的北京人啊！他们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也可能尽情渲泄心中的疑虑，而一旦痛定思痛，理解了子弟兵，立刻又捧出了一颗颗充满厚爱的赤热之心；在环境如此恶劣的情况下，他们不怕歹徒的报复，用多种方式表达出对人民军队的支持和爱戴……短短的一天，我似乎对北京人有了更深的了解和更丰富的情感，北京人民仍然无愧为首都的公民。我爱你——“北京人”！

（崔耀中 整理）

母亲的泪

干事 李西岳

一个不足 20 平米的病房，挤着 10 多个血气方刚的身躯，在一个不平凡的岁月里，他们来到了这个本不属于他们的小小空间。

“妈妈！”一伤员突然惊喜地喊了一声，顿时，病房的宁静被打破了。一位年近 6 旬的老妈妈走了进来，步履慌忙地扑到了儿子的床前，叫了声：“玉儿！”紧紧地抱住了儿子的头。

我这才细心打量这个战士，那张稚嫩的脸蛋告诉人们，他的年龄不超过 20 岁，头部缠着厚厚的绷带，两眼肿得象大铃铛，右腿打着夹板，左脚裹着纱布，令人惨不忍睹。

这就是母亲梦中的儿子？然而，老妈妈的眼圈了红了良久，却没掉下一滴泪！

稍顷，儿子问妈妈：“妈，你是怎么知道我受伤的？”

妈妈摸遍了儿子身上所有的伤处，问了多少个“疼不”，才回答儿子的问话：

“咳，我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自从北京发生暴乱以后，我和你爹爹就常念叨，也不知咱玉儿出事了没有，在电视上看到暴徒那么凶狠地打解放军，甚至把解放军活活烧死，剖腹挖心，我这心里就一揪一揪的，说不出来该有多么难受。紧接着就天天做恶梦

……”

“那天是多少号咧？我也记不清了，吃完晚饭，一家子围着桌子看电视。我正收拾碗筷，就听你三哥喊我：‘妈！你快来看呀，我弟弟在电视上面呢，他受伤了！’我这心腾地一下子就悬起来了，跑过去一看，可不是，那位中央首长正和你握手呢。因为镜头时间短，也没看清你身上到底多少处受伤。这年头，怕啥就有啥，担心啥就出啥。电视没演完就关了，一家子谁也不说话了。呆会儿，你爹对我说：‘要不，你上北京看看玉儿去吧。’家里刚收完麦子，天天下雨，场也打不了，闹不好麦子就得出芽，你哥算是个壮劳力，不能来，一合计，还是我来吧，不管谁来也代替不了我。就这样，把家里安顿好，我就来了。好在我记清了电视里说的是在北京军区总医院，离火车站又近，没费多大劲就找到了。”

老妈妈说完打开自己带来的网兜，把食品分给每一个伤员，说：“眼下乡村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特产还没下来呢，这是我在唐山买的糖火糕，来！孩子们，尝尝吧！”

我倒上一杯茶水恭敬地递给老妈妈：“老妈妈，您老一路辛苦了，先喝口水吧。”她伸出印证着农家主妇含辛茹苦的布满老茧的双手接过了茶杯。

屋内的气氛很快和谐起来，战士们象看到了自己的母亲一样高兴，欣喜，忘了伤痛。

我是来看望战友的，听了这位老妈妈的叙述，我却没有即刻离去的念头。我问那个战士：“你叫什么名字？当时是怎么负伤的？”

“我叫郝其玉，6月3号，我们部队奉命进城执行戒严任务，遭到了一伙人的围攻，接着就向我们投石块、汽水瓶。我们保持了克

制，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迂回着向集结地域前进。刚到北京站口，上来几个人把我拉了出去，不由分说就是一顿拳打脚踢。有人喊：“打死他！”说实话，按我的力气和功夫对付个把歹徒不成问题，自己是个解放军战士，我没有动手。这时，一块石头正好打在我的头部，我脑袋“嗡”地一下，紧接着又飞来几根木棍把我打倒。我昏了过去——等我醒来，浑身被歹徒扒得只剩一条裤衩，痛得要命。但我毕竟还活着，我要找自己的部队，就一步一步地往前爬……”他说完把磨破了的双膝露出来让我看。

他受了这么大的委屈，而表现得又是那么勇敢！我流泪了。然而老妈妈还是没有掉泪。

快吃中午饭了，我告别了老妈妈，返回戒严部队驻地。

傍晚，我去火车站送亲友，在候车室的长椅上，我忽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这不是那位老妈妈吗？我上前打招呼，老妈妈蓦地抬起头来，我惊奇地发现她已是泪流满面……

哦，我明白了，母亲非无泪，而是不愿洒在孩儿面前。

“老妈妈，您老怎么不多住些日子？”我问。

她擦干泪水，勉强地笑了笑：“家里正忙，人手也少，孩子他爹早年得了脑血栓，生活不能料理，离不了我。我不回去，家里会惦记。再说，留下来也给部队和领导添麻烦。”

两行亮晶晶的小河从我的眼角涌了出来，我紧紧地握住了母亲的双手。

姑娘，你在哪里？

上士文书 宋学德

前天，收到了家乡我女友来信。

几天来，在感情的小河中，我似乎象一叶搁浅的小舟，任凭家乡的女友从遥远的南方邮来如晨曦露珠般的情愫。那涓涓细流却怎么也带不走我心中滋生出的一种情感。促使我写信告诉她，告诉她我在这里曾经历的一切。

多情的6月，原本是属于情侣们旅游北京的日子，然而，首都却被动乱罩上了一层迷雾。一小撮别有用心阴谋家妄图利用学潮在全国掀起巨浪，颠覆伟大的人民共和国，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直至在首都北京发展成一场骇人听闻的反革命暴乱。为了捍卫共和国首都北京，为了不让那些阴谋家的险恶目的得逞，恢复首都正常的秩序和昔日的安宁，我们部队坚决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进京执行戒严任务。

当6月3日凌晨，我们部队在向天安门广场开进时，盲目和轻信被谣言蛊惑而情绪化了的人群围攻堵截部队的官兵。乌云遮住了太阳的光辉，善良被邪恶利用，黑白不分，清浊不明。摆在我们官兵面前的只是乱哄哄的人群。这里面，好人坏人不分，暴徒夹在围观人流中，扑朔迷离。我们是一支人民的军队，来自人民，保

卫人民，复杂的场面促使这支军队要经受住一场政治上的考验，这使我们部队官兵有枪不能使，蒙受委屈，忍辱负重。开进途中，从京郊至广场仅16华里的路程，而摩托化行军的我们走了十多个小时仅开进不到两公里。被围困中，漫骂叫喊声不绝入耳。

“解放军同志请回。”这话还算文明。

“当兵的，北京的事北京人能够处理，不欢迎你们来插足。”话里带着侮辱。

一个三十来岁的妇女，说话溢出尖酸味：“都是一群榆木脑壳，不愧为傻大兵。”

“不准大军进城！”有人趁势高喊口号。

“喂，臭当兵的，聪明点吧，自己动手把车气放了，省得哥们动起手来就不是那么温柔了。”一个歹徒阴腔怪调地说着，见官兵们紧护军车，便在人群中蛊惑大叫，领头高喊：“冲上去啊！”

顿时，形势急剧直下，人群拥上来，被阻截的军车陷入不明真相的群众的肆意破坏中。

官兵们个个义愤填膺，但为了避免伤害群众，仍采取克制、忍让，再克制、再忍让。

汽车被阻截，绿色长龙被分开阻隔，汽车轮胎气被放掉；官兵遭受辱骂和侮辱；共和国的法律被践踏。

在万般无奈、汽车无法行驶的情况下，我们官兵改为徒步行进。

然而，部队徒步行军，并没有避过被歹徒袭击的危险，沿途迎来了雨点般的石头砖块。疯狂的暴徒们显露出了凶残的面目，许多战友倒下了，失散了，落入魔爪中。

记得那时，我在混乱中身上多处已被砸伤，一条腿不能行走。

突然，飞来的一块砖头击中了我，顿时感到头晕目眩，站立不稳，便栽倒在地。与此同时，我恍惚看见一个白色的影子飞快跑向我。当跑到我跟前，我看清是一位十八九岁的姑娘。她迅速扶起我：“解放军同志，快跟我走。”

然而，一群歹徒从后面追上来，围住了我。他们高喊：“打死他，往死里打！”拳脚交加，用石块、棍子毒打摧残着我的躯体，我在剧痛中挣扎着，翻滚着。慢慢地，我被疼痛夺走了知觉。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我被一阵剧烈的疼痛唤醒过来。

“求你们别烧死他，这是我的男朋友。”这时我的耳边传来一位女性的哀怨的乞求，当时我的心曾剧烈地跳荡了一阵……

我似有感觉，阵阵熏人的汽油味钻进鼻孔，我试着加深一下呼吸，我嗅到了。我意识到了所处的危险，几次想起来，可身体似乎早已不属于我，只感到眼前还是一片漆黑。

我使劲睁开眼睛，几缕街道路灯的光线从一堵人墙的夹缝中透进来，几个歹徒在灰暗中一副副狰狞的面孔立在眼前，围住我。还有一个歹徒的手中拎着一桶汽油，阵阵熏人的油气味大概就是从那桶里散出的。这时，我发现先前着白色连衣裙的姑娘跪在那个拎油桶的歹徒面前，她双膝跪倒在地，仰着脸，一头黑发垂过肩头，在后背上方，随头摇摆着。白色的连衣裙下摆曲皱于膝下，腰身后的裙带已散落开来，一头垂落于小腿上，一头被掖在腿下。她正伸出一双手，紧紧抓住那只汽油桶和拎桶歹徒的腿。

望着眼前的情景，我想到刚才她扶我的时候“快跟我走”的话，我感动，我自责。

“放过他吧，求你们了！”姑娘一声声的乞求使我的心阵阵酸楚。我疼痛中的神经感到阵阵晕眩，似乎要裂出皮肉来。我恨不

能一跃而起，让这伙歹徒尝尝军人的拳头。这帮混蛋，狗娘养的畜生！我愤怒之极，血往上涌，嗓子眼里有股气流，呛得我喘不过气来，似有一把尖刀扎在胸腔中。

一个与我素不相识的姑娘，竟为我，忍受这么大的耻辱和委屈，这是何等高尚的灵魂。我多么对不起她呀！

不，这屈辱是不应属于她的，属于她的应该是父母的慈爱，恋人的甜言蜜语，追求者的殷勤，女伴们的嫉妒，正义勇敢者的保护。

看着她那委屈的模样，我好恨呀，恨自己竟无能到这一步田地，去连累一位姑娘，眼见着姑娘在为自己而去承担忍受一切，这一切应由我承担，由我……

我的眼睛湿润了，模糊了，只见姑娘转过脸来，那目光中竟带有敬佩，仿佛在对我说：“解放军同志，你受苦了，要坚持住。”

“贱货，找个傻兵！”歹徒们终于扔下几句讥讽和辱骂，散去了。

姑娘仿佛没听见这些话，只是迅速把我从地上抱起。此时，我心里有好多话想对她说，但却只觉嗓子发梗，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我尽力使自己站住，却力不从心。她扶着我，背过身去，弓身背起我，快步往前走。我伏在她的背上，耳边传来她急促的喘息声。

“请放……”我想下来，但只觉脑子一阵晕眩，眼前一黑，话未说完，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当我再一次醒来时，耳边那急促的喘息声消失了，却见自己躺在病床上，眼前站着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医生。

“你终于醒来了，昏迷了十几个小时。”医生舒口气说。

“她呢？”我喊了一句。

“你是问背你来的人？”

我点点头。

“她把你送来后就走了，她说街上还有许多战士面临危险。当时，我也忘了问她叫什么，你认识她吧？”

我摇摇头，又点点头。我已认识她，永远认识她，她永远在我心中。

如今，我痊愈回到部队，一直没能见到她，更无从了解她的姓名。但那晚触动人心的一幕却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中，那情景时时出现在眼前，我的良心驱使我永难忘却，永远感激她，感激这位在特殊境况下，以特殊的方式救助子弟兵的姑娘。

、夜，静寂而安宁，战友们早已进入梦乡。信写完了，我的眼睛不觉又模糊起来，家乡遥远的女友在期盼着我的复信，我的心也在深深的呼唤：

“姑娘，你在哪里？”



九万六千个包子

大兴县 刘士忠

国务院发出戒严令以后，我们大兴县随即成立了以粮食、工业品、副食品、供销社、商委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军供领导小组。我作为这个小组的一名成员，对过去的一些事情，仍然记忆犹新，特别是那9万6千个包子的事情，时常电影似地出现在我的眼前。

6月7日上午，我在商委值班，桌上的电话“笛笛”响起。我抓起话筒，一个气喘吁吁的声音传过来：“……我是县政府办公室，……有支戒严部队已经3天3夜没吃饭了，现派人来我县要买4千斤包子，下午4点前做完。请你速来。”

是紧急电话。我一看表，已11点1刻！我急迫地说：“时间紧，我不必去了，请你让戒严部队的同志到我这里来吧。”我的心一阵发紧，顿然感到肩上的担子加重了许多。

窗外，烈日发威，树静花草蔫。收割机的轰鸣连同万里麦香徐徐飘来。我点上一支烟，疲劳的眼睛不时看看手表，心里想着那4千斤包子。

烟没抽到一半，戒严部队的同志来了。3人，都穿便衣，一个年老的，40多岁，象首长；两个年轻的，约20多岁。他们的头发短

而硬，没有丁点润光；眼窝深陷，布满血丝。他们也许已经知道我是军供领导小组的负责人，见到我时，他们的眼睛蓦然放光，握手也显得异常有力。

首长让我看了他的介绍信，他的单位是 52399 部队。

首长忧心忡忡地说：“近几天来，暴徒越发猖狂，打军人，烧军车，抢武器弹药，不可一世。城里的饭店大都停止营业了，没关门的，由于误解，也不卖给戒严部队饭菜。战士们由于长时间光吃压缩饼干，身体很虚弱，长此下去，必有生命危险……”

暴徒们的罪恶行为，我在电视上见过。戒严部队的需要就是命令！这任务必须完成。然而，交谁完成？怎样完成？我虽心中无谱，但考虑到部队的处境，反而更有为他们送去的想法。因此不加思索地问：“你们在哪里宿营？”

谁知，解放军同志兴奋的目光荡然消失，憔悴的脸上瞬间布满为难而又警惕的神色。我顿感失言，暗暗自责，盯着满窗阳光，随手抓起电话……这时，只听部队的同志说：“主任同志，请你不要对下边说这是为戒严部队做的！”

我猛回头，面前是三张难以名状的脸。从这脸上，我感到了一言难尽的悲哀！我当即改变了由部分个体户饭店分担包子任务的打算，决定把任务全部交给县服务公司。

在电话里，我把戒严部队同志的来意，向县服务公司经理尹鹏同志作了简单说明。

我们很清楚，戒严部队的同志在城里若能找到一线希望，决不会到大兴来。他们是怀着复杂的心情来的。那随身携带的录音机足以说明这一点。往返的路上险情莫测，眼前最首要的问题是尽快消除解放军同志的顾虑，让他们满怀着希望回京。我对戒严部

队的同志说：在这次斗争中，大兴县上上下下始终旗帜鲜明。现在，虽然舆论仍“倒向”，但大兴人的思想、信仰没有倒。尹鹏同志在电话里也一再表示：一定用大兴县最高质量的包子，迎接军车的到来。

11点30分，尹鹏同志将在电话中受领的4千斤包子的任务，又通过电话，分配给公司所属6家饭店。

4千斤包子需要2千斤面粉，1千斤菜，1千斤肉。

6家饭店全告急：原料不足！有的是有面缺菜，有的是有菜缺面。萃馨饭店接到赶做3百斤干面计7百斤包子的任务时，库房里连包7斤包子的菜都没有，甚至都没有1两富强粉面。

“这是政治任务！赶紧成立应急采购分队，一秒钟也不能耽搁。”尹鹏用电话命令着。

临近中午，街上人流如潮。“大兴也要戒严了！”“部队马上进来，物价还得涨！”……各种谣传，闹得整座县城恐慌不安。就在这种情况下，县服务公司的6支应急采购小分队，开着汽车，势如饿虎下山般地出动了。

6月7日的菜市场，已经彻底失去了往日的公平，有的摊位空着，有的摊位却是人挤人，人压人，可用来做馅的菜很少，菜头几乎不见，大葱一块五一斤，韭菜一斤卖到两块钱。在前几天，这都是二三毛，三四毛钱一斤的呵！

机关粮店门前的抢购风，刮得异常厉害。

溢馥斋饭店的应急小分队，空车而归。

经理邵瑞云急得浑身冒汗。电视上一出现军队的被切割、围截的镜头，她就同副经理商量为戒严部队捐款送物的事。只因想不出安全渠道，愿望实现不了，心情很沉重。这次一接到为戒严部

队赶做包子的任务，顿时满脸开花。她觉着戒严部队里肯定有少数民族战士。她的饭店是清真饭店，她要为少数民族战士做最可口的包子。然而，一棵菜也没买回来。在溢馥斋，没有菜，就等于没有清真风味包子，能让饥饿逼着少数民族战士吃猪肉馅包子吗？不！绝不能！

时间已接近12点。

职工张秀珍跑过来：“经理，我家有韭菜，你赶紧派人去割。”

邵经理的眼睛顿时一亮，微驼的背也用劲直起来。脱口问张秀珍：“韭菜多高？”

张秀珍用手比划着说：“大约这么高。”

“辖！小了，十来公分，哪能割。”

“能割，能割，你赶紧派人吧！”

20分钟以后，张秀珍带着应急采购小分队，将她家不该割的韭菜割回来。没来得及过秤，她也不让过秤。估计，至少200斤。

尹鹏同志跟我说，12点半，6家饭店全都开始了包包子工作。菜和肉全是最新鲜的，面全是用进口的富强粉。

中午1点左右，我下去摸情况路经大兴旅馆，凭感觉，我知道餐厅里正在忙包子，就没进去。事后我听说，中午1点左右的时间，大兴旅馆餐厅里发生了一点不愉快的事情：第1锅包子下屉以后，餐厅经理姜万福同志把全厅职工叫到工作间，郑重其事地说：“同志们，过去我很相信大家，今天，我仍然很相信。但为了确保解放军同志的生命安全，我们每人吃1个包子。我带头先吃。”职工们吃惊地面面相觑，没一人想吃这个包子，但最后，他们还是吃了。吃完，又怀着被人无辜猜疑的痛苦，继续为戒严的解放军包包子

……听着，我为这些职工感到了委屈，同时也十分佩服姜万福同志的行为。

这事也使我不由得想到了溢馥斋。在溢馥斋，为戒严部队做包子的全是共产党员。邵经理负责全管，副经理薛国俊专管尝馅，拌一盆他尝一盆，嘴里说：“加香油了吗？”“加了。”他尝完，说声：“少了。”于是再加香油再搅拌。他再认真地尝一遍。“好！这回可以。张秀珍献的2百多斤韭菜，那么鲜嫩，包子不香对不住张秀珍，更对不住戒严部队。记住，后边的多加。”后边的多加了，但他仍然是反复地尝。他的行为，是否也有姜万福同志之意？

中午1点，是个令人发愁的时间：在这个时间，顾客盈门；在这个时间，6家饭店该有四五十名早点班的职工下班；在这个时间，有人猛然想起各店都有不少临时工已回家收麦子；在这个时间，公司经理尹鹏同志考虑到4千斤包子不够吃，又给几家饭店增加了近1千斤包子的任务。6家饭店考虑到包子个越大，皮越厚，装馅少，还易碎，不好运，从开始就包一两两个的小包子。5千来斤包子，计十来万个，要一个一个地包好，再一锅一锅地蒸熟……原料不足的恐慌刚刚摆脱，人手不足、时间不足的新恐慌又相继而来。

困难重重。

该下班的四五十名职工没一人下班。

萃馨饭店职工刘俊英，凌晨4点上班来做油饼。因被油烟熏燎，早点吃不下，包子任务一来，午饭又没来得及吃。下午3点，终因饥饿、疲劳过度，突然晕倒在地。工友们把她抬进宿舍，她清醒过来，又走进工作间。

陈秋荣，上午11点姥姥家来人告诉她姥姥去世的消息，并让她立刻去处理姥姥的丧事。她向经理刘文海请了假。不多会儿，

包子任务来了，她也决定留下来。任人劝说，开始她还解释两句，最后，竟连话也不说了。

刘经理急了：“陈秋荣，你听到了吗？包子有我们。不就是9百来斤包子吗？你赶紧去！”

陈秋荣似乎没听到，仍然机械地包着，她的眼前，一会儿是姥姥那慈祥的面容，一会儿是打军人、烧军车、抢武器弹药的罪恶情景。她咬紧牙关，控制着眼中的泪。但她最终也没能把牙咬住：“姥姥，头……解放军，遭难了！”

陈秋荣哭了。

刘经理哭了。

更多的人哭了。

萃馨饭店，一度在极度压抑的抽泣声中，为戒严的解放军包包子。

下午4点，公司经理尹鹏同志又给我打来电话，他说，4千8百斤共9万6千个包子已经全部做好。都是富强粉面做的。其中溢馥斋的七八百斤“清真”风味的包子已做好上车准备。他还说，他们刚开完饭店经理紧急会议，针对装包子期间可能发生的问题，相应地制定了防范措施。他说，他们现在对军车能否按时到来非常担心。

我竟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尹鹏想得太周到了。他用电话分配任务；他带领各科室干部到一线办公；他还制定了安全装车措施。

4点10分，两辆拉包子的军车来到了大兴。我给尹鹏去了电话，责成业务科的刘宝东同志，带着军车去了县服务公司。

5点10分，两辆军车，载着大兴餐厅、大兴旅馆餐厅、梅林酒家、黄村饭馆、溢馥斋饭店和萃馨饭店制作的4千8百斤包子，安

全地离开了大兴。我至今觉得，军车拉去的，不仅仅是9万6千个包子。

(肖明光 整理)



永生难忘的深情

下士 刘海清

6月3日晚，我身挎冲锋枪，肩扛一箱子弹，随部队向天安门广场开进。当行至一个十字路口时，遭到数万名不明真相的群众的阻拦和围攻。面对劈头盖脸打下来的棍棒，雨点般飞来的石头、瓶子，部队被迫跑步前进。跑着跑着，我的后脑勺猛的一热，右臂被什么东西重重一击，只觉得天旋地转，两眼发黑，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一阵猛烈的砸门声和玻璃的破碎声把我从一个遥远的世界拉了回来。“把大兵交出来！”“不然把你们都打死！”狂呼乱喊的嚎叫声，强烈地撞击着我的耳膜，刺激着我的神经。我明白了现实所发生的一切。“枪、子弹箱在哪儿？”我下意识用右手去摸枪，稍微一动，脑袋疼得象要裂开一样，右臂不知怎的，一点也不听使唤了。我已经顾不得考虑这些，左手咬着牙吃力地打开了保险，拉开了枪栓，听着外面一阵高过一阵的打砸叫骂声，我心里暗想：谁要是再他妈动我一下，老子就和他拚了，反正早晚都是一死。

就在这时候，身后传来几句地道的北京话：“同志，你不能这样，你的伤很重，千万不要乱动，外面那伙人凶得狠，你千万不要硬碰。现在外头这么危险，你出去等于白白送死。”我费力地转过

头，见眼前站着三个陌生的中年男子。我立即警觉起来，用不连贯却是强硬的口气质问着：“你……你们想干什么？”见我两眼敌视的神情，其中一个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个烟盒大小的纸片，和蔼地对我说：“放心吧，解放军同志，我们不是坏人，要不就不会救你了。”另外两个人也都微笑地看着我。我看他们确实不象坏人，拿过纸片一看才知道，他们三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一个是北京京剧四团的王玉珍，一个是工程师，一个是画家。到此时我才彻底解除了对他们的怀疑。可是，外面的打骂声依然没有停止，情况万分危急。只听他们小声商量道：“必须立即转移，赶紧包扎。”“是呀，他的伤很重，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可是，现在绝对不能去医院，出门等于送死。”“这样吧，我爱人在协和医院工作，我打电话让她回来一下。”那个工程师说道。接着他们说为了避免再发生意外，要把我背到别的地方去。事到如今，我只得任其行事了。为防止误伤好人，我把枪的保险关上了。他们把我背到一个很隐蔽的屋子里以后，把我的枪和子弹箱都锁了起来，又为我找来了便服换上。那个工程师说：“万一有外人进来，就说我儿子被打伤了。”

约摸十分钟左右，一个满脸汗水浑身湿透了的中年妇女，急匆匆地跨进门来，她只是与他们交换了一下眼神，转身便关好门。从贴身的前胸掏出了纱布、药粉、绷带。我想这肯定是那个工程师的妻子。接着，他们三人又帮她给我擦了身子，揩净了污血，包扎好了伤口，又找来了桔子汁、罐头和药片，一点一点地喂给我吃。我当时实在是没有一点力气了，只是一个劲地流泪，用感激的目光望着这四位素昧平生的北京市民。到了下午，我的精神好多了，体力也渐渐恢复，外面听不到打骂的叫声了。三位市民对我说：“小兄弟，你真行，被打成这个样子，都昏了过去，身子还紧紧压着冲锋

枪，两手死死抱着子弹箱。”我笑一笑，说当时的情形我一点也说不清了。接着我又说，“我要回部队去，我的任务还没完成，必须把子弹箱交给领导。”他们说你现在绝对不能出去，街面上依然很乱，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我只得又在市民家里住了一夜。

第二天上午，他们又找来地方的小轿车，要把我送回部队。此时，我的泪水又禁不住流下来，一个劲地说着谢谢、谢谢。北京的老百姓真是太好了。

(王贺良 整理)



送 粮 记

中校团长 崔龙珠

我是30出头的军人了，说句心里话，我从小就巴望着进京看看雄伟的天安门，看看巍峨的大会堂。当我穿上军装成为共和国士兵，略知一些革命道理后，更是把天安门奉为心灵的圣坛。甚至在南疆炮火硝烟中，在生命随时可能葬入边陲红土时，也不曾忘记“打胜仗，立大功，遂宏愿，进北京”。

不曾想，我的宏愿，却是在执行戒严任务这种特定的条件下才得以实现的。在“为民送粮车”内，我凝视着这古老而雄伟的天安门——我心中的圣坛，却以一副令人汗颜的面貌接待了我这个膜拜者。广场上垃圾遍地，纪念碑上斑驳陆离，疮痍满目，繁华的长安街被阻塞，军车被烧，路面被毁，军人被害的现场痕迹历历可见……我忘不了6月8日，带领“为民送粮车队”第一次进京时的所见所闻。同时，我也忘不了子弟兵忍辱负重对人民的深情厚意，北京人民历经磨难后对子弟兵的真诚理解。

6月8日，举世震惊的北京反革命暴乱平息后的第4天。上午8时，我奉命带领10辆火炮牵引车和武装人员46人，前往市马连道粮库，执行为民送粮任务。粮库的一位负责人向我介绍了一些情况：北京自动乱以来，马连道粮库已6天不能按时外运粮食

了，下属的宣武区、朝阳区、西城区、东城区，共62个供粮站，85%的粮食脱销，市民恐慌。这几天有100多人来信来电，诉说缺粮的苦处。有一位25岁的妇女在电话中说：我丈夫在外地工作，一年难得回家一次，家里已断粮两天了，一岁的小孩因大人营养不良奶少，饿得直哭……一位小学2年级学生在给粮库信中写道：“我家一天只吃两顿饭，每顿都是面糊糊，我奶奶生病，越来越重了，我真害怕奶奶离开我，我是奶奶一手带大的呀！家里每顿只煮一小碗大米给奶奶吃，可奶奶总是把白花花的米饭给我。她说：‘孩子吃吧！正长身子的时候，该吃饱，奶奶不饿。’”读到这里，我们46名官兵眼在流泪，心在滴血，大家只有一个念头：快调运粮食，解除市民疾苦。

六月的北京，暑气逼人。从小生长在吉林延吉朝鲜族地区的我，热得真有点受不了。为了尽快将第一车粮食运出粮库，我带领战士登上卡车，投入了抢装抢运的战斗。装满粮食的卡车，在市区公路上行驶着。“为民送粮车队”的大红标语，引来大批过路的市民，有的投来怀疑的目光，有的则流下了感激的泪水。卡车在警察的指挥下暂停下来，一些过往的市民主动上前和我们友好交谈。“解放军真是大好人，你们一心为我们生活安宁着想，天天顶烈日站岗，冒大雨执勤，天这么热还为我们送粮，可你们也是血肉之躯，一定要保重身体，千万别累坏了啊！”一位六十多岁老大妈的话，勾起了我痛楚的回忆，好久没有听到这样慈爱的话语了。我用本民族最高的礼节，打开车门，向那位慈爱的老大妈跪下致谢，说一声：“谢谢你可敬的老阿妈。”

中午12点，我带领的第一批运粮车，在广安门西草粮站停下，此时数百名男女老幼，鼓掌欢呼：“解放军万岁！”“欢迎解放

军！”，欢声、笑声、鞭炮声连成一片。“解放军送粮来啦！”呼喊声越过小巷，很快传遍数条街道。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爷手端着半碗面糊糊来到车前，摸着雪白的优质面粉，眼泪顺着两颊直淌，跟战士们一个个地握完手，什么也没说，边走边擦泪离开了人群。恰在这时，从人群中走过来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人，气冲冲地来到车前，指着我的鼻子尖吼道：“谁要你送粮，我们有粮吃，你这是收买人心，民族的败类！”我的心猛然象钢针刺一般疼痛，身边的战士为了我的安全，把我挡在身后，护卫着我。那青年人的话音一落，一位怀抱小孩的青年妇女，上前一把扯着小伙子的衣领：“你这畜生，不讲良心的东西，你还有人性吗？解放军不辞辛劳为我们百姓送粮，他们为了什么？”人群骚动了，愤怒的眼光都一起射向了那位年轻人。“捆起来，打一顿，以安民心，向军人请罪。”青年人在群众的指责下，灰溜溜地跑掉了。烈日当空，天热如火。战士们一上午没喝上水了，有的战士嘴唇干裂了口子，不时渗出鲜红的血，也没叫一声苦，道一声渴，不停地将沉甸甸的粮食从车上卸下，又一袋袋送进粮店。关闭数日的粮站，又注入了新的血液，恢复了往日的生机。一位5岁左右的女孩从她妈妈钱夹子里拿出钱，买了一根冰棍气喘吁吁地跑到我跟前：“伯伯渴，给你冰棍，我家有粮吃了，冰棍给你吃吧！”这幼小而纯真的话语，使我感动。人们常说：“童心可贵，民心难买”，在北京这特殊的环境下，有什么能比群众这真诚的理解和保护更珍贵呢？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位不愿披露姓名的老大爷，时间虽然过去好多天了，但他那慈爱的面容，诚恳的话语，却历历在目。那天我带领“为民送粮车队”从长椿街粮店返回时，就是那位年逾花甲的老人，端着热气腾腾的粽子，举着拐杖来到车前，声音发抖地拉着

我的手说：“我今年80有5了，共产党是不是为人民着想，有没有功绩我心里清楚，抗日救国共产党与人民同舟共济。解放北平，共产党为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没放一枪一炮。建国40年，中国的变化谁不清楚？我相信共产党的英明决策，没有错，相信解放军进城执行戒严的正义性。端午节到了，这几天让那帮败类闹得有钱买不到东西，我跑了四十多里才到市郊买到包粽子的配料，亲手做了这些粽子。我知道部队的纪律，可这是我的一片心意呀！我要看着你们把它吃下去！”……

卡车的轰隆声伴随着夕阳西沉，火红的霞光将天安门装饰得更加壮美。一天的北京之行，使我感慨万千，我想不出更好的语言来表达一个军人对共和国的尊敬，对善良的北京人民的感激之情，我只好这两句话与经受过狂风暴雨洗礼的祖国共勉，与经受过暴乱之灾的北京人民共勉：穷困曲折是磨砺，夕阳西下明早还会东升。



空中补给线

供应站长 吴铁林

6月5日，首都发生反革命暴乱的第三天。

早上，天阴沉沉的。我们兵站的全体干部、战士在紧张中又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昨天晚上，我们接到上级指示，天安门广场上的数万戒严部队从6月3日下午开始，已经一天多水米没沾牙，指挥部命令我们做好空运食品物资的准备。

形势比我们预想的要严峻得多。我们兵站原来的保障任务只有丰台区近处的部队。向天安门空运物资等于面对整个戒严部队实施保障。总共才有百十人，但从上级的指示看，能够向戒严部队供应物资的，只剩下我们一家了，还有什么说的，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

我们立即召开了党委会，研究物资保障方案。由于事先有所准备，我们已储备了50万斤大米、白面。可是，考虑到一些部队做饭不便，还得筹集一部分熟食。我们立即组织了三路兵马：派运输队连夜去天津拉运食品；采购组就近向地方商业部门联系，力争就近建立物资筹措点；其他人员立即倒库，做好收发物资的准备。

早晨9点钟，我和政委陈国来逐个班组地进行检查。库房内外都是紧张忙碌的人们，从他们挂满血丝的眼上看得出大家都

疲劳，但只见忙忙碌碌的人们，听不见说话的声音，这是大战前的沉默。

我们兵站设在南苑机场内，这里还算平静，但是在营门外面却是另一番景象：主要街道都被群众阻塞，一伙暴徒和群众在营门外喊口号、贴标语、扔砖头，门前警卫的战士也都负了伤。我和政委来到营门口，心里都很焦急，不知道夜里派出的拉运食品的车队能不能安全返回？从地方采购的物资能否及时送到？在外面采购、运送物资的战士生命是否受到威胁？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了，按照指挥部指示，10点钟直升飞机到达，开始空运物资。现在离空运时间还有20分钟。我和政委进行了分工，我带一队人负责在兵站库区接收物资；政委带一队人在机场准备装运物资。全站人都动员起来了，包括打字员、理发员、公务员、炊事员都上阵了。

嘀嘀嘀……随着一阵急促的汽车喇叭声，一队军车急驶而来。噢！运送物资的车回来了，我激动得心仿佛要跳出来。带队的司机张国杰跳下车向我行了个军礼。“站长，我们没误事吧。”从递过来的货单上，我看到有方便面3800公斤、面包1万公斤、榨菜2万公斤……

我赶紧上前握住张国杰的手：“谢谢，谢谢同志们！”顾不上多说，赶紧招呼：“同志们，快卸食品！”过后我才知道在去天津运食品返回途中，张国杰他们被一小伙暴徒拦住了。他们谎称是支援灾区的物资，骗过暴徒。为了躲开暴徒的纠缠，他们避开大路走小路，穿街走巷。司机张国旺被暴徒用铁锹砍伤了左腿，他用药布进行了简单的包扎，带伤坚持开车运送物资。

10点53分，一架漆着蓝条的奶白色直升飞机降落在停机坪

上。还没等飞机停稳，陈政委带着队员顶着螺旋桨旋转掀起的强大气流冲了上去，搬的搬，扛的扛，将物资装上飞机。机舱门小、人多、货物多，一下子，你挤我，我挤你很窝工。“分成两队传送。”人群立刻分成两队，木箱、纸箱、麻袋装的食品，从一双手传到另一双手。

将近 12 点的时候，一阵狂风吹过，豆大的雨点打了下来，紧接着就是一场瓢泼大雨。为了防止食品被雨淋，大家都把自己的雨衣盖在食品上，一个个淋得象落汤鸡。雨大，干部、战士干劲更大，50 多岁的老军医搬起箱子不亚于小伙子，职工杨庆文昨天还因水土不服拉肚子，今天却跑得挺欢，一会儿都不肯休息。

就在大家正忙着的时候，一辆、两辆……地方车开来了，原来是北京肉食厂的书记带车送物资来了，接着北京烟酒糖食品公司的车队也来了，他们送来的有咸鸭蛋、糕点、饮料等，据说：700 多个咸鸭蛋是沿街挨家挨户收购来的。战士们看到群众的运送物资车队的到来，劲头更足了。从戒严开始，战士们看到、听到的是群众对戒严部队的不理解：买冰棍，有的一根卖到 1 元钱；去买白糖，货架上明明摆着，售货员却说就是不卖给当兵的；战士们上街到处受到辱骂、殴打，战士们对军民鱼水情都淡漠了。如今，看到群众送来的物资，心里头都觉得热乎乎的。

从上午 11 点到下午 6 点，整整 7 个小时，共空运 13 架次，各类食品 50 多吨。

当最后一个架次在隆隆的声音中拔地而起，展翅向京城方向飞去，我和政委长吁了一口气，脸上露出完成任务后的喜悦。

（熊 荣 整理）

611 特别空运

中校助理员 洪希涛

在我的一生中，恐怕很难忘掉 1989 年 6 月 11 日这个日子。

这天，我作为一个小小的副团职助理员，居然坐上了专机。一架 20 个座位的“里 2”型飞机，只坐了我一个人。这是五十年代国家领导人乘坐的专机。据说，周总理视察灾区、陈毅元帅出国访问都坐过这架飞机。

我负责押运的这 100 万元现金，就象输给戒严部队的血浆。没有它，在首都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就将无法生存。

上机前，财务部的同志精心为钱币搞了伪装，满满的 4 个大箱子，有的装钱，有的装上稿纸等，封条和外表一模一样；后勤部首长反复叮嘱，并派出 3 台车和强有力的警卫力量，押送箱子到机场。军区司令员亲自批示：“绝对保密，绝对安全。”整个行动由军区作战部直接指挥，东塔机场增哨加岗，加强了警卫力量；沈空派出了安全系数最大的“里 2”飞机，飞行团长带飞，副团长驾驶，保证万无一失。

天空还算晴朗，只有几丝淡淡的云。飞机飞得很低，速度也不太快，脚下的山川、河流、稻田、宅院，都清晰可见。这么好的天气，这么好的机会，这么好的季节，本应该好好地欣赏一下沿途的大好

风光。可我的心，总象有一种沉重的东西压抑着，始终兴奋不起来，一点儿也没有那种览山赏水的兴致。我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前方，大脑中的兴奋和疲劳因子交织在一起，编织着梦幻一般的思绪。

“六·三”以后，一时间说不清形势是好转还是更加严峻。从我接触的情况看，北京市内的银行、票据交换中心、邮局都停止办公。6月6日，总后勤部正式通知，总后供给部队的款项一分也拨不出来。部队用的转帐支票到郊区商店和银行也不好使了。

“钱！没有钱怎么办？”我这个财务助理员首先着急了。搞不来钱，自己就是失职呀！

“上哪去弄钱！”后勤部芦副部长也急了。

尽管我们在部队行动前四处筹款，使部队携带了15天的现金储备。可是，几天内不断接到部队的报告，由于装备损失严重，恢复和补给用款大量增加；还有的部队反映，这几天物价邪了，一个鸡蛋，卖别人两毛，卖部队一元，西红柿要花十块钱一斤。这样下去，坚持七天八天也很困难。

一旦断了钱，部队就等于断了血脉。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等待群众支援？那要得到群众的充分理解。况且，现在是商品经济，没钱，能玩得转吗？

“不能等到兜里花得一分没有了再想办法。”一向主张后勤工作要有超前意识的芦副部长决断了，“紧急从外地筹款。”

沈阳，戒严部队某部的基地指挥部。蔡公杰部长放下电话，立即召集财务部的同志研究筹款对策。

财务部的领导心急如焚。“戒严前线缺钱，想尽一切办法也要保证。”王部长亲自布置，派出处长和助理员到几家银行取款。但

由于受动乱影响，群众出现恐慌情绪，挤提存款，银行货币较空。几经周折，才提出十多万元。

杯水车薪。财务部决定化整为零，多方努力。立即通知锦州、辽阳、长春等地驻军财务部门，千方百计筹措现金，十日内送到沈阳。

6月8日，我乘飞机回沈阳取款时，听说各地在筹款时也遇到不少困难，费了不少口舌。是啊！到处都是困难，我当财务干部近20年，头一次碰到部队用钱要费这么多周折。这是特殊时期，特殊任务的缘故吧！这种特殊的保障方式，可难煞了我们这些后勤官。据一些老同志讲，过去部队执行任务，走到哪里，吃、穿、用都是就地筹集。用飞机给部队运票子，在我们建军史上也是没有过的。

“前方就是通县机场。”听了飞行团长的提醒，我的思绪才从东飞西撞中拉了回来。

机场上，部队和前指的首长们正翘首等待。看见我顺利地带来了100万元现金和200万元的汇票，芦光祖少将深深地松了一口气。

“某军40万。”“某军30万。”正当部队倾囊翻兜，为缺钱发愁的时候，一捆捆现钞送来了！

总后首长表扬了我们的财务工作，军区首长表扬了我。其实，这都是应该做的，不这样，就没有尽到一个财务干部应尽的责任。

（宋景森 整理）

七百五十斤干粮

管理员 邢华玉

6月3日夜晚，天气闷热得出奇。看完电视台的晚间新闻节目，心里总好象吊了个大秤砣。这几天，天安门广场的形势急剧恶化，常常让我莫名其妙地感到要发生点什么事。

事情果然发生了。

11点半，我院接到上级紧急命令，必须在明晨5点半之前赶制部分干粮，以解戒严部队的燃眉之急。原来，戒严部队于凌晨按计划进入警戒目标的过程中，受到少数暴徒和不明真相的群众的干扰，堵截，不少人员负伤流血，大多数人一天水米未进……

会议室里的空气是凝重的。院长在传达上级指示时是那样严肃，处长在布置具体任务时是那样认真，再加上形势本身又是那样严峻。我那颗压抑了许久的心顿时象干柴碰上了烈焰，“呼”地燃烧起来。当协理员问每个食堂完成150斤大饼的赶制任务有没有困难时，我和休养灶小赵，点心房小孙竟然异口同声地回答：“没困难。”

其实，说“没困难”是假话。150斤大饼，按每张2斤计算，就得烙75张。烙一张大饼至少也得5分钟。倒霉的是我们每个食堂只有一个饼铛。这样烙75张大饼就得375分钟，合6个钟头多

一点。还不包括点火,和面的时间。而现在(临近深夜12点)到明天早上5点半,满打满算也不过6个多钟头,怎么能说没困难呢?只能说我们不怕困难。比起天安门广场受阻被打的弟兄,这点困难实在算不了什么。

走出会议室,我悄悄把给养助理老王拉到一边,“喂,除了烙大饼我们还想做点别的。”“做什么?”王助理问。“花卷,糖包。”休养灶的小赵抢着回答,他不知什么时候跟过来的。“我们还想做点蛋糕。”点心房的小孙也跟在后面。“能多做更好,只是你们人手、时间、设备允许不允许?”“没问题。”我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小赵、小孙也附和着,我们想到一块去了。“行,看你们的了!”王助理说话历来干脆。

看我们的了。在干部灶我就是绝对的权威。

我三步两步冲进炊事员宿舍,里面的鼾声如雷贯耳。“起来,起来——”我挨个叫着几个主食手。“什么事啊?真讨厌!”王小明翻了个身,嘴里嘟囔着,他还以为谁在跟他开玩笑呢。“有紧急情况!”我的声音不仅响亮,而且异常严厉,所以几个弟兄像火苗燎了脚似的窜将起来,王小明眼睛瞪得比鸡蛋都大。刘大胜呆滞的目光盯在我脸上,一眨不眨。田福春刚打了一半呵欠,张着嘴象傻子一样看着我。我把上级的命令、任务简单一传达,他们几个就骨碌碌翻身下床,直奔工作间去了。我拦住走在后头的小顾:“你留下。”“我不!”他一扭脖子。“你不是主食手。再说明天早上还得给工作人员按时开饭呢。”他想了想,瞟了我一眼,很不情愿地回到床上。

工作间是“老炊”们的战场。大胜从仓库往外扛面粉,一趟就是两袋。王小明整理案板,干净利索。田福春搬盆弄碗,叮叮当

当。“咱们兵分两路，我和大胜烙饼，王小明，田福春先把做花卷的面发上，再来打下手。”没等我说完，小顾一步窜进来说“我烧火。”“不是让你先休息吗？”我说。“我睡不着。”“那明天——”“你放心吧。”我还没答应，他就急着抄煤铲子去了。

平时干活不紧不慢的刘大胜今晚出奇地麻利。和，揉，切，擀，烙，一刻也不停。他是有着七年“烙龄”的老手了，他烙的饼在我们261医院堪称一绝，有时连上面来检查工作的首长也点名要吃他烙的饼呢。可是今天，听说是给戒严部队烙饼，他却象把握不住分寸似的，一边细心地翻弄着铛里的烙饼，一边小心地问我：“这样行吗？”一会，小王、小田发上面过来了。小王上去就抢大胜的饼铛，“我烙。”“不行，这可马虎不得。”大胜把他推到一边。小田拿着一个面剂儿刚揉两下就想擀，让大胜看见了，急忙制止，“面没和开不行，烙出来的饼不好吃，这可是给戒严部队的。”好一个大胜！平时粗粗拉拉，关键时刻心细得象小媳妇，真让我们服了。我们心甘情愿地给他当了下手。大家围在一块案板上，这个问：“大胜，揉这半天行了吗？”那个问“大胜，这个剂儿大小合适不合适？”把个大胜忙呼得一个劲点头，“嘿嘿”地憨笑着。我到干部食堂七年了，看到大家热情这么高，配合得这么好，还是头一次。

1点多钟，院长来了，说了许多加劲的话，还要和我们一起干。

2点多钟，处长协理员来了，送来了西瓜，汽水。

3点多钟，小孙小赵也来了。他们是来煽呼的，也是来刺探情报的，准是怕落在我们后面。小孙炫耀地说他们是现从养鸡场找来的鸡蛋。就三个人手，蛋糕却已做完好几箱了，是第一流的水平。小赵得意地说他们发挥了最大的优势，搬来了娘子军。这帮女娃子心灵手巧得没人敢比。“你们烙多少饼了？”大胜闷着头问

了一句，他只关心烙饼。“不多，不多，一百三四十斤吧。”小赵单逗他：“我不信。”大胜撇撇嘴，不以为然。可等小赵小孙一走，他就沉不住气了，一个劲地催促着“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大家都这么小声催促着，手里的活干得更快了。饼铛里的油爆声，案板上的擀面声连成一片。“他妈的，真热。”王小明干脆脱掉衣服，浑身上下只剩下一条短裤。刘大胜跑到水池边对着水龙头灌了一肚子凉水。让他喝汽水吃西瓜，他嫌那玩艺不过瘾。

4点多钟，战斗再次进入高潮。一方面烙饼接近尾声，另一方面花卷糖包也登场了。我和刘大胜烙饼一张接一张，掐着点儿，一分一秒不浪费。小王小田一人揉一块50斤重的大面团，累得“呼哧，呼哧”直拉风箱。小顾一会一趟跑进来问：“这火候行吗？”为了给大家鼓劲，提神，我搬来了自己的收录机，把音量调到了最大限度，还拿出我“那位”给我买的两盒“红塔山”。这是我自己舍不得抽的，现在嘛，好钢用在了刀刃上。

时钟接近5点半，我们终于完成了任务。一张张大饼又黄又亮，一个个糖包又白又甜，一个个花卷笑开了口，大家那个热呼劲哟，更是别提了。七里咔嚓一包装，扛着就往总值班室跑。大胜边跑还边喊着：“快着，别让他们赶在前头。”我们刚跑进值班室，休养灶，点心房的队伍也相继跟着来了，经王助理一统计，好嘛！一共750斤。

大家笑了。这是一种完成任务的喜悦。在笑声中，疲劳和困意早就不知跑哪去了。

200 顶 帐 篷

上校副参谋长 侯树森

后勤官，走到哪里都忘不了本行，忘不了牵挂战士的衣食住行。

5月22日，我陪总部及军区首长到沙河机场看望刚刚进京待命的戒严部队。发现从千里之外风尘仆仆赶来的官兵们，到机场后竟住在水泥地上。夜晚，又潮又凉、蚊虫袭扰。白天，烈日当头，连个躲闪的地方也没有。

老天爷也来凑趣儿：天气预报近期北京地区有中到大雨。

我的心就象掉进了油锅。

官兵们做梦都盼望来趟北京。城里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林立，他们却连一顶帐篷也没有。

必须尽快解决帐篷。可是，帐篷在哪儿？机场没有帐篷，兵站没有帐篷，从外地调运，至少要四五天。通县机场有储存的帐篷，可公路全部被堵，怎么运来？“对！两边都是机场，空运。”我找到军后勤部长，商定了两个方案：一是派车绕道顺义县，看能否躲过堵截；二是如果汽车过不去，就实施空运。但空运要经总部批准，我们抓住何其宗副总长视察工作之机，在他临上直升机前进行请示，何副总长当即表示同意。

兵贵神速。军后勤派出两台指挥车探路，几经周折开过去了，随后的20台运输车却毫无遗漏地被堵截了，我们把请示飞机的报告迅速电告总参作战部，两小时后，飞行命令下达了，陆航基地派出了最大的运八飞机，拿出了最好的飞行人员，一下午就飞行3趟。可由于飞机刚加满油，装载量小，只运送50顶帐篷。

晚上，我好歹迷糊一会儿，就被雷鸣电闪惊醒了。趴窗去看，原来是做梦。

天刚亮，我就来到通县机场。哪知兵站配属人员一夜之间改变了隶属关系，昨天组织起来的装卸力量撤走了。真是越急越来事。没办法，我又从戒严部队某部调来8台汽车、两个排的兵力，重新组织装飞机。

兵站人员的工作紧张有序。站长、政委亲临指挥，保管队长、助理员、保管员层层把关。点数的，配件的，装车的，有条不紊，保证40多种配件完整配套，不出差错。发出，装车，上飞机，30顶帐篷，不到半个小时就装好了。

机场上一片紧张繁忙的景象，副司令员亲自指挥和调度，各种飞机不时地起飞降落，拉帐篷汽车时时都要躲闪飞机，让开跑道，飞机和汽车交叉行驶，基地指挥员也没遇到过。后勤部芦光祖副部长亲自到机场指挥。由于前指没有营房助理员，我便主动靠前，不停地奔波在两个机场之间，既组织调动、装机。下飞机后还要指挥卸货，把帐篷及时分发给两个部队。

乌云，象要和机场上的将士们比赛似的，迅速堆积、加厚，越压越低。天气异常的燥热，似乎要把各级指挥员焦急的心情逼到爆发的燃点。

接近14点，最后40顶帐篷装上了飞机。这是“运八3052”往

返的第4趟。7次飞行,200顶帐篷全部运走了。

在飞机上,陆航基地的中校队长告诉我:“一般情况下,是不允许这样飞行的,从通县到沙河直线距离只有50公里,45分钟的航程,飞机还没拉起来,就该降落了。况且这鬼天气,又不能钻出云层,我们只有低空绕行了。这是冒险啊!”

我看见了,天空黑蒙蒙的,能见度低。脚下,要躲闪着建筑物;头上,要小心着低空的云层。我不禁佩服起飞行员的机智和胆量。

沙河机场,战士们卸下帐篷,争分夺秒,一座帐篷城很快就矗立起来了。

15时许,运八飞机还没有来得及回返,天空电闪雷鸣,滂沱大雨倾泻而下。

“好痛快呀!”战士们在帐篷里探头探脑地欢呼着。

作为一名后勤官,还有什么比眼前的景象更令人兴奋的呢?

这一夜我睡得挺香。



他就是残害崔国政 烈士的主要凶手

少尉排长 刘汉臣

6月13日凌晨，我排四个小组奉命执行2点至6点在建国门桥、国际饭店、北京火车站之间的巡逻任务。

凌晨4点钟刚过，我带领战士陈海兵巡逻到火车站，发现有三个衣服不整的人形迹可疑，其中有一个人，双手抱一个木箱子。我们立即跟了上去。

那三个人见我们跟踪他们，匆匆走向地铁口旁边的塔台。我们叫他们站住，那三个人不但不站住，反而爬进塔台。

“有情况。”

我通过电台立即命令离我们最近的第四小组向我靠拢。

2分钟后，战士王四成、孔德祥、傅国明在组长蒋志刚的带领下及时赶到。

我们立即对塔台进行包围，并与派出所值勤的几名同志取得联系。

根据地形，我对现有人员进行了分工。两人占领塔台北侧的房顶，以防他们手中有武器。两人占领地铁口顶部，控制出口，其它同志在塔下轮流喊话。

“你们再不下来，我们就开枪啦！”

4点17分，有2个人边喊：“不要开枪，不要开枪。”边往下爬，下来后交待是河北人，一个叫刘小利，一个叫刘俊海。

“上面还有一个人是谁？”

在我们厉声追问下，二刘供出上面那个人叫赵跃堂，是他们刚认的“头”。“头儿”在6月4日参加过崇文门烧军车，身上还有匕首。

上面是条大鱼。

我们拉动了枪栓。

赵跃堂乖乖抱着木箱爬下来，束手被擒。

少校政治处主任 任文锁

上午9点多钟。

刘汉臣排长与几名战士押着赵跃堂、刘小利、刘俊海来到团部驻地。我立即联想到6月4日凌晨，被暴徒浇上汽油活活烧死、尔后又吊在崇文门过街天桥中央的崔国政烈士。凶手会不会就是赵跃堂？

赵跃堂并不是彪形大汉。瘦小的个子，穿着破旧的裤子，又脏又小的深红花格衬衣，一双斜眼，稀稀拉拉的胡子。

我命令四连四名身强力壮的战士把赵跃堂押上来。

“叫什么名字？”

“赵跃堂。”

“什么地方人？”

“湖北省公安县官沟乡新四村10组农民。”

“哪一年出生？”

“1967年2月28日。”

“知道为什么把你抓来吗？”

“我偷了钱。我在103车站边上的餐馆里与刘小利、刘俊海一起偷了90元钱。当时餐馆没有锁门，我们把门撬开，我进去把箱子抱出来。到火车站，把箱子撬开，里面有一张50元、三张10元、二张5元的票子。现在我抱的箱子就是偷来的。”

“还有别的事吗？”

“没……没有。”

“到底有没有？”

“6月4日凌晨，我在崇文门过街天桥那里烧过军车。”

“杀人没有？”

“没……没有，我不会杀人。”

“崔国政烈士是不是你杀的，你参与了没有？”

“没有，我对天发誓，对天发誓……”

歹徒从来都是凶残而顽固的。

我们决定对赵跃堂等采取政策攻心。

我们读了北京市政府通告中关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内容，读了“高自联”头头，“工自联”头头被抓获和个别立功自首的报道。还让他们看了半个小时有关暴乱真相的录像。

强大的政策攻势象无数利剑，砍断了赵跃堂、刘小利、刘俊海灵魂上的黑色绳索，砍断了他们三人之间曾订立的所谓“至死不说”的攻守同盟。

刘小利、刘俊海看完录像后，说出了自己知道的和自己做过的全部事情。

赵跃堂承认自己在6月4日凌晨用刀子捅过人。

歹徒的防线开始崩溃了。

下午3点钟，从河北藁城县流窜到京的农民刘俊海详细供出了6月12日下午，他在103车站遇见赵跃堂的经过，并交待了赵跃堂4日凌晨残害崔国政烈士的全部事实与细节。我们用录音机、录像机录下了刘的全部交代过程。两名笔录员，记下了刘的全部供词，在刘认可后，让刘按下了手印。

下午5点30分，同时抓获的河北邯郸广平县农民刘小利，也交待了自6月6日以来，赵跃堂曾先后6次对他讲杀害崔国政经过。

佐证到手，一个决定性的战斗胜利了。

“要让赵跃堂承认全部犯罪事实！”

晚7点，细审开始。

晚8点30分，我们拿出刘小利、刘俊海的交代材料，让赵服罪。赵说刘俊海不会写字，不是真的，是唬他的。

晚9点30分，我们放审讯二刘的全部录像。

晚10点，让二刘与赵跃堂当面对证。

晚10点10分，赵跃堂软坐在地上，供出了杀害崔国政烈士的全部经过……

6月3日晚，赵跃堂睡在北京站地铁东进站口。

4日凌晨2点多钟，赵听说解放军进城了，就起来拣了两个啤酒瓶子，两个汽水瓶随着人流来到崇文门。

到崇文门后，赵见许多公共汽车被放了气，作为路障堵在路中央。他就拿瓶子从车上汽油箱里灌上了汽油，由于不好灌，4个瓶子都灌了半瓶。

凌晨4点多钟，赵在崇文门过街天桥下，见到许多人围住了两

辆军车，其中一辆带有挂车，里面装有大米、面粉等。赵见许多人正在向车上扔石头，就抓起两个汽油瓶往车上扔，车当时就着起了火。

之后。赵跃堂看到一伙人正围住一名解放军战士毒打，便掏出一把长约15公分的水果刀上前乱刺，这名解放军就是崔国政，他当即被打倒在地。崔国政在地上挣扎了好几次，想爬起来。赵身边一个穿皮夹克、身高1.80米左右、操北京口音、约20岁男青年，从腰间掏出一根约小拇指粗细的尼龙绳。赵与这个暴徒把崔国政从脚到胳膊一道道绑了起来，绑好后，赵抬着脚，那名暴徒抬上身，他俩一起把崔国政抬上天桥上，并吊在栏杆中央。赵与那名暴徒一起往崔国政身上倒汽油。那名暴徒问谁有火，赵说他有，说着，赵用火柴点着了崔国政的裤子。约10分钟后，因绳子烧断，崔国政掉在桥下，昏死过去。

赵与那名暴徒从天桥东侧绕下，等火熄灭后，赵与那名暴徒商量了一下，再次把崔国政抬上天桥，吊在了天桥中央。

事后，那名暴徒往天安门方向逃去。

赵向火车站窜去。

在车站邮电局门口，赵把刀子和血衣扔到了路边的垃圾桶里。之后，赵又到厕所里用水把手、身、脸上的血迹洗去。

这是凶手赵跃堂参与残害崔国政烈士的全部过程。赵供认不讳。

11点20分，北京市东城区公安分局张副局长带着刑警队，前来将赵跃堂依法逮捕。

14日早6点30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节目里向全国人民报告了杀害崔国政的凶手赵跃堂已被戒严部队某部和公

安机关抓获的重大新闻。



傍晚,在军事博物馆

中尉排长 刘 崇

1989年6月6日,是首都平息暴乱的第三天。

中午,虽说天空下起小雨,但天气还很闷热,京城笼罩在一片威严而紧张的气氛中。匆匆来往于军事博物馆门前的群众,脸上还带着恐慌之色。长安街上横七竖八摆放着被烧毁的车辆。

下午1点,部队接到上级指示:清除复兴路上军博至木樨地路段报废的军车和公共汽车。我们排的任务是担负军博正门的警戒任务。

“人在军博在,保证军博万无一失。”这是我代表全排对上级表的决心。

军事博物馆内,驻守着戒严部队不同单位的两万多官兵。这里有许多枪支和弹药。汽车、装甲车一辆挨着一辆。显然,这里是暴徒最想破坏的地方,如果稍有疏忽,让暴徒混进军博,那后果将不堪设想。我顿时感到,我们警戒军博,肩上责任重大。

战士们由于受专业的限制,大多都没有学过战术,不会利用地形地物保护自己。我利用部队换岗间隙,召集全排战士,给他们讲利用地形地物的动作和要领,正在这时,军博对面的楼上,突然,响起了一阵“哒哒”的枪声,还没有等我们反应过来,一排子弹正打在

战士姜立中和李永清前面不足一米远的地方，立即升起一团土雾，庆幸的是战士没有负伤。果然不出所料，暴徒注意上了军博。

我迅速安排战士加强警戒力量，嘱咐他们要保持高度警惕。雨点还在不紧不慢地落着，浇得人心烦意乱。

晚上8点左右，部队清除路障陆续回到军博，战士们一个个累得疲惫不堪，有的衣服斜披在身上，有的裤腿卷起一尺多高，腿上湿淋淋的。看到战士们累成这个样子，我站在哨位上一遍遍地喊道：“战友们辛苦了！”不少战士激动地向我鼓掌。

突然，一位全身穿85式的确良军装，留着长头发，推着自行车的青年人尾随部队进入了军博。据我知道的情况，戒严部队很少有带着自行车进入城区的。他蓬头垢面，神色慌张，从外表看根本不象军人。我当即叫上汪爱礼、刘建超两战士，一同紧紧盯上他。

当他行至院内老干部俱乐部门口时，收住脚步，好象在寻找什么。我们走上前去拦住他的去路，我问他：“你是干什么的？”他看看我们，强作镇定地说：“我是总政首长的警卫员，到这里来找人的。”说着装模作样从兜里掏出了一个小红本亮了一下，又立即收了回去，我把他红本要了过来，打开仔细一看，象是伪造的。于是，我和战士汪爱礼、刘建超一道将他送到了军博保卫处。

经公安机关审问，这个青年人是个反革命暴徒。6月3日晚，他在复兴路北京铁路局门前路上，先向被堵截的军车倒汽油，然后用火把车点燃，前后燃毁装甲车5辆，汽车4辆。这次窜入军博妄图再次焚烧军车。

夜幕拉开。喧闹了一天的北京安详地睡着了，但警卫首都、警卫军博的战士还在哨位上……

（郑自民 胡治锋 整理）

楼 顶 着 陆

中队长 连文生

6月4日18时12分。上级命令我团派一架飞机到阳坊镇装运防暴器材，然后直接送到××部大院，降落点设在5号楼楼顶上，同时指示：首都上空飞行要确保安全，日落以前（20时18分）必须返回机场。

任务交给了我们机组。作为机长，我深感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楼顶着陆并卸货尚无先例，过去也未训练过；在高楼林立的市区内寻找一栋平顶三层楼并一次着陆成功，难度也比较大；更重要的是楼顶能不能承受得住飞机近十吨重的压力。使用机上吊索不行，半空投放也不行，唯一的办法就是采用在楼顶上半着陆的方法把货物卸下去。这样做无疑要承担极大风险，可是，比起那些为保卫共和国流血牺牲的地面战友，我们冒点险又算得了什么！利用起飞前的时间，机组进行了简短的协同和分工。同志们表示：我们有云南前线空运救护和大兴安岭扑火救灾的成功经验，有前一阶段夜航训练和野外着陆训练的坚实基础，我们有信心和把握完成好这次任务。

18时40分，直升机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腾空而起，径直向阳坊镇飞去。此时，空中灰蒙蒙的一片，零星小雨时断时续，能见度

只有一公里左右。领航员王振明对照大比例地图计算数据，掌握航迹。飞机保持300米平飞，飞行30分钟后，到达指定的经纬度位置点上空，却没有发现着陆标志。估计到地面尚未准备好，听到飞机声音后会加速行动，飞机在目标上空进行盘旋，很快发现有人匆匆忙忙扛着红旗边跑边插，围成一个临时起降场。我们着陆后，运输车辆和部分人员迅速靠近飞机，按照分工，副驾驶王守志办理交接，领航员守护尾桨，机械师白光银在机上摆放货物。机组人员和地面人员一起以最快速度装好飞机，飞机再次起飞。

飞机经过西郊机场进入市区。机警地避开高大建筑群和电视天线等障碍物。天色昏暗，视野模糊，大家睁大眼睛极力搜索临近××部大院的明显参照物。飞过这个参照物约一分钟，我们就看到有人站在一栋平楼顶上挥舞着红旗，同时也看到楼的周围聚着很多人，从而判断这是××部五号楼确定无疑。五号楼是一栋旧式三层楼房，长约50米，宽约30米，且四周有半人高的安全墙，不仅如此，周围都是比它高的尖顶楼房。降落条件比预想复杂得多。根据风向，风速，我们决定由西向东沿楼的走向着陆。我操纵飞机转盘修正航向，并把飞行速度减到100公里左右，选择最佳下滑曲线慢慢降落。通常，着陆期间判断高度的主要依据是无线电高度表，可是在这高低不一的楼群间显然不起作用，只有靠目测判断。五号楼犹如一座孤岛，飞机高度高，速度大，就会飞过去；反之，高度低，速度小，又会飞不到。要保证一次着陆成功，非得竭尽全力。关键的时刻到了，我保持飞行状态，副驾驶拉开玻璃窗探出身子及时提示，领航员目视前方打着手势。好，飞机恰到好处地悬停在楼顶2米的上空，我提着油门变距，谨慎地往下放，当感觉到飞机的右轮已经挨着楼顶时，就柔和地稳住杆、舵和油门变距，使飞

机的前轮和左轮悬着，机械师立即打开货舱门，迅速把货物卸了下去。飞机起飞了，楼顶上的人群挥动着红旗，高举着双手表示欢送。经过1小时30分钟的飞行，我们终于在日落前几分钟回到了机场。

飞机关车后，首长和同志们迎了上来，祝贺我们成功的降落。此时此刻我才如释重负，深深地松了一口气，我们终于圆满顺利地完成了任务，没有辜负上级对我们的期望和重托。



“冒牌警察”落网记

上尉股长 田学东

“叮咚……”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房内宁静。办公桌上红色电话机铃声在提醒我们：有情况！

我的新同事，石景山公安分局苹果园派出所的年轻干警小李，眼急手快地抢过电话：“喂，你好，我是苹果园派出所……”

“你们警察太不象话了，耍流氓骗钱财，不是好东西……”一阵愤懑而柔缓的女声从话筒传出。小李一愣，攥着话筒呆住了，“这、这是怎么回事？”还没等他缓过神，电话啪地一声断了。

这奇怪的电话后面一定有文章！

几乎同一时间，派出所接到了上级单位的通告，辖区内有群众反映一干警违反组织纪律和规章，私自一人以戒严为借口违法乱纪。

1989年6月12日、13日，两天时间里就有七人来到苹果园派出所检举揭发，这些受害者大多数是二三十岁的女同志，她们反映，在福田寺、刘娘府及苹果园一带，有一自称是受戒严指挥部领导，从外地来京的警察，在盘查行人时多次调戏妇女、敲诈财物并私闯民宅污辱女同志，拿着枪、匕首、手铐恫吓群众。

是谁竟敢在首都戒严期间如此胆大妄为？是谁竟别有用心给

戒严抹黑？

消息传到了我所在的某部“老虎团”指战员耳中，团首长明确指示：尽职尽责，全力以赴协助、配合公安干警，把这起扰乱人心，具有破坏性的事件搞个水落石出，决不允许有人玷污戒严、破坏社会安定。

首先我们依靠群众力量，把罪犯的面目勾勒出来：

此人身高 1.79 米，皮肤较黑，满脸凶相。壮实蛮横，年龄约在 23 岁至 26 岁之间。

他经常利用天黑时候视线不清的机会，在苹果园、福田寺、刘娘府以及永定河畔作案，他身穿公安制服，携带手枪、匕首、手铐，将目标放在年轻漂亮的女青年身上。以检查武器为名掀起女同志衣裙进行所谓“检查”，还多次闯入民宅、民工工棚以查户口查证件为名诈骗钱财、敲诈勒索，掀起女同志的被服……更为恶劣的是他口口声声称“我是戒严指挥部的，是执行戒严任务的公安人员”等，在人民群众中造成很坏影响。

14 日下午，在苹果园派出所，一场由军、警、民联合参加的案情分析会在紧张地进行，经过核实，按公安、部队执行任务的有关规定，凡是执行任务的有关人员根本没有单独一个人行动的，也不存在什么从外地借调到北京执行戒严任务，而又是北京口音的公安人员。

一位熟悉对手面目的群众自告奋勇地为公安人员辨认。

由解放军指战员、公安干警联合组成的四个行动小组经过周密布置，行动小组各就各位，只等猎物出现。

北京的夏夜，直到晚九时多天才慢慢黑下来。马路上散步的行人悠闲自得，福田桥下流水淙淙，河畔花草丛中，一对恋人正亲

热地呢喃着。

“干什么的？”沙哑粗暴的声音，打破了宁静的氛围，那对恋人吃了一惊，一个粗黑、凶狠的“警察”不知从何处冒出来了。

“没、没干什么呀，我们在这里呆呆。”恋人不知所措。

“呆着？呆什么！北京戒严了你们不知道？”

“知道。”

“知道你们还跑出来！”，那“警察”粗鲁地逼问，“你们的证件呢？”

男青年掏出了证件，他一把抢过去看也不看就问那女青年，“你的呢？”当他知道女青年没带证件时就开始勒索。

“没有证件，那就罚款五百元钱。”他明知那对恋人身上没带那么多钱，便得意洋洋地掏出一支手枪，套在指头上转起来，“没钱就老老实实跟我走，我是执行戒严任务的公安人员，不老实我就毙了你们……”

他得意忘形，却不知法网正等待着他。

在福田公墓一带，我公安人员和解放军战士已设下包围圈，等他近一个小时了。战士们忍着蚊虫叮咬，不顾夜露打湿衣衫，一动不动地坚守在岗位上，他的一举一动已在严密的监视之下。

“警察”带着那对恋人，向偏僻的乡村走去，距福田桥东二百米处，一个已没有人的灰石场，一盏昏暗的电灯照着杂乱的旧棚房，四周的夜，静得可怕。当他来到一间旧房子门前时，昏暗的灯光正好照射在他那凶狠蛮横的脸上。埋伏在十几米处树丛中的证人看清了，朝公安干警点了点头。

在那个“警察”推开门的刹那，担任近距钳制的我和派出所干警小陈、小侯如箭般无声无息地冲到门两侧。几乎是同时，那人转

身要将女青年带进房内。说时迟那时快，我们三人把他包在中间，挡住了他的退路，我们拿出证件，“我们是执行戒严任务的……”

那家伙一见我们，傻了眼，顿时凶相毕露，他举起手中的电击手枪企图行凶，我与小侯一左一右扭住了他的双手，小陈猫下腰紧紧抱住他的左腿用力一拉“扑通”一声，这个假威风的“警察”倒地就擒了。当时的时间是6月15日晚上10时35分。

当公安人员押着这个穿警服、耷拉着脑袋的人，从街上经过时，许多人很惊奇，直到他们得知这个家伙就是冒充戒严人员进行破坏的坏蛋时，大家纷纷拍手称快，感谢公安干警和戒严部队为民除了一害。

这个冒充警察的罪犯，名叫陈月祥，今年二十四岁，是海淀区四季青乡黑塔山的农民。他一贯不务正业，早在1979年，他14岁时就因盗窃而被少管二年。据他交待，他是想利用动乱之机败坏公安机关和戒严部队的声誉，挑拨群众与政府的关系。他利用警服、警具威胁群众，进行流氓犯罪活动，自以为手段高明，但从接到举报到一举抓获他，我们只花了四天时间。“冒牌警察”的寿命就彻底结束了。

南新华街前的哀思

下士 刘 刚

王锦伟，我的好战友。今天，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到这里，你殉难的地方——南新华街 82 号门前。我禁不住哭了，有生以来第一次哭得那样伤心。面对你鲜花翠柏簇拥的遗像，我独自默哀了很久，很久……

你走了，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当代大学生报效祖国的赤诚之心。

你走了，带着一个“学生官”美好的梦。

一幅幅白色的挽幛记述着你的生平，首都晴朗的天空，映下了那惊心动魄的一幕——

6 月 3 日下午，咱们部队奉命向天安门广场开进。当我们在右安门被少数暴徒和成千上万不明真相的群众围追阻截时，团首长命令部队下车徒步开进，留下你和协理员邵成勋带领 40 名战士负责看守后勤物资和弹药。6 月 4 日凌晨 1 点多钟，你们接到向前运送弹药的命令，你立即指挥车辆开进。行至右安门南侧，车队再次受阻。此时，你深知暴徒的袭击目标已放在干部身上，但为了迅速把弹药安全运送到指定位置，你挺身而出，一方面劝群众理智，一方面劝战友克制，不要开枪。暴徒们很快认出你是指挥员，

石块砖头一齐向你砸来，你左腿受伤了。在战士的生命受到威胁、弹药随时都有可能被暴徒抢劫的危急时刻，你镇定自若，忍着伤痛，带头扛起一箱子弹，带领战士们改道太平街，徒步向天安门广场前进。你冒着暴徒的疯狂袭击，一路上跑前跑后，不断鼓励战士们：“要挺住，要跟上，人在弹药在！”……

4时30分，你带领后勤小分队行至南新华街82号门前，穷凶极恶的暴徒把路灯打灭，并用枪袭击部队。突然，一发罪恶的子弹击中了你的后背，你倒在了血泊中，鲜血染红了首都的街道……

我的好战友，你的手中不是也有钢枪和子弹吗？！……

你的伤口流着血，可你还说：“不，不能开枪，好人和坏人混杂在一起……”

你以鲜血和生命，表达了对党的忠诚、人民的挚爱，填写了一张“合格”答卷。

你知道吗？指战员们得知你牺牲的消息都非常悲痛，后勤处的官兵更是个个泪流满面……

本来，你很幸运，17岁的山村放牛娃考入了地区师专，并以优异成绩获得大专文凭。这在当时，正是文凭吃香的时候，当兵被认为是吃亏的事，你却不顾一些亲友的劝阻，毅然投笔从戎，考上了西安陆军学院。你说你爱绿色。绿色象征着生命。

由于你的刻苦努力，你成为学院的“全优学员”。领导在征求你对毕业分配的意见时，你说：“我是从农村长大的，能吃苦，请把我分配到野战部队去吧！”就这样，你被分配到连吃水都很困难的“夹皮沟”里当排长。

在排长职位上，你一干3年，年年受奖。入伍6年，4次调动工作，都愉快服从分配。你干一行，爱一行，默默地把自己的知识

和才能奉献给从小就向往的军营,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记得去年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在山上跑步,见你正独自在山顶上埋头看书,我故意用英语说道:“Good morning(早上好)!”你很礼貌地回答:“Good morning(早上好)!”“What’s your name(你叫什么名字)?”“My name is Wan Jin Wei(我的名字叫王锦伟)。”谁会想到,一个小小的玩笑,竟使我们成了朋友。我们常常在一起谈人生、谈理想、谈事业,谈成吉思汗、斯巴达克和巴顿。由于和你的交往,使我增长不少知识,使我懂得人应该怎样活着。你常说:“人活着不能光想着自己……大学生的价值不在于拥有多少知识,而在于怎样把自己无私奉献给祖国和人民。”

的确,你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我的好战友,现在,你已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并记一等功,中央军委还授予你“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南新华街前,渐渐被越来越多的白花、黑纱、挽幛所覆盖,这里的每一块水泥板都凝聚着人们深深的哀思。你那高大的身躯,是在人们心中树起的一座不倒的丰碑!



太阳伞

上士班长 李洪海

公元1989年6月24日。晴。

三元桥。哨兵。

比地面高出十几米的三元立交桥，热浪已把这里的水银柱推到42℃的刻线上。无遮无盖的沥青路面晒出了油。毒日使往日流连忘返的人流消失了。只有我和我的伙伴们全副武装站在桥面的哨位上。

烈日酷暑真无情。站在2号哨位的我，不到半小时，汗便湿透了衣服并顺着裤角流到了翻毛皮鞋里。我担心3号哨位的陈传辉能不能坚持住，他出发前偷着量了一下体温：38.8℃。这热上加热和雪上加霜不是一样吗？正想着，就见他瘫软在哨位上，巡逻哨立即把他背到了桥下阴凉处。接着，1号哨位的王士军也因气温高，失水过多，造成中暑性休克，被巡逻哨背到了桥下治疗。报话兵李利这几天食欲不好，我以为小李是想病中的母亲，劝他想开点。今天一上岗就看他的脸色不对，几次让他下去，由别人替换，他就是不肯。站岗时，他总是弓着腰把冲锋枪顶在前胸上，我还暗暗责怪

他军容不整，谁料中午下岗他就被送到医院做了胃切除五分之三的大手术。就这样，先后有9个伙伴晕倒了背下去，清醒后又回到岗位。

我的战友被酷日晒晕、休克的前前后后，最感人的场面发生了。从清晨一直到日落，一个个自发组织的家庭慰问团，用不同方式向全副武装的哨兵表示慰问。我在激动之余，摄下了6月24日发生在三元桥上的一组镜头：

8时50分。一对中年夫妇领着他们的小女儿来到1号哨位王士军跟前，送给小王一盒雪糕，小姑娘天真地说：“爸爸说让我把零钱放到聚宝盒里，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今天真热，叔叔站岗辛苦，我觉得给叔叔买雪糕最有意义，爸爸妈妈可支持我啦，请叔叔快吃雪糕解解渴。”

正午时分。古楼中医院退休老大夫刘庆华，他已是白发苍苍七十多岁的人了。当他听说桥上执勤哨兵不少中暑晕倒的消息后，很激动地捻了一下胡子，马上和老伴找出家里所有防暑药品。拄着拐杖，背着药包，颤颤巍巍地步行3里多路把药送到哨位战士手中。他看到战士脚下被汗水滴湿了一片，动情地说：“你们在桥上执勤，不顾炎热天气，为首都千万个家庭站岗放哨，维护治安，老朽我一辈子从医，几经沧桑，最后看准了共产党能打天下；平息反革命暴乱，我又清楚地看到了解放军是人民的钢铁长城，是千万个家庭的保护神，今天我亲自给你们送药，才使我不安的心得以自慰，也代表我们一家的心愿。”

我们的眼眶湿润了，泪水和汗珠一起从面颊上流淌下来。

正午30分，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领着孙女给2号哨位姜洪台送去了两个大西瓜，说是以全家的名义而来的，必须收下才行。

几乎同时，两位戴眼镜的姑娘用网兜给我送来两个大西瓜。她俩诚恳地对我说：“我俩是邻居，又是大学同学，前几天也和其他同志一样，做了一场恶梦，现在想起来真后悔。你们从东北来北京，受了不少委屈，也吃了不少苦。我们两家派我俩来送西瓜，希望得到你们的谅解。”

下午3时。当水银柱爬到44℃刻线时，地球象凝固了一样，没有一丝风，闷得喘不过气来，象窒息一样难熬，我心里骂老天爷太不给情面。这时，一位50岁左右的老同志来到我的跟前说：“小同志，我每天下班都从三元桥上过，看到你们在烈日下全副武装站岗执勤，很是心疼。你们若在父母身边，还都是孩子，现在你们受的苦，都是为了首都千万个家庭得以安宁啊。我们全家经过商量，决定给你们买一把太阳伞，遮遮烈日的酷晒，以表我们的寸心。”说完他把太阳伞和的一封信放下转身走了，我问他叫什么名字，哪个单位的，他边走边回答：“名字在伞里边！”我急忙打开伞一看，在太阳伞的边上工工整整地写着：“钢铁长城，首都卫士”，落款是：“首都一家庭”。在他慰问信上这样写道：“在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日日夜夜，你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为保卫共和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在站岗执勤中，你们发扬了‘两不怕’精神，坚守岗位，克服困难，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塑造了文明之师的形象。我是老共产党员，又是一名老工人，几十年受党的培养教育，大理论我说不出来，但只有一个信念是我深信不疑的，就是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新中国现在的一切。在党和共和国有了危难之际，你们旗帜鲜明地跟党走，一举平息了反革命暴乱。我，一个老工人由衷地佩服你们，希望你们在四化建设中，做出新的贡献。”老工人的话象一滴水，映照出首都人民对子弟兵的信任和爱戴。

我是一名普通士兵，在血与火的老山战场上，没有掉过一滴泪，但在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官兵被歹徒残杀剖腹暴尸时，流下愤恨的泪。而今天，首都家庭给予战士的情与爱，又使我流下了激动的泪。三元桥的一天，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

(鞠 杰 整理)



唱支军歌给党听

上尉股长 吴 君

萍妹：你好！

借着结满灯花的烛光，我在大棉帐篷里给你写信。今天，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我们戒严部队歌咏代表队给党和国家领导人唱歌啦！

6天前，上级指示我部组成一个234人的歌咏队，届时参加总部举办的首都戒严部队暨驻京陆海空军、武警部队“庆祝七·一歌咏大会。”消息传出，帐篷林立的营地沸腾了。“我去！我去！”官兵们有的软泡硬磨，有的毛遂自荐，纷纷拥来，接受挑选。

“股长，这事儿可别把我落下。”一个毛头小伙子硬挤到我面前。哟，这不是高炮连颇有名气的“军中百灵鸟”小江吗？原来小江正在理发，等不及将头发茬子拾掇干净，就跑来了。

歌咏队组成了。在总部给戒严部队推荐的16首歌中有一首令我们格外亲切，这就是《学习雷锋好榜样》。萍妹你知道，雷锋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首要品格，就是忠于人民忠于党。他的出现，是祖国的骄傲，时代的骄傲。在练习中，大伙越来越感到：我们是代表部队去向党献歌，就应当在内容上尽量体现本部队的特点，在形式上唱出本部队的特色。渐渐地，我们都把视线集中到了

《学习雷锋好榜样》这首军歌上。真没想到，“英雄所见略同”，在上级下达的补充通知中，总部为我部指定的曲目，竟与我们不谋而合，正是《学习雷锋好榜样》。

这几天，老天好象有意跟人过不去，京东一带，三十七八度的高温持续不下。而我们的营帐，又偏偏扎在一片空旷无碍的草地上。再往外探寻是一株株拔节孕穗的高粱地，根本找不到一处可供几百名官兵同时遮荫蔽阳的地方。许多时候，歌咏队员们只好顶着烈日挥汗歌唱，工兵连下士商伟东唱着唱着，突然中暑，倒在地上。不一会儿，又有3名战士晕眩欲倒……然而，战士们自称是“拥抱太阳的骄子”，仍然挺胸昂头，盯着指挥放声歌唱。

有道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战士们的歌声在日头和汗珠的锻打下日臻纯熟了。就连总部歌舞团指挥姚家杰老师来审视后，也禁不住由衷地夸赞：“怎么来评价你们的歌声呢？三个字：太棒了！”

前天傍晚，我们的歌咏进入了取优汰劣、正式编队的阶段。在合唱中，我发现二机连有个小胖子站得特别直溜，嘴也张得特别圆，便抽他单独来一段。谁知他却羞色满面，一味擦汗，说啥不肯就范。事后，连的班长悄悄告诉我：“久纯唱歌跑调，他让大伙替他保密。”呀，原来这里面有“混子”！自然，我无法迁就他。方队解散后，我授意久纯的指导员：“做做工作，明天叫他别来了”。谁知第二天，他又来了。久纯抠巴着水壶带子给我下小话：“股长，留下我吧，我唱歌不行，可以给大家烧开水；去唱歌时，你把我带着，我给你们看汽车，当警卫……”我心肠一软，竟答应了。

遗憾的是，我们的“百灵鸟”却未能如愿以偿。今天下午，就在军车编队准备出发时，小江突然喊肚子疼，额上的汗水一串一串往

下淌。他趴卧在铺板上，用脑门顶开帐篷的一角，眼巴巴地望着“歌友”们各就其位。汽车的引擎响了，小江噙着泪水对我说：“股长，我不能去给党唱歌了……”我连忙安慰他：“别难过，我们一定铆足劲，替你唱……”不知咋的，我鼻根一酸，一汪咸雨也漫湿了眼眶。

今天，环形的空军体育馆美若苍穹，各路歌咏精英恰似群星灿烂：兄弟戒严部队的4支歌咏队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海军战士军乐队和武警战士军乐队来了；驻京部队文工团的16位著名歌唱演员和董文华同志也来了，伴随着《人民军队忠于党》的主旋律，我军3500名忠诚卫士就在这里放声高歌，欢庆党的68周岁生日，欢庆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胜利闭幕。

萍妹，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们曾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这支歌，在党的召唤下，奔赴唐山，抗震救灾；赴奔海城，抗洪抢险；奔赴辽河，把辽宁的“宁”字扛在脱皮掉肉的肩膀；奔赴大兴安岭，用青春的喷泉扼制吞噬生机的火光……曾几何时，一个意念在我的心扉开始冲撞：什么时候，才能让我们云集首都，放歌北京，让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耳听听呀！连做梦也没想到，在这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今天，这个美好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该我们演唱了。但见我们的“首席指挥”小孙把小臂一扬，“刷！”234副白手套宛如雪浪飞翻，将234顶军盔高高托起，稳稳地安放在234颗黛若礁石的头颅上。小孙再把双臂一展，234座“春山”夺“波”而出，又恰似长城昂首迎朝阳：

学习雷锋好榜样，
忠于人民忠于党。

爱憎分明不忘本，
立场坚定斗志强。

.....

挟雷裹电，大气磅礴的歌声就从这“雪浪”之间、“春山”之巅猝然迸发！

在这一瞬间，我突然领略到一种崇高的壮美，一种境界的升华，一种信念的交汇，一种理想的融洽。党，就在我心田；我，就在党的心房……

啊，萍妹，我太激动了，太幸福了。朱伯儒同志有一句名言：两个人分担一个痛苦，只有半个痛苦；两个人分享一个幸福，就有两个幸福。萍妹，就让我们共同分享这个幸福的时刻吧！

烛光眼看就要贴着铺板，熄灯号也毫不通融地吹响了。文短辞涩言不尽意，就乱画到这里。



祝你

娇好！

你的军哥

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九日夜

《戒严一日》（上集）

总政文化部征文办公室 编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印张14·字数311,000

1989年10月第1版·1989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30,000

ISBN 7—5033—0103—1/I·92

定价：5.60元（膜）